

满洲黑手党

俄国纳粹黑幕纪实

刘万钧等 编译



THE RUSSIAN FASCISTS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1

满洲黑手党

——俄国纳粹黑幕纪实

刘万钧 郑志宏 编译
曹 默 苏继东
刘万钧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封面设计: 冬 妮

满洲黑手党

Manzhou Heishoudang

——俄国纳粹黑幕纪实

刘万钧 郑志宏 编译

曹 默 苏继东

刘万钧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 8/16

字数: 330,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7-01080-X/I·223 定价: 7.00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约翰·斯蒂芬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1971年，在一本1942年出版的旧杂志上，一篇题为《俄国法西斯分子在哈尔滨》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求索精神，立志要对“俄国法西斯”的来龙去脉穷源竟委，乃于1971年到1975年间周游了英、德、苏、日、美诸国，借助于因时间久远而解除了对档案资料保密的规定，查阅了这些国家有关机构档案库中的俄国法西斯分子档案，并走访了有关的历史见证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本书基于这些资料再现了近代史上一段扑朔迷离而又被人们忽视了的插曲。

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流亡国外，这些流亡者中有逃避革命的旧军官、政客、地主、富商，也有逃避内战、外国干涉和饥馑的农民和无产者。他们生活漂泊，精神空虚，而在政治上则各自保持不同的倾向。一些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人，认为反革命可以使他们重返故里，并恢复他们从前的天堂。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一小撮法西斯分子。这一小撮流亡国外的俄国法西斯分子搞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十字军运动，妄图借助于德日对苏联的进攻，消灭苏联共产党，接管苏联

政府，在苏维埃国土上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本书记述了这场“十字军运动”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作者以丰富、有据的资料，翔实、生动的叙述，揭露了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反动思想和罪恶活动。作者又以辛辣的语言，幽默的笔调，讽刺了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愚蠢和狂妄。书中既有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情节，也有马克吐温笔下的滑稽场面。这帮俄国法西斯分子欲为其所不能为，很可悲；其装腔作势的小丑表演，很可笑。但是作者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法西斯的俄国，很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作者对俄国法西斯的性质、产生的根源和其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的原因都根据他自己的观点作出了可取的分析。至于他根据自己的观点对苏联的一些提法以及他使用的一些历史上的地名，诸如“满洲国”、“新京”等等，我们都原文照译，以保持原书的面貌。

本书正文20章，郑志宏翻译了《序》和第1—5章，校订了第16—20章和《事后分析》的译文并对全部译稿作了文字润色；苏继东翻译了第6—10章；曹默翻译了第11—15章；刘万钧翻译了第16—20章和《事后分析》，校订了《序》和第1—15章，并最后统校定稿。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述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所长徐景学、副研究员高云山、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郝建恒、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洪声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一定会有不少纰漏乃至谬误，请广大读者多多指正。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1

第 一 章 散居国外的俄国人.....	12

第 二 章 欧洲俄国流亡者右派的形成.....	32

第 三 章 在中国的白俄居住区.....	54

第 四 章 来自海兰泡的小伙子.....	74

第 五 章 同日本人的关系.....	89

第 六 章 满洲黑手党.....	104

第 七 章 俄国灰姑娘.....	129

第 八 章 新英格兰的俄国领袖.....	164

第 九 章 拼凑法西斯联合阵线.....	182

第 十 章 哈尔滨最高级会议.....	199

第十一章 分裂.....	223

第十二章 蔓延.....	242

第十三章 远东风格的国民革命.....	263

第十四章 康涅狄格州的把戏.....	291

第十五章	风暴骤起.....	321
第十六章	预示未来的一年.....	361
第十七章	小丑表演，受到惩罚.....	391
第十八章	哈尔滨的最后探戈舞.....	432
第十九章	决定命运的转变.....	453
第二十章	演变.....	493
事后分析		514

序

俄国法西斯分子？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个词有一种不和谐甚至不自然的味道。它可能是50年代的冷战勇士所挥舞的反苏用语，或者只是有点滑稽的胡言乱语。很少人会想到这是一个有信条，有进行曲，有卐字袖标，有自己的元首和在全球都有捧场者的羽翼丰满的政治运动。本书的主旨便是揭露这个未必令人相信的幽灵的历史真相。

谁是俄国法西斯分子？多数人对此未有所闻，这是不足为奇的。真正的俄国法西斯分子从来不超过10000人，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声称他们有两倍于此数的追随者。他们是流亡者或流亡者的后裔，散居在世界各处的俄国飞地。他们当中有沙皇军官、哥萨克骑兵、东正教牧师、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心怀不满的有产者和流离失所的无产者，杂以一些假贵族、一名罗曼诺夫王朝的少年成员、各种已定罪的重罪犯和不多几个苏联间谍。在二十多年间，这个奇特的队伍阴谋策划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十字军征伐，以接管苏联，建立一个超过墨索里尼意大利、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俄国。在30年代，他们活动于柏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天津和东京，开罗和芝

加哥，瓦尔帕莱索和维也纳，巴黎和康涅狄格州的帕特南。他们网罗年轻的流亡者，培养他们有去国怀乡之苦的爱国主义，培养他们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镇压国内共产党人并且似乎给意大利和德国增加了活力的作法，怀着一种既带有几分敌意又强烈迷恋的情绪。他们勾结一切能投合他们的幻想的人物：中国军阀、日本将军、纳粹头目、一名芝加哥巨头的女继承人以及康涅狄格州警察。1941年，俄国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狂热地准备从第三帝国（德国）的征服部队那里“接管”他们的祖国。但是，他们的梦幻在表面看来似乎就要开始实现的时候就破灭了，剩下的是一堆叛逆和死亡的渣滓。

历史是会重现的，先是重现为悲剧，然后重现为笑剧。在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历史中，悲剧和笑剧交替重演。他们荡迹于被人遗忘的角落，飘忽不定而又无能为力，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醉心于“大事业”的白日梦。有一个崇拜斯大林的人，确信这位伟大领袖营造了尚未开闸放水的反犹水库。另一个人则向遍布全苏联的幻想中的间谍网发布命令，并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农场以玩具和供玩赏的动物举行军事演习。俄国法西斯分子模仿德、意两国使用法西斯党徽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他们虔诚地给灯罩、裤纽、纸篓以至圣诞老人装饰了卐字。然而他们的荒唐古怪行径是悲剧困境的象征。可悲的是，俄国法西斯分子除了同他们的敌人结盟之外，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法为祖国效力。这些爱国的叛逆者成了人人攻击的对象，人人使唤的走狗。

“法西斯分子”这个标签为什么会贴在这群特殊的俄国人

身上？主要是因为他们自称是法西斯主义者。这个词儿臭名昭著，难以给它下定义，但是只要略微研究一下它的用法，就能弄明白俄国法西斯分子如何符合于历史上的那些突出典型。

在现代语言中，“法西斯”这个词什么地方都能贴得上。人们也许最常听到它用于形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纳粹德国、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1931—1945年的日本、阿连德去世后的智利，极端民族主义者与军国主义者的政治组织，象罗马尼亚的铁卫团^①和匈牙利的箭十字运动^②，也被称为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这个词除了用来形容特定的统治制度和特定的组织外，还用来作为对任何事或任何人的诅咒之词，从政治对手之口或惩戒子女的父母之口冒出来。托马斯·杜威被某些国家的批评家贴上了“法西斯分子”的标签。《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最近谴责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实行“外部法西斯主义”。一位五角大楼分析家在1975年声言，国防部的所谓保护承包商的贸易制度是“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帕特里夏·赫斯特留居共生解放军期间^③，谴责了这个“法西斯猪仔”的生活环境。

① 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原名“天使长米哈伊尔军团”，1930年改名为“铁卫团”。——译者

② 即箭十字党运动。箭十字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的法西斯组织，其首领为萨洛奇·费伦茨（1897—1946）。——译者

③ 共生解放军是美国的一个极端派秘密组织，曾抢劫银行。帕特里夏·赫斯特是美国报业巨头赫斯特的孙女，被共生解放军绑架。——译者

“法西斯”也作为攻击性词语用于左派。反共政论家在50年代有“红色法西斯主义”一说。1973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贝林格谴责他本国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客观法西斯分子”。30年代，苏联共产党把离经叛道的同志叫做“社会法西斯分子”。这个特别词汇已物归克里姆林宫原主。

法西斯主义的不定向的环形防线，变化多端的政治态度，以及乱七八糟的结合，使得法西斯主义成了把握不住的难以理解的现象。《韦氏第三国际辞典》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是“任何以严厉的国家主义政治纲领建立集权的、独裁的国家制度，实行工业、商业、金融组织化，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以及对反对力量进行强力镇压的倾向”。这个概括的表述仍然留有讨论的余地。列宁指出，法西斯主义——连同帝国主义——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是，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只把法西斯主义限于特定阶层和特定生产方式，忽略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农民性（例如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诚然，某些评论家从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家伦佐·贝多尼到托洛茨基，都认为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俄国表现了典型法西斯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当然，这样的说法在苏联国内遭到了强烈的谴责，苏联的评论者作出了反应，他们对列宁主义给法西斯主义所下的定义加以推论。杰尔查文^①教授在1941年宣称：“法西斯主义是斯拉夫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伊利亚·爱伦堡说得更直率：“法

① 苏联斯拉夫学家、历史学家（1877—1953）。——译者

西斯分子有多种多样。有的象啤酒，有的象葡萄酒……但是他们刻骨仇恨苏联的时候，你总能够识别他们。”

即使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性质也没有一致的见解。柯罗齐^①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行动主义的陶醉，是幼稚的冒险主义，短时期灾变性的突然发作，是欧洲思想潮流中一时出现的畸变。另一些人则强调法西斯主义同旧模式的连续性。有些评论者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或经济制度，还有一些人则寻求心理学上的解释。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常常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对于提出抽象的法西斯主义“模式”是否有用的问题持不同见解。对各个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剖析和对各个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的看法如此大相径庭，以致有不少人怀疑能否给法西斯主义下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定义。

历史将把俄国法西斯主义看作是二、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社会经济小团体搞起来的运动；这些小团体深以政治上绝望、国民自尊心受辱、经济地位改变以及文化上的怀旧情绪为苦。俄国法西斯分子吹捧独裁的国家，追随神化的领袖，乞灵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且尚武好斗；但他们并不都接受反犹主义。俄国法西斯分子把他们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归结为“综合从白党^②运动的失败中汲取的教训，德意日

① 意大利哲学家（1866—1952）。——译者

② 这里的“白党”指旧沙俄政权的坚决支持者和众多反布尔什维克将领中的某一两个将领的追随者，这些将领在俄国内战时期组织了军队。但是到了20年代，“白俄”则泛指所有在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17——1922）期间离开故国的全部俄国流亡者，而不管其政治面貌如何。——原注

法西斯主义的经验，俄罗斯帝国的光辉过去和当前革命后的现实的产物”。俄国法西斯分子在另一方面也是独特的：他们在本国之外活动，发展一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法西斯运动。但是，背井离乡的生活迫使他们分散在全球各地，这表明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情况迫使他们任凭外国主子的摆布，并把他们拖进荒诞的幻想中。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文字记载，但是却从来没有叙述过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全部历史。有人写过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丛书；学者们已分析过美国人、阿根廷人、日本人、以色列人、法国人、瑞典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中国人、挪威人、瑞士人以及其他中间的法西斯运动。但是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为什么对俄国法西斯分子的经历很少给予注意呢？

首先，有关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情况很难获得。这个运动的自封的领袖——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和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旺夏茨基已经去世，而那些还活着但对公开露面扬名于世已不再感兴趣的追随者，却隐瞒了他们的历史。这个法西斯党的活动记录已经散失、销毁，或是藏在不能接近的苏联地下档案库里。只有把分散于世界各地档案库中多种语言的残缺资料拼接起来，才能瞥见这一研究对象的全貌。

其次，虽然本来可以指望苏联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个有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同谋者渗入的反共阴谋提供许多情况，但是他们竟令人不可思议地对俄国法西斯主义表示沉默。种族上的敏感性是否使他们不能承认“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存在？

或者，这种沉默是否因为俄国法西斯竟同苏联共产党在组织结构与词藻运用上有使他们难堪的相似之处，而且这种相似之处可能会被别人抓住而加以利用？不管有什么制约因素，苏联作家大约还是同他们经常提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一样，经常提到俄国法西斯分子。偶尔，当书刊中提到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这类俄国法西斯领袖的时候，他们就在“白卫军”这个无所不包的红色术语下，同哥萨克首领、沙俄将军和其他旧牌号的反革命分子混为一谈。

第三，那些在俄国法西斯分子当中生活过的人谨慎地保持沉默。多数俄国流亡者同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许多人还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而那些具有法西斯主义气质的人则在私室里喋喋不休地谈论不可外扬的丑事。

“那是敏感而微妙的论题。”伯克利历史学家尼古拉斯·里亚沙诺夫斯基教授于1975年听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时说。无疑，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间，法西斯主义对许多急于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同时又对君主制度和自由主义表示不耐烦和大为失望的俄国年轻的流亡者，以及许多较为温和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者具有感染力。在君主主义运动本身已表明其不合时宜并显得愚蠢的地方，法西斯主义似乎还风华正茂，具有活力。在自由主义于1905年到1917年之间在俄国暴露了它的弱点的地方，法西斯主义可望把全国力量动员起来并且团结一致——如果有偶然的良机的话。在社会主义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地方，法西斯主义就把国家抬高到阶级之上，许多流亡者就觉得急切需要全国性机构。法西斯主义不是拯救了意大利——其后还有德国——免遭共产主义的祸

害吗？法西斯主义不是提供了最有效（如果不是唯一有效）的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吗？今天，我们大家对奥斯威辛记忆犹新，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四五十年前曾为这种法西斯主义思潮所动。因此，许多有关俄国法西斯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就消失在保全自己的沉默中。

1971年我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浏览战前的一种名为《东方画报》的日本杂志时，第一次知道有关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情况。我的注意力被1941年刊出的一篇题为《俄国法西斯分子在哈尔滨》的文章吸引住了。文章的作者阿马·拉希里是当时所谓的“东亚新秩序”的印度辩护士。在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画像下的日本顾问面前装模作样地摆出姿势的斯拉夫冲锋队员的照片，带着蓬乱不堪的胡子象基督似地凝神注目的法西斯“首脑”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的照片，在苏——满边界上挑战似地发光的卐字霓虹灯的照片——这些照片立刻给我一种极不协调、荒唐可笑、可悲可怜而又无可奈何的印象。我记住了这篇文章，作为不寻常的奇闻用在我的讲义里。

1972年我在伦敦公共档案局附属的葡萄牙部从事研究工作时，发现几页关于白俄在远东的资料，这些资料与英国外交部新近降低了保密度的1938年到1945年的中国案卷保存在一起。其中一份文件载有已故牛津大学东方学专家赫德森1941年所写的一份有关日本庇护俄国法西斯分子运动的报告。另一份的内容有罗扎耶夫斯基1941年6月发自满洲的信件和电报，这些信件和电报命令他的欧洲代表在德国国防军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建立法西斯小组。罗扎耶夫斯基的指令被

不列颠帝国的检查机关截获，并促使英国秘密调查流亡者对希特勒的反苏十字军的反应。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法西斯分子不是反映异国情调的小事。我决心有系统地探索这个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我到了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老一代的苏联公民的谈话，暴露出鲜明的“白卫军”意识，但是对于俄国法西斯分子运动本身，几乎没有能令人接受的认识。

我取道西伯利亚到达东京，查询了外务省档案馆，并看到了四卷标有“白俄法西斯分子的活动(1925—1944)：秘密”字样的报告和通信。其内容不但有日本派往满洲和中国的外交官发回的急件，而且有内务省警察详述罗扎耶夫斯基同日本人正式与非正式接触的报告。外务省的档案中涉及盖世太保和联邦调查局，这说明在美国和德国的档案库里可能有更多的材料。

德国档案馆里果然藏有关于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有价值的资料。纳粹党、党卫队和东进部^①的记录提供了德国境内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某些情况。波恩外交部档案馆藏有德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收罗俄国流亡者的资料。斯图加特“德国外国研究所”的案卷中，关于满洲的德国人的报告为我打开了有意义的视野。

美国档案库收藏的在美国活动的俄国法西斯分子的资料原来是丰富而与众不同的。司法部、国务院和陆军部在这方面本来都各自有案卷，而今都存入华盛顿国家档案局。旺夏

① 德意志帝国东部占领领土部。——原注

茨基在司法部的案卷既有联邦调查局的详细报告，还包括来自移民归化局的资料。联邦调查局1939年到1941年的四份报告原先是受保密限制的，但是1975年6月25日我按照情报自由法案向司法部提出申请后，这些报告于1976年6月15日解除了限制^①。在麻省沃尔瑟姆的联邦档案文献中心藏有1942年旺夏茨基大陪审团的审讯记录文本。在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专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斯拉夫专集里几乎保存了全套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报纸、刊物和小册子。

除了收集文字记录外，我试图寻找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两人尚在世的的朋友和追随者。这项工作处处遇到障碍。因为时间已经索去了一些人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已湮没无闻。纽约的俄文日报《新共和言论报》刊登的一条消息提到了许多头目。我向美国国家人口统计局查找死亡记录，得知有关人物的姓名和住址。不久，我给全世界——从法兰西到塔斯马尼亚——的流亡者写信。为了访问特别有价值的知情者，我多次到纽约和旧金山去。1974年，我访到了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的亲属，前者在旧金山，后者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

这期间我三次前往康涅狄格州的帕特南，这地方一度因为是全俄法西斯党的“中心”而引人注目。十几位当地居民慷慨地答应提供他们回忆中的有关旺夏茨基的往事。有价值的

① 在这同时，机密报告也由司法部刑事处和国防部海军调查处解除了限制。——原注

资料在似乎不可能的地方出现：在靠近北格罗夫纳谷的遗嘱检验法庭的案卷里，在西汤普森公墓的地穴里，以及在一个旧时称为俄国熊的废弃村舍里。真是巧得很，我父亲听说，在旺夏茨基早先拥有的房地产上，把鸡舍改建为女宿舍时挖出了四箱文件，这些文件已经捐赠给普罗维登斯学院（在罗得岛），并保存在学院的档案室里。1975年作者检查和校勘了这些“鸡粪档案”，不但发现私人文件和图片，而且发现欧美和日本的主要档案库里所没有的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出版物。

有许多关于俄国法西斯分子运动的材料（特别是在远东的）仍然有待研究。在满洲哈尔滨的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活动记录已于1945年被红军和苏联安全机关缴获，可能目前都在苏联，但是把这些资料用来作研究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现在的研究可以只看作是探索一个问题的尝试，而其他的人有朝一日会有希望对这问题作更精确、更细致的研究。

第 一 章

散居国外的俄国人

所有背井离乡的流亡者对于辛酸的现实都视而不见，而越来越适应于他们那封闭而怪诞的小天地，沉溺于无济于事的怀旧和不能实现的希望之中。

——亚历山大·赫尔岑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俄国人放弃他们的家园，以逃避镇压、暴力或贫困。1918年至1922年间，外逃流亡者的规模达到惊人的程度。在革命、内战、外国干涉和饥馑的大动乱中，从俄国涌出了二百多万难民。他们象浪潮般地涌向四面八方。向北那股人潮奔向芬兰及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两个北极港口。南面那股人潮穿过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使成千上万难民聚集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往西去的人潮悄悄地溜过内战前线进入波罗的海各国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到1920年大约有560000俄国人群集于德国，而这些人后来又大多数有移居法国的倾向；到30年代，法国成了俄国流民向往的地方。东去的一股人潮约有250000人，趑趄趑趄地通过西伯利亚来到远东；其中大致有100000人在满洲定居（1917

年前这里就已有为数相当可观的俄国人口)，其他流民继续到中国本土以及朝鲜和日本。所有这三股人潮中的成员都有到达加拿大(40000人)、美国(20000人)、南美洲(3000人)和澳大利亚(1700人)的。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俄国移民不过是浩浩荡荡的一大群芭蕾舞女演员、男低音歌剧演员、俄国大公以及自命的阿纳斯塔西娅^①；其实不然，虽然他们之中夹杂着相当数量的艺术家和贵族成员，而基本成分却是劳动者和中产阶级。从吃了败仗的白军中跑出来的几千名哥萨克骑兵和战士自来就有尚武精神；政治家、记者、律师、医生、工程师、牧师、教授、实业家和店主带来了中产阶级气派；逃荒的农夫给这个队伍增加了农民成份；为数不多的流氓无产者和流窜的恶棍也混进了这个人潮。

1918年至1922年逃离故土的俄国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背景如何，都经受了使他们慌乱、迷惘和痛苦的大冲击。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对来说是不流血的，而国内战争则造成了残酷的社会动乱的大风暴。红军和白军的暴行同样给人们的精神留下了丑恶而不可磨灭的仇恨的创伤。佩奥特·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男爵的哥萨克骑兵每杀害一名布尔什维克就在他们的枪托上刻一道记数的沟痕。昂格—斯顿伯格·冯·罗马·费奥多罗维奇(他长着血红色的毛发又嗜好杀戮，所以得了个外号叫“血腥的男爵”)为了千倍地替被杀害

① 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夫娜(?——1560年)是伊凡雷帝的第一个妻子，在伊凡雷帝的许多妻妾和情妇中，唯有她能够长期受宠。——译者

的妻子复仇，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把他所猜疑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全都活活塞进火车锅炉。1918年7月16日在叶卡捷琳堡一个商人家的地下室里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子女的无情清算，给人们心头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可怕的幽灵。

革命与内战中的流亡者感觉到他们可能幸免于死，但却不一定能找到活路。外逃者的命运处在这生与死之间。一个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世界在他们的心头萦绕。那个曾经很安稳而且似乎不变的世界突然间变成一场恶梦，失去了亲人，财产被没收，事业成泡影。到国外避难的俄国难民取得了人身安全，但是牺牲了精神基础，对某些人来说，这种令人愁肠寸断的大迁移等于分阶段死亡。

俄国流亡者踉踉跄跄来到异国的新环境，很少得到人们的理解。他们那奇特的穷酸相只要还保留着，就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有时还引起人们的同情心。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联盟和各种慈善团体向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了援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不幸逐渐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还成为取笑的对象。

罗曼诺夫王朝的幸存者发现他们被看成是同他们的时代背道而驰的外来怪物。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公开谴责他们应当为俄国的灾难负责；即使是暗中有同情心的政治家也同他们保持距离，谨慎地避免同他们有什么可能损害自己的政治前途的接触。1919年，在凡尔赛会议期间，亚历山大大公（尼古拉二世的表弟和妹夫）试图去拜访伍德罗·威尔逊、罗伯特·兰辛（威尔逊的国务卿）和豪斯上校，他被一次又一次地推迟接见，致使他的一位美国朋友查尔斯·道斯直率地劝

告他：“同那些大人物见面，你干脆连想都别想；他们不会见你的——垮了台的人对他们没有什么用。”亚历山大在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被拒绝进入英国，于是试图在英国外交大臣的某次出访巴黎时求见阿瑟·贝尔福。虽然这位俄国大公最终果真得到同贝尔福在一个不显眼的旅馆房间里见面的约请，却根本没有见到他。大公在一闪间看见贝尔福从太平梯溜走。在这同时，一位红着脸的助手期期艾艾地通知来访者：“贝尔福先生深表遗憾，由于他要参加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未能有幸同殿下交谈。”助手问亚历山大是否愿意留下口信，他回答说：“那当然，你告诉他，象他这样年纪的人应该坐电梯呀。”这个幽默的讽刺有助于许多被撵走的贵族保持头脑清醒。

更令人难堪的，是那些同罗曼诺夫王朝成员有血缘或婚配关系的欧洲皇族的行为。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罗马尼亚的玛丽皇后对待他们的俄国亲戚倒也慷慨大方，但是，其他皇族则连象征性的帮助都很吝啬。丹麦国王克里斯琴十世为了不得不接待他的姑母而感到恼火。他的姑母玛丽皇太后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和尼古拉二世的母亲，在俄国生活了50年后回到了故国。他对这位老太太的伤痛毫不在意，却纠缠于要她少用些电，并且毫不掩饰他怀疑她典当了他的客厅里的装饰品。

皇家的冷漠比皇家的吝啬更刺痛那些俄国流民。温莎家族、萨瓦家族和格鲁克斯堡家族的许多人对他们采取拘谨和疏远的态度，似乎他们的俄国亲戚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受害者，而是给他们带来了某种有传染性的、容易招徕武装袭击

的因素。诚然，罗曼诺夫王朝的幸存者很以为自己对于革命有一定的专门知识，他们都很愿意同哥本哈根、温莎和马德里的皇族分享这种知识。但是，由于罗曼诺夫王朝的流亡者对他们的东道主很有怨气，所以见到失业工人罢工或游行的时候，就幸灾乐祸，故意点头赞许，好象是说：“哦，这种事我们以前也见过。轮到你们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我的好亲戚！”

各阶级的流亡者都在经济上受到剥削；他们孤立无援的处境，使他们成了很好打的靶子。有位一度颇富裕而在俄国失去了一切的绅士，带着希望得到安慰的心情回到巴黎的房东那里。他在六年前曾经委托这位房东保管相当大的一笔财产。房东以一张六年租金的帐单迎接他。要付清这个帐单就得放弃由房东照管而当时已被房东耗用了的财产。被迫出卖钻石的流亡者知道，庞德街和和平路的商人收购宝石所付的价钱，只及其价值的很小一部分。

1919年亚历山大大公以战前行情表所列价格的百分之五出卖他收集的钱币。十年后，他偶然见到《泰晤士报》（伦敦）上的一则广告，在这广告上，同是那个先前收购亚历山大的钱币的瑞士商人描述说，他有一枚钱币是从“帝俄家族的一位成员”那里买来的。它的售价比他付给亚历山大的全部收藏币的价格还大100倍。

逃亡国外还意味着孤立无援。患难把俄国流亡者凑在一块儿，他们在世界各地群集在孤岛似的社区里，这些社区或优雅如巴黎的帕西，或粗俗如上海的虹口。他们互相靠拢以求得慰藉、平安以及缩小丧失家园的感情疤痕。他们的孤立往往

由于周围社会对他们的冷漠态度而更突出了。安德烈·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学生时代在尼斯的中学里有许多法国朋友，但是1920年他回到法国时，“我的老朋友以至那些在童年时就认识的人，在我面前都变得很不自然。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象是麻疯病人，因而开始躲开他们。”已故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波科夫在他的《谈话与回忆》中生动地回想起他自己所经受的孤独：“我在西欧居留将近五分之一个世纪（1920—1940），在我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大多是女房东和文人）当中，同我要好的朋友统统算上超不过两个。”即使是俄国流亡者中为数很少的几个头面人物也不一定感到象常人那样受到喜爱和尊敬。亚历山大大公讥诮地回想起，美国女房东邀请他吃饭是为了让一个悲剧式的有爵位的俄国人点缀一下他们的晚会。

难以容忍的是许多人对俄国情况的误解。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所认识的知识分子把“从农民社会主义者到白军将领”的所有流亡者统统看作红色轻蔑语所称的“沙皇分子”，对此，纳博科夫嗤之以鼻。帝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协约国的事业所作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公认，甚至还受到讥笑。法国人丝毫不了解1914年8月俄国人作出了牺牲的攻势转移了德国人进攻巴黎的目标等情况，却自以为是地谴责俄国流亡者违反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①。1920年，一位美国

① 1918年3月由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同盟国之间订立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规定俄国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因此得以把兵力集中到西线。——原注

妇女问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些什么活动，他回答说，他是在帝俄军队中服役。“哎呀！”她很惊讶，“我不知道俄国参加过大战。”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想，你们俄国人没干多少事，对吧？”

对于流亡的俄国老兵来说，没有比1919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协约国胜利大游行的景象更使他们难堪的了。俄国在三年间(1914—1917年)忠诚地充当英法两国的盟友。它吸引了德国的打击力量，否则这种力量就会打击西部战线；而俄国却因此牺牲了300万条生命、伤残几百万人。坦能堡和 马 祖里湖的幸存者在香榭丽舍大道边观望游行队伍的时候，象哑巴似的尝受这胜利的街头历史剧所包含的讽刺味儿：行列里没有一个俄国兵，却不时出现来自黑山和圣马利诺的一脸傲气的代表队。

大多数流亡者由于经济拮据没工夫沉浸于思乡的梦幻，而那些较有先见之明的有钱人家则在大变乱之前就把他们的财富藏在英国、法国甚至德国的银行里。某些富足的逃亡者在比亚里茨和戛纳挥霍金钱，带着伤感的情调试图再度获得革命前的生活方式。俄国最大的工业资产（估计有2.5亿美元）的唯一继承人费利克斯·尤素波夫亲王设法从革命烈火中挽回价值100万美元的珍宝、两幅伦布兰的画和一批古代的鼻烟壶。靠出售财富分期付款过日子的尤素波夫亲王和他的妻子艾丽娜(亚历山大大公唯一的女儿)举行过非常豪华的舞会。亲王在这些舞会上让客人们欣赏这样的故事：他如何参与杀害格雷戈里·拉斯普京——一个农民修道士；这个修道士给皇后所施的催眠术使得罗曼诺夫王朝在衰微时期又加

上了一层晦气。象德米特里大公^①那种仪表堂堂、勇于进取的人，还因为同有钱的美国女嗣人结婚而补偿了经济损失（也就是发了财）。但是这种意外横财世间少有，已成为传奇了。

亚历山大大公揶揄地说：“对于流亡者来说，以辛辛苦苦学来的本事去讲述那男女相反的灰姑娘故事，是再有趣不过的了。”有些人滥用这种本事，更多的人凭借这种本事作为谋取职业的最后的手段。

俄国流亡者很快就发现，有教养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多少能够如愿获得相应的职业保证。的确，象布宁、纳博科夫、坎丁斯基、查格尔、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巴兰钦、巴甫洛娃、高瑟维茨基和西科斯基这样的名人最后表明，不同凡响的逃亡者最终在事业的追求上是能够成功的。有许多学者在斯坦福、康奈尔、芝加哥、哥伦比亚、哈佛、巴黎大学和布拉格找到了合适的避难所。但是，统观移民的整个情况，上述现象都属例外，对他们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流亡是社会地位的丧失，是个人事业的损伤。

大多数俄国贵族能以非常的气派、机敏和幽默去应付经济困难的状况。除了象可以从丹麦和英国的王族远亲直接得到资助的玛丽皇太后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之外，即使是真正的罗曼诺夫王朝的成员也试图自谋生计。亚历山大大公拒绝了金融家艾尔弗雷德·洛温斯坦对自己有利的宴请，没在请

① 德米特里大公（1891—1942）是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曾经同尤素波夫一起参与谋杀拉斯普廷。——原注

束上签名，却兴致勃勃地开始过不可靠的巡回讲演人的生活，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新浸礼会教堂以《旧俄罗斯》为题开始发表讲演。德米特里大公的妹妹玛丽大公夫人不畏强手竞争，在巴黎搞起了服装刺绣。德米特里大公虽然能从他的美国配偶奥德丽·埃默里（“伊林斯卡娅公主”）那里获得可观的收入，但是他却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为里姆斯商店卖香槟酒。尤素波夫家的成员的生活依靠卖伦布兰的画和鼻烟壶，依靠出卖一部暗示私人宗教教师拉斯普廷与艾丽娜公主有性关系的诽谤性影片，从米高梅公司获得的375000美元；在这同时，尤素波夫又在巴黎、伦敦和柏林开了一系列时装商店。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以前，为一家保险公司摆弄数字。曾经有谣传说，一位“果利琴公爵”在纽约当侍者，一直干到30年代。但是，这个“公爵”很可能就是哈里·格古逊所举例证实的一般称之为“迈克尔·罗曼诺夫”（“德米特里·迈克尔·奥勃兰斯基—罗曼诺夫”的简称）的又一名皇族成员，他在好莱坞开饭馆以前曾经利用这个堂而皇之的化名去兑现了假支票。

有些流亡者把想象和实际技能结合起来去谋取工作。有一类为数较多的有创业精神的人物在巴黎、柏林、贝尔格莱德、上海和哈尔滨等“绿洲”开饭店、咖啡馆、杂货铺、服装店和报馆。牧师们在俄国社会召集新的会众。律师和医生恢复中断了的业务活动。技术高的工程师比其他大多数从业人员走运，一般都受雇于外国企业。有些（不是全部）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发现有人需要他们的创造才能。有个流亡者当了职业摔跤手，自称为“天神”，他连续挫败了从斯特兰格

拉·刘易斯到大伽马的175名对手。

几千名听命于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的哥萨克兵同布尔什维克作战败北之后，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他们缺衣少食，而且一般受教育的程度很低，所以对于在国外开始新的生活并没有很好的准备。若不是他们在俄国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吃苦，他们就忍受不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流亡厄运。他们的流亡生活一般是从英、法两国在加利波利、利姆诺斯岛和亚历山大港建立的某个难民营开始。因此，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沙皇的忠贞战士为了维持生活，什么活都干。他们在南斯拉夫修路、伐木，在保加利亚和秘鲁种地，在巴黎赶马车，在蒙得维的亚铲煤，在好莱坞演低级角色，在法国的外籍兵团服役，以及在中国受雇当保镖或门警。还有这样一个例子，一群顿河哥萨克兵只呆在一个地方，依然保持严格的纪律，仿佛仍然在为沙皇服役；他们当了巴黎北站的搬运工，在车站巡行，象是严肃而仍然有干劲的旧俄时代的爪牙。

命运的恶作剧有时把许多流亡者推进荒唐或悲惨的境地。以伊利奥多修道士为例，他在革命前曾经以热情奔放的演说打动过数以千计的听众，最终却成了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的浸礼会教友看门人。若不是伊利奥多的主要对手拉斯普廷于1916年被人塞进涅瓦河的冰层下，这两个牧师就可能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凳上，在回忆往事中度过残年。一位在流亡中把自己晋升为将军（因为美国人只看得起最高的军阶和头衔）的上校在美国捷运公司的纽约运货马棚喂马。他开了一家名为“双头鹰”的饭店，为时不久，然后当了促

成他在米高梅的影片里担任小角色的格洛里亚·斯旺森的手下人，最后又在好莱坞大道开了一家咖啡馆（这咖啡馆毁于煤气阀出毛病而引起的爆炸）。这位“将军”的同仁——早年皇家炮兵第一军团的指挥官，在森塞大街的一家美容店里修剪头发。

俄国流亡者的最沉重的负担常常落在妇女身上。经过暴乱破坏的俄国抛下了成千上万没有生活技能的妻子、寡妇和无家可归的妇女。妇女要承受三重责任：抚育儿女，养活失业或半失业的丈夫，维持漂泊不定的家庭。很多妇女到工厂做工，受雇当家庭佣人，或者做费尽眼力的缝纫工作。有的妇女则出卖肉体。早于1917年以前，北京和新加坡的妓院就有俄国妓女，到20年代其数目大增，以致在哈尔滨、上海和神户等地卖淫业的行话中，“俄国姑娘”的意思就是“高加索娼妓”。很难确切知道有多少坦雅、奥尔佳和瓦兰蒂娜向寻求外来艳色的嫖客献媚。已故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描述一个可怜的、早熟的俄国女子在日本的温泉胜地叫卖小玩意儿，有个顾客问她从哪里来，她只重复道：“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她的问题是流落在世界各地的俄国妇女的写照。

寄人篱下的羞辱同在社会上遭受白眼、在经济上遭受剥削一样使俄国流亡者痛心。亚历山大大公在受到一艘英国巡洋舰的安全保护的时候，不但没有感到慰藉，反而由于他先前的敌手（英俄对抗激烈时期他是海军上将）把他从俄国同胞中拯救出来而感到羞愧。1918年在德国皇帝的军队保护下，数以千计的俄国人通过德军占领的乌克兰逃离布尔什维克，

而这些德国军队仅仅在几个月前还是他们的民族敌人。纳博科夫因此为他的同胞诉苦道：“这些有爱国心的俄国人逃脱了本国行刑队，在肉体上得到解脱，却又必须感恩于使他们幸免于难的外国入侵者——特别是德国人，这使他们很尴尬。”

没有国籍使俄国流亡者没有安全感。1921年苏联政府剥夺了住在国外的俄国人的国籍时，这些流亡者发现自己是在被法律抛弃的处境中挣扎。外国政府冷眼对待为俄国难民签发证件，对于加入国籍的要求，不管陈词如何恳切，一概置之不理。由国际联盟给无国籍的俄罗斯人签发的令人厌恶的绿色身份证——“南森护照”，只是将持照者无所寄托的情况登记入册，以免引起人们怀疑他们是哪个国家行政管理范围之外的逃亡者。纳博科夫回忆说，持有“南森护照”的人有如假释犯，又象私生子。

在远东，没有国籍还包含某种肉体上的风险。中国没有象对待其他欧洲人那样承认俄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而让军阀和小官吏随意处理他们的事务。在上海和哈尔滨，中国或日本警察在街上象殴打苦力那样殴打白俄，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因为没有人会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成了人人可以欺凌的对象。

这种情况给俄国流亡者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损伤，既不能挽回过去，又不能应付当前，某些俄国流亡者在纯粹的幻想中过活。在极端的情况下，流亡者甚至否认发生过革命。玛丽皇太后对于她的两个儿子（沙皇尼古拉和迈克尔大公）和五个孙子孙女（尼古拉的儿子及继承人亚历克西斯和四个孙女）被杀的报告不屑一顾；相反，她沉浸于梦幻世界中的维兹奥

勒——她在丹麦老家的一块地产，1917年以前那里曾经是罗曼诺夫家族、格鲁克斯堡家族、温莎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亲属快乐团聚”的地方。1924年12月5日，即十月革命之后七年和列宁逝世之后十个月，玛丽皇太后对他的侄儿亚历山大大公说：“圣诞节快到了，有许多礼物要分送到维兹奥勒各处，但是皇产处到现在还没有把支票给我送来。我不能想象这么拖沓的怪事可能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亚历山大大公不敢破坏这位老太太的幻梦，就尽自己的能力赶快把钱汇了去。

玛丽皇太后的心境不是绝无仅有的，成千上万流亡者在“整装待发”（当时流行的说法）的状态下生活，深信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能返回故土并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以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不过是一时的乾坤颠倒；苏维埃政权每时每刻都会崩溃；克里姆林宫的头头脑脑们让一辆专列随时准备待命，以备在不可避免的反革命发生时他们得以顺利逃跑。他们一再向法国和德国的房主和杂货店老板保证，“我们一回到俄国”就会付清账单。每逢传出有关苏联内部发生经济崩溃或人民起义的谣言，他们就抓住不放，并且把谣言当作饭来吃，借以满足贪馋的幻想。

星移月换，幻想的迷雾烟消云散了，留下来的是苦涩的挫折。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攻势本来吹嘘得很厉害，但是在可望而不可及地盼望了一阵胜利之后，都畏缩不前了。外国的远征军撤离了俄国，从白卫军最后的城堡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海参崴很不体面地撤退了。人民大众根本没有起义，感到困惑和受到伤害的流亡者极力自责，互相发泄怒火。

1919年，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坐在不同的桌子前的三个人忽然互相认出对方来。其中一个亚历山大大公，第二个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他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家，1917年主持过短命的临时政府，第三个是鲍里斯·萨文科夫，臭名昭著的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分子，作过他的受害者当中包括亚历山大的表兄塞盖大公。这三名败将带着无言的仇恨互相注视着，对于共同命运向他们的嘲弄真是哭笑不得。他们都看到他们所怀的希望已经破灭。他们都不能安全地回到俄国去。他们若不对越来越小的财源精打细算就喝不起咖啡。每个人都认为另两人要对自己的困境负责。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成了散居国外的俄国人的化身。

被逐和受辱的俄国流亡者成了热心参加各种组织的人。一些乱哄哄的组织力图把流亡者所萌生的激情引导到充满幻想的活动里面去。有些团伙是从革命家的立法机关——杜马——中的各党派转变而来的，其中有社会民主党（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立宪民主党。其他团伙，象俄国大使委员会和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是对革命作出特别反应而产生的。有些组织以仇恨共产主义并自诩能在苏联内部搞恐怖主义而兴旺起来。另一些组织则宣称布尔什维主义正在向民主制度发展，因而极力主张同斯大林和解。有的组织发誓要恢复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另一些组织赌咒要沿民族界线肢解苏联。

俄国流亡者因为一般都生性不能共事。有一种可能不够公正的说法，认为每个俄国人都是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安定、受打击的流亡生活使他们冒出了致命的宗派主义，即使

是最无关紧要的事业也受其影响。玛丽大公夫人发现她的许多流亡伙伴拒绝同她联合办慈善事业，因为他们认为罗曼诺夫家族要为俄国——以及他们自己——的厄运负责。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争吵，例如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就二月革命的失败实际上责备了每个人（不包括他自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分裂为支持保罗·斯科罗帕德斯基的亲德的哥萨克首领派和支持西蒙·彼得留拉的亲法的共和派。已经被旧有的地区纽带分裂的哥萨克人发现，从亲日耳曼人的佩奥特·克拉斯诺夫到日本人的亲信格里高里·谢苗诺夫的各个互相争斗的领袖都想拉拢他们。东正教的高级教士们就放弃国籍的人的管辖权和缩减会众的问题争论不休。在20年代，象列昂·托洛茨基等自行其是的布尔什维克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在这总的喧嚣声中又添加了另一种不和谐的音调。

虽然俄国的帝制派大致上都围绕着复辟罗曼诺夫王朝这个目标联合了起来，但是又分成各个对立的派别，分别支持不同的（流亡中的）俄国沙皇称号的候选者。罗曼诺夫家族的皇位承继顺序很难确定，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系统地清除了公认的皇位继承人：尼古拉的独生子亚历克西斯，尼古拉唯一活着的弟弟迈克尔，以及尼古拉幸存的叔父保罗。逃往国外的罗曼诺夫家族的男性成员都是末代沙皇的堂兄弟或侄子。无论是习惯还是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非常情况下谁应当继承皇位。这种模糊不清的局面，形成了以“正统主义”为论题，以两个（但不是只有两个）觊觎皇位的人物为中心的激烈的论战。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856—1929）是沙皇尼古拉

一世的孙子和尼古拉二世的侄子。他有帝王的体态：六英尺六英寸高的身躯，修剪完美的银发，刚毅清癯而富于表情的脸庞，挺直威严的风度，但是“尼古拉沙”（他的亲属和好友这样称呼他）对于当皇帝的抱负有一种矛盾的感情，更坏的是，幸存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还对他产生怀疑，有人责怪他曾经对末代沙皇施加了不良影响。有些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尼古拉沙大叔”怂恿沙皇尼古拉于1905年颁布《十月宣言》^①，并于1917年退位。亚历山大大公这样疚心地思索：“如果尼古拉沙在1917年3月2日（旧历）劝说沙皇同军队一起留下来并且接受革命的挑战的话，斯大林先生就不会于1931年在克里姆林宫接待萧伯纳了。”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尼古拉大公却受到世界各地的俄国帝制派相当大的支持。他的沉着庄重、无可怀疑的正直以及单纯的爱国心，在20年代对俄国流亡者颇有吸引力，其性质很象50年代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人的吸引力。

另一位主要皇位候选人西里尔·弗拉季米罗维奇大公（1876—1938），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孙子、亚历山大三世的侄子、尼古拉二世的堂兄。日俄战争爆发前他是无所用心的宫廷纨绔子弟；日俄战争期间，在一次遭遇战中，他作为一个军官正在皮特洛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上。该舰后来触雷炸毁。这件事使他变成了郁郁寡欢的宿命论者。1917年6月他偕同怀孕的妻子维多利亚（萨克斯—科堡封地的公主）和幼小

^① 在自由派的强大压力下颁布的一项法令。它允许俄国有宪法，扩充选举权和公民自由，扩大杜马的立法权。——原著

的女儿基拉逃往芬兰，免得遭受同他堂弟一样的命运。西里尔大公在芬兰、瑞士和法国南部过了一段潇洒的流浪生活之后，在北巴伐利亚靠近科堡的爱丁堡镇定居，那是他妻子娘家的领地。西里尔象尼古拉沙一样，对于政治缺乏自信。如果让他自行其是，他会满足于高尔夫球、园艺和赛车。但是他的妻子维多利亚（“宝贝”），是个性格坚强而很有野心的德国人，她对他丈夫有些宏伟的计划，而不是让他过有气派的闲居生活。罗曼诺夫王朝的皇位被一个孱弱的患血友病的继承人占有，而那些年轻有为的“弗拉季米罗维奇们”（弗拉季米尔大公和玛丽公主的男性后代，其中西里尔年龄最长）却靠边等待着。对此，维多利亚和她的婆母——梅克伦堡—什未林的玛丽公主——早在革命前就几乎按捺不住心头的不满情绪了。在流亡当中，维多利亚渐渐深信，德国的支持不但能助长她丈夫当帝王的抱负，而且有朝一日还可能在俄国恢复帝制。她利用她的魅力和家族的金钱培植移民中的极右势力，又通过埃里奇·鲁登道夫将军资助阿道夫·希特勒羽毛未丰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希特勒参加维多利亚家族发起的“德国日”集会时访问了科堡。“宝贝”为了回报这位未来德国元首的关怀，多次参加了冲锋队的集会。

在维多利亚的促使下，西里尔于1924年8月向“俄国人民”发表宣言，宣称他是唯一的皇位合法继承人和帝制运动的领袖。三个星期后，他正式宣布自己是俄国沙皇西里尔一世。西里尔的最活跃的追随者麇集于慕尼黑，成立了“俄国正统帝制拥护者联合会”以便同支持尼古拉大公的“帝制拥护者最高委员会”抗衡。但是巴伐利亚政府对于西里尔的抱负

并不乐观，并迫使“科堡沙皇”签署一项声明，放弃进一步的政治活动。

由于在德国没有行动自由，西里尔和维多利亚于1927年移居法国，住在布列塔尼海边满是岩石的圣布里亚克村。西里尔在一间并不吸引人的农村房子里严肃地着手管理一个无形的帝国。他发布命令，提升官员，以帝国的名义宣布表彰和赦免，期望好运登门。圣布里亚克成了幻影首都，数以千计的信件从世界各地倾泻到了村邮局，当地的“法克托”（邮件搬运工。他的任务是从散居各地的“臣民”那里把成袋的邮件拖运给这位驻外沙皇）都要吃不消了。西里尔象煞有介事地研读每封信，决心当一个自觉的通信君主。这些来信向他提供情报，征求意见，博取恩宠。从前的一个卫队队长成了美国中西部一家廉价小饭店的洗碗工，他从美国来信抱怨没能得到提升，然而他有几个朋友，离开俄国时是少尉，如今都是上校了。在玻利维亚的一名哥萨克，在满洲的一名军官，在印度的一名将军都分别就他们在外国军队服役的礼节问题请求帝国的指导。在哈莱姆过赤贫生活的俄国侨民要求得到君主的精神鼓励。在加拿大一家纸浆厂工作的一位前莫斯科最高法院法官很机密地向西里尔建议，说某个流亡者是危险的激进分子，将来复辟后决不能允许那人回到俄国去。

西里尔在圣布里亚克沉溺于这样的信念：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荒谬无稽的事情变得崇高卓绝。长期以来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亚历山大大公风趣幽默地描绘他的幻想世界：“从一个离群索居的虚幻世界的中枢产生的一种愿望，助长着悲怆、滑稽与昏聩相杂的情调。没有任何东西是实在的，一切东西都

是他的支柱。”

西里尔异想天开的筹划也不能消除使人烦恼不已的疑虑，即使在最狂热的帝制派中间也是这样。他那不加掩饰的亲德态度冒犯并挫伤了斯拉夫人的自尊心。妻子维多利亚不光彩的婚史（她曾同已故沙皇尼古拉的内弟离婚），她拒绝放弃路德教而改信俄国东正教，以及她那明目张胆的对纳粹的同情心，这些对西里尔都是有害的不利因素。更糟的是，西里尔在二月革命期间令人生疑的行为还给他的流亡生活增添了苦恼。甚至，不等尼古拉退位，这位未来的圣布里亚克沙皇曾经不恰当地仓促带领海上卫队开往彼得格勒的帕乌里德宫，宣誓效忠临时政府，从而背弃了要忠于他的堂兄和君王的誓言。他就算没有反叛帝国，也是背叛了家族。罗曼诺夫王朝的成员很少人会忘掉他或宽宥他。

流亡的军事阶层倾向于支持尼古拉大公。尼古拉大公从1914到1915年是颇孚众望的（纵然是不胜任的）俄国最高陆军统帅。在俄国南部建立最后一个白卫军据点的自愿军的有号召力的将领——佩奥特·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将军，于1923年在巴黎成立了“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以便保存已不复存在的帝国各部队的统一而不中断的组织形式。虽然这个联合会打算继续远离政治，但是它拥护君主制度，并且绝对亲尼古拉沙。只有海军的退伍军人和某些亲德军官保证效忠西里尔大公。

散居国外的俄国人囿于秉性不睦，偏执多疑，在如何对待流亡生活问题上从来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亚历山大大公说过：“无论贫富贵贱，无论何等臣民，都在等待布尔什维克

垮台，以便重返俄国并恢复被十月革命所取消的俸禄。”

大多数流亡者从梦幻中觉醒之后，终于放弃了重见俄国的希望。他们把注意力转到寻求同化于收养国上来。就象一个住在洛杉矶的中年难民在1927年所说的那样：“我不想回到俄国去。我现在已经不认识俄国了。俄国以及我的过去存在于我的睡梦中。我目前的生活不过是活下去；我没有野心，没有关于未来的考虑。下个月我就要取得国籍，要成为一个美国人。”

然而，另外一些人则坚持反革命的幻想，反革命会使他们能够返回故土并恢复从前的生活和事业。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俄国法西斯分子。

第二章

欧洲俄国流亡者右派的形成

我们并不是要俄国人改信国家社会主义，
而是要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工具。

——阿道夫·希特勒

在散居各地的俄国人当中的右翼，聚集了一帮各式各样的人物：过去的军官、政客、先前的地主，以及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前的极右势力和本书所写的自称的法西斯分子之间形成一座桥梁。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倾向于君主制度的俄国沙文主义者，有的是被逐出俄国的仇视斯拉夫人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来自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库兰和利沃尼亚的日耳曼族人）。另外还有隐藏哀怨、远谋深算的乌克兰分离主义者。尽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往往还互相敌视——却几乎全都有共同的反犹倾向。他们有些人把近年来降临俄国的大祸不但归咎于犹太人，而且归咎于共济会成员和亚洲人。

有些右派集团分子似乎还是革命前一个称为“俄罗斯人民联盟”的组织的成员。这个联盟及其秘密军事支柱——黑

色百人团——是作为自由派和革命派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挑战的回答而于1905年成立的，比后来的意德两国的极权主义运动还抢先一步。这个联盟提倡“正统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而与尼古拉一世产生共鸣，但是它采取好斗的、蛊惑人心的政治作风而与保守派的传统分道扬镳。这个“联盟”处心积虑地拉拢农民和中产阶级（但是把贵族看作是自由主义者，不予信任），竭力在民众中煽起偏见。它把俄国的不幸归罪于外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它大喊大叫地鼓动处死基辅的一个名叫比里斯的犹太人（他在1911年被控杀害一个俄罗斯男孩，用以祭神）。这个联盟虽然公开反对议会制度，但是还是派代表参加第二、第三届杜马，利用这个集会作为宣传讲坛。沙皇和皇后不但容许这个联盟的活动，而且公开称赞它的“忠诚”。无论是政府还是教会都不会使联盟财源枯竭。

联盟威胁着要干什么，黑色百人团就干什么。黑色百人团这个反革命治安维持队是已经老化的俄罗斯帝国的冲锋队。官方偷偷摸摸给他们一些施舍，他们受到这些施舍的收买而热中于煽动屠杀犹太人和谋杀政敌。

“俄罗斯人民同盟”的中坚分子弗拉季米尔·米特罗法诺维奇·普里什科维奇被称为第一个俄国法西斯分子。他是比萨拉比亚一个乡村牧师的孙子，自幼在基什涅夫（1903年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地点）就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想使所有的犹太人在科雷马（在西伯利亚东北部）重新定居，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杜勃罗文和马尔科夫的同谋而终止了他的想法，因为这两个人要求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对某些观察家来说，普

里什科维奇是个语无伦次的煽动家。他在杜马的污言秽语导致军校学生的领导人保尔·米留科夫把他看作是“悲剧小丑”而把他革退。但是他的故意夸大和粗俗猥亵的语言掩盖了他在组织人马和筹措经费方面的不可思议的才能。

普里什科维奇同他所竭力支撑的、行将坍塌的大厦共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同亲德的同僚马可夫决裂，并在杜马发表了连他的自由派对手都普遍赞赏的演说。1916年12月，正当旧政权临近崩溃的时候，他在彼得堡参与德米特里大公和费利克斯·尤素波夫亲王在彼得堡尤素波夫的莫伊卡宫杀死拉斯普廷的阴谋。当拉斯普廷拒绝吃下含有氰化钾的糕饼而死时，普里什科维奇开枪处决了他。十月革命之后，他由于堂吉诃德似的试图搭救皇族成员，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城堡里关押了一个短时期，1920年在新罗西斯克（在黑海滨暂时被白卫军占据的一块飞地）死于斑疹伤寒。

普里什科维奇集中体现了俄国革命前极右集团内部的矛盾。他象俄罗斯人民联盟那样，在求助于中产阶级的同时，却不能放弃同君主制度和俄国东正教的联系。双方的反犹主义都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这些原始的法西斯分子背着旧式的意识形态包袱去玩弄极权主义的新方法，但是最后终于把群众活动丢给了左派。

诚然，许多象马可夫和苏尔金那样的“联盟”分子在十月革命后移居德国并为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唱赞歌。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运动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复辟罗曼诺夫王朝的反共工具。

同德国的关系

极右势力虽然在俄国国内沉没了，但是它在德国的流亡者中，特别是在1919年到1923年之间尚缺乏经验的纳粹分子中找到了合适的学生。这个时期在柏林和慕尼黑聚集着许多弃国离乡的俄罗斯人、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和乌克兰人的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是从前的贵族、军官和政客，曾经在白卫军中参加作战，或者曾经在吕迪格尔·冯·德将军的自愿军团的旗帜下，在波罗的海沿岸作战。他们失去了家庭、财产和家乡，这些变故弄得他们茫然不知所措，便认定犹太人和亚洲人曾在俄国暗中策划革命，而且准备在西欧也这么干。某些流亡者还向阿道夫·希特勒施加了不少影响，少数人最后终于在第三帝国占有负责职位。

从1919年到1923年之间，德语和俄语都讲得很流利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在没落的俄国右派流亡者和正在兴起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之间形成一个特别牢固的环节。有些人作为从前的沙皇臣民，自以为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忠心尚未泯灭；但是大多数人把自己当作条顿文化的东方堡垒和斯拉夫民族海洋中的德意志文化的前哨。马克思·埃尔温·冯·绍布内一里希特和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分别代表君主主义派和反斯拉夫派。这两个人在里加大学时是联谊会会友。他们俩以不同的方式都体现了“同德国的关系”。

绍布内一里希特虽然没有贵族血统（他的姓名中的“冯”字来自他妻子的娘家），却有吉米·杜兰特所说的“社会等级”。他英俊，文雅，懂多种语言，富有而慷慨，幻想建立一个反

对布尔什维克派的俄德联盟。绍布内一里希特在他的家乡库兰(在拉脱维亚西部,紧靠波罗的海)参加了俄国(1905)和德国(1918—1919)军队反对革命派的战争。1920年他在慕尼黑初次会见希特勒时,这个流亡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因为卷入了德国的一次复辟君主制度的流产政变——“卡普暴动”^①——而正在逃避德国当局的追捕。但是绍布内一里希特并不只是个粗鲁的暴发户。在他的朋友之中有钢铁大王弗里茨·赛森、坦能堡的英雄埃里奇·鲁登道夫将军,以及科堡沙皇西里尔大公。绍布内一里希特的妻子马蒂尔德偶尔陪同维多利亚·罗曼诺夫(“宝贝”)到慕尼黑郊外观摩冲锋队的演习。

绍布内一里希特和希特勒都感到互相有一种直接的吸引力。这位讨人喜欢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惊异于这个从前的下士竟有令人着迷的辩才,立即捧他为“条顿民族的先知”。希特勒也机敏地觉察到,绍布内一里希特是向上流社会获取资金和沟通关系的理想媒介。

绍布内一里希特一参加了纳粹党,就开始向富有的朋友征集金钱并纳入德国国社党的金库。“宝贝”作了大量的贡献,她把家族里很大的一笔现金委托卢登道夫将军分配给各右派组织。

绍布内一里希特作为中间人和集资人的成就,加强了他的愿望:建立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作战、复辟罗曼诺夫王朝

① 卡普(Wolfgang Kapp, 1858—1922),德国1920年3月反动政变首领。他勾结国防军反动势力,发动复辟君主专制的卡普暴动。失败后逃往国外。——译者

的德国国家主义者和俄国君主主义者的联盟。1920年晚些时候，他组成了一个称为“奥弗保”（重建）的德俄民众阵线，把具有同样观点的德国右派分子和俄国移民结合起来。有几个奥弗保的新成员后来为第三帝国效劳，他们是艾尔弗雷德·罗森堡、阿尔诺·席克丹茨之流的波罗的海日尔曼人、瓦西里·比斯库普斯基、佩奥特·沙别尔斯基之流的俄罗斯人以及哥萨克首领伊凡·波尔塔韦茨—奥斯特拉尼察。

绍布内一里希特深信，唯有把俄国散居者的右翼联合起来才能成功地同德国国家主义分子实现合作。他下决心把各派移民拉在一起之后，就从德国企业家中的同情者那里获取经费，于1921年春由奥弗保主持，在巴伐利亚的巴特赖兴哈尔召开俄国君主主义者大会。那个地方离希特勒未来的休养所不远，是个神话般的胜地。

大会代表从欧洲各地麇集巴特赖兴哈尔。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从满洲派去一名代表。贵族、政客、乌克兰分离主义者、黑色百人团的老手、从前的奥克拉纳（沙皇秘密警察）的特务和一名原东正教教务委员会代理人，混在一起参加一场少见的兄弟关系大表演。高山景色使他们大家都异常欣快，暂时忘记了派别之分歧而庄严地发誓要使俄国摆脱布尔什维主义。绍布内一里希特深感庆幸，由于从容地置俄国人的权利于德国人的保护之下，调和了各派系的分裂情绪。虽然这种团结很快就瓦解了，但是有相当多的俄国君主主义者后来采取了德国的方针。而且，离开大会的人无不知道在慕尼黑有个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非凡人物。

巴特赖兴哈尔会议成了绍布内一里希特对于俄德合作所

作的最后贡献。1923年11月9日，那是啤酒店暴动期间，他同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雷西登大街手挽手前进的时候，警方一颗子弹突然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在受了致命伤就要倒下之际，把未来的德国元首拖向人行道，因此躲过头上的一阵弹雨而救了希特勒的命。可笑的是，绍布内一里希特自己就曾孕育过在慕尼黑举行暴动的想法，不过他认为这样的暴动时机还不成熟。

绍布内一里希特倘若活到30年代，会不会变成第三帝国的大人物？也许不会。尽管希特勒哀悼这个波罗的海人之死（“谁都可以替换，唯有他不可以！”），又在《我的奋斗》一书的题词中尊他为烈士，但是其后的纳粹著作却不理会他。没有人去写一首《绍布内一里希特之歌》，好冲淡一下《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①那种令人生厌的单调味儿。

归根结底，绍布内一里希特因为太依恋过去而不能变成全心全意的纳粹分子。他就象普里希科维奇似的，依然是个保守分子，赞赏冲锋队的干劲，但是并不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手段与种族偏见的思想精髓。

倘说绍布内一里希特为希特勒打开了金钱与社交的门路，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则指导过希特勒研究俄国革命。罗森堡，这个文笔晦涩，口齿木讷，德语讲得不如俄语好的愚钝的波罗的海人，缺乏智力上的创造才能。但是他却高升为

① 纳粹德国的国歌。霍尔斯特·韦塞尔（1907—1930），德国纳粹运动的殉道者，出身学生，市井无赖，1926年加入纳粹党，成为冲锋队队员。——译者

“帝国哲学家”——他的主要对手约瑟夫·戈培尔这样嘲笑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主管东部占领区管理部（设于1941年），连纳粹要人们都为之惊异和忌恨。罗森堡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迹全靠希特勒。1919年到1920年间，这位波罗的海难民赢得奥地利的信任，当了一名俄国人和犹太人问题的专家；过了几年，他担当了希特勒的意识形态顾问的角色。希特勒发现罗森堡这位华而不实的假学者令人振奋地表达了他自己初期的一些想法。

罗森堡1893年生于雷维尔（今苏联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塔林）一个鞋匠的家庭，少年时放荡不羁，特别爱穿紫色的衬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浪迹德法两国，其后进里加大学研习建筑，在那里加入了绍布内一里希特所加入的学生联谊会。随着1914年战争爆发，他从里加撤往莫斯科。这位未来第三帝国的“俄国通”为了逃避兵役，不顾周围的革命大动荡，利用1917年的时间设计了一个有罗马式拱顶和陶立克式柱廊的火葬场。

象许多移民那样，罗森堡是在流亡中偶然参与政治的。他在克里米亚漂泊一阵之后，于1919年一头扎进慕尼黑，沉浸于俄国和德国右派势力蛮横逞凶的气氛中，这种气氛很有感染力。忽然间，他认识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个喜欢幻想的建筑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受命于人的小册子作家。

罗森堡在知识上对于纳粹的贡献，包括把由于宗教原因而产生的俄国反犹主义同伪科学的日耳曼种族学说揉合在一起。他给张伯伦和尼采的理论加上黑色百人团的“息多马逊斯特沃”（犹太共济主义）、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仇俄症和一

些印度的神秘主义，制造了一个在历史上预示未来的“神秘的手”的幻象。罗森堡在《20世纪的神话》(1930年出版)一书中把他制造的这个幻象加以提炼，取其精华。尽管这书不值得一读，最后却同《我的奋斗》一起成为第三帝国的畅销书。

在罗森堡的变幻无常的宇宙中，犹太人都以非犹太人的名字遮盖其本来身份，出没于资本家、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行列里。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迷了心窍，引起了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灾难。正是犹太人的财力同亚洲的下层社会——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和中国人——的结合，才酿成了为消灭西方开路的俄国革命。共产主义是一个种族阴谋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托洛茨基(布隆斯坦)、季诺维也夫(阿普费尔包姆)、拉狄克和卡冈诺维奇都是罗思柴尔德、沃伯格和希夫家族的合作者而不是敌人。忧郁的、无知的、懒散、无政府状态的俄罗斯人未能抵抗住血的污染，结果是遭受到屈从之苦。只有守纪律、勤奋和勇敢的日耳曼人能使欧洲免遭犹太—亚洲人的祸害。

罗森堡特别感谢一个波罗的海的日耳曼朋友，感谢他制定了一项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有效办法。流亡到柏林的帝俄陆军上校费奥多·维克托罗维奇·温堡在他从1919年起直到1927年去世为止出版的一份反犹期刊上提出一些新奇的想法。他向德国人推荐一篇虚伪的著作《犹太长老会谈记录》(这部著作被说成是全球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计划)。罗森堡像传播流行病那样成功地传播了这部著作。但是温堡更引人注意的贡献是极力强调了只有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才能抑制犹太人。他因此预示了后来在第三帝国实行的“最后解决”。

罗森堡对魔鬼的信仰，进一步肯定了奥地利人在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布尔什维克问题上的见解，这很合希特勒的口味。这种信仰把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哲理化。他从种族的角度而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给共产主义下定义，因而无须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挑战作出回答。作为报酬，希特勒于1921年让他担任纳粹党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

对于右派俄国流亡者，罗森堡有一种既称道又屈尊俯就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他欣赏黑色百人团的训条的潜力。他细看俄国流亡者的报纸，赞许地注意到偶尔出现的卐字或把希特勒比作彼得大帝的阿谀奉承。另一方面，罗森堡培养了波罗的海的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的轻蔑情绪。他认为斯拉夫人在种族上低劣（混有鞑靼人的血统），在文化上原始，在气质上混沌。

罗森堡承认斯拉夫人可能成为法西斯分子，但是不可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这个荣誉只属于日耳曼人。他放弃了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俄国的前景，而赞成以民族为界把苏联加以肢解，使它成为由一些不会兴风作浪的共和国拼凑成的政治结构，由德国统治。他认为俄国人应当到亚洲去寻求他们的出路，从而恢复他们的“内部平衡”并完成他们的“民族使命”。乌克兰分离主义者或者会容忍这个方案，但是，哪怕是最喜爱纳粹的俄国爱国者，对于“年轻人，到东方去！”这样的命令也会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罗森堡的主使下，有几十名波罗的海日耳曼人于20年代加入了纳粹党，后来当了第三帝国的“俄国通”。他们的仇俄症加强了希特勒本身的反斯拉夫天性，而且抑制了同情俄

国民族主义愿望的任何可能性。

罗森堡在“波罗的海黑手党”里的主要后继者是阿诺·斯切克丹斯。他们的友谊始于里加大学的学生会时期，通过在奥弗保、《人民观察家报》和德国国社党对外政策办事处（罗森堡于1933年担任这个办事处的主任）的合作，而达到成熟。斯切克丹斯由于给犹太人起了个“杂种”的外号就赢得了理论家的小名声。因为“精通”俄国事务，他在1942年被任命为高加索的“地方长官”。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国防军撤退，斯切克丹斯无法到任就职。他在1945年同全家人一起自杀，以避免被从前的同胞抓获。

不是所有为第三帝国工作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都是罗森堡的门徒。约瑟夫·戈培尔在“反共产国际处”（宣传部所属的一个部门）收罗自己的“俄国通”同僚。在谁的俄国问题专家应当主管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的问题上，罗森堡和戈培尔之间的互相忌恨和长期不和，很少停息过。波罗的海黑手党也有它自己的派系之争。

随着仇俄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被安插为国社党的俄国问题顾问，俄国流亡者日益感到难以为自身的反苏事业取得纳粹的支持。1923年绍布内一里希特死后，他们就失去了至为重要的同希特勒的联系。就希特勒来说，纳粹主义既已成为大规模运动，富裕的帝制拥护者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了。1933年之后，俄国流亡者就被看作是可以抛弃的令人生厌的人物。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尚能予以容忍；如果他们闹独立性的迹象，就予以压制。

另一方面，乌克兰人不但得到罗森堡的鼓励，而且也得

到鲁道夫·赫斯和赫尔曼·戈林的鼓励，因为乌克兰人的分离主义简直顺应了纳粹在东欧方面的战略思想。但是，可能受到纳粹施舍的乌克兰人却在他们自己当中不断打仗。由于他们的抱负有时伟大得连戈培尔都为之脸红，德国恩主们就对他们持保留态度。

俄国纳粹分子

在政治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下，在德国的俄罗斯居民从1923年的250000人下降到1933年的50000人。大多数流亡者迁往巴黎、布拉格和巴尔干诸国家。在留下来的那部分流亡者中，有人进行了把俄国人的爱国主义同他们对于第三帝国的忠诚融合起来的可怜尝试。另一些人则公开放弃俄国国籍，成为“荣誉德国人”，并且学着他们太上皇的样子。

在纳粹德国的流亡者中的右派以阿谀奉承和自我陶醉来掩饰他们的无能，而瓦西里·比斯库普斯基将军则是阿谀奉承和自我陶醉相揉合的集中表现。比斯库普斯基是俄国流亡者中最令公众讨厌的人物之一。他在流亡中策划罪恶活动以补偿破灭了军事生涯。1919年，他大吵大嚷但毫无成效地要求在冯·德·戈尔茨将军的自愿军里指挥军队，吹嘘说他将亲自带领一支俄德联军开到莫斯科，再从那里开到凡尔赛。1920年他在柏林组织气味相投的俄国军官，参加了卡普暴动。暴动失败后他逃往慕尼黑，同鲁登道夫共同策划建立一支扫荡中欧的俄、德、匈、意反革命部队，给所到之处恢复帝制。

比斯库普斯基玩世不恭，时而受人尊敬，时而犯罪作

恶；他感兴趣的是行动而不是空想。他悄悄地溜进奥弗保，在巴特赖兴哈尔扮演奇特的教师爷角色。他收了两个刺客为门徒，一个叫塞盖·塔波里茨基，一个叫佩奥特·沙勃尔斯基·波克。这两人于1922年笨手笨脚地图谋暗杀前军校学生领袖保尔·米留可夫时，竟致命地击中了著名小说家的父亲、自由派新闻记者弗拉季米尔·诺巴科夫。比斯库普斯基自称是西里尔大公的“总理”，并乐于接受维多利亚的财政帮助，培植了科堡集团。1927年西里尔离开德国，比斯库普斯基并不因此有所动摇，而且继续筹措资金并策划建立堂吉诃德式的十字军。

比斯库普斯基为纳粹1933年的胜利欢呼，满以为他的老朋友“艾尔弗雷德·沃尔德马罗维奇”（罗森堡）和“阿诺·古斯塔沃维奇”（斯切克丹斯）会报答他过去十年间的功劳。但是这两个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对于他要求经费的呼吁和在法国参谋部里面组织一个间谍网的许诺都置若罔闻。看来，比斯库普斯基死乞白赖的要求激怒了某些人，因为盖世太保在1933年夏曾把他抓了起来，让他在牢房里冷静一会儿。

比斯库普斯基无耻的恭谦卑顺最终还是赢得了他渴望已久的赏赐。他发誓永远效忠希特勒之后，于1936年受命当上了为协调移民事务而设的纳粹机关的头头——设在柏林布莱布特鲁大街的俄国难民局的局长。他在杀害纳波科夫的凶手塞盖·塔波里茨基的协助下，管理由他的主子们严密控制、日益缩小的俄国社会。他试图提取在革命前以尼古拉二世的名义存入门德尔松银行的200000德国马克，这个欲望碰了壁；他想取得对纳粹化的移民报纸《新言论》的控制权，也没

有成功。他最终是个可怜的装饰品，点缀了一些虚假的委员会，写一些讨好亨利·希姆莱的请柬，这种请柬是德国元首的党卫军从来不屑答复的。

有少数流亡者以当冲锋队员来谋求接纳加入纳粹行列。早于1924年，冯·德·戈尔茨将军的自愿军里的某些俄国老兵已形成了一个同德国国社党关系不很密切的青年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被称为俄国辅助军，其成员在柏林东北约50英里靠近采登村的地方正式参加了冲锋队的军事训练。俄国和德国青年在勃兰登堡贵族(威廉·冯·弗洛托)宽敞的领地上行进，唱歌，正确运用机关枪、刺刀、棍棒、指节铜套以及练习柔道。一些失业、贫穷、渴望参加活动的年轻流亡者在这样的户外生活中得到某些满足，国社党又为这样的新兵提供丰盛的食物和少许补贴。俄国人甚至有自己的特殊服装：白衬衫、黑裤子、长统靴，还有以帝俄的红白蓝三色构成的卐字袖标。穿褐色衬衫的往往以恩人的骄态向穿白衬衫的微微一笑。但是他们回到柏林之后，又友好地来到盖斯堡大街啤酒厂，在这里，斯拉夫的冲锋队员们用掺了伏特加的啤酒解渴。1928年之际，俄国辅助军并入(永久地)舍纳堡冲锋队，这样，他们的力量就被用来对付当地的共产主义红色先锋战士。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不到三个星期，一小帮俄国流亡者宣布组织“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俄国“国社运动”)。俄国国社运动恢复了俄国辅助军服装的特色，有些狂热分子还阿谀地——也真太露骨了——模仿他们的偶像，留了牙刷胡子。国社运动的第一任首领是一个叫斯维托沙罗

夫的并不出名的人物，其外貌同戈培尔有某些相似之处。1933年年底以前他就湮没无闻了，原因还不清楚。

斯维托沙罗夫的继任者的姓会使流亡者想起革命前的一种有名的伏特加的商标：伯蒙特—阿瓦洛夫。帕韦尔·米哈伊洛维奇·伯蒙特—阿瓦洛夫“王子”1884年生于梯弗里斯。他在流亡者内部和外部的许多仇敌给他散布了令人厌恶的谣言，使得他声名狼藉。这个胡子浓密的军官，由于爆发了革命而产生政治抱负，在战士中有了名望，就带了一些追随者到处流亡。1919年伯蒙特—阿瓦洛夫率领一支由先前的俄国战俘组成的分遣队在波罗的海地区同布尔什维克作战。就象他的对手比斯库普斯基似的，他窜进窜出魏玛共和国，谁也不知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伯蒙特—阿瓦洛夫把波罗的海战役的老兵以及象另一名杀害纳博科夫的凶手佩奥特·沙勃尔斯基—波克之类的低级人物塞进俄国国社运动。但是，即使在亲纳粹的流亡者当中他也没有争取到广泛的支持。因为希特勒和希姆莱都对斯拉夫人模仿国家主义的一些表面现象很有反感，所以盖世太保就密切注视俄国国社运动，并且不时驱散它的活动。俄国国社运动很费力地维持了几年，最后，随着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也就彻底垮台了。

一心同德国人合作的流亡者所能走的最后一步是放弃他们的斯拉夫身份，成为“异族德国公民”。只有一小部分人对于改变身份持审慎态度。其中，格里高里·波斯塔尼奇明显地表现为纳粹和黑色百人团的病态心理相纠结的混合体。生于基辅一个富裕家庭的波斯塔尼奇从小在犹太人的性观念和犹太

——共济会的象征主义的薰陶中长大。他在内战期间当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宣传人之后，参加了涌向德国的俄国右派的人流。他象罗森堡那样(他为罗森堡工作过一个短时期)对艺术有所涉猎，出版了一个剧本；剧本以一个犹太契卡代理人折磨一个俄国将军的幼子告终。但是波斯塔尼奇自知他的真正副业是以党卫军学者的身份，在履历簿中嗅出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来。

波斯塔尼奇更名为斯瓦兹之后，就进入上层纳粹组织，彻底同他的斯拉夫祖先断绝关系。他那狗一样的忠心给希姆莱留下良好印象，因而被授予“党卫军名誉教授”的称号。他凭这头衔周游德国，作关于犹太人和共济会的讲演。他的德语有缺陷，全靠他那说书人似的风趣来加以弥补。由于得到希姆莱的青睐，斯瓦兹一波斯塔尼奇在党卫军等级体制中晋升为旗队长(相当于上校)。这个成就，除了一个名为布罗尼斯拉夫·弗拉迪斯拉沃维奇·卡明斯基的俄籍波兰人叛徒之外，任何斯拉夫纳粹分子都不能同他相比。

卡明斯基短暂的纳粹生涯在时间上刚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吻合。战争爆发时，他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小镇洛科季的酒厂里当工程师。卡明斯基怀恨苏维埃政权。象成千上万具有波兰中产阶级血统的俄国人那样，他于1935年被捕并送进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关到1940年。德国侵略者的到来不但给他以发泄仇恨的机会，而且促使他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1942年1月，经德国国防军的同意，卡明斯基接管并巩固了“洛科季自治区”，使它成为在德军占领的俄国土地上仅有的几个由本地人管理的地区之一。这个绰号叫

“布里扬斯克森林的军阀”的卡明斯基，在由俄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组成的一个残败的但很凶悍的旅的支持下，在他的小王国里建立了俄国纳粹党。1943年，东部战线开始瓦解的时候，卡明斯基和他的追随者向西通过白俄罗斯转移到波捷交界的拉蒂博尔。由于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党卫军的活动国际化，卡明斯基的旅成为党卫军第29师，1944年8月至10月，在华沙起义期间，这个师以其残酷性而引人注目。

卡明斯基逃脱了落入苏联人或波兰人手中的命运。他在华沙的贪得无厌连党卫军也觉得难以容忍。德国部队扫除了最后几块孤立地区的起义者的时候，卡明斯基被拘捕，用车送往罗兹，随后枪决。官方报告说，他的死是遭到游击队伏击的结果。

象比斯库普斯基、伯蒙特—阿瓦洛夫、波斯塔尼奇和卡明斯基一类的纳粹分子，同成千上万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人工作的苏联公民有根本区别。红军战俘参加德国战斗部队或作辅助勤务，通常是为了免于在集中营受折磨致死。非斯拉夫的少数民族可能在党卫军组成的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卡尔美克人、穆斯林和突厥人的小部队中找到种族的慰藉。许多通敌分子仇恨斯大林，但他们实际上没有一个是赞赏希特勒的。有吸引力、很能干的苏维埃陆军中将安德烈·弗拉索夫，在被德国俘虏、监禁后被用来装点了一个“俄国民族委员会”，并且率领了一支空想的“俄国解放军”，但他既不是纳粹分子，又不是法西斯分子。顿河的哥萨克首领佩奥特·尼古拉耶维奇·

克拉斯诺夫的情况可以说也是如此。他参加了赫尔默思·冯·潘恩维茨中将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对抗游击队的哥萨克部队。说来说去，弗拉索夫和克拉斯诺夫不过是徒劳无功地试图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而又不愿沾染纳粹主义的代表人物罢了。

但是，尽管俄国纳粹分子和俄国反斯大林分子有所区别，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在苏联人眼中，他们都是叛徒，都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置。回顾历史，他们更象是听人摆布的可怜虫，在机器的运转过程中身不由主地或不知不觉地被碾得粉碎。

法西斯主义的诱惑力

如果认为向法西斯主义靠拢的俄国流亡者同聚集在国社党、东部占领区管理部和党卫军中的那种流亡者都是一路货色，难以区别，那将是一种误解，是不公允的。本尼托·墨索里尼所体现的法西斯主义在20年代期间吸引了散居各地的俄国流亡者——这些流亡者不一定是反犹分子、亲德分子或机会主义分子。年轻的流亡者特别倾向于认为意大利最近的经验切合他们自己的需要。

在20年代期间，俄国流亡者中新的一代在流亡生活中成熟了。这些成员的眼光同他们父母的眼光有鲜明的差别。这些年轻人大致生于两个世纪之交，在童年或少年时经历了革命和内战。有些人在白卫军中参加作战时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兵，目睹过一些使他们的长辈和较为坚强的人气急败坏的事情。

这些年轻的流亡者尽管憎恶布尔什维主义，可是仍然缺少他们父辈那种对于革命前的制度的怀念感情。他们一方面尊重君主制度，一方面又认为君主主义者不合时宜、没有生气而基本上不予理会；他们一方面钦佩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一方面又认为流亡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是要嘴皮的空头理论家而轻视他们。他们渴望有所行动。他们翘首以望，寻找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效药。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向这些年轻的俄国流亡者提供的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墨索里尼在20年代显露出他有充沛的精力、领袖的气质以及理想主义。他的副手象吉塞普·博塔伊和加斯通·斯皮内提以先知的口吻给年轻人带上高帽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西方文明衰败的一对孪生征兆，青年法西斯分子应当扫除它们以改造世界；黑衫队已经把意大利从议会制的堕落和共产主义的颠覆中拯救出来。按照博塔伊和斯皮内提的说法，欧洲的青年国家主义者必须发起组织一个“法西斯国际”。

俄国年轻的流亡爱国者很容易被这种哗众取宠的言词所感染，他们对于意大利那种显然有民族宗旨的新观念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渴望团结起来，热情接受法西斯主义否认阶级斗争的主张和法西斯主义所崇尚的民族精神。在20年代，由于纳粹的种族排他主义使他们很不痛快，他们就欢迎一种据认为是有普遍性的、没有羞辱斯拉夫人的内容的原则。他们确信苏联的共产主义本身在斯大林领导下正在演变成为共产——法西斯主义，因而感到亟需趁早模仿意大利的模式。

决不是只有俄国流亡者才感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力量和生机的关键所在。20年代的各个时期，甚至在30年代，欧洲某些主要的知识分子，象人们能想起的皮兰德娄、艾略特、叶芝、劳伦斯、庞德和萧伯纳，也表示赞扬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也不是只对欧洲有吸引力。蒋介石于1932年宣称“法西斯主义正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七年后，纽约哈莱姆的黑人斗士公开组织了法西斯的“埃塞俄比亚太平洋运动”。法西斯主义的灵活多变，很适合各种狂热的空想家们的口味。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巴黎、柏林和贝尔格莱德萌生了几个俄国流亡者集团；一些亲法西斯浪潮就在这些集团中掀起。这些组织的成员常常自诩为“社会连带主义者”，表示他们拒绝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确信俄国人为了完成反苏维埃的国民革命必须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社会连带主义者往往是年轻人而且受过良好教育，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前沙皇官员的后裔。他们继承了父辈狂热的民族主义而不继承父辈对君主主义的忠心。

在俄国流亡者许许多多的社会连带主义者组织当中，“青年俄罗斯运动”和“全国劳工联盟”也许动员了最广泛的支持。青年俄罗斯运动是亚历山大·勒沃维奇·卡泽姆一贝克大约于1930年左右在巴黎成立的。全国劳工联盟原称“新一代全国同盟”，是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于1932年建立的，所吸收的成员大多是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定居的流亡者。

青年俄罗斯集团不时向纳粹分子卖弄风情，但是没有同他们形成持久的关系。卡泽姆一贝克于1933年9月到柏林同

伯蒙特—阿瓦洛夫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但是这次会见没有产生有重要意义的协作关系。

有些社会连带主义者赞许地响应诸如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和奥托·斯特拉瑟之流的“激进”纳粹分子的主张，这些纳粹分子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份。居住在魏玛共和国统治下的柏林的年轻流亡者维克托·亚历山德罗夫回忆道：“对许多人来说（我承认，我是其中之一），国家社会主义由于经过奥托·斯特拉瑟的激进派集团（这个集团后来消灭了）的示范，有了一定的吸引力。”

随着格雷戈尔·斯特拉瑟被杀和他的兄弟奥托在1934年6月纳粹党进行血腥清洗之后逃亡，俄国社会连带主义者发现自己已渐渐无力在第三帝国内部活动。在盖世太保进行了一系列突击围捕之后，全国劳工联盟于1938年8月撤消了它的德国支部。虽然全国劳工联盟的个别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国防军的战斗部队、罗森堡的东部占领区管理部和卡明斯基的俄国纳粹党合作，但是他们的行动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最后的情况表明，俄国流亡者的爱国主义同德国的需要不能共存，因而欧洲德占区的全国劳工联盟领导人于1944年夏天被盖世太保逮捕或拘留了。

在欧洲孳生的俄国法西斯主义只是没有机会发展成为有凝聚力的政治运动。帝俄时产生的原始法西斯分子，在十月革命中断其活动之前顽固地坚持君主制和正统。意大利提供了一个可资仿效的模式，但是缺少一个供法西斯运动扎根的

较大的俄国社会。法国和南斯拉夫所庇护的半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连带主义者集团则处在分散状态并且没有影响力，即使在流亡者内部也是如此。德国拉拢了大部分俄国右派分子，但是在1933年以后只容忍他们作第三帝国的奴才。

后来的情况表明，不是欧洲，而是远东和美国，提供了使法西斯主义得以最充分表现自己的环境。

第三章

在中国的白俄居住区

你是亚洲人。我也是。

——约瑟夫·斯大林(1941)

我们都属于亚洲民族。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3)

对俄国流亡者来说，远东如同美国的西部荒原。有些流亡者在那里找到了埃尔多拉多^①，另一些人在那里进了坟墓。没有人能逃脱大战和内战（俄国革命后的内战震撼了东亚）的冲击波。卷进了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大旋流的俄国流亡者除了顺应政治潮流的巨大势头而活动外，别无选择。他们依次生活在中国军阀、日本军官、苏联政委的势力下，就一一为各种势力效劳，以求生存。

人们成批地逃离受战火与革命破坏的故国，有如梦魇，而其中远东那部分流亡者的颠沛流离，同整个情况相比，真

① 意即黄金城，是传说中南美洲的一个极为富有的城市，十六世纪时曾引起西班牙人多次探寻。——译者

是好得多了。从俄国欧洲地区逃出来找避难所的最近途径，是经过芬兰、波兰和乌克兰逃往西方。但这是明显的路线，因而都设有警戒。于是，成千上万的难民作出的选择是冒险通过西伯利亚，朝中国和太平洋逃去。

从1918年到1922年，西伯利亚是红军和白军之间激烈斗争的场所，而日本、美国和英国的远征军以及大约45000名力求返回家乡的捷克武装分子（以前的奥匈帝国战俘）在那里出现，更加剧了那里的局势。自1918年秋至1919年夏的短时期内，设在鄂木斯克的白军政府的首领、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设法勉强维持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部沿线的秩序。这条铁路作为运货马车和河运船只之外的唯一运输手段，是白军不可缺少的生命线，也是东去难民的一条最明显的出逃路线。1919年春高尔察克进犯乌拉尔的失败，是人流开始大泛滥的信号。由于红军队伍从西部涌入西伯利亚以及红军游击队在东部制造恐怖，白卫军的败兵完全瓦解，仓皇夺路向太平洋方向溃逃。夹杂着士兵、农民、政客、官僚、商人及其家属的人群向着已经堵塞了的铁路线蜂拥而来，拼命要在任何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列车上获得站脚之地。但是捷克军团和外国顾问征用了所有能用得上的车辆，高尔察克因为自己的列车受阻也只到达伊尔库茨克。在俄国内战的一幕典型好戏中，捷克人和一名法国军事顾问把倒霉的高尔察克交给布尔什维克，以换取自己向东去的道路畅通无阻。

难民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白卫军伙伴同样也干坏事。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土豪们利用中央政权垮台的机会，掠夺

那些通过他们地盘的无依无靠的人们。象格里高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那样的哥萨克首领则在满洲和滨海地区开辟避难所，从中向逃难的同胞榨取重税。

虽然有些人尊重谢苗诺夫死后的名声，但是俄国革命却把他列为最可恶的人物之一。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于1917年委派这个东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首领招募一支队伍，用来部署在欧洲前线以对抗德军，而谢苗诺夫的回答却是建立一支他称之为“满洲特别先遣军”的私有部队。十月革命刚胜利，他就踏进尚未建立地方政权的真空地区，在赤塔俨然以外贝加尔地区的独立军阀自居。随着1918年协约国的武装干涉，谢苗诺夫的先遣军摇身一变，突然成了贝加尔湖以东的一支较强大的“土生土长的”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尽管(或者是正因为)他在美国远征军中名声不好，他还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大量的津贴。这个哥萨克首领利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提供的给养和通信联系制造混乱，成了高尔察克所忌妒的对手。高尔察克于1919年晚些时候战败并于1920年2月7日被处决，实质上只留下谢苗诺夫自己去应付红军前进的浪潮。但是，他设法把他那种爱国的抢劫活动再延长一年，然后以隐退为名，带着两车皮战利品，到了安全的被日本控制的关东地区的大连。

那些试图避开满洲而从外蒙古进入中国的难民遇到可怕的恶运。这地方在一个精神狂乱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罗马·费奥多罗维奇·冯·昂格-斯頓伯格男爵的控制之下。这个沙俄军官由于妻子儿女在革命中被杀而失去理智，以屠杀真正的或假定的红军来求得安慰。1920年，这个红头发、蓝眼

睛、童子脸的嗜杀者离开谢苗诺夫，带领一支由蒙古人、中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没有固定驻地的队伍，在西伯利亚——满洲——外蒙古的边界地区窜来窜去。昂格自命非凡，以为命中注定应由他来恢复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以整肃衰败的欧洲。在一支极其忠诚的蒙古部队的支持下，这个“嗜血成性的男爵”征召一切粗心大意地来到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人。几百名不幸的俄国难民发现自己已落入杀人狂的掌握之中：任何人若反对加入男爵的队伍，都有被吊在库仑的一个房顶上遭到人死尸烂的危险。

在那些活着走出西伯利亚和蒙古的人看来，中国好象是和平的地方——起初他们有这种感觉。

远东流亡者的布局

从1918年到1922年之间涌入远东的250000俄国人中，有半数略多一点在中国落脚，定居于满洲以及诸如上海、天津和青岛等通商口岸。到日本去的比较少，用沙俄外交官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的话来说，“部分原因是进入日本比较困难，部分原因——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俄国人一般都觉得在中国更安适。有些人在香港、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定居。那些能够获得签证并且付得起海外旅费的人，就继续旅行，前往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有一个难民在雅浦结束旅程，那是密克罗尼西亚的加罗林群岛中的一组环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日本的委任统治之下。1977年他仍然住在那里，是一位自豪的嚼槟榔的父亲，有12个俄罗斯—雅浦后代。

坐落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上海，在20年代无疑是远东最大的海港。它把广大的长江流域同海洋连接起来，是八分之一世界人口的贸易中心。上海的3000000居民，大部分住在泥泞河滩上的一个紧挨一个的棚屋里。大约有30000欧洲人，包括19000白俄住在两个有治外法权的飞地上：万国租界和法国租界。这些租界都各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和警察力量。少数有办法的俄国人设法在法国租界建立住所，但是绝大多数聚居在苏州河以北名为虹口的万国租界的一角。虹口还住有许多日本人，所以也称为小东京。

上海生活的某些方面使流亡者痛苦地想到他们正向下层社会滑动。1920年以后，白俄停止享受治外法权的特别待遇，对他们来说，这是严格地把他们区别于其他欧洲人的一种打击。为了取得一点社会地位，有些人入了中国籍。有些无意返回苏联的人也申请了苏维埃护照。总的说来，中国人——他们饱受过屈辱——对于这些来到他们的城市避难的人表示同情与理解。但是，欧洲伙伴们认为这些流亡者的生活与工作状况玷污了白种人高人一等的神奇说法，便很少掩盖对他们的厌恶情绪。

尽管地位受了损害，在上海的俄国人还是喜欢他们已选择的都市，而不喜欢其他亚洲城市。他们甚至庆幸无需同巴黎的房东讨价还价，也免得在巴尔干半岛的农场过乡下生活。此外，上海还给他们以谋生的机会。律师和医生开办的业务很成功。企业家们在时髦的南京路一带开设药店、服装店和咖啡馆。膀大腰粗的人参加市警察队（象万国租界的俄罗斯巡捕团和法国租界的俄罗斯自愿分遣队），或是受雇当

保镖或门卫。许多妇女找到家庭教师、秘书或家庭女仆等工作。

3 当然，不是所有上海的俄国居民都过得不错或表现良好。有些人为了弥补生计，兜售便宜布料。还有一些人凭翩翩的风度举止和装腔作势的伎俩成了文雅的骗子手；象斯坦诺沃依兄弟，就冒充法国领事馆官员，把赌博许可证卖给法国租界里轻信他们的中国商人。上海有许多肮脏酒吧和闹哄哄的下等舞厅，那里头满是白俄“公主”；尽管有个顾客刻薄地说，她们之中有些人“手脚粗笨，一举一动象马夫”，但是另一些妇女来自破落的名门；事实上，确有相当多的俄国酒吧女郎出身于曾是很富裕的人家。这些人家靠卖珠宝过活，直至一无所有，被迫把妙龄女儿卖给妓院。穷困潦倒使她们顽强起来，这些本来脆弱、纯真的花朵被送进上海的弄堂，同廉价的中国野鸡抢生意。不管操什么职业，俄国流亡者都发现上海有一种超道德的活力，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从中清除战争与革命所带来的烦恼。一位从前的圣彼得堡的居民发现，“远东的巴黎”在精神上（虽然不是物质上）补偿了他遗留在俄国的东西。黄浦江沿岸的外滩人行道上，成群的各国游人熙来攘往，这情景连涅瓦大街也输它三分。人们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同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马来人、安南人（更不用说中国人）擦肩而过吗？一个饮者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走进世界最大的酒吧借酒浇愁吗？此外，俄国报纸、商店、饭馆和夜总会全部给流亡生活系上一根红线，使它同已消失而又仿佛就在眼前的革命前的往事联系起来。

天津也吸引了相当多的流亡者。天津比上海小但繁华不次于上海，是华北的主要通商港口和北平（北京）的沿海门户。北平在天津西北约70英里。3000人的移民集团安顿在破落的前俄国租界，这租界自十月革命后中国恢复了对它的主权。有少数比较富裕或有某种良好条件的人家就设法把财产转移到英、法租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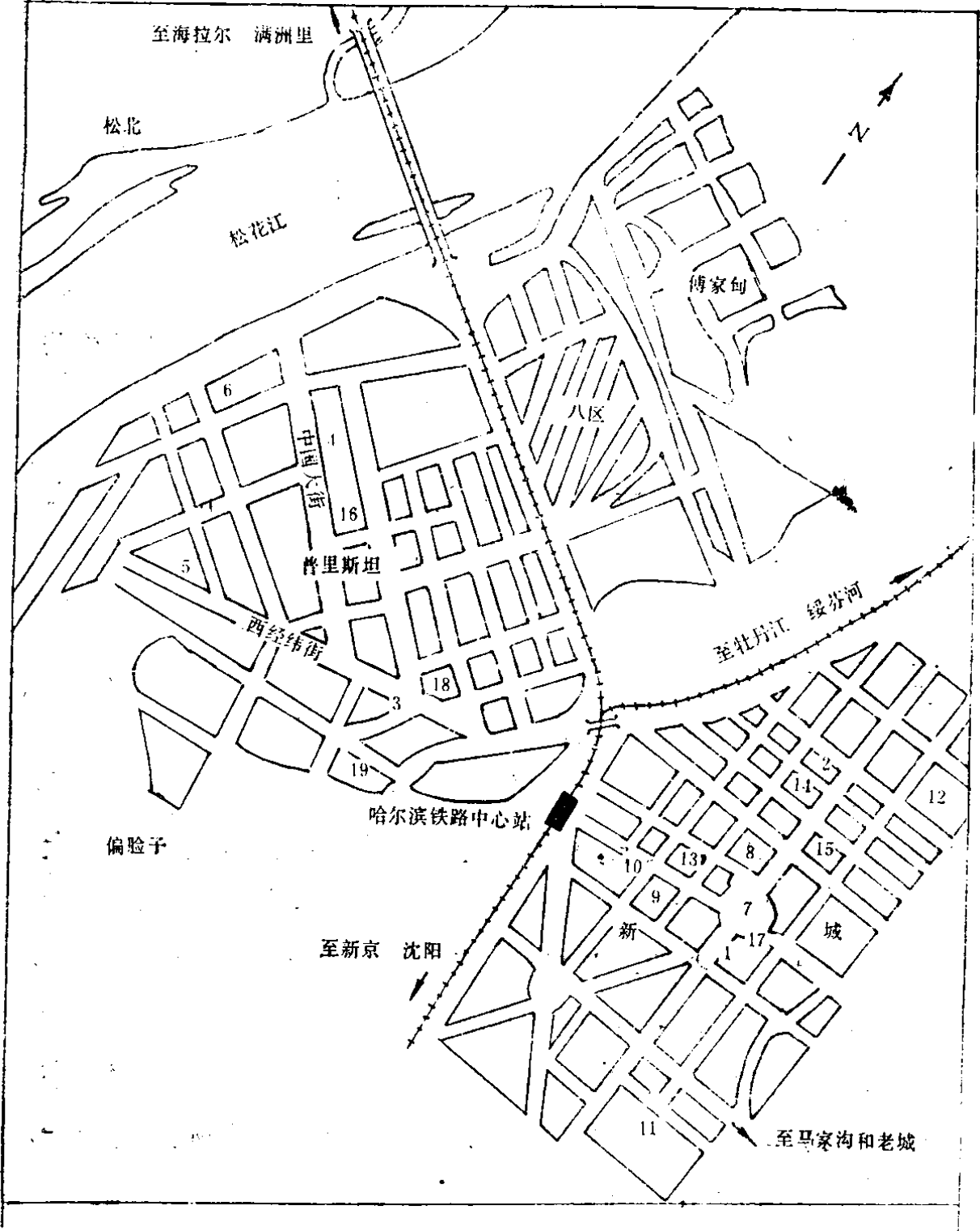
上海和天津更富裕的俄国居民为了消磨几个月的夏天，就到北戴河（在天津东北140英里，长城在那里伸到渤海湾）或山东半岛的海滨城市青岛和烟台去。他们喜欢海滨城市里成帮的英美海军军官，这些军官的舰队定期从香港和马尼拉来避暑。有教养的姑娘们随同家里人到这些地方来，幻想通过美满姻缘求得解放。不正经的女人们被水手们所吸引，也聚集在这些地方。

在20年代，北平只有少量白俄；但是在30年代，好几千白俄为了逃避对自己凶多吉少的日本统治，从满洲迁到那里。

满洲是远东最大的白俄集中点：1922年收容白俄155000人。由于它毗邻东西伯利亚，从17世纪哥萨克人妄图占领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时起，它就同俄国有历史交往。1896年中国允许沙皇政府修建一条铁路，对直穿过北满950英里，把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海参崴连接起来，于是俄国人重新在满洲出现。这条铁路线称为“中东铁路”，它暂时可免得俄国修一条沿黑龙江到海参崴的铁路，那铁路比中东铁路长得多。1898年，中国准许俄国修一条中东铁路支线，这条支线从哈尔滨往南通到旅顺港——位于辽东半岛尖端，大连西南，是

俄国租借的海军基地。铁路建设把几千俄国工人、工程师、职员、卫兵和商人带到满洲来。这些新住户在中东铁路沿线

三十年代的哈尔滨中心



1. 俄国学生俱乐部、俄国法西斯组织总部 (1926—1929)
2. 大直街俄国俱乐部、俄国法西斯组织总部 (1929—1930)
3. 西经纬街渔夫楼、俄国法西斯组织、俄国法西斯总部 (1930—1932)
4. 中国大街125号俄国俱乐部、俄国法西斯党、全俄法西斯党总部 (1932—1937)
5. 西经纬街俄国俱乐部、俄国法西斯党、俄国法西斯联盟总部 (1937—1943)
6. 罗扎耶夫斯基住宅
7. 尼古拉教堂
8. 关东军哈尔滨军事使团
9. 关东军宪兵队
10. 日本总领事馆
11. 苏联领事馆
12. 法国领事馆
13. 英国领事馆
14. 美国领事馆
15. 德国领事馆
16. 马迭尔饭店
17. 新哈尔滨旅社
18. 考夫曼旅社
19. 凡塔西亚夜总会

注：“中国大街”即今中央大街；“普里斯坦”即今道里区；“西经纬街”即今经纬街；“新城”即今南岗区；“新哈尔滨旅社”即今国际饭店。——译者

的不同地点定居，形成中国领土上的俄国飞地。俄国同日本作战(1904—1905)失败，它的势力范围退缩于北满，而日本则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南部(从长春到旅顺港)，并于1907年另行命名为南满铁路。南满铁路作为半官方企业，在1945年以前成了日本在满洲进行经济渗透的主要工具。

欧文·拉铁摩尔有个恰当的说法：在20年代满洲是“冲突的策源地”。20年代末，从山东迁来大量居民后，满洲人口大约有百分之八十(20000000)是中国人。土生土长的 4000000 满族人于是成为少数，其后是朝鲜人(800000)和日本人(350000，包括南满铁路区和关东租借地的人口)。满洲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刺激了日本和苏联的胃口。满洲在法律上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1918年至1928年实际上是由一个名为张作霖的很有色彩的军阀所统治。

出身卑微的张作霖有领袖的气质但为人奸诈。他凭这两手成了这个地区强有力的军阀。他把马贼编成游击队以投靠出价最高的主人，在中日战争(1894—1895)中对日本人作战，在日俄战争中又为日本人作战。1911年清朝灭亡后，中国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张作霖在满族人的故土上当上了督军，设总部在奉天(现在的沈阳)，并自称“元帅”(其后改为通俗的叫法“大帅”，以区别于他的儿子和承继人张学良，即“少帅”)。

外号东北虎的张作霖是玩弄政治把戏的老手，他巧妙地利用邻居的鹬蚌之争保存自己。他轮番使用各种手腕，对北平政府时而打，时而拉，对日本人时而调情卖俏，时而弃如敝屣，对苏联人时而讨好，时而刁难。张作霖象许多军阀那样，着迷于地位和正统名份。虽然他的250000军队都由他自己的银库提供粮饷，但是这位“大帅”仍坚持称他为“督军”，以保持这样一个表面现象——他是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张作霖在奉天附近建造了一座法国式的别墅，内藏美酒、妻妾以及儒家经典，享用这些同他的高位相称的舒适设备。

张作霖的外表掩饰了他的残酷无情。他貌似伏案工作的学者，加上虚弱的体格，略为下斜的双肩，温文尔雅——几乎是羞怯——的举止，使他的学者风度更臻完美。但是在平易近人的外表下面所隐藏的却是反复无常、凶狠残暴的心地。他曾经请来九位被怀疑在通货上对他的总部耍手腕的银行家。他们听了她的一番有关伦理道德的告诫性讲话之后，都被斩了首。凭想象与威风执行死刑符合张作霖的正义感。

由于草菅人命，张作霖就严密地保护自己。他从底特律

定做了一辆1921年出产的帕卡德装甲轿车，车上装备了铁窗帘、六名保镖的坐位和两挺50毫米口径水冷式机枪。每当从奉天总部外出，他乘坐四辆装甲车当中的一辆，每辆车各驶向不同方向，以迷惑可能出现的刺客。

张作霖以绅士风度对待他的领地内的俄国难民。他对于这些命运在他手心里的流亡者不但彬彬有礼，而且表示同情。他把北满沿额尔古纳河的大片土地让给大约10000外贝加尔哥萨克人。他为政府、军队和警察雇佣了好几千俄国人，对他们的选择往往优先于中国人。他从盐税、铁路收入和保护费中足以得到可观的经费，而对白俄则收薄税。尽管他也调整过中东铁路局的白俄代表权，但却倾向于不去干涉白俄的组织。

许多经由满洲进入华北的白俄最终为另一军阀张宗昌效力。张宗昌是大帅的下级伙伴。1922年，他解除了从俄国滨海地区涌入满洲的白军残部的武装。两年后，著名的帝俄陆军将领康斯坦丁·涅察耶夫将军组成一支受命于张宗昌的4000人的自愿部队。这支称为“涅察耶夫先遣军”的部队同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军队进行了较量，并通过夺取山海关（长城东端满洲南部的战略门户）显示了它的价值。涅察耶夫的军队由装甲列车运送的时候，所到之处使人惊慑。他们拚死作战，自知没有国家的俘虏反正不会碰上什么好运。他们的外号是“倒霉兵”，象这种为与己关系不大的事业铤而走险的人是不多的。

张宗昌采购军事物资是不分国籍的，在两性关系上也同样不分国籍。他以俄国女人补充到他的中国妻妾的行列中

来。俄国母亲和女儿伺候张宗昌所遭受的痛苦并不亚于伺候涅察耶夫先遣军的母亲和女儿。

哈尔滨

满洲的俄国人大部分住在哈尔滨。哈尔滨位于满洲中部平原的中心，由松花江南岸的中国村落结集和铁路区俄国人定居点发展而成。这个城市的存在归功于向三个方向辐射的中东铁路：西北通满洲里和西伯利亚大铁路，东面到达海参崴，南面通往长春、沈阳、大连和旅顺港。哈尔滨托福于铁路和河上优越的交通条件而繁荣起来，1900年之后就成为粮食、棉花和大豆的集散中心。到1916年，它有34200常住俄国居民。

十月革命及其余波，使哈尔滨到处都是从西伯利亚来的俄国难民，其中许多人决定在他们熟悉的、有俄国风采的环境里定居，而不到更遥远又不可靠的地方去。1922年，哈尔滨的485000居民中，有120000俄国人。虽然，在1932年以后哈尔滨由于有成千上万人到北平、上海和天津逃避日本人的统治，俄国居民的数字下降到55000人，但是直至40年代后期哈尔滨仍然是俄国流亡者的主要中心。除了俄国人之外，各国民族的杂居又给哈尔滨增添一种世界主义的情调。其中中国人占优势(300000)，其次是朝鲜人(34000)和日本人(5000)^①。此外，还有少量逃离布尔什维克的波罗的海日耳

① 这些都是20年代的数字。1932年以后哈尔滨的日本人口增加到13000。

曼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还有大约13000俄国犹太人，其中有些是长期住户和哈尔滨商界、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领袖。

虽然哈尔滨称为城市，但是更接近于七个镇子的拼凑，各个镇子都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各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在松花江一侧是普里斯坦（词意为“码头”，即今“道里”），这是一个港口和商业中心，除了有一个东正教教堂、一个犹太教堂和一个清真寺之外，还有这个城市的主要商店、银行、剧场和咖啡馆。诺维戈罗德（词意为“新城”，即今南岗）位于南面的岗子上，中东铁路那段架有单孔跨线桥的密集轨道网把它同道里分隔开。在20世纪20年代初，车辆在道里的街道上靠左行驶而在南岗靠右行驶，汽车和马车在这把两个城镇连接起来的跨线桥上自行调整行车规则。南岗气氛庄重，其中大直街、新买卖街（今奋斗路）和松花江大街等大道绿树葱茂，优美的住宅、外国领事馆和中东铁路俱乐部掩映其间，在公园或俄国尼古拉大教堂前，成行的树荫围成了漂亮的广场。有一个这样的广场包围了中心火车站，站内挂有巨幅圣象。

哈尔滨的其余五个区域景色稍为差一点。道里东面是八区，这是一个有豆油作坊、工厂和铁路货场的贫困的工业区。八区的那边是杂乱无章的中国人居住的傅家甸。傅家甸的简陋小码头从错综复杂的狭窄住宅区伸入松花江，住宅区里许多妓院若隐若现。南岗东南方是斯塔利戈罗德（词意为“老城”，当地人称“老哈尔滨”，即今“香坊”）和马家沟。香坊一度是哈尔滨的商业中心，但是在1905年之后它的优势为

道里取代；到20年代，它拥有的主要是四个工场和一些卫戍部队的营房。马家沟在十月革命后曾由俄国流亡者大规模地建设过，并继续是优雅的住宅区，它那些低矮蹲实的木屋上装点着雕花房檐。在道里西南蜷缩着纳克哈洛夫卡，当地人叫它的别名：“偏脸子”，那是占地栖身者拥挤、凄凉的贫民区，棚屋是用木片、纸张、布料和废纸盒钉成的。偏脸子是哈尔滨最穷的俄国难民的藏身之地。

道里对过的松花江北岸尚未开发，只有铁路线和一些草屋。那地方叫松北，在张作霖全盛时期用来作刑场。1932年之后，日本人在那里建了一个吗啡工厂。

到1917年，道里和南岗因为成了受中东铁路掌管的外国租界而享有特殊地位。十月革命后，红军和白军都立即宣称他们是中东铁路合法的俄国业主。但在1924年，张作霖和苏联都甩掉白军，坚定地向中东铁路扩展势力。于是，道里和南岗渐渐失去自治地位，尽管它们同这个城市的其余部分仍然是分开治理的。

道里看来颇象伏尔加河畔的乡镇。河畔码头和明轮船简直象是从萨拉托夫搬来的，东正教教堂的洋葱头形的屋顶威严地对着满洲的天空。电车和四轮马车在石头铺设的街道上嘈杂地来往。冬天，伊兹沃兹奇基——马车夫——坐在马拉雪橇上招揽生意，人推的冰橇横越结冰的松花江，雪橇和冰橇的主人身穿皮衣，头戴俄式皮帽。俄国孩子们在空地上玩“拉普塔”（俄罗斯棒球），或围着各处的食品杂货摊，眼睛盯着香肠和叫做“糖葫芦”的糖山楂。推童车的主妇、哥萨克人、留胡须的神父、穿制服的学生漫步于道里的主要街道中

国大街(即今中央大街),经过戏院、音乐餐馆、马迭尔饭店、秋林百货公司,以及名为“华俄道胜银行”的沙俄遗迹。用西里尔字母写成的广告到处可见,显示在苏联几乎已消灭的资产阶级企业在这里仍有生命力。

哈尔滨几乎赋予俄国流亡者一切激发才智和娱悦感官的条件。到处可见的货亭不但卖当地的报纸,象《霞光报》和《哈尔滨时报》,而且还卖《真理报》、《消息报》和《鳄鱼画报》,还有俄国人的学校,从幼儿园到第一流高等院校。这些学校几乎全是中东铁路出资兴办的,它们是:法学院、东方商学院、师范学院和工学院。那些叫做“图姆贝”的广告塔上贴着哈尔滨交响乐团和哈尔滨歌剧团演出博罗丁、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和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海报,这两个艺术团体都属于中东铁路。美食家在温特伯格餐馆或铁路俱乐部吃烧野鸡(每只45美分,满洲清贫者一餐饭的费用)和鲟鱼子酱(从苏联廉价进口。由于莫斯科在20年代外交孤立,此物在其他地方难以销售),佐以当地加工的“内加”(“甜比利斯”)伏特加酒。马尔斯咖啡店供应法国的精美糕点;在阿尔卡莎餐厅,希腊式圆柱支撑的楼座上,进餐者在喷泉间凭栏观赏旋转舞台上演出的节目。在凡塔西亚歌舞餐厅,吉普赛的旋律奏出了靠变卖家财过活、不知归宿何在的流亡者内心的忧伤。在普捷瓦亚,俄国娼妓日夜接客。

哈尔滨的俄国流亡者的生活显示了革命前那个俄国的一个活生生的碎片还继续存在,它有如浸在甲醛里的生物切片,母体虽早已消灭,而它还继续存在一样。

哈尔滨有许多俄国组织。当然,两个君主主义派别都有

地方代表：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斯利钦将军领导正统派，支持西里尔·弗拉季米罗维奇大公；格里高里·阿法纳谢维奇·弗尔兹比茨基中将领导武装部队联合会满洲分会，支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哥萨克团体为数颇多。哥萨克首领格里高里·谢苗诺夫蒙日本人保护之恩，住进大连的一座别墅；他把他的哈尔滨追随者托付给阿列克塞·普罗克洛维奇·巴克谢夫和列夫·菲利波维奇·弗拉舍夫斯基两位将军。在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人普遍听命于谢苗诺夫的时候，奥伦堡和叶尼塞的哥萨克地方团伙仍然较少受到谢苗诺夫的影响。以柏林为基地的满洲恐怖组织自称“俄罗斯真理兄弟会”，其头目弗拉季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科斯明将军控制了许多试图在东西伯利亚和苏联滨海地区搞破坏活动的不怕死的年轻人。

哈尔滨好斗的白俄团体比远东其他任何城市都多。它们的存在形成一种反革命的紧迫气氛，这是上海或天津所不能比拟的。对于众多的哈尔滨流亡者来说，把俄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中解救出来并不仅仅是他们急于实现的梦幻，而且是行将逼近的事实。那些因年龄太小而记不起革命或从来没有到过俄国的孩子们，都有人教导他们要为参加解放战争作好准备。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哈尔滨俄国人都为反革命作好了准备。许多人都对暴力行为感到厌倦，而把满洲当作半永久性家园。有些人抱怨，是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干涉内战才使他们产生了虚妄的希望，以致成千上万俄国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否则，他们可能已在苏联政权下过着平静的生活。

满洲的战略位置和不稳定形势还把成群的苏联官员吸引

到哈尔滨来，这些外交官强硬声称莫斯科拥有中东铁路。由于沙皇政府的逊位，张作霖的垂涎，以及由于反布尔什维克铁路雇员拒绝苏联接替人员取代自己的职位的不妥协态度，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复杂化了。克里姆林宫的使节还死死要求中国当局引渡以满洲为基地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所谓白卫军。

苏联代理人不遗余力地在这个城市的白俄社会中制造混乱与分裂，他们所采用的不少妙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苏联宣传员以动人的说词劝诱流亡者回归祖国，去过“自豪的”、“建设性的”生活。契卡人员渗入流亡者的组织，特别是那些企图向苏联派遣破坏分子的组织。潜入西伯利亚和滨海地区的游击队员能返回哈尔滨的很少，因为他们的真实身份、任务和活动路线早已被苏联安全机关获悉，所以潜入者到了边境就被捕获。莫斯科的暗探是如此普遍，以致当地一个东正教教堂偶尔也被用来就地召开下达简短指令的会议。那里的神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白俄能够防止苏联渗透的办法很少。天生倔强的俄国流亡者是在明处，而他们的“敌人”却是在暗处。哈尔滨有两万多俄国人持有苏联护照，其中许多人这样做只是为了方便。他们被称为中东铁路雇佣的“小萝卜”（外皮红，里头白）。苏联于1924年最后重申对中东铁路的控制，这可要用第六感官去识别真假小萝卜了。

无孔不入的苏联渗透迫使许多流亡者长期疑虑重重，差不多要患偏执狂了。“红色间谍”、“第三国际密探”等字眼令人心烦地在人们的交往中冒出来；几乎哈尔滨所有各种团体的领袖——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君主主义的、哥萨克

的，以及法西斯主义的——都同时或先后被造谣者贴上“克里姆林宫奸细”的标签。对于这类指控澄清也罢，不澄清也罢，它已经分裂了社会组织。

作为对中国试图（没能成功）自行控制中东铁路的反应，红军于1929年暂时占领北满的部分地区，于是在哈尔滨的苏联人进一步增加了。同时，由于苏联好心地不干涉蒋介石把国家统一在国民党之下的图谋，莫斯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在明显增长——至少在流亡者看来是这样。这种发展形势同满洲的中国民众中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潮流联系起来，使白俄深感痛苦与不安。他们觉得自己分明是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注重实际利益的联盟的牺牲品；有些人开始指望日本出面制止在他们看来好象中国要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

红军和白军相处动不动就发生冲突，这只是哈尔滨局势多变的一个因素。这个城市又是非法贸易的中心。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期间没收的艺术品、毛皮和珠宝通过西伯利亚运到哈尔滨出售。奥尔加·博迪斯科亲王夫人偶然在中国大街发现一家苏联商店的橱窗里摆着她母亲的一套瓷质茶具。毒品同艺术品混在一起。朝鲜和日本的走私贩把鸦片从乌苏里地区带给中国和俄国的经销商，这些经销商为当地的许多常客服务。在这个理想与贪婪的奇特的混合体上，日本浪人（“大陆冒险家”）和日本下层社会的渣滓潜入窜出，无孔不入，这种现象成了1931年以后日本人统治满洲的标志。

在30年代，哈尔滨几乎是失去法律控制的城市。男子在数量上以二比一超过妇女。由于袭击和酒精的毒害，俄国人

的死亡率也以同样比例超过出生率。强抢与绑架(有时为警察所纵容)使富裕人家不得不雇用保镖。长期驻在哈尔滨的美国领事乔治·查尔斯·汉森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一支实弹手枪。小心谨慎的打高尔夫球的人,给他们的球童配备了自动步枪。外来的哈尔滨居民发现,几乎任何城市都比哈尔滨安宁。有个逃离哈尔滨最后在洛杉矶住下的人感慨地说:“如果你上街而不遇到任何伏击,就会感到相当的安慰。”哈尔滨的局势虽然混乱,但与周围农村的局面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农村地区是满洲“红胡子”(把胡子染红让人见了害怕的匪帮)大批出没之处。每帮红胡子都占有自己的地盘,从中进行看不见却摸得着的统治。张作霖的侍从、银行职员、商会工作人员和私人仆役、旅店老板、马车夫和河上的帆船主里面都有红胡子的代理人。匪徒们通过对农民、商人和店主出售“通行证”而获得固定收入。他们偶尔也抢劫火车——主要是中东线的火车,这种火车的防御措施比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火车差。红胡子杀掉火车卫兵,赦免那些交出财物而不反抗的乘客。这种慈悲与其说是由于骑士风度,不如说是由于有远见,因为相同的旅客可能会携带更多可供劫掠的财物再次乘车。有经验的乘客镇定自若地对待红胡子的光顾。亨利·金尼1934年在南满铁路亚洲快车上碰上这种匪徒,被抢得只剩下一条衬裤,但是他作为受雇于这条铁路的公共关系人员,继续光顾这条铁路。

可能是受本身经历的影响,张作霖对待红胡子是小心谨慎的。只要他们不触犯他的收入来源,他一般不去管他们。然而大帅偶尔也树立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司法处理的榜样,

以告诫匪徒们野心太大的危险。

虽然哈尔滨的俄国社会中有少数富裕人家和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但是大多数流亡者是在质朴的环境中生活。成千上万来自西伯利亚的倒运的难民身无长物，又无社会关系，完全是在赤贫状态中逃命。他们在哈尔滨的偏脸子挤成一团，而那些在1917年以前在哈尔滨定居并发迹的俄国同胞们则对他们敬而远之。半数以上的俄国男性成年人遭受失业之苦。妇女操贱业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难童们学习如何用几种语言乞讨。人们还能见到穿花布衫的小女孩按小时收费出卖自己。

被贫穷与动乱逼得怒不可遏的流亡者，就近就能找到他们泄愤的替罪羊：

“看看那些有钱的犹太人吧！他们有商店、银行和旅馆。俄国孩子们在大街上要饭、卖身，而他们却吃得胖胖的。”

“看看那些红军吧！他们杀了沙皇，亵渎上帝，把我们赶出祖国。他们是如此肆无忌惮地欺凌我们，即使我们流离失所，他们也不放过！”

在20年代期间，恶毒的反犹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同不拘泥于字面意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佐料混在一起而就地酿成了法西斯主义，使满洲许多年轻的流亡者活跃起来。在30年代中，这种法西斯主义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炮制成一种特殊药剂，它使整个远东的白俄或是振奋一时，或是如经梦魇。

俄国法西斯主义以本尼托·墨索里尼为榜样。

它的领袖——俄语叫“沃兹奇”（首脑）——是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

第四章

来自海兰泡的小伙子

啊，还我以自由
我要洗雪蒙受的羞辱
我要拯救俄国于敌人之手
——摘自亚历山大·鲍罗丁《艾戈尔公爵》中的《艾戈尔之歌》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在海参崴西北约600英里，是黑龙江畔的一个省会。这城市的名称的字面意义是“喜讯”，而那些知道这地方在1900年发生的遭遇的人，更爱称它为“恶讯城”。

海兰泡在进入本世纪前后是典型的西伯利亚城镇，它那宽阔的街道随着寒来暑往，不是泥泞就是结冰。夏天，尘土无孔不入，给衣物蒙上黯淡的色彩。这“城镇”本身主要由农舍组成。在基本建筑方面，海兰泡能够夸耀的是几座房檐和护窗板雕饰华丽的大木头房子、一个兵营、两个教堂、一个凯旋门。凯旋门是在1891年为恭迎尼古拉斯·亚历山得罗维奇皇太子(后来是沙皇)驾临而建立的，还有一个叫做豪华旅

馆的巴洛克式畸形建筑物。

海兰泡同中国隔江相望，是边陲城镇，西伯利亚大铁路在它旁边绕过。1900年以前，这里的中国人比俄国人多，但是这年的6月28日，哥萨克驻军被中国义和团对外国人采取的恐怖手段吓得神经过敏，竟把大约四千多名中国居民驱入江中。

海兰泡到了20世纪初仍以暴力闻名，当地的黄金以及从中国来的廉价的走私酒，引来了大批恶棍，有如群蝇逐臭。访问这地方的人受到劝告：随身少带钱为好，不然的话，如果无意中露出一张十卢布钞票的一角，就要遭到谋财害命。周围的农村也不安全，尖牙利齿的老虎到处吼叫。玛丽·冈特是一位不屈不挠的云游四方的英国未婚妇女，曾于1914年7月耐着性子在海兰泡住了两天。据她说，有一只猛虎曾经吃了一位粗心的德国昆虫学家——只剩下他的钮扣和一只捕虫网。他可称是德国皇帝在俄国阵地上第一个殉难的臣民。

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1907年8月11日生于海兰泡。这个城镇的放荡不羁的风气，影响了他一生。

罗扎耶夫斯基家族是人数少而脆弱的西伯利亚中产阶级族系的成员，这个族系最终被革命所消灭。康斯坦丁的父亲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有法律学位，深沉、文雅，过着公证人的简朴生活。他的母亲纳杰兹达·米哈伊洛夫娜出身于一个历史久远的海兰泡家庭，尽心尽力养育了他、他的弟弟弗拉季米尔和两个妹妹纳杰兹达和尼娜。

在国内战争(1918—1922)期间，红军和白军把海兰泡变成停尸场，但罗扎耶夫斯基一家保持着一种不令人注目的低

下形象，设法不受触动地站住了脚。若不是康斯坦丁于1925年突然想要逃往满洲，他们甚至已成功地转入社会主义了。

是什么导致一个18岁的青年放弃家庭和祖国而流亡呢？是否象他在1945年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忿懑的是尽管自己身为共青团员，又经过当地苏维埃的有力推荐却上不了大学呢？是否象1946年在莫斯科的审判中检察官所强调的那样，他那中产阶级的血统毒害了他对苏维埃的忠诚呢？或者是否象他的对手和贬损者所窃窃私语的那样，他是奉奥格别乌^①（苏联秘密警察）的派遣，到满洲打入并颠覆白俄组织的呢？罗扎耶夫斯基渡过黑龙江逃亡的背景依然是个谜。

1926年，罗扎耶夫斯基的母亲追踪她那倔强的儿子，来到哈尔滨；她甚至还从苏联当局取得看望儿子的出国签证。她恳求康斯坦丁回家，但他就是不依。她顺从了这个青年的不妥协的态度，独自返回苏联，此后再也没同他见面。

1928年，罗扎耶夫斯基的父亲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突然从海兰泡逃到哈尔滨，原因还不清楚。偕同而来的是他最小的儿子弗拉季米尔。纳杰兹达和她的两个女儿纳杰兹达和尼娜随即被奥格别乌逮捕并送往图鲁汉斯克——叶尼塞河畔的一个定居点，在伊尔库茨克西北1000英里。她擅长缝制衣服，就当了一年女裁缝以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她于1930年死于斑疹伤寒，尽管一位同她的大女儿纳杰兹达相爱的当地医生曾对她悉心照料。这以后不久纳杰兹达嫁给那位医生，最后迁往莫斯科。尼娜的命运尚不清楚，弗拉季米尔

①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缩略语。——译者

父子找到了工作，继续不为人注目地住在哈尔滨。康斯坦丁，这个造成他的家庭同苏联当局发生纠纷的根子，变成了法西斯分子。

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在哈尔滨一度进入法学院学习。这个学院拥有卓越的师资，他们是从俄国不同的大学招聘来的，其中包括研究中国和蒙古法律的有声望的权威瓦连廷·里阿沙诺夫斯基和“改向”运动(20年代初这个运动鼓励流亡者同苏联政府和好)的首领尼古拉·乌斯特里阿洛夫等名流。但是，罗扎耶夫斯基受两个赤裸裸的反共国家主义者的影响，他们是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金斯(有时写作古因斯)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尼基福罗夫。

金斯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短命的鄂木斯克政府(1918—1919)的官员，1921年关于西伯利亚干涉的研究论文的作者，是对墨索里尼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社会连带主义者。他惊异于这位领袖竟恢复了意大利的活力，相信组合国是代替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行办法。金斯在学院的讲演中强辩说，法西斯主义是普遍适用的，即使在多民族的俄国也如此。1930年他在一本题为《在通向未来国家的道路上：从自由主义到社会连带主义》的书中发表了这些观点。

金斯是理论家，而尼基福罗夫教授则是一位专心致志于眼前的政治现实的行动主义者，他惊惧于苏维埃势力在哈尔滨的存在并迅速增长，深感法学院内部的新潮流是不祥之兆。由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管理局供给经费的法学院要依靠莫斯科的善心，大多数教员和学生(后者主要是中东铁路员工的子女)持有苏联护照。没有国籍的白俄学生和教职员(其中包括

金斯和尼基福罗夫)发现他们是脆弱而易受攻击的少数派。尼基福罗夫决心发动没有国籍的学生加入反苏力量，便于1927年组织了一个俄国工人全国辛迪加联盟。

事实上，金斯和尼基福罗夫是在表达学生们自己初期的法西斯冲动。早在1925年夏天，学院里就有几个学生开始聚会，共叙他们对墨索里尼及其黑衫党党员的钦慕之情。有纪律、坚忍、威风的黑衫党党员成了这些俄国年轻人以自己的力量反对校内占支配地位的亲苏分子的模范形象。另外，他们深感法西斯主义是年轻人对于哈尔滨老一代的流亡者领袖的挑战。

有三名学生——叶夫根尼·科拉布列夫、亚历山大·波克罗夫斯基和博里斯·鲁缅采夫带头召集了非正式会议，这些会议很快就定名为“俄国法西斯组织”。科拉布列夫性格谦让、好思，善于讲演和编制口号。身颀体瘦，容貌俊秀且戴着眼镜的鲁缅采夫能操流利的汉语，同张大帅的亲信很有交谊。波克罗夫斯基身躯瘦弱而精力充沛，面色白净，头发浓密，小胡子在突出的上腭上肆意往外翘。他孜孜不倦地游说学生和中东铁路员工以争取支持。1925年9月，当年轻的逃亡者罗扎耶夫斯基到达哈尔滨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震颤刚刚开始搅动法学院。他立刻加入俄国法西斯组织，又在1927年加入尼基福罗夫教授的全国辛迪加。从一开始，这个来自海兰泡的小伙子的行为举止就象他注定要成为这两个组织的首领似的。

乍一看，罗扎耶夫斯基的仪表并不引人注目。他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重140磅，显得身体衰弱，营养很差。他那

张病态、凹陷的脸上嵌着一双不露感情的蓝眼睛，高高的前额上垂复着蓬乱卷曲的褐发。青春期的胡须不自然地遮住后缩的下巴。象精雕细刻而成的手指为他的双手凭添了女性的气质。

罗扎耶夫斯基本身的吸引力同他的外貌不相称。他浑身散发出一种活力。他爱跑步、游泳、散步、做手势，似乎是在不断的运动中生活。每当他的浪漫主义的或热情洋溢的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他就以响亮的男中音高唱《艾戈尔之歌》，还自己以钢琴伴奏。这当儿，他脸上就闪现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微笑，然后又纵情狂笑，肚腹都要笑破了。愤怒使他的嗓音走了样，只有他那双惊奇的大眼睛还没受影响。他除了在社交场合啜几口酒之外，不吸烟不喝酒。

罗扎耶夫斯基的公开行为举止以墨索里尼为榜样。他模仿这位领袖的动作和讲演技巧颇为成功，赢得了赞誉，被称为有感情的、歌剧演员式的演说家。即使离开讲坛，他说起话来也象快板断唱，鸡毛蒜皮的小事经他一说也成了紧急大事。罗扎耶夫斯基象墨索里尼一样，博览欧洲历史和文学书籍。

罗扎耶夫斯基最大的弱点是易于冲动和轻信传言。他有不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决定的习惯。他的亲密朋友说他办事不切合实际。这个高明而天真的鼓动家陶醉于自己的讲演术。由于他为人极为诚挚，就有些人利用了他的易受骗的特点，而他并不觉察。

罗扎耶夫斯基在哈尔滨露面不久，另一个对俄国法西斯主义将要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加入了俄国法西斯组织。米哈

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马特科夫斯基是沙皇的一名将领的儿子；这位将领曾经在乌拉尔指挥高尔察克的一个军团，结果于1919年被布尔什维克击败俘获，投入监狱。当时刚从军事学校出来的小马特科夫斯基已在他父亲的参谋部中服役，但是逃脱了老头子的命运。他逃到满洲之后，先在哈尔滨的工艺学院短期学习，然后转到法学院，恰好在这时候同尼基福罗夫教授和他的年轻门徒们邂逅相逢。

马特科夫斯基同罗扎耶夫斯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身材高大结实，和蔼的大脸上装点着覆在两鬓上的几缕棕黄色的头发，小胡子修整得很漂亮。罗扎耶夫斯基是幻想家，而马特科夫斯基却是实在论者。前者渴望在人前亮相，而后者则喜欢观察别人。罗扎耶夫斯基着迷于艳丽、浮夸，而马特科夫斯基办事总要考虑后果。罗扎耶夫斯基的吵吵嚷嚷、感情脆弱、易于冲动常常使他的知心朋友不知所措；马特科夫斯基的老练果断令他的对手（显然还有他们的妻子）也心悦诚服。罗扎耶夫斯基是思想上的法西斯主义者，激烈的反犹分子，反布尔什维克斗士；马特科夫斯基是战略上的法西斯主义者，对种族主义信条并不关心，感兴趣的主要是同强有力的支持者建立有益的联系，不管他们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苏联人都无妨。如果说罗扎耶夫斯基领导了俄国法西斯运动，那么，马特科夫斯基便是维持了这个运动。他们都感到对方是竞争者，互不信任，但是谁也不能单独取胜。20多年来，他们在紧张的合作关系中心照不宣地掩盖着他们之间的差异。

俄国法西斯组织受到罗扎耶夫斯基的动人词句的鼓动和

马特科夫斯基的政治眼光的指导，很快就在学院内部形成明显的力量。这个组织吸收了几十名学生，在校内针对亲苏团体进行了宣传，于1927年1月宣布了“俄国法西斯主义纲领”。这个纲领是意大利式的豪言壮语和反苏胆汁酿成的令人兴奋的美酒。由于不放过在哈尔滨的白俄中进行宣传的机会，俄国法西斯组织的共同创建人之一鲁缅采夫于1926年11月21日创办了名为《我们的要求》的法西斯小报，其流通之广超越了学院的范围。

俄国法西斯组织最早的同盟者之一是哈尔滨的一个反共青年小组，叫做“俄国滑膛枪手全国组织”，简称NORM或“滑膛枪手”。这个组织大约于1924年由一个叫巴里什尼科夫的人建立，它以一种少年侠义组织的面貌出现，为“自由俄国”和神圣的东正教而战。它的正式服装包括黑衫、黑色有穗腰带、黑色喇叭裤和佩挂在身上或用作袖标的银质马耳他十字。许多滑膛枪手岁数大了之后加入了俄国法西斯组织。这两个组织紧密地在一起工作。

俄国法西斯组织在扩大组织的同时，它的活动也更放肆了。马特科夫斯基从学院毕业后，进入了中东铁路，并开始在俄国铁路员工中建立法西斯基层组织网络。在天津、上海都派有代表，组织当地侨民区的法西斯俱乐部。要求进行“俄国国民革命”的传单印刷出来在全满洲、全中国散发。有些印刷品还被偷运到苏联。为了骚扰敌人并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俄国法西斯组织于每年5月1日和11月7日在哈尔滨南岗的苏联驻哈领事馆外面举行有声势的示威游行，这两天分别叫做共产党的“剥削日”和“反叛日”。

莫斯科对于这些有刺激性的事件及时采取了对策。它郑重提醒张作霖大帅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1924年建立中苏外交关系的北京协定禁止图谋推翻苏联政府的团体在中国存在。他不断对张作霖父子施加压力，要求把“自卫军”引渡到苏联。这两位军阀以同情态度答应要求，摆出顺从的样子，而干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无疑带有讥讽苏联官员对于革命的颠覆活动感到烦恼的味道。的确，俄国法西斯组织到1930年已成为与共产国际反其道而行之的小型国际团体，即为在苏联境内掀起革命而工作的激进分子的国际团体。哈尔滨的年轻法西斯分子感激他们的中国保护人。在南岗的俄国法西斯组织总部内悬挂了张作霖父子的相片。

但是，在法学院内部也确实感受到苏联的压力。这个学院的经费主要是由中东铁路提供的。1928年，罗扎耶夫斯基在毕业前夕被学院校董会找去，他被指责违犯纪律。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曾经领导过一次示威游行，在示威游行中扯下了学院主楼上的一面苏联国旗。他宣称这是代表无国籍的白俄学生的抗议行动，并声言锤子和镰刀对白俄来说意味着可恨的异物侵入校园。

罗扎耶夫斯基在校董会前出现后，哈尔滨的街谈巷议流传了下面的对话：

校董会主席：你自我介绍一下。

罗扎耶夫斯基：我是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的领导人。

主席(冷笑)：这是什么意思？

罗扎耶夫斯基：就象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首领那样，我是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的首领。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罗扎耶夫斯基被开除出学院。

然而，罗扎耶夫斯基有最后决定权。1929年由于学院与张少帅意见不和，学院内的苏联影响暂时消失，罗扎耶夫斯基很快就恢复了学习并毕了业。怀有敌意的资料说，是罗扎耶夫斯基胁迫学院发给他毕业文凭的，但是这说法没有可靠的证据。据罗扎耶夫斯基的一个亲密朋友说，罗扎耶夫斯基很怨恨这段往事，但是他把忿懣藏在心里。这事无关大体，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不很需要学术上的证件。

俄国法西斯党的产生

苏联在满洲的干预激怒了俄国法西斯组织的一伙积极分子，中国人对他们的放任又使他们壮了胆，于是他们就在尼基福罗夫教授的全国辛迪加内形成了一个派别，决心广泛地以整个远东的流亡者为基础建立一个常设组织。因此，他们筹划召开一个以建党为目的的代表大会，邀请满洲、关内和日本的俄国人社会中的青年男女参与其事。

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的名称)于1931年5月26日在哈尔滨西经纬街的渔夫楼召集。这次集会名义上是秘密的，但是可能得到中国人的默许。以罗扎耶夫斯基、马特科夫斯基、鲁缅采夫、波克罗夫斯基和科拉布列夫为首的几十名代表宣布俄国法西斯党成立。一位煽动在苏联

境内搞游击活动的前沙皇将领弗拉季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科斯明被任命为党的主席。但是科斯明不过是作为拥有耀眼的军衔、适宜上照片的挂名领袖以装点俄国法西斯党的门面罢了。这个党的控制权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手里，垄断中央委员会的是俄国法西斯组织的原班年轻人（他们接任俄国法西斯党的职务）。罗扎耶夫斯基设法当了俄国法西斯党的总书记。

由罗扎耶夫斯基和科拉布列夫起草的党纲，开宗明义断言苏维埃政权即将崩溃；来自东西两面的威慑力量（没说明是什么力量）正在向苏联迫近。纲领声称，人民在国内呻吟于暴虐的集体化之下，在国外又蒙受“犹太—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招徕的耻辱，因此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已脱离于人民；广大人民重新觉悟的浪潮遍及整个俄国，这种形势很快就会爆发成为反共产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

俄国法西斯党的纲领继续写道，唯有法西斯主义适合俄国当前的需要。法西斯主义通过把国家提高为民心所向的、至高无上的中心，能够引起人民大众对未来的向往，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动员群众。先前“用刺刀而不用观念作战”的白色运动，已证明它本身肩负不了这样一项雄伟的使命。在俄国法西斯党的旗帜和“上帝，民族，工作”的口号下团结起来，领导国民革命，这就是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的神圣任务。

罗扎耶夫斯基在制定俄国法西斯党纲领的过程中极力讨好政治上分崩离析的各部分移民。他尤其想拉拢帝制派（他们仍然是俄国流亡者中最强有力的集团），使他们相信法西斯

主义的俄国同他们复辟罗曼诺夫王朝的理想是一致的。不过，罗扎耶夫斯基仍然格外注意避免使得俄国法西斯党在王朝问题上承担义务。他无意卷入帝制派在几个觊觎象征性皇位的人当中拥戴谁的问题上展开的争论。

同样，党纲的其他大多数细目除了明确反对苏维埃制度外，对党的最终目标的解释是含糊不清的。它赞成阶级合作而谴责阶级斗争。国际主义被称为犹太人和资本家的工具而予以排斥，而赞成俄国国家主义。集体农场要废除，个人所有的财产应归还，但是大量集中的私有财富将要缩减。恢复对上帝的供奉，信仰准则将会根除无神论和唯物论的腐蚀性影响，但是新生的东正教将同政府分离。家庭是民族繁衍的支柱，应予加强。妇女的尊严应予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应予尊重，但是犹太人将发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客人”。法西斯主义俄国的繁荣昌盛和社会正义将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周围的邻国（芬兰、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斯、阿富汗和蒙古）都将谋求合并到这个最终必将成为伟大的欧亚帝国的国度里面来。

尽管罗扎耶夫斯基有他的折衷主义，他却坚定地保证俄国法西斯党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原则作为俄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法西斯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即是各阶级合作主义：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通过劳动与资本、雇工与雇主的调和消除阶级斗争。罗扎耶夫斯基期望他的法西斯主义俄国把民族的“创造”力纳入各个全国联盟和全国组合里去。全国联盟由从事普通职业的人组成；全国组合把共同与某个特定经济部门有关的各个全国联盟集合起来。例如，在炼钢厂

里，冶金专家、工程师、司炉工以及管理人员都分别属于各自的全国联盟，而工厂的所有成员又都是同一个炼钢业的全国组合的组成部分。联盟和组合选出的代表同法西斯党一起，通过为本地、地区和全国各级理事会（称作“苏维埃”）配备人员，组成政府。国家的最高机构主持最高苏维埃，称为“全俄泽姆斯基·索波尔”，那是由全国的组合单位的最高代表组成的一种集团会议。

俄国法西斯党未来的任务是否吸收帝制派，这个敏感的问题被故意弄得模棱两可。罗扎耶夫斯基谈到，一旦全国的联盟和组合巩固地建立了，“联邦国家”就要出现。在那以前，这个党将制定“暂时的独裁制度”。看来，这位俄国法西斯党的主席在这个过渡时期将要领导俄国。虽然科斯明将军暂时占居俄国法西斯党的最高位置，但是毫无疑问，罗扎耶夫斯基认为自己是法西斯俄国的首脑。

尽管纲领里有各阶级合作主义的行话和术语，而俄国法西斯党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描绘为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主义迥然有别的运动。罗扎耶夫斯基断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沌与颓废，他们的目的在于把个人严密地组织起来，把经济集中起来。至于俄国法西斯主义者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压迫作斗争，因而力图解放个人和分散经济。最重要的是，俄国法西斯主义的宗教性质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偶像崇拜有深刻的差别。唯有“基督教法西斯主义”能够拯救受难的俄国灵魂。

俄国法西斯党的理论家试图强调法西斯主义有其本国的根源，便翻遍了俄国的历史，寻找土生土长的法西斯主义祖

先。俄国法西斯党作家尼古拉·伊万诺夫宣称，14世纪的莫斯科大公伊凡·卡利塔通过把莫斯科建成一个宗教的首府，创立了俄国法西斯的传统。另一位党的政论家根纳迪·塔拉达诺夫声称，16至17世纪国家的泽姆斯基·索波尔（集团会议）预示了现代的组合国家。前沙皇将领和俄国法西斯的装饰品斯皮里多维奇指出，墨索里尼抄袭了由国家赞助劳工联盟的主意，而这个主意是莫斯科警察长塞奇·朱巴托夫在1901年设想出来的。还有人说，连俄国法西斯党的卐字党徽也有俄国渊源。据说，最后一位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在去世前不久被这个标志所吸引，就在房门框上刻了一个这样的标志。她和家属至死都住在这幢房子里。

反犹主义作为俄国法西斯党纲领中具有强烈的“民族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显得突出。尽管在马特科夫斯基方面对这样的政纲的实用性持保留态度，罗扎耶夫斯基还是热切地收罗了黑色百人团，给犹太人打上犹太共济主义烙印。俄国法西斯党的教义把苏维埃制度同“犹太国家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有一条党的口号号召：“反对苏联的犹太法西斯主义！拥护俄国法西斯党的俄国法西斯主义！”对苏联领导人的出身和历史编纂得十分详细，就像希姆莱的党卫军研究人员所编纂那样。从朱利叶斯·斯特里克的戏弄犹太人的《狂飙》上剽窃而来的漫画被重新刊登在党的小册子上，这些小册子以夸张的犹太人的特点来描述克里林宫领导人。提请人们特别注意苏联共产党内的犹太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卡冈诺维奇和拉狄克。奥格别乌被说成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巢穴”。列宁被蔑称为“半个犹太人”。连戴不上亲犹主义这顶

帽子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也成了“美国资本家和犹太人的姘妇”。

有一项“与俄国的关系”，罗扎耶夫斯基对此讳莫如深，这就是俄国法西斯党模仿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和词藻。列宁关于党应成为革命先锋队的主张，是哈尔滨法西斯主义者乐于采纳(虽然并没有公开)的原则。诸如“中央委员会”、“党的书记”、“党的基层组织”、“最高苏维埃”、“劳苦大众”和“战斗的团结”等俄国法西斯党的术语都是直接从共产主义的辞典中摘录下来的。有几首俄国法西斯歌曲实际上是填上了新词的布尔什维克曲调。但是俄国法西斯分子不敢采用“同志”这个苏联名词，而选择了“战友”一词，战友也是“同志”的意思，但是它的军事上的涵义多于政治上的涵义。

俄国法西斯党为预示法西斯俄国的到来而吹响的号角，听上去确实是浅薄的、没有前途的。200来个学生、铁路员工、店主和教员怎样去取代斯大林的200万共产党支持者？罗扎耶夫斯基回避了这个问题，一半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党去制定任何具体的革命战略，一半是因为他并不真正知道问题的答案。俄国法西斯党的宣传机构暂时所能做的，顶多不过是乐观地预言苏联即将崩溃。但是，即使最轻信谎言的“战友”也知道，没有大量的外界支持，俄国法西斯运动永远不过是个忧伤的哑谜游戏。

对于这样的外界支持，罗扎耶夫斯基无需等待很久。日本于1931年年底之前闯入满洲，从此为俄国法西斯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第 五 章

同日本人的关系

日本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获胜后开始插足满洲。1905年9月5日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使日本得到俄国在满洲的权利和租借地作为赔偿。关东地区的租借地是1300平方英里的辽东半岛，包括大连和旅顺港，以及从大连通到长春（哈尔滨南约150英里）的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东京任命一名总督管理这些战利品。关东地区和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交给一个名为“南满铁路公司”的准政府组织负责。为了保护这些财产和利益，日本皇军组建了一支强悍的、有时是半自治的军队——关东军。

20年代，几种力量的配合促使日本考虑在满洲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一种力量是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它向日本好不容易在中国积累的特殊利益和投资挑战。另一种力量看来象是苏联要通过分裂外交、共产国际的宣传、在西伯利亚

与外蒙古的军事准备，千方百计使“中国问题”恶化。再就是以“门户开放”的陈词滥调为掩护的美国远东经济扩张对日本人的打击。日本人因为伪善和阴险，受到1924年阻止日本移民进入美国的《排外法》的羞辱。国内危机也加深了日本的挫折和不安，这就是发展迅猛的工业化造成的经济混乱和社会紧张局势。世界不景气使丝绸出口一落千丈，许多村社受到沉重打击。在类似美国人民党的那种冲动的激发下，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军队的年轻积极分子，痛斥“腐败”的政务领袖、党务政客以至皇军陆海军中的高级官员。1930年以后，这些复杂的压力开始转变成通过大陆扩张，谋求安全与自治的不协调的运动。当关东军在满洲采取最初的一些步骤时，如果说并不总是得到人们的宽恕，但它的积极性却普遍为日本政府、各政党和各阶层民众所认可。

关东军以旅顺为基地。在20年代，它的主要职责是守护关东地区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但是某些关东军军官，主要是来自中层的军官却酝酿着更有野心的计划。泛亚的理想和反西方与反苏联的戒备心理，同日本在东亚的使命的信念相结合，促使这些人玩弄着一种想法：让满洲脱离中国，并把它建成一个清除了日本自由资本主义污浊的独立国。

在20年代末，这种思想开始转变成不依赖东京的军事上级而独立采取的行动。独立采取行动的是一个叫做河本大作大佐的人和一个叫土肥原贤二大佐的人。1928年当张作霖表示满足不了日方的贪欲后，河本大作便把这位大帅炸死在专列里；土肥原贤二大佐则由于在“特务机关”（皇军参谋本部第二处——情报处——的极端秘密的部门）暗中策划野蛮的阴

谋，得了个外号，叫“满洲的劳伦斯”^①。

1931年9月18日，陆军参谋本部第二处处长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他的同事石原莞尔中佑制造了一个事件，这是关东军将攫取整个满洲的信号。他们在沈阳（旧称奉天，在哈尔滨西南约350英里）外面的铁路线上搞了一次爆炸，为日军攻击当地的中国卫戍部队制造借口。

虽然东京方面的领导人确实要把战斗控制在沈阳周围，但是又批准从朝鲜调集增援部队，容许关东军在整个满洲的军事行动逐步升级。沈阳不到24小时就落入日军手里。在其后的三个星期里，日本人随着占领吉林和长春，控制了南满。北满于11月18日关东军纵队进入齐齐哈尔后被日本人控制。虽然“劳伦斯”土肥原和他的特务机关的特务一直在削弱哈尔滨的抵抗力达两三个月之久，但是这个城市直到1932年2月5日才陷落。

在少帅张学良的军队全部向南往长城退却的时候，关东军的注意力转为给已占据的领土梳装打扮，让它“独立”。日本的宣传机构把沈阳事变后所发生的事情说成是“满洲人”决心摆脱暴虐的中国统治的自发起义，是可赞颂的事业，对这事业日本感到有责任予以援助。1932年2月18日，中国的卖国分子在关东军的监护下，宣布满洲脱离中华民国，更确切地说，是脱离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3月1日，一个名为

① 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冒险家。1914年为英国从事谍报工作，策动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曾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满洲国”的徒有其名的国家在长春（从此更名为“新京”，是“新的京城”的意思）宣告成立。为了给满洲国穿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关东军物色了一个前清留下的人物——中国末代宣统皇帝，又称亨利·溥仪。溥仪自从1912年七岁时退位后，一直在天津过舒适的生活。1931年11月10日，“劳伦斯”土肥原设法把这位从前的天子藏在一辆黑色敞篷汽车的行李箱里偷运到一艘日本商船上，然后送到新京。经过某些起码的装扮，这位多少有点稀里糊涂的少年在1933年正式即位，成为满洲国皇帝，年号康德。

满洲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设计得很拙劣的傀儡国。“满洲人”（中国人）名义上对政府机构、军队和警察拥有领导权，而事实上无处不在的日本“顾问”对一切事情都作出决定。例如，哈尔滨的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就担任了满洲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关东军在幕后是起决定作用的操纵者。它的司令官兼有“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这是总督的委婉叫法。

“王道”

从1931年9月沈阳事变起直到哈尔滨被关东军侵占之后四个半月止，这个城市的白俄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经历了暂时的苦难。愤怒的中国人对他们痛加责骂。亲苏的流亡者自信地设想斯大林介入满洲时，红军将会怎样清算反革命分子。侮辱和恫吓弄得他们神经紧张起来，因而很想寻求保护人。

在这新旧政权交替的不安宁时期，哈尔滨的日本平民对白俄表示同情并向他们提供了安全措施。许多日本居民拥有

武装；由于秩序混乱，他们的房屋、办公室和商店都改成了据点，感恩不尽的白俄在那里寻求庇护。

局势发展表明，中国的反抗力量远远不如预料的那么强烈；同时斯大林也没有阻止日本攫取满洲的动向。因此，日军的特务机关正好趁机而入，并且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哈尔滨需要关东军来保护。于是暗藏的特工人员雇佣了一些歹徒在哈尔滨的街道上乱放几枪，又放了几把火，制造一种印象：中国的“盗匪”正处在极其猖獗状态。演出这类事件，就使白俄对日本感恩戴德，效果相当漂亮。

1932年2月5日关东军兵团进入哈尔滨的时候，遇到了来自白俄社会的吵吵闹闹的欢迎。中央大街沿街窗户突然飘出太阳旗，成群的俄国人向在他们前面经过的纵队高喊万岁。俄国姑娘们一路上挥舞花束，并且亲吻日本兵那满是尘土的面颊。当晚，一个上万人的俄国人队伍以由衷的宽慰心情向日本领事馆聚拢。在法国，西里尔大公公开欢呼他的25万臣民受到大日本的保护。

流亡者所盼望的公正与仁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最初的欢乐一旦消失，他们就痛感失望。许许多多日本人举止乖戾自大，使得集中体现满洲国教义的标语“王道”越发令人厌恶。这个标语到处都是。

如果剥去“王道”的儒家伪装，它的意思是“效忠日本”。满洲国的俄国人发觉日本的宣传机构把他们描绘成愉快的“王道”受益者，是“王道”使他们脱离了贫困和中国的苛政。未说出口的是如何实施满洲国的“王道”。这就是要人们学会如何在皇军军官面前弯腰施礼；这就是当粗野的日本观光者

顺步闯入正在举行仪式的东正教教堂时，人们要低眉下意；这就是支付保护费以震慑“红胡子”；这就是培养对日本在东亚自行规定的使命的“忠诚”，即采取合作态度。一句话，就是对日本人要诚惶诚恐。

在哈尔滨被侵占后的几天之内，一个包括关东军地方代表及其下属和日本特务机关在内的新设立的日本军事代表团，开始采取措施，让全体白俄领略一下“王道”：通俄语的军官被派到每个流亡者的组织中当“顾问”。新闻检查制度紧紧箝制着新闻界。从俄国社会雇来的密探在车站、旅馆和咖啡馆游窜，收集只言片语，报告可疑的行动。有些密探很明显，一刻也不离地坐在马迭尔饭店的门厅里，象是患了疑心病的无赖；另外一些密探则隐瞒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些密探的存在几乎使每个人在讲真话时都顾虑重重，即使对亲密朋友也是这样。

许多日本人无视法律和秩序，而法律和秩序乃是他们的国家公开干涉满洲以求恢复的东西。“扶桑”^①的一些不良分子很快就充斥了满洲国，成为赌场、妓院和大烟馆的老板。那些精明的日本人则仍在幕后，通过俄国、朝鲜或中国的中间人进行活动。

说来也荒谬，哈尔滨的犯罪活动空前猖獗的原因之一，竟是争夺权力的执法机构太多。有九个组织暗中互相倾轧，交叉行使管辖权；特务机关，它对东京的皇军参谋本部负责；日本宪兵队，它对新京的关东军司令官负责；哈尔滨市警察

① “扶桑”是日本国的代称。——译者

局，隶属市政委员会；哈尔滨刑警队也隶属市政委员会，但是独立于市警察局；日本领事警察队；中东铁路警察队；还有三个满洲国的机构（宪兵队、地方警察队、国家情报处）。在这九个机构当中，以特务机关和宪兵队权柄最大；它们互相间也是激烈的竞争对手。

特务机关的分支遍布全满洲国，但是它的哈尔滨办公处是皇军对付苏联的情报与反情报工作的作战司令部。哈尔滨分支在庄严典雅的南岗区大直街上占用了一座砖房，这砖房先前属于一个名叫卡瓦尔斯基的由巨富沦为赤贫的波兰人。它的花园同日本军事代表团总部的楼房连接。代表团主要入口处面对的广场，是同俄国尼古拉大教堂和苏联的新哈尔滨旅馆共有的。

宪兵队总部坐落在邮政街上，靠近与车站街相连的交叉路口。车站街是一条连接教堂广场和中心火车站的林荫大道。宪兵队集中体现了30年代日本政治上某些声名狼藉的东西。在名义上，宪兵队负责军队的人事管理，而它却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调查和镇压军职和文职人员中各式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哈尔滨特务机关总部二楼所设置的刑具就是为“特别犯人”——政治犯——准备的。这地方臭名昭著，以致在白俄当中“二楼”成了厄运的同义语。象“我老婆昨天晚上把我放在二楼上”或“当心，不然的话你会上二楼的”之类的话，就是当地流传的暗指宪兵队的隐语。

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都运用它们的权力获取利益。它们都以日本过去为满洲国作了“牺牲”为名，认为捞点钱是合理的。在特务机关，其收入确实通常规定要上交东京。但是在

宪兵队，在正常情况下，收入往往流进私囊。1934年，关东区日本警察中的自肥已达到丑恶可耻的程度，据当时东京民族主义的保守报纸《国际新闻》报道，警官的三年任期所“得”，达到30000日元(约合10000美元)，或者说，比一个警察的薪水的三倍还多。按照哈尔滨的标准，那是中等的收入。有一个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八木^①的，为了当上哈尔滨市警察局顾问，付给军事代表团50000美元。他收回的钱比他的投资多了好几倍。

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都在门面上小心翼翼，努力使他们的赚钱事业在表面上合法化。它们爱用的手段是组织专卖事业，以及给贩毒、赌博、卖淫和运输等有利可图的营生发放许可证。

鸦片买卖成了推行“王道”的特别阴险恶毒的丑剧。1931年以前由日本人和朝鲜人在治外法权的掩护下运入满洲国的麻醉剂变成了满洲国的民族产业。在中国人当中鼓动吸毒以增加收入并麻痹中国人的政治觉悟。炮制了引诱民众消费鸦片的周密计划。飞机散发的传单赞颂烟枪给人带来的快乐；在满洲国的钞票上，一朵盛开的罂粟花 诱人地招摇着。单是哈尔滨就自夸拥有几百家领了执照的毒品商店，这些商店出售海洛因和吗啡无需医生的处方。给有钱顾客准备的安乐窝是居室似的吸毒场所；而卖便宜货的简陋屋子则在入口处开个洞，顾客可以手握20钱(8美分)把胳膊伸进去，便被迅速注射一针吗啡。小青年可以到学校附近的代销处买“少年剂

① 在满洲国有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那些有钱的军人和谍报人员，采用俄国人的名和姓。——原注

量”的毒品。据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4年估计，在满洲，有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同毒品直接有关。日本人可以随意买卖麻醉品，但是严禁尝试。

随着这项产业的扩展，毒品的生产和销售都交给不同的代理商去办。1932和1933年，特务机关统管麻醉品，但是麻醉品的消费量大大超过它的管理能力。日本(1933年)占领热河省之后，开辟了广大的罂粟种植区，促使关东军设立满洲国鸦片专卖局，以便理顺这项产业。在新京、沈阳、旅顺港、吉林、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在松北)都设立了生产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工厂。在朝鲜和台湾生产的生鸦片扩大了满洲国的进口量。1935年，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授权鸦片专卖局全面控制麻醉品贸易。当时官方透露的年产量稳定在30万磅，获利700万美元。实际产量比这高得多，因为特务机关和宪兵队都保留了自己的“私人”厂商。

除了鸦片生意之外，特务机关还在哈尔滨经营非法运输业：在中东铁路上低价承揽托运，办法是把托运物资贴上“日本军需品”的标签。它还在地段街垄断卖淫业，派精明的人员在那里向所有愿意做这种买卖的人出售许可证，并管理大量涌入的日本姑娘。

特务机关总是要同宪兵队的贪欲相竞争。关于管辖权的纠纷经常爆发为这两个机构的中俄两国仆从之间的暴力行动。然而，通常都通过妥协而维持着和平。1934年，特务机关同意宪兵队可以“保护”哈尔滨的100家妓院中的5家、48家大烟馆中的5家以及200家毒品商店中的1家。

哈尔滨的白俄没有过多久就体会到，日本人的统治充其

量是好坏掺半的事。然而，反对是谈不到的。要么逆来顺受，要么离开这地方，再没有别的办法。几千人搬到北平、天津和上海去，那些地方，在1937年“中国事变”发生以前至少还部分处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其他留在满洲国的白俄只好公开屈从于“王道”，私下在隐晦的刺头话中寻求慰藉。“他们从树上下来得太快了。”这是在地下流传的笑话，让人听了捧腹。

同日本人勾结

关东军急于要把满洲国分散的白俄团体联结成容易操纵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能够用于反苏目的，也便于管理。因此动手物色能合作的流亡者领袖。

哥萨克首领格里高里·谢苗诺夫是干涉西伯利亚期间的哥萨克保护人，一眼看去好象就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他非常愿意同日本人合作，并且还得到定居在满洲北部和东部的外贝加尔哥萨克人的支持。在这同时，他的候选人资格却遇到了某些困难。他舒服地隐居在大连，远离白俄人口集中的哈尔滨。他在俄国内战期间的狂暴行为人们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那些在“指导”满洲国的白俄方面起关键作用的特务机关官员们，认为谢苗诺夫是容易感情冲动的、沉湎于空想的、“落后于时代”的人物。

另一方面，哈尔滨白俄社会中更有威信的领导却同合作没有缘分。亲尼古拉沙皇的君主主义者代表和哥萨克代表弗尔兹比茨基和巴克谢夫两位将军都婉言谢绝了日本人的邀请。80多岁的前滨海地区总督尼古拉·勒沃维奇·贡达提直

截了当地拒绝了日本人反复请他合作的建议。当四名宪兵队员来到贡达提的住处请他合作的时候，他不能拒绝，就佩带了几十年前明治天皇亲自授予他的勋章出来露面。宪兵们只好向他鞠躬告退。

日本人最后发现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斯利钦将军是一位合适的人选，他是当地正统王朝拥护者（亲西里尔的君主主义者）的领导人，人们对基斯利钦有过种种描绘，诸如“有文化素养的人，……诚实的人”，以及“没有头脑的、狂妄自大的寄生虫”等等。他总是以将军自命；但是，蔑视他的人对此嗤之以鼻，说他其实不过是一名骑兵师长，俄国革命后西里尔大公把他提升到不相配的高级军衔。他的真实军职介乎将军和骑兵师长之间。基斯利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中又曾在米勒将军和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部下服役。高尔察克溃败后，他得了将军的军衔，在赤塔指挥第一骑兵师，其后又指挥混合满洲师；1922年的白匪叛乱溃败后，他逃到满洲。基斯利钦又威严又柔顺，据认为他的后一种品质显然不但来源于对伏特加的强烈爱好，而且来源于在各次战役中积累起来的14次重大创伤。

然而特务机关和宪兵队需要的不仅仅是德高望重的傀儡领袖。它们需要唯唯诺诺的年轻积极分子。这些人是反苏的俄国爱国者，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信奉“王道”——推行卖淫与贩毒行当，绑架有钱的中国人和俄国人以勒索赎金，必要时按照指令搞暗杀。阿姆列托·维斯帕是一名走运的意大利士兵，曾经在满洲相继为中国雇主和日本雇主服务。在他的文字优美的回忆录里，他引用一名特务机关官员的话道：“我

们需要的是相当精明的年轻人，他将以接受某种军衔而自豪，他将按照布置去做我们要求做的事情。我们需要用俄国人的名义去掩盖我们的活动——这些人不一定是思想家。”

在可能的积极合作者当中，引起日本人兴趣的是俄国法西斯党主席和搞恐怖活动的俄国真理兄弟会在本地的头头弗拉基米尔·科斯明将军。在20年代，他进入苏联搞的自杀性的破坏活动是众所周知的。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2月哈尔滨被占，科斯明替特务机关履行了指定任务，诸如在办公室内放置能发现的手榴弹，在当地的无赖当中挑动打群架等等，表现出渴望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属于略微不同的另一种类型。这位1931年只有24岁的俄国法西斯党年轻的总书记是个宣传家而不是个巷战的斗士。不过，他是那么热情地对日本人的亲近作出反应，所以尽管他轻率鲁莽，特务机关还是把他认作是正确理解“王道”的有价值的合作者。

罗扎耶夫斯基同科斯明一样，也在1931年秋同特务机关有了联系。1932年2月在关东军占据哈尔滨之前不久，罗扎耶夫斯基奉命乘一辆悬挂日本国旗的汽车，送一名日本记者到科斯明的手下人刚发生争吵的地方去。他被告诫可能遇到麻烦，但是又被告知冒这种危险是为了美好的事业。果然，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狙击手把他的汽车打得尽是窟窿。他没有伤着，但是也十分烦恼不安。日本领事即时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说“中国警察”蓄意向日本官员的汽车开枪。

关东军刚刚控制哈尔滨，罗扎耶夫斯基就开始同两个大不相同的日本人打交道。在随后十年间，这两个人在白俄社

会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特务机关的秋草俊少佐，一个是宪兵队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中村。

1932年，38岁的秋草俊是日本皇军的俄国通之一。他在干涉西伯利亚中服过役，岁数够大了；但是往前看，他还有许多年可以大显身手，这么说又相当年轻。秋草俊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基本上掌握了俄语和俄国政治；在干涉西伯利亚期间他在海参崴和赤塔为第三师担任翻译。20年代后期他在东京外国语学校进修俄语，使他的这些技能得以完善，并在参谋本部俄国课担任苏联问题分析人员。

秋草俊在1932年受命协助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小松原陆太郎陆军少将时就相当了解满洲国。秋草俊很快就熟悉这个城市的白俄组织，不久就当上了俄国法西斯党的顾问以及这个党和日本军事代表团之间的联络官；他的任务是向俄国法西斯党提出建议和发放津贴，以引导它走“正”道。秋草俊以他的沉着、机智、正直赢得他所接触的大多数流亡者的尊敬——甚至爱戴。

罗扎耶夫斯基所接触的另一个人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中村是头号“满洲恶棍”。他侨居满洲20年，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有个同居的俄国妻子，他的名字就让人想到他是信奉东正教的。早在1931年以前，“科斯加”（中村的俄国熟人这样称呼他）的劣迹在哈尔滨警察局就有记载。他在哈尔滨的偏脸子以开理发店作为掩护经营毒品买卖，又开了个妓院。1924年，他的妻子指控他应对她的12岁的女儿被（另一人）强奸负责；1928年他因为雇用未成年妓女受到中国当局审查。但中村所干的其他坏事没有受到惩罚。中国人明白他有治外

法权，拿他没办法，只好向日本领事申诉；而日本领事所采取的行动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根本不予处理。科斯加公然逍遥法外，在流亡者中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他同东京有某些强有力的秘密联系。

1931年9月19日，中村同白俄的“联系”变得明显了。那是沈阳事变的第二天，当时他召集一群白俄朋友到他的店里来。他向他们宣布日本将要“把满洲人民从共产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国民党人）手中解放出来”，并且帮助“爱国的”俄国人从苏联人手中“解放”他们的祖国。他注意到白俄朋友的表示赞许的反应，就着手分发左轮手枪、步枪和手榴弹，指示他们在关东军部队能够占领哈尔滨之前保护日本人和俄国人的财产。他还许诺：以后将组成白俄解放军的核心。四个月之后，科斯加公开接受宪兵队“秘书兼翻译”的职衔。中村象秋草俊少佐一样，当了俄国法西斯党的顾问和恩人。

罗扎耶夫斯基从1932年2月开始定期在军事代表团和宪兵队总部同秋草俊和中村见面。他还得到少量津贴，足够把俄国法西斯党从西经纬街渔夫楼狭窄的驻所迁到中央大街125号，那是一座堂皇的砖房，从马迭尔饭店往下隔几个门就是。

罗扎耶夫斯基同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的合作分解了俄国法西斯党的队伍。人事方面的变化随之发生，俄国法西斯党的前身——名叫俄国法西斯组织的学生组织——的三个创建者不见了。叶夫根尼·科拉布列夫于1932年死于肺结核。博里斯·鲁缅采夫凭借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进入满洲国外交部供职。亚历山大·波克罗夫斯基因为反对罗扎耶夫斯基的亲日路线而脱离了党，另行组织一个“法西斯一工团

主义者联盟”，但这个组织很快就被日本当局解散。被宪兵队短时间拘留的波克罗夫斯基决定迁居到较为安全的上海。他携带了当诗人的妻子玛丽亚娜·伊万诺芙娜·科洛索娃，以后渐渐湮没无闻了。

科斯明将军有好几个月守着俄国法西斯党首领的空衔，甚至还同特务机关长小松原讨论过为将来的白军准备作战干部的问题。但是科斯明在1932年晚些时候醉心于发财致富。这位老战士一连几年从绥芬河派党徒往滨海地区去。绥芬河是中东铁路哈尔滨——海参崴线上的一个站，坐落在苏联边界的满洲国一侧。1932年11月，科斯明得到俄国法西斯党的准许，绑架一个名叫季尼钦的富有的奶场主，作为勒索的人质，从中为发展游击活动筹集经费。季尼钦住在绥芬河附近，离科斯明的游击队基地不远。科斯明的下属绑架成功并取得赎金之后，这位将军决定把钱装入私囊。他向哈尔滨的俄国法西斯党总部报告说，他受了骗，所有钱都损失了。但是当地一个名叫波里斯·谢普诺夫的恶棍因为在科斯明的分赃中一无所得，就向罗扎耶夫斯基揭发了这件事。罗扎耶夫斯基立刻认定这位挺上镜头的主席已经失去使用价值。他召集了俄国法西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科斯明开除出党。此后不久，科斯明到上海去了，最后在那里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随着科拉布列夫、鲁缅采夫、波克罗夫斯基和科斯明的相继离去，罗扎耶夫斯基不但是俄国法西斯党事实上的领袖，也是法律上的领袖。他仍然需要依靠俄国法西斯党的另一名干将——米哈伊尔·马特科夫斯基。他仍然需要向日本人表现他作为合作者的价值。

第 六 章

满洲黑手党

1931—1932年，日本人对满洲的占领，为俄国法西斯党开辟了振奋人心的新前景。与日本人相勾结，展现出有金钱、有恩赐官职和参与先发制人的反苏战争的希望。

通过帮助日本人来解放俄国，这已成为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的一条坚定的信念。他认为爱国主义与替祖国潜在的敌人服务，两者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这个小首脑相信日本人的许诺，陶醉于自己的辩术，很快就投身于“王道”的事业之中。

但是，日本人对俄国法西斯党却有自己的打算。日本特务机关承认他们具有作为苏联国内的情报收集者、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价值。日本宪兵队则把他们想象为傀儡诈骗者。因此，一直在准备进行国民革命的俄国法西斯党战友们发现，他们自己已卷入吸毒、卖淫和敲诈勒索之中。以政治运动为

出发点的事业，随着俄国法西斯党变成了日本黑手党的组成部分，而开始显露出转变成一场骗局的迹象。

智囊，蹩脚诗人和打手

罗扎耶夫斯基通过1932年在整个远东地区着手发展俄国法西斯党员的运动，新近获得了日本人的恩宠，并且他把日本人的恩宠作为资本来加以利用。俄国法西斯党的力量得到秋草俊少佐的允许，呈扇面形分布到中国、朝鲜和日本，去谋求流亡者社会的支持，并且在上海、天津、新京、大连、汉城、神户、东京和桦太岛（南萨哈林）设立了它的支部。虽然俄国法西斯党在满洲国以外招募的新党员仅为几百人，但他们终于能够自称在国际上有一批赞助者。

罗扎耶夫斯基热望广泛散布法西斯主义，他把对法西斯主义的系统阐述和大肆宣传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1932年4月，设立在上海霞飞路的俄国法西斯党总部创办了一份名为《民族》的理论刊物，其内容是随意拼凑的大杂烩，包括辩论文章、迂腐的说教及诗歌。诺沙奇·诺斯科夫“教授”为该刊撰写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有关战术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章。尼古拉·多佐罗夫和格奥尔基·谢麦纳写的那些法西斯主义诗篇，读起来就象是模仿伟大的布尔什维克诗人弗拉季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颂歌而成的拙劣作品。该刊还连载了格奥尔基·克鲁奇宁写的象《东方的黎明》这类滥竽充数的小说。这些小说完全背离了苏联文学作品的风格。刊物还刊载一些国外来稿，以增加点世界性味道。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写的令人费解的大哄大嗡的文章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民

族》的封面设计都是些派生品，轮番剽窃墨索里尼的新古典派画像与《狂飚》的反犹作品。编辑们偶尔也采用一些富于幻想的抄袭品。该刊有一个封面，把1915年法兰西战争的一幅招贴画（画面是一个龇牙咧嘴的法国兵高喊着“我们将战胜他们”）修改成一个以卐字饰边的俄国法西斯党兵团战士的画像，他似乎正在追逐犹太籍人民委员。

《民族》办刊的宗旨在于争取知识分子，所以，俄国法西斯党还需要有一个群众性的刊物。罗扎耶夫斯基发现可以利用鲁缅采夫办的小报《我们的愿望》来达到目的。1932年9月，首脑接管了这份小报，将其改名为《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道路》与其他两家哈尔滨的俄文报纸相竞争，这两种报纸是：亲日的《哈尔滨时报》和犹太人主办的《新霞光》报。虽然《我们的道路》的发行量（4000份）从未达到《哈尔滨时报》（25000份）与《新霞光》（10000份）的数量，但该报却通过一派刺耳的喧嚣而为人们所熟知。它的报头上有一个卐字徽，卐字徽上方是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侧面是俄国法西斯党的口号“上帝，国家，工作”、“一切权利属于国民革命”和“俄国属于俄罗斯人”。

罗扎耶夫斯基认为，俄国法西斯党还应有自己的《我的奋斗》，便委派根纳迪·塔拉达诺夫和弗拉季米尔·吉巴尔德（他们与马特科夫斯基关系密切）撰写权威性文件。1934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入门》一书，远东地区的俄国法西斯党员人手一册，因此，该书再版了几次，即使他们并不经常读它。《入门》共分100节，每节包括一问一答，其篇幅不等，短的有八行，长的有两页。问题编排在从第18节“什么是民

主？”到第97节“俄国法西斯的制服包括哪些部分？”的篇幅里。正文的大部分是描绘国民革命胜利后俄国的情景：民族联盟与民族组合在和谐的气氛中工作，每个人（犹太人除外）都享受繁荣与自由。总的说来，《入门》扼要地重申了俄国法西斯党1931年的纲领，包括一些含糊之词和折衷主义。同时，这本手册还包括一些使人们对俄国法西斯党的心理有深刻了解的内容。例如，对“为什么俄国法西斯分子自称是‘法西斯’？”一问的回答坦率得令人吃惊，曰：苏联的宣传工具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法西斯主义在苏联境内那些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人中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振奋人心的呼声。

《入门》这个标题大概是受尼古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一书的启迪而产生的；《共产主义入门》是20年代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了斯大林清党的受害者——对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战略所作的一般性讲解。这两本《入门》即使有什么联系，塔拉达诺夫和吉巴尔丁也不愿提及。罗扎耶夫斯基为1935年出的一本批判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小册子选择了《怎么办？》这个标题时，他既不感谢车尔尼雪夫斯基^①，也不感谢列宁^②。

《入门》的结束部分论述了俄国法西斯党的党徽、制服、歌曲和敬礼姿势。俄国法西斯党的党徽一眼看去就像一个不

①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激进作家，《怎么办？》（1862—1864）的作者。——原注

② 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长篇著作《怎么办？》（1902年）批评“经济学家们”放弃了阶级斗争。——原注

协调的俄罗斯帝国和第三帝国的混血儿：黄底的黑卐字上有一只白色的双头鹰（罗曼诺夫王朝的徽记），《入门》解释说，双头鹰象征俄罗斯民族，卐字象征同其他国家的法西斯运动团结一致。俄国法西斯党的旗帜省略了鹰，橙黄色的底上有一个黑卐字，四周镶白边。

俄国法西斯党的制服是一顶带黑帽舌的黑色褶纹帽，扣领的黑衬衫，黑马裤，齐膝高的黑统靴。俄国法西斯党徒们生怕被误认为是汽车司机，又佩带了武装带（佩于肩上与腰间）和袖标，袖标上印有一个黑色的卐字，衬底是一个耀眼的橙色圆面，镶上一圈细白边。这种色彩比得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旗标。

俄国法西斯党战友间互相敬礼的姿势是模仿纳粹的方式。右臂伸直，稍高于水平线，神情高傲而严峻。敬礼的同时，一般都精神饱满地喊一声“俄罗斯万岁！”（“嗨尔，俄罗斯！”）。这是俄国法西斯党口头上或文字上正式的致敬用语。

完全脱离音乐的十字军是没有的。罗扎耶夫斯基是个十足的歌剧迷。他认为，俄国法西斯党有相当可观的一批激动人心的歌曲。党的桂冠诗歌作者尼古拉·多佐罗夫和尼古拉·佩特林写的抒情作品配上沙皇与共产主义歌曲的一些曲子，就成为哈尔滨风靡一时的歌曲，如《圣弗拉季米尔，我们与你在一起》^①，《听呵，战友们！》和《红星舞曲》。俄国

① 圣弗拉季米尔（1015年12月），基辅基督教的第一个统管者，是俄国法西斯神圣的守护神。——原注

法西斯党的党歌《弟兄们，同我们一道起来吧！》，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曲的旋律相和谐，大概是企图获得已逊位的尼古拉沙皇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的名誉成员资格。歌曲的每个拍节都激励俄罗斯人为国家的复兴而加入法西斯的行列。

起来，弟兄们，同我们一道来吧！
俄罗斯的旗帜，
在山上山下到处飘荡。
俄罗斯的真理，
在高空翱翔。
信仰上帝的人同我们在一起，
俄罗斯的国土同我们在一起，
我们开辟了
通往克里姆林古城墙的道路。
我们俄罗斯的锤子更加坚硬，
这锤击犹如天上的雷鸣，
把穷凶极恶的Sovnarkom^①
击成齑粉。

罗扎耶夫斯基明白，只靠口号与歌曲是不能推动他的运动的，必须把全体流亡者，不分年龄大小，都动员起来加以

① Sovnarkom：人民委员会的缩写，苏维埃的内阁。1946年改名为部长会议。——原注

训练，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突击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俄国法西斯党于1932年成立了同人小分队。在鲁缅采夫的妻子舍伊娜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俄罗斯妇女法西斯运动。法西斯青年团体的数量也急剧增加：10—16岁的男孩组成了前卫联盟，10—16岁的女孩组成了青年法西斯联盟，5—10岁的儿童组成了法西斯少儿队。1932年8月5日，用日本人的津贴作经费，在哈尔滨建立了一所秘密的俄国法西斯党党校，训练战友们到苏联境内从事地下活动。

在俄国法西斯党的建设中，罗扎耶夫斯基没有忽视人力这个因素。首脑一直迷恋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它是20年代俄国法西斯组织的偶象。他在1932年7月号的《民族》上慷慨激昂地喊道：“瞧，他们是怎样把小小的意大利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想想看，在俄国能够做些什么！”当年夏季，俄国法西斯党成立了自己的黑衫队的翻版：特别部。从官方角度讲，特别部负责保护党的领导人，并为党的会议执行警卫任务。在非官方场合，它就是打手队，专门迫害流亡者、犹太人以及上司要暗害的人。俄国法西斯党冲锋队员的人数之所以迅速增加，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坚定的信念，倒不如说是由于贫困和无聊更为确切。结实强壮且烦躁不安的青少年渴望短兵相接的交手战和满足于权力感；他们发现，在流亡国外时，特别部给了他们在苏联国内纳卡夫德^①（秘密警察）能向他们提供的东西。

特别部由一个27岁的强健青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

^① 纳卡夫德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简称。——译者

奇·博罗托夫领导，朋友们称他为“萨沙”。博罗托夫自称，1926年逃离苏联之前，曾在奥格别乌服务过。他来到哈尔滨后，受到俄国法西斯党的吸引，成为罗扎耶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博罗托夫与首脑有明显的区别，他对意识形态的事漠不关心，只热衷于暴力行动，当他没过足吗啡瘾时，尤其如此。博罗托夫喜欢穿戴俄国法西斯党的全套服饰：高统靴、马裤和黑衬衫。他爱不释手地摆弄左轮手枪，就象列车员拨弄他的怀表一样。萨沙公务上的责任是保卫罗扎耶夫斯基，加强党内的安全工作，但他也能抽空去照管设在俄国法西斯党总部三楼的一间赌博窝。

战友博罗托夫的专业是杀人夺命。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他按约承办杀人勾当，但据说，有时他也超越命令凭冲动的感情行事。这种杀人行凶的感情爆发使博罗托夫不足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攻击手，特别是因为他喜欢吹嘘他工作的艺术——例如，怎样用撬棍杀人。俄国人和日本人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病态者（日本的一条外交新闻称他是“杀人狂”），然而，萨沙几乎存在于整个30年代。他的日本雇主与他的俄国首脑为他找到了大量的工作。

爱国的暴徒

当罗扎耶夫斯基决定与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队勾结时，他决心在俄国法西斯党内加强自己的权力，并且，一旦在日本对苏开战时，使党处于有利的地位。他的主子们对俄国法西斯党的作用有自己的打算，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昭然若揭。诚然，日本特务机关的秋草俊少佐和日本宪兵队的科斯

佳·中村都鼓励罗扎耶夫斯基为这样的日子做好准备，到这一天，围绕着“俄国爱国者”这个核心建立起来的一支伟大的白军将与日本皇军并肩前进，把俄国从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解放出来。但同时，还要完成一些实际任务，这些任务与日本国民没有直接关系。

卷入敲诈与绑架的日本官员并不直接参与这种冒险的事业。他们雇用中国人和白俄作代理人，这是一个合适的安排，一旦有暴露的危险，就立即结束这种安排（连同代理人一起结束）。许多白俄受雇于日本宪兵队的官员，替他们充当执刑人、谋杀者、密探和打手。这些白俄当中，不仅有些残暴成性的人，而且也有些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打击“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当中很多人与俄国法西斯党并无联系。那些为日本人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无论他们怀有什么动机，或与俄国法西斯党有无联系，都失去了行动自由。他们已经隐约看到“王道”事业的幽深之处，这对日本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不把家庭成员留下当人质，日本人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出满洲国境的。

从1932年起，成帮成伙受雇于日本人的白俄流窜于哈尔滨街头。由于他们受雇于不同的机构，有时，为了争夺与妓女和毒品有关的“领土”管辖权而互相斗殴。有时，他们又捆在一块共同执行重大任务。如，1932年4月，李顿调查团到达满洲国时就是如此。李顿调查团受国际联盟的派遣来调查沈阳1931年9月事件内幕，这一事件导致日本人占领满洲。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调查团员以及他们的英国团长李顿伯爵在哈尔滨马迭尔饭店住了几天。一些便衣特务和彪形

大汉出没于这家饭店及其周围，监视“未经批准”与调查团员进行的交往，如信件、请愿书或私下诉说满洲人毫不迷恋满洲国，等等。

这些白俄团伙在骚扰犹太人时，当然无需日本人的指导，因为在旧军队军官、哥萨克骑兵、和帝制主义者当中积郁着反犹主义，更不用说俄国法西斯党了。哈尔滨反犹情绪大大助长了“犹太人支持十月革命”，这样一种荒诞神话的流传，并且使他们对当地少数犹太人很富有这一事实更为反感。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逃离了布尔什维克，而且与白俄同样承受了极端的贫困和人们的攻击，这都无关紧要；成问题的是，当地犹太人社会中一小部分人富裕得惹人注目。这种富裕在许多流亡者中点燃了发自内心的仇恨。俄国法西斯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煽动这种仇恨，严厉抨击“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资本主义”。言词不时转变成行动，如俄国法西斯党的黑衫队捣毁犹太商店，砸破犹太教堂的窗户，拦劫犹太学生。为了自卫，哈尔滨的犹太人组织了一个半军事性质的青年团体支部，通称为“贝塔”。“贝塔”不仅同俄国法西斯的黑衫队较量，而且也同青年先锋队的一些小队较量——青年先锋队是苏联青年组织在当地吸收的新成员。

一般说来，哈尔滨的警察机构对犹太人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除非犹太人碰巧发了财。富有的犹太人是进行敲诈的对像。1932年间，日本宪兵队和市警察组织的一些官员利用白俄走狗也干了一系列绑架勾当。首先受害的是那些有能力为保住性命而支付5000—100000美元的中国和白俄商人以及自由职业者。有些人能够支付相当可观的赎金的消息传到

各个团伙后，这些人就不止一次地遭到绑架。

第一桩由警察操纵的绑架一个犹太人的事件发生在1932年3月11日，那是满洲国成立十天之后，也是李顿调查团抵达日本的第十一天。被绑架的是个名叫科夫曼的西药商人。绑架的组织者是科斯加·中村，执行者是六名白俄，其中有两名为暴徒，基里钦科和加卢斯科，他们经常为日本宪兵队的官员执行“特殊”任务。大约在晚上10点钟，他们在道里一条街上捉住了科夫曼，把他关在南岗的一个地窖里，几小时后，转移到马家沟东南郊一间中国式草房里。3月12日，俄文报纸宣称，科夫曼被红胡子绑架了，要求他支付30000美元的赎金。后来的一个月中，在这个药商本人同意之前，科夫曼的家人拒绝支付任何赎金。最后科夫曼的妻子终于支付了18000美元，与“匪徒”们达成了释放她丈夫的协议。然而，她再也没能见到丈夫。早在这以前三个星期，他的遗体就已被砍成几块扔在地沟里，成为无人辨认的尸体在哈尔滨的街上被人们发现。据一个被认为是目击者的人证实，科夫曼是被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拷打和杀害的。

这位首脑行凶杀人是否代表其日本主子的意志还不清楚。当时，受日本特务机关雇用的意大利雇员阿姆斯特·维斯帕生动地回忆起他被雇主派去调查未经证实的科夫曼凶杀案的报告。维斯帕由日本宪兵队所信任的人带到哈尔滨市外的一幢房子里，发现罗扎耶夫斯基正在与基里钦科和加卢斯科喝啤酒。当他询问此事时，据说罗扎耶夫斯基脱口而出道：“这个该死的犹太猪，把钱看得比他的皮肉还重要。这就是他不愿同妻子接头也不愿给她写信的下场。我只略微吓

唬了他一下，这个老傻瓜就死了。”

“略微吓唬他一下”的含意原来就是把他的脸烤得无法辨认，并且使他窒息。维斯帕又问是谁杀死了那个西药商人，罗扎耶夫斯基(用维斯帕的话说)洋洋得意地说：“是我，一切肮脏的犹太人、俄罗斯的敌人都应该像这样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亚历山大·佩尔尼科夫为笔名发表的一部流亡者回忆录重申了维斯帕把罗扎耶夫斯基当成虐待狂似的杀人凶手的说法。但是，维斯帕和佩尔尼科夫对罗扎耶夫斯基的看法同更了解他的几个人对他的印象不相称，这几个人把罗扎耶夫斯基说成是见暴力而畏缩的人。1946年，罗扎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写了一份供认状，并作了宣誓。他在这份材料中交代了一个罪行目录，但目录中没有谋杀罪。毫无疑问，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的档案可以澄清罗扎耶夫斯基在科夫曼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这些档案已被毁掉了，或者于1945年落入苏联人手中。

日本宪兵队的官员们在哈尔滨新闻界中掩盖了科夫曼事件，但却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警察和罪犯间的同谋关系。还未取得安全保证的富裕的犹太人为了保护生命，都成功地取得了在满洲国享有治外法权国家的国籍（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籍最受欢迎）。护身符似的外国国旗飘扬在犹太人的住宅与商店上空。

然而，外交手段并不能阻止日本宪兵队的头目们采取更加无耻的冒险行动。1933年夏季，科斯加·中村带着一份计划来到设在中央大街的俄国法西斯党总部，计划的内容是要对哈尔滨最富有的犹太人约瑟夫·卡斯佩进行敲诈。科

加·中村是来谋求罗扎耶夫斯基帮助的，因为首脑手下的人在执行命令时是不提任何问题的。

卡斯佩事件

大约在本世纪初，犹太人卡斯佩便从俄国移居到哈尔滨，由于建设中东铁路能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他受此诱惑而参与了中国铁路的建设。卡斯佩开了一家不大的修表店，同时还经营转手货。他的买卖逐渐兴隆起来，以致到1918年，他成了远东地区最成功的珠宝店的老板之一。20年代里，卡斯佩从事多种经营，他买下了哈尔滨最漂亮的一个联号剧院的所有权和马迭尔饭店。1932年，据说他的财产已数以百万计。

日本宪兵队的拐骗手和俄国法西斯党理所当然会对卡斯佩特别感兴趣。他那显眼的财富对宪兵队的主事者来说是诱人的目标。在俄国法西斯党的一些鲁夫莽汉的眼中，他是犹太吸血鬼的化身，无情地从他人的不幸中牟取暴利。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适合这种讽刺的。他喜欢谈论自己的富有。更糟的是，他在中央大街的商店里陈列着他从苏联政府那里廉价买来的银器、搪瓷制品、钻石项链、绿宝石戒指和塞夫勒产的瓷器；这些东西都是苏联政府从它们从前的主人手中没收来的。在疯狂反对共产主义的难民社会中出售这类物品，必然会引起麻烦。从1932年起，《我们的道路》载文攻击卡斯佩，说他经营的东西“来路不正”，是从俄国受害者那里大偷小摸弄来的。这家报纸还斥责他是第三国际的代理人。

约瑟夫·卡斯佩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方式引起的仇恨。他是个倔强而又机警的人，哈尔滨没有几件事能瞒过他。他深知自己很可能会遭绑架，便精心制定了一套防范措施。他在马迭尔饭店住宅内的门窗上都安装了粗铁栏杆。俄国武装警卫人员在房前屋后巡逻；他出门时，其周围形成一个警戒圈。他还采取了保护财产的措施。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不久，他就把马迭尔饭店和联号剧院的所有权转到他居住在巴黎并持有法国国籍的两个儿子名下。卡斯佩的每个企业的上空都高傲地飘扬着三色旗，以示它是“王道”掠夺的禁区。最后，他还通知法国领事雷诺，一旦他的生命和财产遭到威胁便及时采取行动。

但是，约瑟夫·卡斯佩在他的家庭保护罩上留下了一个毫无防护的侧翼，那就是他的小儿子西蒙。1933年，西蒙24岁，当时，他刚刚跨入光辉的音乐生涯的门栏。在结束了巴黎音乐学院的学习后，他立即来到哈尔滨，作为一个职业钢琴演奏家而初次露面。约瑟夫十分溺爱西蒙，他断言说，西蒙将成为一个超过帕德列夫斯基的艺术大师。他不惜一切代价，在哈尔滨、上海和东京最上等的剧院为儿子安排演奏会。

约瑟夫警告西蒙，作为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在哈尔滨是危险的，他告诫这个年青人，在不带随从外出时务必当心，特别是在夜晚。西蒙对这些话置若罔闻，只把这当成父母对他的一种关心。他喜欢夜间溜达，并嘲笑父母的恐惧的念头与那些无国籍的难民的思想极为相似。而他，毕竟是一个法国公民，有资格享受他的法国护照所宣布的一切保护。

是谁下命令绑架西蒙还不清楚，但有理由怀疑日本宪兵队的某些官员盯上了卡斯佩的财产。其他的警察机构，更不用说许多黑帮团伙，也都具备充分的动机和机会采取这次行动。日本宪兵队的两个雇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宣称，这个机构的俄语译员科斯加·中村想出了用绑架西蒙来敲诈卡斯佩的主意。中村得到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和一个名叫尼古拉·马蒂诺夫的帮助，马蒂诺夫是哈尔滨市警察局的巡官。他们为中村招募了一帮能够执行绑架任务的人马。1933年7月间，这三个人经常在南岗的一间不引人注意的房子里会面，研究这次绑架的行动方案，这间房子是以中村的名字租用的。

作为哈尔滨市警察局刑事调查处的巡官，马蒂诺夫在绑架西蒙的技术方面是个理想的内行。他掌握了关于绑架的特殊知识，既调查过绑架案件又干过绑架勾当。他还掌握着一窝子白俄走卒，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从不提问题。马蒂诺夫唯一的缺点是有杀人的习惯，这习惯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养成的，在俄罗斯真理兄弟会服务期间又进一步加深了。1932年，他用枪打死了名叫阿尔古诺夫的旧沙皇军队的上校。他因杀人案而在中国法庭上受审，但却以他的军用手枪在两个人谈话时偶然走了火为由被宣判无罪。而子弹是如何在阿尔古诺夫的双目之间穿过去的并没有得到解释。但马蒂诺夫的冲动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由于他的冲动使他受惠于他的日本主子，日本主子为了他而插手干预法庭。

把罗扎耶夫斯基卷进卡斯佩行动，中村本来是有些保留的。这位俄国法西斯党的首脑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一切问

题，并且有爱出风头的癖性，这可能危及对“内部自己人”所干的绑架案件的重大秘密。但是，罗扎耶夫斯基的俄国法西斯党同卡斯佩的联系和所掌握的关于卡斯佩的情报，显然使中村认为他们足以同他合作。

中村刚刚提出计划与罗扎耶夫斯基讨论，立刻发现他原来的猜疑是有道理的。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要的是卡斯佩的鲜血，而不是他的金钱。他争辩说，对西蒙不应仅仅是绑架，而应给他插上第三国际代理人的标记，不顾“犹太人的”法国政府的态度而消灭之。中村断然拒绝批准政治谋杀，而且提出了下列条件：（1）此次行动不要有政治色彩；（2）尽量不要张扬出去；（3）只有在得到法国当局不干涉此事的保证后才进行绑架。这些条件激怒了罗扎耶夫斯基，他当即退出这次行动，于是，马蒂诺夫便担起了这次绑架的全部责任。

在让马蒂诺夫放手行事之前，中村对卡斯佩与法国领事雷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翻周密的调查。他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报告：他们之间并无私人交往。他通知马蒂诺夫继续进行并招募帮凶，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透露他的上司是谁。作为“王道”事业的专职奴仆，马蒂诺夫决不需要别人提醒他：如果事情失败了，他将承担罪责。

1933年7月末，马蒂诺夫设法接近一个叫阿列克谢·尚达尔的可靠的仆人，说服他担当了绑架西蒙·卡斯佩行动小队的负责人。然后，他又招募了三名执行“特殊任务”的老手：基里钦科和加卢斯科，他俩都参与过绑架科夫曼的案件。此外，还有扎伊采夫，他是个全能打手，他的许多工作都是按

合同在上海和天津干的。他把杀人当成“打猎”。不知为什么，尚达尔推荐两个非专业打手参加这个小队，他们是科米萨连科和别兹鲁奇科。马蒂诺夫勉强同意，但条件是对他们俩都不能分配高度机密的任务。

马蒂诺夫给每个人分配了一项特殊的任务：让尚达尔率扎伊采夫和基里钦科去绑架西蒙·卡斯佩；加卢斯科、科米萨连科和别兹鲁奇科负责在香坊的一个掩蔽点看押西蒙，直到获取赎金为止。马蒂诺夫本人在幕后指挥，他不能过早地冒险去与受害者接触，在以后警察调查此事时，他将与受害者见面。

由于便衣人员以及马迭尔饭店守门的希腊人的协助，马蒂诺夫得到了有关西蒙的准确情报。他掌握了这个青年钢琴家的生活规律，他的男女朋友，他最喜欢的饭店，他从马迭尔饭店外出溜达的习惯路线。马蒂诺夫甚至还获悉西蒙的司机带有一支左轮手枪（马蒂诺夫所在的刑事调查处为他签发了枪证）。这帮人进行袭击时，行动是那样的准确无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3年8月24日，午夜前几分钟，西蒙·卡斯佩在哈尔滨的街上被抓走了。那时，他与一个名叫莉迪娅·切尔涅茨卡娅的女友在马迭尔饭店吃过夜宵后正护送她回家。当他的车在女友家大门前停下时，尚达尔从隐蔽处闪出，偷偷窜进车内坐在前排座的司机身旁，缴了司机的左轮手枪。与此同时，基里钦科进入后车门，命令莉迪娅和西蒙不许声张（他们照办了）。尚达尔强迫司机把车开到南岗，在那里释放了司机和莉迪娅，释放前，教给他们对约瑟夫·卡斯佩应说些

什么。西蒙被送进另一辆汽车，由扎伊采夫把车开到城外的河滩上。在那里，由加卢斯科和别兹鲁奇科负责看守西蒙。接着，再次转换汽车，把他送到事先预备好的香坊的隐蔽点。

这次绑架尽管很顺利，但获取赎金却遇到了困难。中村提出西蒙的赎金数目为30万美元，他认为约瑟夫有能力支付这笔金额。但他却错误地估计了这个老头的特点。莉迪娅把西蒙被绑架的消息告诉了约瑟夫，包括所要的赎金数额以及威胁他的话，即与警察和法国领事馆的任何联系都会使西蒙丧生。老卡斯佩以他那特有的大哄大嗡性子来处理此事，立刻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哈尔滨所有的警察机构，并要求法国领事馆干预此事，还对报界宣布，说他决不支付分文金钱，因为没有人敢伤害他的儿子。

西蒙绑架案轰动了哈尔滨。在这样有显赫地位的外国公民中还不曾发生过这类事件。哈尔滨所有的警察机构（包括市的、满洲国的、日本宪兵队的、日本领事馆的、中东铁路局的警察）在一片公开宣扬声中分别进行了调查。

官方与非官方人士都首先怀疑俄国法西斯党。俄国法西斯党党员无一例外地都是坚定的反犹分子；《我们的道路》经常对老卡斯佩进行尖刻的攻击。黑衫队的头目萨沙·博罗托夫因涉足这类罪恶勾当而臭名昭著。哈尔滨市警察局审问了几个法西斯分子，包括一个最不值得怀疑的米哈伊尔·马特科夫斯基，他被拘留了三天。然而，罗扎耶夫斯基却没有受到触动。

正如尼古拉·马蒂诺夫所预见的那样，他接到了哈尔滨

市警察局刑事调查处处长戈罗日克维奇的命令，让他调查卡斯佩的失踪案。马蒂诺夫厚颜无耻地拜访了约瑟夫和法国领事雷诺，向他们表示遗憾，并保证他亲自优先处理此案。

马蒂诺夫几乎没有时间来扮演他的双重角色了。8月末前，一个意外的事变使他有被揭穿的危险。不出中村所料，法国领事雷诺对小卡斯佩命运的关心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副领事艾伯特·钱邦感到这件事很有来头，得通过私人活动来解决。钱邦让老卡斯佩与绑架者谈判，但不要答应他们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又雇用了一些没参加任何团体的侦探暗中进行调查。两个星期内，钱邦的怀疑变得可信了：这次绑架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内场人干的。剩下来要他去做的只是收集证据。

到了9月中旬，绑架者已变得紧张不安。看来，老卡斯佩是在拖延时间。钱邦宣布了寻找西蒙的赏格，赏金的数额使萨沙·博罗托夫也会高声宣布，他想要领这笔赏金。最糟的是，有谣言说，钱邦的特工人员正在整理最新获得的线索。绑架者担心哈尔滨不再是安全之地，便把他们的囚徒从香坊转移到小林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小林是距哈尔滨市约30英里的一个孤立村庄。

据说，到9月末，中村更加神经紧张了，他撤换了马蒂诺夫，召回了罗扎耶夫斯基，让他杀死西蒙。罗扎耶夫斯基在这阶段卷入此案既无文件记载，也缺乏可能性，但大量的迹象表明，有人作出了必须处死小卡斯佩的决定。

尽管西蒙尽力与绑架者合作，包括给他的父亲写信，恳求他屈从这些人的要求，但看来他并不知道他自己的命运已

被决定了。经过几星期被迫的亲密接触，西蒙逐渐了解了他的看守们——别兹鲁奇科、加卢斯科、基里钦科和扎伊采夫（科米萨连科离开了小林）。长时间无所事事使这些人感到厌烦，便信口开河地饶起舌头来。扎伊采夫忍不住夸夸其谈地讲起他在俄罗斯真理兄弟会里工作的情况。他在言谈中还透露了绑架卡斯佩计划的详细情况，泄露了马蒂诺夫的名字，并暗示此事与“更高一级”有关。当基里钦科知道了这个失密事件时便决定，即使卡斯佩支付了赎金也不能让他活下去，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9月28日，绑架者采取了一项极端行动，迫使老卡斯佩交出赎金。他们割下了西蒙的两只耳朵，连同一张便条一块儿打成包裹邮寄到马迭尔饭店，便条上说，不久，他们将把西蒙的手指头也邮去。面对儿子那鲜血淋淋的肉体，约瑟夫当即放弃了原来的决心，但钱邦极力主张他再稍微坚持一段时间，说折磨西蒙的人马上就要暴露了。

副领事是对的，几天之后，他的特工人员捉住了科米萨连科，他是这个团伙中最年青的，也是坏事干得最少的一个。他被带到法国领事馆受审；他的精神崩溃了，说出了真情。为了获得释放，科米萨连科在供认状上签了字，供认状上涉及到六个同谋者，其中包括马蒂诺夫。由于恐惧或不知底，他没有提到中村和罗扎耶夫斯基。钱邦带着这些证据找到了哈尔滨市警察局的负责人，要求逮捕他们。他明确地表示，他怀疑日本人介入了此事。

哈尔滨市警察局把科米萨连科的供认及钱邦的怀疑都通知了日本宪兵队总部。中村断然作出反应，他命令把科米萨

连科送到哈尔滨以东250英里的苏联——满洲国边境上的绥芬河去隐匿起来。钱邦的调查员被科米萨连科认出后被逮捕了。

中村的对策更坚定了钱邦揭露日本人在卡斯佩失踪事件中的作用。他向所有的领事馆散发了科米萨连科供认状的副本。不久，美国、英国、法国的报界不仅公布了这一事件，而且还推测日本人与此案有同谋关系。也许是日本宪兵队的命令，《我们的道路》和《哈尔滨时报》向钱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谴责他滥用外交豁免权。《我们的道路》称这位法国副领事是“犹太共产主义的代理人”，竭力主张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者”对他采取直接行动。一些俄国法西斯党的战友随即向钱邦提出挑战，要求决斗，但这种姿态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马蒂诺夫此时感到，一张包围着他的网正在收紧。1933年10月8日，他与尚达尔和基里钦科商议鉴于即将暴露应采取的对策。他们决定，马蒂诺夫和尚达尔只能等待逮捕，但被捕后要否认与日本宪兵队有联系。其他的人（基里钦科、扎伊采夫、加卢斯科、别兹鲁奇科）要逍遥自在地留在小林看守西蒙，继续设法诈取赎金。即使在这最后的阶段，绑架者仍然相信他们有成功的可能。科米萨连科并没有向钱邦泄露小林的掩蔽点，他们指望西蒙住在巴黎的母亲能向约瑟夫施加压力，让他软化立场交出赎金。

10月9日，马蒂诺夫和尚达尔在他们的家中被哈尔滨市警察局正式逮捕。审讯他们的是一个哈尔滨地方法院的日本检察官。他们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绑架卡斯佩的事情以及他的下落。

在这关键时刻，钱邦找到了一个有势力的同盟者，铁路警察局的负责人大井深大佐。北满整个中东铁路地区都属他管辖。尽管他是日本官员，但并不受日本宪兵队左右，即使日本宪兵队对他指手划脚，他也未必会同意放弃原来的主张而另作抉择。大井不是一个肯屈从于日本宪兵队压力的人，而且不能容忍在铁路辖区内目无法纪的行为。

当大井听说科米萨连科就要乘车去绥芬河时，他立刻命令特工人员于10月13日在一面坡车站(哈尔滨东部50英里处)截住了这个年轻的俄国人。科米萨连科被带回哈尔滨，提供了一份更加详细的供认状，使大井大佐掌握了重要线索。11月28日，大井得，有两个很像扎伊采夫和别兹鲁奇科的人经常在哈尔滨的香坊车站上车，就下令逮捕了他们。

各种互相矛盾的报道把卡斯佩案件的情况弄得模糊到了极点。新闻报道说，别兹鲁奇科自首了，扎伊采夫、基里钦科和加卢斯科杀死西蒙后逃离了小林。当这三个逃亡者打算进入哈尔滨北部人烟稀少地区的一座寺院时，被追上来的搜索者发现了。扎伊采夫和基里钦科被捕，加卢斯科在“拒捕中”被击毙。但是，接近日本宪兵队的人士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大井的特工人员在香坊车站逮捕了别兹鲁奇科和扎伊采夫后，监视这次逮捕行动的便衣人员把此事通知了中村，中村立刻赶到小林。他命令基里钦科杀死西蒙，然后，他拔出手枪打穿了加卢斯科的脑袋，因为有人报告说，加卢斯科曾经同西蒙在私下里作了交易，他企图把这个青年放了，以换取一笔报酬。接着，科斯加命令基里钦科潜回哈尔滨，到日本宪兵队总部去领取为他提供的假证件，隐藏到满

洲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地方。

总之，1933年12月3日，日本宪兵队的发言人发表公告说，在小林村附近一座不太深的墓穴中发现了西蒙的尸体。公告还说，绑架小卡斯佩的全部人员，除基里钦科外^①，或死亡，或被哈尔滨市警察局扣留。

约瑟夫·卡斯佩不相信这种结局，他坚持要看儿子的尸体。尸体被送到他家中，那消瘦而未擦洗的尸体，那须发蓬乱、没有耳朵又生满坏疽的面孔，使老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95天的囚禁生活中，他的儿子忍受了何等的痛苦。直到这时，约瑟夫才失去了自制力，他低声呻吟着，接着，就放声痛哭起来。

成千上万来自各个种族群体的哈尔滨市民，包括日本人在内，都与约瑟夫·卡斯佩共同发出了愤怒的喊声。为西蒙送葬的行列成为一场激愤的群众性示威。亚伯拉罕·考夫曼先生在他那激动人心的悼词中，不但斥责了杀害卡斯佩的人，而且也斥责了那些逍遥法外的幕后指挥者。他的话的含意是清楚的。由于他的这次鲁莽行动，日本宪兵队的流氓对考夫曼进行了恐吓，但没有逮捕他。东京显然很担心国际舆论，急切希望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直到15个月之后，马蒂诺夫和他的同伙才交付审判。直到1936年，经过一系列司法上的歪曲之后，对这些人的最后判决才算通过；这些歪曲事实的审判和犯罪事件本身一样引起了极大的义愤^②。

① 基里钦科于12月被大井大佐的人在哈尔滨北部逮捕。——原注

② 见第十一章。——原注

尽管日本当局希望卡斯佩事件逐渐为人们淡忘，但他们所庇护的罗扎耶夫斯基却把此事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庄严事业。他不顾及会给他的主子带来麻烦，竟在《我们的道路》上撰文，为西蒙的死亡而欢呼，并称赞这些绑架者是俄罗斯的爱国分子。当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被冲昏了头脑时，中村十分明白他必须保持缄默。因此，日本宪兵队的执法者对《我们的道路》的办公室进行定期访问，以便在那里反复灌输对“王道”的正确理解。

尽管卡斯佩事件的余音还在回荡，随着1933年行将结束，罗扎耶夫斯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他在26岁就当上了远东最强大的俄国流亡者组织的一致公认的头目。俄国法西斯党员人数由1931年的200人猛增到1933年的5000人，两年间增加了24倍。有种种迹象表明，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要成为未来的潮流。阿道夫·希特勒刚刚在德国上台执政。本尼托·墨索里尼高声宣布了罗马帝国的复活。法西斯主义运动正在西班牙、法国、巴尔干和南美汇集力量。日本在亚洲大陆进行扩张，看来要同苏联顶牛。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会说俄语的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将军对俄国法西斯党有好感。苏日战争可能促进国民革命，并且使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这个俄国法西斯的首脑成为俄国的首脑。

且慢，他真的是所有俄国法西斯分子的首脑吗？当他开始得知一个名叫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的人的反应时，心中便产生了一些微弱的怀疑。旺夏茨基自称是在美国的俄国法

西斯分子的首脑。罗扎耶夫斯基这个来自海兰泡的青年决心要进行调查。由于这个康涅狄格州的冒牌伯爵戏剧性地跳上崇高的流亡者的政治舞台，罗扎耶夫斯基那最初的担忧就变成了十年的头疼之患。

第 七 章

俄国灰姑娘

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移居到美国的俄国人都都是骗子，但我确信，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国家招徕了如此庞大的一批俄国骗子。

——亚历山大大公(1933)

如果远东的俄国法西斯主义常常看起来像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掩护所，那么，它在美国却表现为一场戏剧表演。感谢一个宽容的政府、合作的地方警察及慷慨的个人津贴，这一切使一位名叫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旺夏茨基的技艺精湛的演员为千百万美国人树立了一个连好莱坞也忌妒的绝妙演出的榜样。

从外表看，旺夏茨基是个饶舌而轻浮的人，但他实际上是个具有变态心理的人，他的滑稽喜剧掩盖了他的悲剧性质的灵魂。他从受到挫折的青年时期中振奋起来，无视旁观者对他的种种猜疑，说他是危险人物也罢，救世主也罢，江湖骗子也罢，他全然不顾而执着地追求在政治与杂耍喜剧的边缘

上逗人取乐的事业。他的无法控制的怪癖同不伦不类的俄国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很快就能大致显露出一种毫无价值、荒谬绝伦和悲怆凄楚的精神状态。

青年时代的旺夏茨基饱经沧桑，他失去了祖国，却得到了财富。革命剥夺了他的家庭与财产，留下了他这个败而不馁的流亡者。他与美国的一个女继承人结了婚，从而变成了一位新英格兰的绅士，成千上万的人羡慕他是移民之梦的化身。在他丝毫未产生作一名法西斯主义首脑的想法之前，他已经穿上了俄国灰姑娘的水晶鞋。

败而不馁

1898年6月12日，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旺夏茨基出生在华沙城堡——原俄国波兰省的省会。他的生日恰恰与彼得大帝的生日是同一天，后来，这种巧合使阿纳斯塔斯感到他有权认为自己是这位古怪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后裔。实际上，旺夏茨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波兰血统的小贵族的后裔。最初，他名字的拼写是“旺·夏茨基”，但若干年后，这个名字就被俄罗斯化为“旺夏茨基”了。几代人为沙皇服务使旺夏茨基家族的眼界与名字都已俄罗斯化了。阿纳斯塔斯的曾祖父由于有一片忠心而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好评。他的祖父曾帮助镇压过1863年的波兰起义。他的父亲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上校统领过华沙的宪兵队。

旺夏茨基的家族在城堡里居住与工作。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献身于困难的而且常常是不得人心的维护该城法律与秩序的工作，当时，社会革命主义者与波兰民族主义者在该

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安德烈的姐夫阿纳斯塔斯·普雷舍夫斯基是个东正教牧师，负责监督卫戍部队的宗教信仰。安德烈的妻子尼娜·阿纳斯塔舍夫娜任劳任怨地接受了斯巴达式的生活环境，潜心于抚育五个孩子，他们是：玛丽娅、娜塔莎、丹娘、尼古拉 与最小的阿纳斯塔斯。

阿纳斯塔斯这个长着一双好奇的灰色大眼睛的健壮小伙子，在一种冷酷无情的军队环境中成长起来。他的父母为在军队中服务而感到自豪，并希望他们的男孩能继承家庭的光荣传统。

年轻的阿纳斯塔斯似乎已津津有味地接受了他的命运安排。当他还是幼儿时，便绕着城垛爬，好象这就是他的游乐场。他身穿小小的轻骑兵制服，绕着大鹅卵石庭院飞奔，同时有规律地喘息，活像个小骑兵。离小阿纳斯塔斯玩耍处几步远的地方，是一排排的单人牢房；从1900年到1912年，这里曾相继关押了一些著名的犯人：波兰政治家约瑟夫·皮尔苏兹基，德国斯巴达克派的殉难者罗莎·卢森堡，不幸的第三国际才子卡尔·拉狄克以及契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908年，阿纳斯塔斯10岁时，被莫斯科军事预备学校录取，这是他走向俄罗斯帝国军队军官团的第一步。

1910年6月16日，旺夏茨基的家庭发生了悲剧。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被调到基辅的前夕，在华沙南面50英里处的拉多姆城内被刺杀。尽管后来阿纳斯塔斯把他的父亲描绘成波兰革命恐怖主义分子的受害者，但实际上，他是被一个愤怒的密探杀死的。由于个人间的忌妒而产生了怨恨，旺夏茨

基上校雇用的一个密探进入了拉多姆警察总部，走近他的雇主旺夏茨基上校，而上校这时正毫无戒心地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来人在助手们上前干预之前已拔出白朗宁手枪，击穿了军官双目之间的部位。这次谋杀事件加速了在俄属波兰全境内对地下警察代理人进行清洗，给阿纳斯塔斯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使他一生都对暗杀感到恐惧。

1916年，阿纳斯塔斯完成了莫斯科军事预备学校的学业，又立刻进入圣彼得堡的有声望的尼古拉一世皇帝骑兵学院。作为一名军校学生，他被分配到亚历山大·费奥多罗夫娜皇后轻骑兵第五团；由于这支部队身穿黑色军服，骑的是黑马，人们通常称之为黑骑兵。

革命的大动荡使这个学院在一年之内就解体了，并且使旺夏茨基与家人永久分离。母亲尼娜于1916年底病故。尼古拉在国内战争中与布尔什维克交火时死去。玛丽娅留在国内，在1936年的大逮捕浪潮中销声匿迹。娜塔莎和她的丈夫穿过西伯利亚逃到了哈尔滨，在那儿开了个咖啡馆。丹娘在莫斯科附近定居。阿纳斯塔斯开始了流浪汉的历程，飘泊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帕特南。

十月革命使阿纳斯塔斯在顷刻之间参与了国内战争的大屠杀。1917年11月底，他联合了几百名帝国军官候补生，经过1000英里的雪地跋涉，到达俄罗斯南部库班河岸的耶卡捷里诺达(现在的克拉斯诺达尔)。安东·邓尼金将军在那里组织了一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志愿军。在后来的两年中，阿纳斯塔斯在邓尼金将军的领导下，在乌克兰东部和顿河沿岸对红军作战。战争使他从一个面颊粉红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饱经

风霜的战士。他从一个军官候补生晋升为上尉。在这次残酷的战争中，他用枪和刺刀杀死了许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嫌疑分子。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在勾动扳机之前都不关心核实被杀者的真实身份。旺夏茨基在晚年时曾回忆了1919年11月27日他和其他白军士兵在罗斯托夫用机枪杀死了500名布尔什维克囚犯的情景。

在战争期间，旺夏茨基有几次都差一点丢了命。他的前额上有一个三角形的伤疤（不可思议地与他父亲的致命伤位置相同），而且他的腹内始终留着一粒红军的子弹。危险的生活把他磨炼成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机灵鬼，摆脱了接踵而来的困境。1919年，有一回他在罗斯托夫附近的瓜地里饱餐西瓜，被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巡逻兵出其不意地碰上了，他抬脚就逃，但由于暴食西瓜闹了肚子而无法逃脱。他向巡逻兵请求解手，并保证尽快便完，趁解手之机，他迅速地捅了巡逻兵一刀。

俄国国内战争给旺夏茨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他对共产主义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好像是共产主义使他的祖国充满了死亡与毁灭；国内战争也使他与志愿军中其他老战士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纽带，这些人在20世纪30年代将成为法西斯党的核心。他们的共同经历成为法西斯联合的纽带，是法西斯奥秘的精髓。例如，在冰天雪地中流浪到耶卡捷里诺达之事，被他们看作是俄国法西斯的长征，当成永存于故事和歌曲之中的不朽的坚韧不拔的象征。

旺夏茨基由于疾病而在白军最后的失败中幸免于被捕。1919年12月，他在哈尔科夫附近患了斑疹伤寒，货车把他运

到黑海的诺沃罗西斯克港，他从那儿改乘轮船到达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疗养地。1920年1月3日，当他到达那里时，双腿已冻伤，身上分文皆无。雅尔塔的一个名叫穆罗姆斯基的犹太商店老板掩护了这个狼狈不堪的勇士。穆罗姆斯基的女儿柳巴医治了他的创伤。

旺夏茨基在这里的几天之内，与柳巴的关系便十分亲密了。1月31日，他们在雅尔塔的圣尼古拉大教堂按照俄罗斯东正教仪式结了婚。他们如此仓促结婚，其目的不得而知，并且众说纷云。后来，阿纳斯塔斯解除了婚姻，以此为策略使穆罗姆斯基免遭屠杀，并且便于他们迅速逃离克里米亚，当时，克里米亚正濒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旺夏茨基坚持说他与柳巴的婚姻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因为柳巴谎报了她的宗教，俄国法律是禁止犹太教徒与俄罗斯东正教徒结婚的。但柳巴实际上并没有轻易放过她的男人。

鉴于俄罗斯南部白军事业的失败，旺夏茨基认为应当尽早地离开雅尔塔，以免为时太晚。年轻的妻子伴随他渡过了黑海，于1920年3月到达君士坦丁堡，住进加利波利的一家英国医院，治疗他缠身多日的严重的斑疹伤寒病。一个月后，他出院时，只有一件大衣、一身褴褛的制服和一双医院里的拖鞋是属于他的。旺夏茨基决定不带柳巴，启程到欧洲西部去寻找工作。4月，他换乘了各种不同的轮船设法到达马赛。5月，他途经巴黎到达伦敦，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恩人，费利克斯·尤素波夫亲王本人。

费利克斯·尤素波夫继承了俄国最大的工业财产之一，在逃亡的皇族当中，他算是一个大富翁。虽然十月革命剥夺

了他在巴库的油井，但他已设法抢救出了一批便于携带的贵重物品，变卖这些东西足以使他过上一段豪华的生活了。尤素波夫喜欢举办宴会，在宴会上他给客人们讲述他在1916年如何帮助杀死拉斯普廷的故事。他还找到了一条发扬利他主义激情的途径，在伦敦一所雅致的住宅中为贫困同胞开办的创作室提供津贴。旺夏茨基成为他的被监护人之一。

旺夏茨基在作了三个月“尤素波夫亲王的客人”后，清点了他的救济金，告别了他将在10年后与其一同欢腾跳跃的罗曼诺夫王孙公子们。他于1920年10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很难断定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舒适的闲职而到不知环境是否适宜的土耳其去。也许是尤素波夫对他厌倦了，也许是他挂念着柳巴，也可能是他的英国护照签证期限已到。

无论旺夏茨基回去的动机如何，他都没有在那里久留。11月，弗兰格尔将军和150000名军队和平民从克里米亚撤退，标志着白军在俄国南部的崩溃，大批难民涌到博斯普鲁斯。旺夏茨基无意在加利波利的拘留营、法国外籍军团或巴尔干劫道团伙中了结一生，便签约受雇上了一艘开往马赛货船，在法国南部干些杂活，最后在巴黎的福利斯—贝热雷^①定居下来，当一名舞台布景工作人员。看来，柳巴又被他抛在脑后了。

旺夏茨基对一个朋友透露了他对今后生活的抱负：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要娶一个有钱的女人，或者当一名电影明

① 福利斯—贝热雷，巴黎的一家歌舞剧场，以演出场面豪华而著名。

星。他达到了前一个目的。由于1921年春在巴黎舞厅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个离婚的美国女人，年龄比他大一倍，也比他富有许多倍。亚历山大大公在他的回忆录《蓝色海岸》一书中讥讽地议论此事说：“对于一个流亡者来说，他那辛苦学得的背诵颠倒男女角色的灰姑娘故事的能力实在是再有用不过的了。”旺夏茨基把男女角色颠倒过来，他自己成了灰姑娘。他的媚人的公主原来就是马里恩·斯蒂芬斯夫人，他的娘家姓氏为马里恩·白金汉·里姆。

关于里姆家族

1920年时，里姆家族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后来，这个家族已完成了从芝加哥财阀转变成康涅狄格州地主的变迁。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这个家族的族长诺曼·布鲁斯·里姆经营家畜和粮食发了财。1879年，他靠垄断装甲部队的猪肉供应赚了大钱，从而变成众所周知的芝加哥“四巨头”之一。与摩根、马歇尔·菲尔德、乔治·普尔曼和格雷一样，里姆被人们当成美国镀金时代的英雄（或者说是恶棍）之一。约在本世纪初，诺曼·里姆把他的经营范围扩大到铁路、钢铁与金融。1915年他死时，身兼22家公司的董事，其中显赫的有国际饼干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他与别人共同创办的。他给他的妻子卡罗琳·帕特南（移居美国的英国清教徒、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二任总督威廉·布雷德福的后裔）和六个已成年的孩子留下了4000万美元的遗产，他的孩子是：马里恩、弗朗西斯、诺曼、罗伯特、爱德华和路易斯。

卡罗琳在丈夫去世后继续住在卡罗林公馆——这个家族在康涅狄格州汤普森的宏伟庄园。汤普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风景宜人的新英格兰村庄(1975年人口为300人)，距帕特南(人口约7000人)约3英里，距普罗维登斯28英里，距哈特福德48英里，距波士顿60英里。它隐蔽在该州的东北角，靠近马萨诸塞和罗德岛海岸线。汤普森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不象它的毗邻帕特南，作为纺织工业城的帕特南曾经繁荣过，后来衰败了)。

虽然里姆家族在汤普森的财产中包括几百英亩青翠的田地，但家族的第二代人里，除一人外，最终都到外地定居去了。罗伯特和诺曼定居在格林威治。弗朗西斯移居到北卡罗来纳，爱德华在肯塔基定居，路易斯则搬到了普罗维登斯。只有马里恩留在汤普森。

马里恩·白金汉·里姆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于1877年1月9日生在伊利诺斯的伍德朗公园。她身材娇小(5英尺3英寸)，大脑袋，圆下颏，宽眉毛，棕色的眼睛。无论怎样，她那男性般的面孔也不能掩盖她那颗仁慈与同情之心，这种仁慈与同情心赢得了每个了解她的人的好感。马里恩慷慨得几乎到了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恩惠的地步。她在汤普森的一个朋友回忆她时说：“她总是不断地给予。”但是，马里恩的慷慨大方是圣洁的，是出于虔诚和感恩的愿望。她的真诚意念永远不会冷却而变成自我欣赏的高雅和体面。

马里恩性格恬静，但又有坚定的独立性。她的小小的愿望就是作一个娴静的妻子、多子女的母亲和长寿的主妇——期望于一个有经济社会地位的妇女应有的一切。对于生活，

马里恩有自己的主见。她设法按自己稍微有些不寻常的爱好来安排个人生活，但又不得罪家里的人。如果她是个男人，就可能效法她的父亲，可是相反，她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钱都用在她心爱的朋友和事业上。

1903年，马里恩26岁时，与芝加哥的一位名叫雷德蒙·斯蒂芬斯的律师订了婚。订婚后，她依然保持着独立自主的性格特点。他们在芝加哥的活跃季节举行了最豪华的婚礼。由于金钱关系和感情上的不合，他们的婚姻之舟逐渐沉没了。马里恩每年用于宴会与旅行(1903至1915年间，她往返于芝加哥与帕特南达32次)的支出约为25000美元。尽管律师的业务很成功，并且在患病无法开业时得到诺曼·布鲁斯·里姆在经济上的支援，但雷德蒙仍然担心他的收入会花光耗尽，对他妻子到处旅行的习惯感到厌烦。1915年5月17日，他给岳母写信诉说了他的苦衷(诺曼·里姆于当年2月份去世)，提出如果马里恩不少花些钱，多一些时间留在家里，他们之间就有可能出现分居的阴影。

但终止婚姻的不是雷德蒙，而是马里恩。她截获了一个叫普里西拉的人写给她丈夫的信件——这些信件使人对雷德蒙当妻子不在时怎样寻求安慰一事不容有任何怀疑。1915年，马里恩突然打点行装回到了卡罗林公馆。两年来，雷德蒙低声下气地向她陪礼道歉，请求她的宽恕。他在1917年12月5日写的一封信中恳求说：

回想起来，我们之所以发生矛盾似乎是因为我们都想使对方成为自己家庭中的成员。我遗憾地声明，我过

去对成为里姆家庭中的一员而怨恨。现在，我考虑了这件事，我愿意成为里姆家庭的一员，甚至作一名奴仆，一头“麋鹿”^①或天主教徒，或是犹太人，只要能够得到你，我亲爱的难以驾驭的你。

但马里恩对他的请求一直充耳不闻。他们终于在1918年4月6日离了婚。雷德蒙忠贞到底，终生没有再娶。此外，在他的遗嘱中，马里恩是他的财产受益人之一。1931年2月13日，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弗伦奇利克温泉逝世，她继承了5000美元的遗产。

也许是为了驱散婚姻失败带来的烦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里恩投身于席卷美国的理想主义洪流中。她自愿加入了美国红十字会，在华盛顿女子海军后勤部队受训后，取得了护士的资格。停战后，她作为隶属于美国远征部队占领军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救援人员迅速赶赴法国。救援工作使她与数以百计的俄国流亡者有了接触，但她对其中一个人的幸福特别关心，他就是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

马里恩与旺夏茨基结成了一对奇异的夫妻。她44岁，他22岁。她不会讲俄语，实际上对俄语一无所知。他仅仅只言片语地会点英语，对美国只是怀着梦境般的想法。1921年春，他们在巴黎舞厅中的偶然相遇，引出了持续40多年的关系。

① 美国上层社会有一个麋鹿俱乐部。这里说作一头麋鹿是指当麋鹿俱乐部的成员，即当这个上等家庭的成员。——译者

可以肯定，他们的相互吸引乃出于不同的动机。马里恩把阿纳斯塔斯看成是历史事件中无辜的受害者，对他深为同情。他以那富于表情的灰色眼睛尽情向她倾诉他的悲惨命运。他那欧洲式的殷勤使她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她为这个爽直而英俊的青年向她叙说大量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情而感到毛骨悚然。他笨嘴拙舌地说英语的尝试也许可以说成是结结巴巴地表达自己的激情。他表面上孩子似的无依无靠，唤起了她母性的本能，也使她更加相信他的真诚。

另一方面，对阿纳斯塔斯来说，这似乎已经是预料中的爱情。马里恩极其关心革命的受害者，这使他非常满意，特别是联系到她的金钱与财产来考虑的时候，尤为满意。与马里恩的结合使他产生了一些想法。像成千上万其他流亡者一样，他不甘心让布尔什维克取得最后的胜利，梦想着重返俄国，虽然他还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实现这一梦想。马里恩的财富与同情使他充满了能够办成任何事情的信心。爱德华八世后来为了一个离婚的美国女人而放弃了一个帝国，但阿纳斯塔斯则在娶一个离婚的美国女人的前景中看到了一个帝国（的可能性）。

马里恩把这个年轻的俄国人置于她的卵翼之下，决心帮助他在美国找到工作。她首先介绍阿纳斯塔斯认识了当时正巧在巴黎的培根公司的有资历的合伙人埃利奥特·培根。培根问这个爱国的流亡者想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他劝旺夏茨基在收割机厂或机车车辆厂找工作，因为关于这些机器的知识都离不开俄语。培根把旺夏茨基介绍给另一位访问巴黎的美国人，费城鲍德温机车车辆厂总经理塞缪尔·沃克莱恩的女

儿康斯坦斯·沃克莱恩，直到俄国革命时期，这个厂在俄国的生意仍然十分兴隆。康斯坦斯还为此候选的无产者写了一封信，把他推荐给她的父亲。

怀着获得工作的光明希望，旺夏茨基准备于1921年6月离开巴黎去美国。他向埃利奥特·培根借钱买了船票，也许马里恩也给了他一些钱。临行前，他禁不住在欧洲流亡者的圈子里开了个玩笑。

1921年6月24日，巴黎俄文版报纸《最后新闻》登载了一篇非同寻常的文章，该报是自由党的刊物，由政治家卡德特和历史学家保尔·米柳科夫主编。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文章生动详细地叙述了1920年在克里米亚的三起审讯布尔什维克嫌疑犯的刑讯杀人事件。作者充分说明，这些杀人事件只是一种陪衬。有一段的情节是这样的：一些白军军官拔出他们受害者的指甲，并用刺刀挑受害者的小腿。另一个情节是：一个刽子手，当着犹太青年那无限惊恐的双亲的面，用枪击穿了青年的脑袋，并且抱怨那进出的脑浆溅脏了他的雨衣。文章的署名是“阿·旺夏茨基”。

冷静地读读《回忆录》，会发现它流露了过于激烈的想象。尽管旺夏茨基后来宣布说，这些材料是一个朋友从他个人的日记中抄录的，这个朋友希望把这些内容发表出来。但看来旺夏茨基未必参与了他如此炫耀的暴行。《回忆录》写的是克里米亚的事，然而，阿纳斯塔斯在克里米亚逗留的两个月（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访问克里米亚）是作为一个伤病员，后来又作为女婿在一个犹太人家中平静地度过的。《回忆录》很

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说教式的故事，哀叹许多白军把犹太人等同于布尔什维克。也许这是作者第一次焕发了以假为真的想像力。

无论旺夏茨基的意图是什么，《回忆录》的读者们确实从中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东西。《最后新闻》的编辑们把这篇文章作为对君主主义者从反面捅一刀的文章来发表的。帝制派流亡者的刊物异口同声地表示愤怒，抗议发表这种危害整个白军事业荣誉的材料，并且气愤地指出，苏联《消息报》翻印了100万份《回忆录》。后来，旺夏茨基被《回忆录》的事件纠缠了20年之久，那些贬低他的人借口“克里米亚刑讯杀人”而称他为俄国的希姆莱。然而，旺夏茨基眼下耍了点花招，并且扬名一时。他离开巴黎不早不迟正是时候，因为法国警方通知他，允许他在法国逗留的时间不能延长。

旺夏茨基乘“法兰西”号轮船于1921年7月30日到达纽约时，他得到了不得延期的三个月签证。居住许可证很难得到，国会刚刚通过了移民限额法（1921年5月19日），此法令对进入美国的俄国移民数量严加限制。马里恩又一次为他动员家族关系搭救了旺夏茨基。

详细的证据表明，已故诺曼·布鲁斯·里姆的朋友约翰·格拉丁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作用，他使旺夏茨基的问题得到了有关当局的注意。格拉丁是普罗维登斯的证券经纪人，与新近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是大学同学（布朗大学第81届），而且有通信往来。作为哈定政府的一个正直的孤星，休斯矫枉过正地极力避免对人施予违背他的公职责任的个人恩惠。旺夏茨基可能是实施这个规定的例外。

格拉丁推荐这个流亡者，说他是个很庄重的年轻人，他的极有名望的家庭（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保证了这点。格拉丁的推荐可能促使休斯下令美国移民归化局给旺夏茨基以居留的特许。由于旺夏茨基的移民档案——被归到“共产主义分子”的卷里——仍然保密，所以没法看到这项命令的书面记录。不过据了解，有一个检查委员会于1921年10月29日批给旺夏茨基一件居住许可证，那天正是他的护照到期的头一天。

在后来的年月里，在里姆家中工作多年的一个名叫托马斯·沃森的人回忆起约翰·格拉丁抱怨的情况，说他（格拉丁）如果在1921年时知道“那个俄国人”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绝不会为他向休斯国务卿求情。但旺夏茨基却永远对这个“长腿的叭儿狗”怀抱感激之情。他变成了一个终生的共和主义者，并且有几次以深切的敬意与情感说到或写到休斯，感谢他帮助自己留在美国。

旺夏茨基在卡罗林公馆度过了1921年的夏季与秋季。马里恩表露了对他的感情，但没有公开提到结婚的问题。许多年后，她的汤普森的朋友们回忆说，马里恩把这个俄国青年当成未婚夫，倒不如说当成是她的被保护人更确切。她指导他学英文，把他介绍给家人和朋友们，不动声色地要求所有的人与他友好相处——总之，是不遗余力地要让他得到汤普森绅士们的承认。

很难确定结婚的意念是在什么时候潜入了马里恩的博爱计划。考虑到他们的性格，最大的可能是旺夏茨基向马里恩求婚，马里恩接受了，时间可能是在1921年秋天，当旺夏茨基的居留地位落实的时候。

无论有着牢固传统的里姆家庭对这个异国房客感觉如何，这个家庭对一个有可疑背景的俄国穷难民与诺曼的最有主见和难以捉摸的后代结婚之事是有保留的。这对族规家法实为可悲可叹，但诺曼已辞别人世，无法再使他那任性的宝贝们就范。当马里恩的弟弟路易斯·马歇尔·里姆与一个女演员私奔到新泽西的霍博肯时，他就曾使路易斯就范。那时，面对后代的叛逆行为，诺曼让他的儿子在要姑娘还是要继承权之间任选其一。路易斯泄气了，回到了家中。他的父亲给那个女演员21万美元，作为结束这场婚姻的馈赠，以示抚慰。但是，1911年与1921年的情况截然不同。诺曼已经不在人世，马里恩具有比路易斯更坚强的意志。马里恩1921年时的年龄几乎比路易斯1911年时大一倍。她还享有财产上的独立权，继承了她父亲七分之一的遗产。无论里姆家族的人怎样地忧心忡忡，也只能尊重马里恩的选择，并恳求婚礼在最小的范围内举行。谁也不想使这件事成为国际连续广播剧的组成部分。

在旺夏茨基的坚持下，马里恩同意在纽约第97大街的圣尼古拉俄国教堂举行婚礼。为了这次婚礼，马里恩也改信了东正教。结婚仪式安排在1922年2月4日下午4点秘密举行。他们的婚礼被当成了一件小事，里姆家族的人不打算参加婚礼，而旺夏茨基在美国没有任何亲戚。

1月下旬，纽约报界突然发现了这个即将到来的婚礼。连续数日，此事成为重要的国际新闻。到2月1日，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报纸都报道了此事。《妇女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马里恩的生活照。人们对美国的女百万富翁嫁给一个

身无分文的俄国流亡者的前景进行了种种想象。这不仅是罗曼蒂克，也是美国梦的缩影。成千的人或者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而产生激动之情，或者怀着可望而不可得的忌妒之心，或者以冷嘲热讽的犬儒哲学来注视着这一事件。

婚礼前两天，由于受到记者的包围，阿纳斯塔斯与马里恩好不容易才搬进范德比尔路第48街的卡撒姆旅馆。里姆家族雇用了私人侦探，防止有人擅自闯入他们的住处打扰这对夫妇，但仍然有记者来采访。马里恩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她的家庭对这桩婚事感到沮丧。当记者问及她与她的未婚夫之间年龄与财产的差异时，她回答说：“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成些。幸福不是金钱的问题。”旺夏茨基则投身于沃尔特·米蒂^①的日常工作，做起白日梦来。他自称他就是“夏茨科伊—旺夏茨基伯爵”（专栏作者将其缩写成“VV”）。VV曾经一度在俄国南部拥有大量的房地产，VV的父亲是著名的“华沙总督”。VV的祖父是“1863年波兰起义的镇压者”。在俄国内战中，VV转战于各个战场。VV应他个人好友鲍德温机车车辆厂总经理的邀请来到美国。VV在卡罗林公馆里姆家里作客时，在康涅狄格与他的未婚妻相遇。报界对这种遭遇并不完全相信，但他们不切实际地过高估计了马里恩的嫁妆，他们的估计数字为4000万至6亿美元。

阿纳斯塔斯和马里恩瞒着记者和一些有名气的商人，比他们宣布的日期提前一天举行了婚礼。为了不让人们知道他

① 沃尔特·米蒂是美国幽默作家詹姆斯·瑟伯笔下的一个做白日梦的人。

们蜜月旅行的路线，他们佯装回到卡罗林公馆，然后出其不意地到了魁北克，在弗隆特纳克大别墅用假名登记住了下来。这种躲躲闪闪的行为只能惹起报界的注意。当他们沿着圣劳伦斯河散步时，被人认了出来，便又被报界捕捉到了。

虽然很明显，这对新婚夫妇依靠马里恩的财产可以过悠闲自在的生活，但他们谁也不愿这样做。阿纳斯塔斯希望自己成为对未来的俄国有用处的人，并且已经遵照埃利奥特·培根的忠告去学习机械知识。

1922年1月，一辆由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沿着费城西南郊的特拉华河驶向鲍德温机车车辆厂的埃迪斯顿工厂的正门，乘车人要求会见公司总经理塞缪尔·沃克莱恩，说他持有沃克莱恩先生的女儿的一封介绍他来此找工作的推荐信。埃迪斯顿厂的经理恢复了镇静后，询问了来访者的资历。事情很快就弄明白了，他对机车一无所知。经理不知如何安置他，后来，一个有同情心的工头表示愿意让这个来访者到工厂的化学试验室当一名小学徒，每周薪水为8.5美元。

旺夏茨基在2月份与马里恩结婚时，已经开始在埃迪斯顿厂做工了。他请求并且得到了结婚与度蜜月的假期，而他的工人伙伴们（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安妮”）对这事还不相信。

从魁北克回来后，阿纳斯塔斯和马里恩搬进了一幢俭朴的房子，房子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的里德利公园区斯沃思莫尔路505号。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个“埃迪斯顿工厂的学徒”在试验室的工作台前来回忙碌，而他的妻子也在为家务而奔忙。周末，作为一个自愿的消防队员，他经常参加

里德利消防队的扑克比赛。新闻界兴奋地讽刺富豪们这种假扮无产者的表里不一的状况。《纽约记事报》上刊登了一幅题为“小屋洗衣日”的漫画，把马里恩画成了一个被悬挂在洗衣绳上的珠宝，而丈夫正提着他的午饭盒，兴高彩烈地快步奔向工厂。赫斯特辛迪加化的全国性刊物《美国周刊》为了让数千名，甚至是上百万的读者消遣取乐，刊载了一个插图故事，描绘说，“当马里恩第一次看到她那低级的新居时，几乎对那‘茅舍的爱情’失去了热情”。一些低级的杂志为他们的房子起了个绰号，叫作“爱情窝子”。当阿纳斯塔斯每周的薪水提高到22.5美元时，这些刊物虚情假意地对此事大为赞扬，以示祝贺。

1922年4月，这位无产者的田园诗突然被昔日的一个幽灵打断了。柳巴·穆罗姆斯基出面坚决要求享有婚姻上的权利——加上利息。旺夏茨基又一次成为惹人注目的人物，这次，他被看成是重婚罪犯和奸夫。里姆家族发现，他们不但蒙受了耻辱，而且还必须承担50万美元的诉讼费。

阿纳斯塔斯与柳巴的关系仍然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于1920年分别离开君士坦丁堡，但却于1921年初在巴黎象夫妻似的住在一起。当阿纳斯塔斯遇见马里恩后，便开始摆脱柳巴。至于马里恩与柳巴之间，相互了解对方一些什么，只能加以推测。也许柳巴对为什么旺夏茨基突然启程去美国产生了怀疑。但是，在柳巴公布自己的身份之前，马里恩好像对她未婚夫的另一个女人一直毫无察觉。

柳巴住在巴黎，一直等到旺夏茨基与马里恩结婚两个月后才采取行动。她的行动方式表明，她对金钱比感情上的补

偿更感兴趣。1922年4月6日，柳巴的律师爱德华·德·布拉兹写信给里姆的家庭律师克拉伦斯·米切尔（乔特、拉罗克和米切尔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也向美国驻巴黎的大使迈伦·赫里克控告了旺夏茨基。赫里克把这份控告信转到华盛顿，此信在华盛顿几经周折，终于转到纽约地区检察官的桌子上。地区检察官劝柳巴必须到纽约来，否则诉讼不能成立。在这期间，阿纳斯塔斯和马里恩给柳巴一笔钱，以求得不经法院而了结此案。

柳巴决定双管齐下，她接受了封她嘴巴的钱，同时，也买了去纽约的船票。

旺夏茨基察觉到了柳巴的意图，他请求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再一次证实他第二次婚姻的合法性。1922年11月22日，由纽约的大主教普拉顿主持的教会法庭正式宣判说，旺夏茨基与里姆的婚姻有效，而旺夏茨基与穆罗姆斯基的结合无效，因为后者只是为了暂时的目的，并且使用了伪造文件。教会法庭是遵循判例作出裁决的。国内战争期间，在白军占领地区所结缔的婚姻在发生争执时，一般都认为是不合法的。旺夏茨基借助教会摆脱了困境，但他仍然不得不认真考虑对付国家的法院。

柳巴·穆罗姆斯基与爱德华·德·布拉兹在众目睽睽下于1923年1月27日到达纽约。德·布拉兹向新闻界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的委托人为了转让阿纳斯塔斯的爱而要求马里恩赔偿她50万美元，而且她还向旺夏茨基索取赡养费。对于这段公主与乞丐的风流韵事人们依然记忆犹新，柳巴戏剧性地出现，为这个美好的故事增加了曲折性。圣保罗（明尼苏

达)的《先驱报》用大字标题宣布“俄国女人前来砸毁机修工的天堂”，中西部的读者立即就明白了它的所指。柳巴机敏地争取人们对她的同情，使人们认为她是一个寄人篱下无家可归的人，她的野心勃勃的爱人为了丑恶的钱袋而无情地抛弃了她。7月，原告交给新闻界一封据说是旺夏茨基写给她的信，信上说为了让她保持沉默，他将每月给她40美元的终生赡养费。柳巴为这不朽的三角又增添了新的插曲，她引用了她丈夫的话，说她丈夫央求她把写给他的信寄到切斯特基督教青年会转给他，“因为马里恩正在学习俄语”。

也许柳巴已经唤起了公众对她的同情，但是纽约最高法院于1923年8月3日驳回了她的起诉。法官引证了东正教教会法庭的裁决，驳回了柳巴对旺夏茨基重婚罪的指控，并提醒她说，她曾于1922年1月写信给旺夏茨基，对他与马里恩·里姆订婚一事表示高兴。显然，这位被抛弃的夫人曾有代价地赞成这次重婚，但当她进一步了解到马里恩的财产情况后，便决定增加赌注。

颇为消耗精力的宣传把旺夏茨基搞得精疲力竭，他意识到那无产者生活的试验对他们已开始失去吸引力。招唤和吸引他们的是卡罗林公馆优雅的环境、安静而悠闲的隐居生活以及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另外，马里恩的母亲卡罗琳已经72岁，身体状况欠佳。

阿纳斯塔斯与马里恩卖掉了在里德利公园的“爱情窝子”，于1924年1月搬到了汤普森。鲍德温机车车辆厂失去了一个小徒工，康涅狄格州得到了一个初出茅庐的民间英雄。

养 泰

为了让阿纳斯塔斯迁到汤普森居住，马里恩对他进行了再教育，教他如何作一个新英格兰的绅士。在下一个10年当中，她好心地试图把她的俄国小伙子培养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温德哈姆县绅士，但旺夏茨基原来不是她所能对付的。不久，他便开始把汤普森和它的刚毅的公民转变为实现他自己的戏剧性抱负的暂时可供利用的支持者。

在1924年12月卡罗琳·帕特南·里姆去世前，阿纳斯塔斯与马里恩一直住在卡罗林公馆。卡罗琳的逝世标志着诺曼·布鲁斯·里姆为子孙们安排的那种豪华的生活方式的结束。1926年，卡罗林公馆被出售给立陶宛人的玛利亚修士会，这修士会把公馆改为玛利亚诺波利斯学院。

1925年6月12日，马里恩用25000美元购买了一个面积为224英亩的奶牛场，人们称之为拉纳德场地。这个奶牛场位于汤普森南一英里的县中心路（现在康涅狄格的第21线公路），这条路把第193线和101线（现在是美国44线）州公路连接起来。这个奶牛场的建筑物包括一幢三层楼的白木板房、一间大牛奶库、鸡舍和车库。它横卧在山脊上，掩映在栎树、蓝云杉和栗子树丛中，俯瞰着西边微波轻滚的田野与灌木林。向东跨过县中心路，是诺曼·布鲁斯·里姆在本世纪初修建的高尔夫球场^①。

昆纳蒂塞特河在县中心路下面，经里姆家的地界流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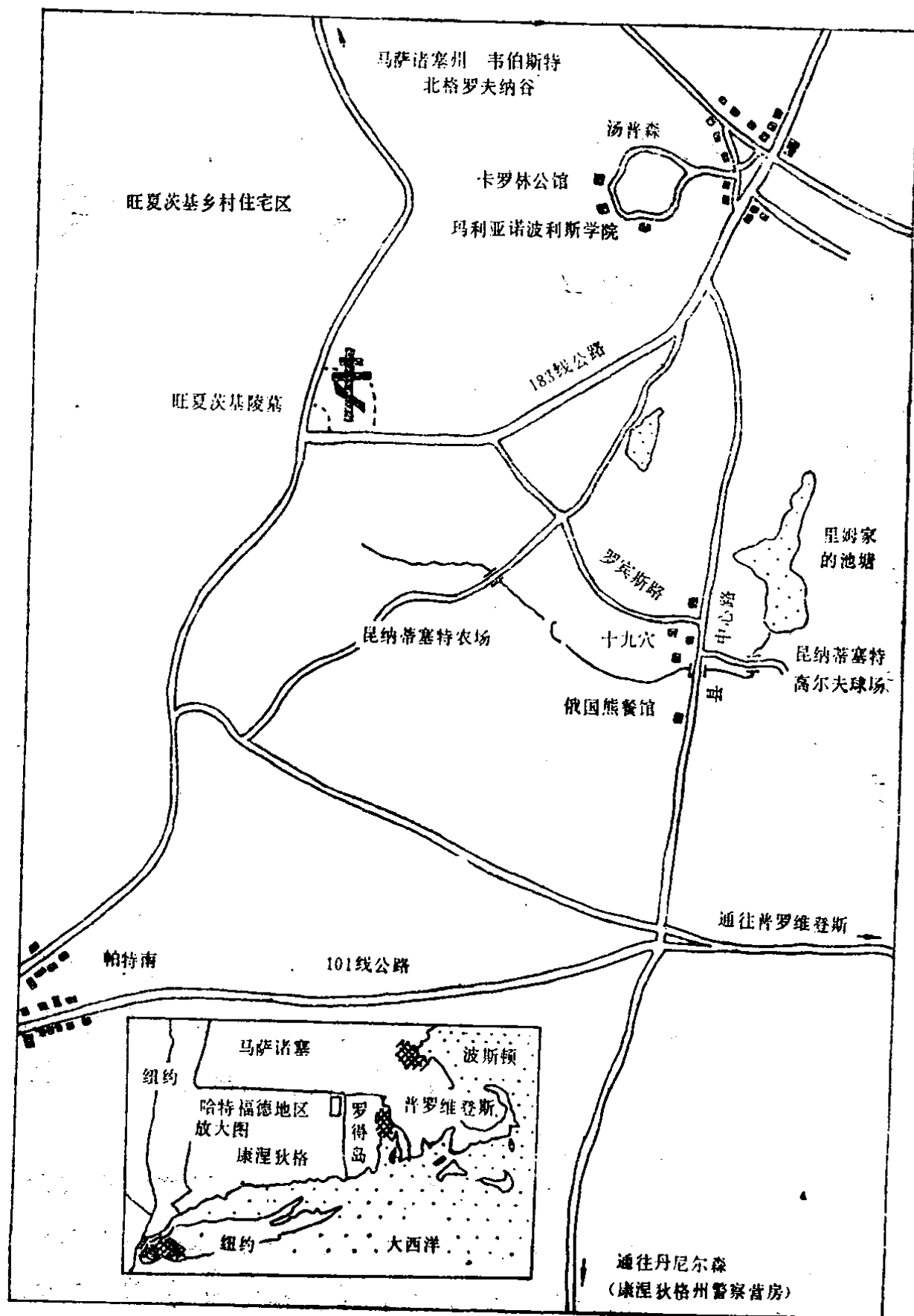
^① 现在的昆纳蒂塞特乡村俱乐部。——原注

姆家的池塘，马里恩就按昆纳蒂塞特河的名字把拉纳德场地重新命名为“昆纳蒂塞特农场”。阿纳斯塔斯提议把他的新居称为“十九穴”，因为它与高尔夫球场近在咫尺。

1921年，旺夏茨基第一次来到汤普森时，就对高尔夫球发生了兴趣。到1925年，他已经具备了打球的全套装备：一顶花呢帽子、灯笼裤、一双坚固的鞋、高尔夫球棍和一篮子球。阿纳斯塔斯不喜欢把球轻轻地击入穴中，他更乐意猛烈地击球，他对高尔夫球的耗费如同消耗子弹一般。昆纳蒂塞特玩高尔夫球的人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击球方式，白色的球被击出后，呈优美的弧形跳出人们的视野，远离球座与终点之间的草地。这位俄国的弹道学家给当地愿意为他冒着球击的危险去拣球的青年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但谨慎的高尔夫球手们却知道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仅仅是高尔夫球并不能长久地吸引住旺夏茨基的注意力，他的精力需要新的发挥途径，不然，就会堕落成祸患。马里恩认识到这一点，并巧妙地鼓励她的丈夫参加社会活动。

刚开始在汤普森生活，旺夏茨基就显示了他的表演艺术家和企业家的才能。1924年1月，他在卡罗林公馆为流亡朋友与当地居民组织了一个音乐社交晚会，称其为“娱乐之夜”。节目单上印的节目主要有歌剧选段、芭蕾舞剧片段及歌舞杂耍。阿纳斯塔斯和志愿军的一些老战士表演一些哥萨克舞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一个远房堂弟维塔格拉电影制片厂惊险影片的制片人安德烈·罗斯福演出了粗鲁的滑稽剧。罗斯福的女儿莉拉（节目单上称她为“莉拉·安德



烈夫娜·罗斯福茨卡娅”)献给晚会的是俄罗斯歌曲与舞蹈。

所取得的成功激励了旺夏茨基，他企图自己撰写、创作和演出音乐喜剧。他吸收当地一些有才能的人在卡罗林公馆一间改建的马厩里进行演出。如果帕特南《爱国者》的戏剧评论家可以信任的话，那么旺夏茨基写的《吉蒂的到来》(1925年)和《这可是真的?》(1929年)得到了高度的赞扬。

人们对阿纳斯塔斯的戏剧活动的热烈欢迎成了他的动力，使他进一步采取多种形式的娱乐方式。他总是利用他那帕特南俄国居民的特殊身份来这样做。每年7月4日，他都要在卡罗林公馆举办化妆舞会，直到1926年为止。他还写了一部题为《俄国人的爱情》的浪漫小说，此作未曾发表。他还到温德哈姆县向麋鹿俱乐部成员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发表题为“古老的俄罗斯”的讲演。

富裕的生活难免使他对以前在埃迪斯顿当学徒的滋味有所感触。他丢掉在华沙城堡养成的苦行主义的残余，很快就变成了一位装扮一新的花花公子。他收集了法国留声机唱片，几乎是用科隆香水洗澡，用琥珀烟嘴抽昂贵的香烟，身着最上等的服装。阿纳斯塔斯对查尔斯·林白驾圣路易精神号飞机飞渡大西洋着了迷，说服“妈妈”(他对马里恩的称呼)在1927年为他买了一架单引擎的飞机，这样，他便可以驾着“孤鹰”绕康涅狄格东北部飞行。

汽车也引起旺夏茨基的热爱。他对赛车的兴趣犹如它们是迷人的女人一般。马里恩迎合他对车子的迷恋，也许她把车子看成是一件无害的代用品，并且于1928年赠给“阿列克

斯”(她对阿纳斯塔斯的称呼)一辆黄色的默赛尔牌轿车，奖励他进入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学习。

布朗大学给旺夏茨基的教育与马里恩所希望的有所不同。她希望他提高英语水平，并且具备受过名牌大学教养的风度。事实上，阿列克斯确实在英语一班(修辞和作文)注了册，但没有参加期终考试。使他入迷的是大学的足球，而不是学术。他酷爱足球，不仅把它当成一种运动，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假想的军事演习。布朗大学球队在1928年赛期中是胜利者(同耶鲁队比赛胜8场，负1场，14比32)；这个赛期末，他津津乐道于母校橄榄球场上的搏击，好像这些比赛是邓尼金战役似的。在布朗队与耶鲁队每场比赛结束后，他都削下一片球门柱子留作纪念。这些木片被虔诚地珍藏在十九穴的一个玻璃陈列橱窗里。

除足球之外，普罗维登斯还有其他的东​​西吸引着旺夏茨基。他喜欢在每年夏季理发，只有几个理发师能胜此任，其中有个人叫奥兰多，他在布朗大学校园附近开业。即使是奥兰多也抱怨阿列克斯的头弄钝了他五把剃刀。每年修头后，旺夏茨基对他那微微发红的头顶总是有些神经过敏——他的球童吉米·巴克说，旺夏茨基去奥兰多那儿理发后，每当一些打高尔夫球的漂亮女人走近他时，他准会突然喊道：“吉米，给我拿帽子来！”

一学期过后，阿列克斯向学校请了长假，取得了驾驶皮尔斯—阿罗牌汽车的资格，这是辆橄榄绿色的12缸汽车。由于驾驶这辆车，他收到的为数众多的超速驾驶违章传票又增加了。为了周末的足球，他定做了一件特制的能装三小

瓶伏特加的礼服大衣。

这种作派可能是20世纪20年代很多富有而浮夸的男大学生的典型,但阿列克斯的豪华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尽管家里人反对,但马里恩却不想削减她丈夫的费用,相反,她决定通过主要收入分摊的份额和她个人的津贴而对他的需求给予慷慨的照顾。马里恩通过她的弟弟罗伯特·克拉克·里姆作好了安排,让阿纳斯塔斯每年有20000美元的收入,由里姆赖特森公司(纽约约翰路99号)每季度支给他5000美元。该公司经管她的托管财产,其董事长是罗伯特。阿纳斯塔斯用这笔收入中的12000美元来支付家庭日常开支,其中包括购买四辆汽车及其维修费用、房屋取暖燃料费、园丁与杂务人员的工资和各种维修费用。剩余的钱他可以任意支配。

罗伯特·里姆反对旺夏茨基的这种生活。里姆家的管家里查德·巴顿曾奉命监视东家的姐夫,他说“罗伯特·里姆从未把他看作是一位绅士”。罗伯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自从马里恩把旺夏茨基从福利斯一贝热雷带出来后,这个俄国人没为里姆家带来任何好处,只带来烦恼。为了他们共同的财富,里姆家族的人都希望不引人注目地生活,而旺夏茨基在汤普森则特别显眼,用当地一个居民的话来形容,“就象是美国革命女儿组织会议上的一个霍屯督人”。首先是围绕着婚姻问题的令人讨厌的大肆宣传,然后是重婚的丑闻,接着是超速驾驶违章传票,再往后——最糟的——是疯狂的晚会。

比妻子小21岁、性格外向的旺夏茨基,自然要寻找与其年龄相仿、对饮酒和爵士音乐有共同爱好的伙伴。马里恩热

切地希望阿列克斯在他的收养国里感觉到象在他本国一样，所以对汤普森的年轻人偶然聚集在十九穴搞一点小小的娱乐并无异议。阿列克斯喜欢跳舞并能表演节奏性很强的探戈舞，尽管他有一个让人发窘的习性，那就是当他跳舞时如果看上了另一个意中人，便会把他的舞伴抛下不顾。他喜欢诱使女士们从喝果汁饮料转为喝较为厉害的饮料。总的来说，姑娘们感到他有异国情调，很吸引人，一个赞赏他的人狂热地谈起他的“淡紫色的眼睛”和军人的举止。就连他那恶作剧的特性也具有一种吸引力。昆纳蒂塞特农场(十九穴)的来宾登记簿上记载着这样的评价：

阿列克斯别淘气，

要当心！

Y · S · H

1925年2月

这儿住着一位令人愉快的人

旺夏茨基

他的晚会总是那样精彩

尽管他从不自夸

但他是地道的俄罗斯主人

并且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彼得·范·德·贝内特

1927年4月4日

下面一则看来是写给马里恩的：

你是怎样得到他的？

你怎样来保住他？

马杰里·泰勒

1928年12月25日

阿列克斯的恣意行乐实际上可能帮助拆散了他的妻弟路易斯·马歇尔·里姆的第二次婚姻。1924年10月，路易斯步入旺夏茨基举办的晚会，发现他的妻子玛丽·韦弗正酩酊地纵情享乐。一声枪响——有人说枪是惊恐万状的玛丽放的——，但是不知击中了谁。五个月后，玛丽提出与路易斯离婚的起诉，理由是他“极端的残酷”。《哈特福德时报》把这起离婚事件与旺夏茨基的晚会联系在一起。阿列克斯极力弥补这次不幸事件，把玛丽介绍给一个俄国流亡同伴，这人是纽约的花商，玛丽终于与他结了婚。然而，阿列克斯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里姆家族的喜爱。只有马里恩好像很从容地对待这个事件。

里姆家族的反对并没有阻止阿列克斯在收养他的国土上扎根。1927年9月30日，他成为一个归化的美国公民，从而摆脱了异国侨民的不稳定的处境。那时，他已经邀请他的姐姐娜塔莎(1892年生)和她的丈夫列夫·贝·马梅多夫到汤普森居住。

马梅多夫于1886年出生在中亚，他原来是个穆斯林，进入莫斯科军事预备学校后才改信了东正教。他作为派到高加

索去的一个年轻军官，据说，于1908年带领一个班捉住了一名进行颠覆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此人是格鲁吉亚人，名叫约瑟夫·朱加施维利(后来被认为是斯大林)。1910年，列夫与娜塔莎·旺夏茨基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炮兵部队被提升为上校。革命使马梅多夫一家穿过西伯利亚逃到了哈尔滨，在那儿开了个咖啡馆。可是，他们感到哈尔滨太危险，在阿纳斯塔斯的鼓动下，于1924年来到美国。

从1924年到1926年，在他们访问汤普森的过程中，马梅多夫一家越来越喜爱这个山青水秀、环境宁静的地方。不久，马里恩就与她的俄国亲戚相处得很融洽了。健壮的娜塔莎愉快而有朝气。从矮胖的、黝黑的、长着卷发的列夫身上可以看到他妻子的温存。他们的小儿子安迪赢得了无子女的马里恩的欢心。

马里恩决定让她的俄国亲戚在生活上有一个新的起点。1927年初，她购买了一套有150年历史的农场住房(当地人皆知的弗林特别墅)，在县中心路下首，距十九穴约400英尺。3月3日，她把这幢房子连同地产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娜塔莎。马梅多夫一家感激地接受了这份极其慷慨的礼品，并立即修葺房子和花园。同年底，他们把弗林特别墅改建成成了一个饭店，用旧圣彼得堡的一座建筑物的名字命名：“俄国熊”。

俄国熊的生意非常兴隆，它首先招揽了温德哈姆县的就餐者，尔后，顾客便从哈特福德、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纷纷前往。20世纪30年代中，这个餐馆曾款待了诸如爱德华·埃弗雷特·霍顿、艾伦·莱德和汤姆·米克斯等名流。

俄国熊取得成功的诀窍在于它特殊的食品及环境。列夫和娜塔莎让他们在当地雇用的女侍者都穿上俄罗斯农民服装，并演奏俄国的吉普赛音乐以便在屋外地坪上跳舞，这使前来就餐的美国人感到很尽兴。从纽约到波士顿，没人能比得上“马梅多娃太太”（一本小册子中这样称呼她）的烹调技术。她的特技包括家制俄罗斯苏卜汤、油炸包、（羊）肉串、带鲱鱼鱼子酱的油饼、酸奶、摩加酒蛋糕和复活节吃的甜奶楂糕（一种用加糖的酥酪、黄油、葡萄干混制而成的味道香美的食品）。

还有一件吸引顾客的事，马梅多夫一家和当地的企业家以及里姆家共同制订了一个周末假期计划。来访者只需花12美元就可以在俄国熊餐馆得到食品、饮料，参加茶座舞会和桥牌游戏，在汤普森历史上有名的弗农·斯泰尔斯客栈住上一夜，在韦伯斯特湖游泳，在昆纳蒂塞特的高尔夫球场上得到打高尔夫球的优惠待遇。

列夫和娜塔莎在汤普森取得的成功促使他们于1932年在波士顿的纽伯里街11号开办了第二家俄国熊餐馆，与其相邻的是里茨旅馆，离当地公园只有一投石之遥。波士顿俄国熊的厨房总管是瓦西里·科万，他曾作为“波斯国王的厨师长”被列名在一本小册子上。1933年4月7日的《波士顿先驱报》是这样评价科万的烹调技艺的：“他在一只小鸡的胸脯上所做的事情使坚强的男人也会落泪。”

娜塔莎显然认为这个评论是赞誉之词，因为它被翻印在一本俄国熊的小册子里。

马梅多夫一家的到来，标志着马里恩使新郎阿列克斯成

为新英格兰绅士的宏伟实验的结束。她被友好的俄国亲戚包围着，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服从于阿列克斯。她几乎每天都陪他到俄国熊去一块儿吃油炸包，喝饮料，玩纸牌，进行交际。不久，她就可以用俄语和英语混杂着与人聊天了，这种混合语言是她与旺夏茨基和马梅多夫一家进行交谈的代用语言。

就这样，以阿纳斯塔斯在美国化开始，最终导致了马里恩的俄罗斯化。

与罗曼诺夫的关系

旺夏茨基与皇族并不陌生。革命前夕，他在圣彼得堡高贵的尼古拉一世皇家骑兵学校与罗曼诺夫家族、特鲁别茨科伊家族和奥登堡家族的青少年都有来往。四年后，他在伦敦受到了好客的费利克斯·尤素波夫亲王的款待。1925年，希腊的保罗亲王（后来的皇帝）到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为圣康斯坦丁教堂举行落成式时，旺夏茨基在十九穴招待过他。

同贵族再三巧遇，激起了旺夏茨基对贵族头衔的欲望。自从1921年他初到汤普森时起，就自称为伯爵。马里恩赞同他的做法，甚至对此确信无疑。不久，当地的居民就称阿纳斯塔斯为“伯爵”和“阿列克斯”，但是，在与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之流的真正贵族的交往中，他从来不为自己用那个头衔。

亚历山大大公是罗曼诺夫家族中幸免于革命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作为短命的俄国帝国空军的统帅，他以超然的态度

目睹了帝国的崩溃。他乘英国福赛思号巡洋舰从塞瓦斯托波尔撤离后不久，便在比亚里茨迷上了一个狡黠的、令人莫测的英国女人，并设法终止自己与尼古拉沙皇的妹妹科谢妮娅的婚姻关系。科谢妮娅拒绝了任性的丈夫提出的离婚要求，同他们的六个儿子移居到英国，住在温泽的维尔德纳斯别墅，这幢小别墅是她的表兄乔治五世国王认真考虑后提供的。亚历山大也许是由于崇拜德国而被斥于英伦三岛之外，他便在旅游、讲演、写回忆录以及同那些冒充的亲戚和渴求社会地位的百万富翁虚与委蛇中度过余生。

尽管亚历山大讨厌装腔作势的人，但他却屈服于旺夏茨基的魅力。在他去世前两年，即1931年夏季，他在十九穴度过了数日。这位年迈的大公身穿白西服，头戴卷边巴拿马帽，独自漫步于高大的栎树、槭树和栗树的浓荫下，给人以仪表堂堂的形像。是什么使这个高傲、明智的罗曼诺夫来到了汤普森？不是金钱，很可能是这里的美景与宁静；东道主朴实而热情使这种景色和气氛更加突出。此外，亚历山大的两个儿子西奥多和尼基塔亲王与旺夏茨基是同龄人，而且是私人朋友。西奥多·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身高六英尺六英寸，真正具备了罗曼诺夫家族的体格。西奥多与旺夏茨基是同年出生的，而且与他进入同一所军事学校。革命之后，他俩在什么时候如何重新认识的还不清楚。西奥多大部份时间陪同母亲住在温泽，学习建筑学和设计房屋模型。1930年夏天，他在十九穴作了三个月的客，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经常去拜访旺夏茨基一家，旺夏茨基一家把他当作一位可尊敬的朋友。1932年夏，“伯爵”和亲王乘阿列克斯

的蓝色带篷的帕卡德牌四门汽车在美国西南部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这是一次无忧无虑的旅行，只是超速驾驶的违章传票和同一名埃尔帕索边境哨兵发生争吵使这次旅行美中不足，这个哨兵对两位绅士缺乏应有的尊敬。

由于西奥多亲王有他的同学为伴之乐，在20世纪30年代的整个时期，一直对政治不很关心，并明显地表现出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复辟不抱幻想。他完全顺应历史的变迁，甘愿设计房屋而对帝国不感兴趣。

西奥多的弟弟尼基塔亲王对流亡者的复辟事业更不关心。个头高大、英俊而腼腆的尼基塔乘英国的马尔巴勒号巡洋舰逃离俄国，随母亲移居温泽，就读于牛津。后来，他在巴黎找到了一个银行职员的工作，在那里，他成为人所共知的持长期车票坐地铁的“罗曼诺夫先生”。1929年1月，这种宁静的、有条不紊的生活突然中断了，那时，由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逝世，有一个帝制小宗派拒绝支持西里尔大公自立为沙皇的意图，“推选”尼基塔为“俄国的沙皇”。年轻的亲王对这个荣誉既没接受也未拒绝，只是谨慎地保持沉默。此刻，旺夏茨基出现了，他想说服尼基塔为俄国流亡青年创办一所军事院校。

旺夏茨基作为一个无限依恋圣彼得堡母校的原骑兵军官候补生，出于感情上和爱国主义的原因，对年轻流亡者的教育很关心。他深深感到缺少这样的院校：在与俄罗斯祖国相关联的纽带被完全腐蚀之前，向散居国外的最年轻的一代逐渐灌输爱国主义和军事纪律。1930年，出现了一个使这种情况得以转变的机会，当时，一群流亡者在巴黎建立尼古拉

二世军事学院。旺夏茨基为这项计划捐了大量的资金，并且据一份流亡者的报纸报道，他在说服尼基塔亲王充当这个学院的官方赞助人方面起了作用。1930年秋，院校开学，有37名男生入学。

1931年，尼基塔到达美国，从6月到12月，一直在十九穴作客。这期间，他与旺夏茨基的友谊已经成熟。尼基塔还带去了他的妻子玛丽·沃龙佐夫女伯爵及两个小儿子尼基塔和亚历山大。

尽管1934年的《哈特福德报》把尼基塔亲王描绘成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但1931年，他与旺夏茨基的关系却是建立在愉快生活的基础上，也可能是建立在怀旧之情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虽然有些流亡者把尼基塔当作他们的沙皇，但他与哥哥西奥多一样，既不是幻想家，也不是十字军参战者。

然而，对于旺夏茨基来说，西奥多和尼基塔亲王并不仅仅是他情趣相投的座上客，他们注定要给他早期的政治生涯增加光彩。

第 八 章

新英格兰的俄国领袖

今年，明年，今后五年甚至50年以后，将出现一个现在还不知名的人物，他将成为俄国的独裁者，把我的人民从压迫者手中解救出来。

——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1927)

20世纪20年代末，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开始有了投身于政治的念头。从音乐喜剧过渡到政治是比较容易的。在伯爵看来，政治是剧场的自然延伸，他对自己的戏剧才能充满了信心，当然也希望在政治方面取得成功。政治与戏剧间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差别而已。政治所提供的舞台，不仅仅是温德哈姆县，而是整个世界。

但是，政治对旺夏茨基来说，比发泄表演的冲动更深奥些。他在汤普森时，仍旧保持着华沙童年时代所接受的概念，并且，不管他作为一个康涅狄格的绅士闹得多么欢腾，但他却不能抛弃那发自内心的对俄国的忠诚。“俄国”为旺夏

茨基提供了在革命中失去的一切：家庭、朋友、家园和生活的道路。他的爱国主义使他不但关注当前的政治形势，而且还寄托着一个梦想。他所寻求的无异于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在一个过分活跃的花花公子阿列克斯背后，潜伏着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反革命分子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他通过投身于政治活动，表现了他这两方面的品质。

最初，旺夏茨基并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最适合他的抱负。共产主义当然被排斥在外；革命和国内战争使他对布尔什维克充满了仇恨。作为俄国的一名爱国主义者，他倾向于帝制思想，但同时，他又厌恶使各个帝制派组织头痛的陈腐观念和派性意识。旺夏茨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在全世界蒸蒸日上的运动，它最有希望从斯大林的手中收复俄国；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这种感性认识，1933年，他以一个自称的法西斯主义者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此外，本尼托·墨索里尼拨响了与伯爵的行为特性灵犀一点通的琴弦。

很难确切地说出是什么时候旺夏茨基开始幻想自己注定会成为一部反革命戏剧中的名角。也许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于1930年在里加发表的《蓝色的制服》一书激起了他的英雄梦。这是一本颂扬阿列克斯被暗杀的父亲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旺夏茨基的传记小说。也许，有些事情早在1927年11月就在进行了。当时，《温德哈姆县观察家》宣布，阿纳斯塔斯和马里恩“厌倦了拾苹果和种植球茎植物”，他们已登上螺旋桨蒸汽机轮船“哈定总统号”赴欧。当“妈妈”在蒙特卡洛休养时，阿列克斯直奔

巴黎，与各种各样的流亡者活动分子取得联系，其中有知名人物库捷波夫将军。

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库捷波夫将军是流亡国外的志愿军中干劲最足的人，他是精锐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原团长，沙皇尼古拉二世曾担任过这个团的名誉上校，在俄国南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役中(1918—1920)，库捷波夫作为邓尼金将军最有才干的中尉而崭露头角。白军溃散后，他移居巴黎，于1932年在弗兰格尔将军的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中形成一个好斗的小宗派，鼓吹在苏联境内进行破坏活动。库捷波夫对行动的强烈爱好恰恰与旺夏茨基相投合。1927年末，旺夏茨基刚抵达巴黎，便为这个联合会捐献了10000法郎。1928年，弗兰格尔死后，库捷波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领导，他任命旺夏茨基为这个联合会的官方喉舌《前哨》的副总编辑之一。旺夏茨基一直对库捷波夫进行资助，直到1930年1月26日，这位将军被奥格别乌劫持并且大概是被杀了时为止。后来，旺夏茨基颂扬库捷波夫是“俄国法西斯主义的奠基人”，但是，如果这个帝制主义者活着听见这样的话，他很可能不同意。

1927年冬，旺夏茨基在巴黎逗留期间参加了一个组织，据推测它是个秘密组织，自称是俄罗斯真理兄弟会。该组织由一个顿河地区的哥萨克酋长(皮奥特尔·尼科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将军)、一个小贵族(格奥尔格·留赫登堡公爵)和一个居住在柏林俄国侨民区的不明国籍的外籍居民(索科洛夫)于1923年组建的。兄弟会主张用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使沙皇复位(没有具体指出让哪一个觊觎王位者登基)。

它的大部分成员是居住在巴黎、柏林、贝尔格莱德和哈尔滨的前白俄军官。兄弟会声称它在苏联境内进行了破坏活动，尽管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但1931年至1932年期间，俄国法西斯党主席科斯明将军领导的哈尔滨远东支部是例外。旺夏茨基用25000美元换取了兄弟会美国九个分会之一的领导人的职位。1928年4月，伯爵回汤普森发展了他的第一个新会员：他的姐夫，列夫·马梅多夫。

涉足于一些流亡者的边缘组织并不能充分满足旺夏茨基日益增长的政治兴趣。1928年秋，他参加了选举赫伯特·胡佛的竞选运动（在两次布朗足球赛之间）。他在帕特南参加了一个共和党的集会，骄傲地与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局长罗伯特·赫尔利站在同一个讲演台上。尽管是交流候选人名单，但旺夏茨基还是很高兴能从个人的角度结识康涅狄格执法机构的负责人。

随着胡佛顺利当选，足球赛季过去了。一学期后，旺夏茨基的大学教育也告结束。他忙于为兄弟会办事、捐款资助流亡组织^①和创作另一部音乐喜剧。然后，在1930年，他又投身于一种新的爱好：收集枪支。几年之后，旺夏茨基回忆说，1930年前后，他变得“对收集俄国军事纪念品发生了兴趣”。这是出自这位伯爵之口的极为克制的话。

旺夏茨基喜欢枪支。枪支迎合了他对在华沙要塞度过的

① 1941年，旺夏茨基写道：“1922年到1933年间，我大约向俄国教堂、俄国医院、俄国学校、战争中致残的退伍军人和世界各地捐款达40000美元。”这些捐款来自马里恩供给他的每年20000美元的津贴。

——原注

童年以及充满战斗的青春的怀念心情。枪支减轻了他怕被暗杀的忧虑，这种忧虑无疑是由于他的父亲被暗杀而产生的。1930年，枪支既便宜也易于搞到。开始收集枪支之前，旺夏茨基认为发给他适当的凭证是当然的和恰当的。

因此，他把鲍德温机车厂的学徒资格成功地利用在科学技术方面，1930年3月17日，获得美国陆军后备队的任职令，委任为化学战师的中尉。九天之后，他到纽约的艾伯克龙比——菲奇公司购买了一支1921年产的（#8349）45口径的汤姆生式冲锋枪。他把这支枪带回十九穴，安置在能够俯瞰主楼前厅的楼梯平台上。客人们刚一进门，便发现欢迎他们的是主人顺着一支空枪管向下凝视他们的兴奋的目光。

旺夏茨基不失时机地收集火器。1930年10月18日，他在巴尔的摩附近完成了化学战的课程回家后，向弗朗西斯·班纳曼父子公司发出了一系列步枪订货单的第一张订货单。该公司是纽约一家专门进行枪支交易的商行，位于百老汇大街501号。班纳曼公司的武器仓库向旺夏茨基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一批存货：14支威斯汀豪斯式30/06口径步枪和45支雷明顿式步枪，这些枪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帝俄军队制造的，但却从未交货。实际上，雷明顿步枪根本不能用，它们是专门根据俄国子弹测定口径制造的，不适合打美国子弹。

旺夏茨基意识到这些步枪不起作用，只能作为装饰品。为了提防不友好的入侵者，他制定了一套保护自己的措施以弥补他的武器库的不足。1931年12月2日，他从联邦化学公司购买了两支短筒催泪瓦斯防暴枪，三根催泪瓦斯警棍，六

支普罗泰克托式枪——这种枪看起来象自来水笔，但也能发射催泪瓦斯。

为了替收集的这些武器建造一个合适的陈列室，旺夏茨基于1930年末雇了些砖瓦匠，在十九穴主楼南面建造了一组石头附属建筑物。这组石头附属建筑物围绕着一座宽敞的亭子(被称为“俱乐部会所”)；马里恩和阿列克斯在户外招待客人时，常常用这亭子作为避雨的地方。在这个亭子的正下方，有一间房子用来贮存从牛棚送来的牛奶，距离牛棚30英尺。当这组附属建筑物竣工时，它那16英寸厚的花岗石的墙壁与四周其他建筑物的白色护墙板交相辉映。十九穴逐渐成了旺夏茨基几经波折的经历的缩影：有点象是迁移到新英格兰的农村房舍当中来的华沙要塞。

旺夏茨基在这个石头附属建筑群内设立了一个军事室(他这样称呼它)。这间精心装饰的长15英尺、宽20英尺的小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枪枝崇拜者的西斯廷小教堂。屋内摆设着一条琥珀色的东方地毯和一套罩着印花布罩子的绿色柳条家具。用步枪枪托和空弹壳制成的灯映照着沿墙而立的枪架。翻转过来的钢盔从教堂的天花板上吊下来，在齐腰高的地方游荡着。有充作小天使的烟灰缸。一张像是祭坛的桌子上整齐地排放着匕首、马刀、手榴弹、指节套和左轮手枪。

除了可用的和作装饰的武器外，旺夏茨基还在这个军事室中摆满了个人的纪念品。一个飞机推进器的速度表使人想起他模仿查尔斯·林白的飞行。在布朗队与耶鲁队历次比赛结束时从球门柱上削下来的一些长六英寸的木片，被虔诚地置放在一个用天鹅绒作衫底的玻璃陈列盒里。伯爵对球门

柱胜利纪念品的迷恋更胜于对足球的喜爱。用阿列克斯的话说，这些木头片表明“一小伙人可以干成大事情”（能在一场比赛后的混乱人群中得到一片球门柱，就能领导一场反对魔鬼般的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

在军事室的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尊与真人一般大小的人体模型，身披一件帝国军队的大衣，头戴一顶军帽。这件大衣就是旺夏茨基在国内战争时期穿过的那件旧大衣，上面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窟窿（每个窟窿都已用金线精心地织补起来），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子弹”打穿的，当然，其中一粒子弹还留在大衣主人的腹腔里。

军事室穹形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些帝俄陆军军官学校（包括旺夏茨基的母校）的旗帜和盾牌。一条宽宽的拱道穿过这个房间的南墙直接通向一间凹室，室内有一个宽敞的石头壁炉和一尊圣母玛丽亚与圣婴的圣像，圣像前那个紫红色的杯子里燃着祈祷的火焰。房间的墙壁上排着一排排军官候补生和骑兵军官的照片。

石壁炉的左面有扇狭窄的门，通往一间长5英尺、宽12英尺的密室，这间小屋在集中供暖前原是用来储存木柴的。旺夏茨基在这个隐蔽室里安置了一张吊床、步枪架和饰以卐字徽记的废纸篓，使它成为近在身边的圣彼得堡军校学员宿舍的复制品，以慰怀旧之情。他把这间房子称为“枪炮陈列室”。

在这些军事摆设物中间，旺夏茨基留出一张桌子来摆放俄国皇族的照片。有一张逊位沙皇尼古拉的全家像，照片中尼古拉紧紧地拥抱着他那患血友病的儿子亚历克西斯，亚历

山德拉皇后和他们的四个儿女簇拥在他们身边。桌上还摆着西里尔大公、亚历山大大公、科谢尼亚以及西奥多和尼基塔亲王的照片(最后两个人的照片上有本人的亲笔签名)。尼古拉一家的巨幅照片摆在最尊荣的位子上，阿列克斯告诉客人们，这张照片曾挂在巴黎的帝俄使馆里。

这间军事室和枪炮陈列室使它们的主人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感到愉快与自豪。马里恩很少涉足其间，但阿列克斯却把他所有的朋友都带到那里去聊天、饮酒、放留声机唱片。

军事室那刺鼻的沙皇时代的气氛并不能抑制旺夏茨基逐渐滋生的对君主制度的不耐烦情绪。1931年，他终止了对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的捐助，找到了库捷波夫的后继者叶夫根尼·米勒将军。他是个平庸的、毫无创见的人。那年，阿纳斯塔斯和马里恩旅欧时，他们绕过巴黎去到柏林和贝尔格莱德——行动导向的俄罗斯真理兄弟会的两个孪生的总部。但是，旺夏茨基最后对兄弟会也失去了信任。兄弟会拒绝让他参加同想要炸毁苏联石油管道的“与标准石油公司有联系的美富翁”进行的谈判，他为此而感到气愤，便于1932年7月向兄弟会递交了辞职书。他退出兄弟会非常及时。这些“美富翁”原来是阿姆托格公司雇员名单上的人，阿姆托格是同美国做买卖的苏联公司。此外，兄弟会与苏联奥格别乌的一个代理人进行了联系，这一丑闻动摇了兄弟会的根基，不久，它便解体了。

旺夏茨基由于错误地相信了现有的流亡组织而感到幻想破灭，便开始考虑能否创立他自己的反苏团体。一些年后，

他回忆道：

我在1932年与俄罗斯真理兄弟会断绝关系时，便决心自己组织一个政党，以便实现我推翻苏维埃政府的计划，并实现为俄国人民建立一个自由政府的打算和目标。

这位伯爵在1932年的“打算和目标”到底是什么还很难说，也许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确。无论他考虑的是多么大胆的创举，但这年他并没有为组建一个政党而采取什么明显的步骤。

辞去兄弟会的职务后，旺夏茨基把夏季剩余的时间都用来与西奥多亲王在美国西南部乘车旅行。到了秋季，他投入赫伯特·胡佛的继选运动中。

旺夏茨基对1932年的总统选举怀有强烈的个人意念。他深深敬仰胡佛，这不只是由于他所实行的国内政策，而且还因为他在1922年伏尔加出现饥荒时曾向几百万俄国人提供了食品。阿纳斯塔斯在旧金山的俄文报纸《新霞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胡佛：俄国人民的朋友》的文章，表达了他上述的想法。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给旺夏茨基的印象是一个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惜替斯大林卖力的机会主义者。旺夏茨基惊呼，为什么还有俄国移民会投这个民主党候选人的票；他在纽约俄文报纸《新俄罗斯言论》上重复保罗·米留科夫于1916年在第四届杜马上讲的名言质问道：“这难道不是对我们俄国事业的愚蠢行为和背叛么？”罗斯福在竞选获胜

后果断地承认了苏维埃政权，这进一步证实了旺夏茨基对这位总统的最坏的猜测，使他一生对这位总统都持有反感。

虽然旺夏茨基从不承认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但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无疑使他看到了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得力招牌。希特勒对德国赤色分子的镇压和对日耳曼力量的动员使旺夏茨基确信，同样的群众运动，按斯拉夫人的情感适当加以裁剪，便可以摧毁布尔什维主义，并复活俄国潜在的崇高和伟大。他还开始认为，他自己才是唯一有智慧、有魄力、有金钱来领导这一运动的人。

1933年2月后，沉浸在这梦幻中的不再只是旺夏茨基自己了，十九穴收留了一个流亡的同伴，此人在后来的七年中作为伯爵的秘书而忠诚地为他服务。

多纳特·约西弗维奇·孔尔于1900年出生在俄国，和旺夏茨基一样，曾与邓尼金共同在乌克兰作战。于1920年撤到君士坦丁堡，在美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顺利到达美国；1921年，他在康涅狄格的斯特拉特福的沃特——西科尔斯基飞机厂找到了工作，当一名机修工。孔尔中等身材，有一个运动员的体格。他那鬈曲的茶褐色头发和撅起的嘴唇显出一点稚气，这种稚气与那双哀怨的眼睛不很协调，这双眼睛在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期间看见的事情太多了。

孔尔与旺夏茨基是在革命之前相识的还是在国内战争期间两人在邓尼金手下当差时认识的，还无法确定。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昆纳蒂塞特农庄的宾客簿上看，孔尔曾多次拜访过十九穴。1933年初，孔尔的妻子保拉离他而去，与一个名叫杰米多夫的亲王在长岛同居。与此同时，多纳特·约西

福维奇辞去了他在西科尔斯基的工作到十九穴居住，他在主楼占有一间卧室。为了使他的名字英文化，孔尔改名为“孔利”，当地人称他为“孔茨”。不久，伯爵和孔茨这不可分离的一对便在帕特南人们的闲谈中赢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

十九穴家中多了孔尔，使旺夏茨基的梦获得了共鸣者。这两个人在军事室里、在昆纳蒂塞特的高尔夫球场上和俄国熊餐馆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反复思索白军事业的失败，哀叹它缺乏年轻的领导者，并对意大利和德国对付国内共产党人的战斗力感到惊讶。他们认为，只能从俄国国内去推翻斯大林，而不能从国外，不能按白军想作而没有作到的办法去干。这需要一个富于战斗性的宣传核心和突击队，这些都可以在苏联国内促进一场反共国民革命。旺夏茨基与孔尔越谈越觉得他们就是复兴俄国的救世主。

全俄法西斯组织

1933年5月10日，旺夏茨基和孔尔决定正式成立一个政党。他们以“俄国法西斯最高参谋部”的名义写了一封“公开信”，号召成立一个全世界主张采取行动的流亡者的法西斯联合阵线。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冗长的文章，把他们创建的党命名为全俄国民革命劳苦者与工农法西斯党。为了方便起见，一般简称为全俄法西斯组织或VFO。

全俄法西斯组织从诞生起就是一个家庭的产物。旺夏茨基获得了该组织的首脑称号，孔尔是党的秘书，马梅多夫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为了保护留在苏联国内的亲属，

他使用了“依拉里恩·苏沃罗夫”这个假名。马里恩没参加全俄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她把这看成是阿列克斯爱国主义的癖好，但后来，旺夏茨基决意授予她诸如“第一夫人”和“旺夏茨基卡娅伯爵夫人”之类的光荣称号。出于讨好首脑的热情，党的抒情诗人们后来又给马里恩加上了“克娄巴特拉”、①“汉密尔顿夫人”及“尤金尼娅女皇”的桂冠。

旺夏茨基不注重教理、教义，不像满洲的俄国法西斯分子那样没完没了地谈论阶级合作主义、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五年计划，他宁愿让这些思想听其自然。他喜欢即兴表演，乐于不看讲稿凭记忆发表演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开始干起来。

首脑很快便意识到，俄国法西斯组织要想在温德哈姆县以外地区发展组织，就必须进行自我宣传。很明显，这需要一份报纸。依靠马里恩每年给他的津贴——现在已达到25000美元——他雇佣了一些木匠来改建牲口棚那边的鸡舍，以便在里面摆放印刷机；同时，在改建完毕前，他在纽约保持两家公司为他印刷报纸。

旺夏茨基宣称他的报纸为《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虽然是报纸的版式，但它是最优质的有光纸印刷的，使人感到它好像是《全国地理杂志》②。

该报第一期于1933年8月问世，发行了2000份。此后，《法西斯主义者》大约每隔一个月出版一期，每期发行约

① 克娄巴特拉是公元前51到30年的埃及女王。——译者

② 《全国地理杂志》是美国全国地理协会的出版物，插图、照片精美。

——译者

10000份。该报每年的维持费为4000美元，其中邮费占2400美元。

旺夏茨基在汤普森雇用了一个21岁的男青年具体负责《法西斯主义者》的工作，这个青年叫诺曼·沃森。他父亲托马斯·沃森是昆纳蒂塞特高尔夫球场的看管人，1921年以来，诺曼断断续续地为伯爵当球童。穿过罗宾斯路就是沃森的家，离十九穴很近，旺夏茨基找他时很方便。阿纳斯塔斯委任他的新助手为“外事副官”。诺曼除了向订户发寄报纸、把成捆的报纸送到汤普森或帕特南邮局外，还负责为首脑的英文信件打字。

《法西斯主义者》为旺夏茨基发挥他的空想提供了广阔的领域。他和孔尔所写的文章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俄国法西斯主义代理人们在世界各地、甚至在苏联境内的功绩。为了“保护”这些人，使他们免遭苏联保安机关的迫害，他们的真实姓名“不予透露”，而是用缩略词fashkor后面加上党员编号和工作岗位所在地来识别（如Fashkor18337，斯摩棱斯克）。这样，旺夏茨基需要在世界各地有多少代理人就可以编造多少代理人。

《法西斯主义者》的内容大约有一半是讨论俄国法西斯组织当前的活动，另一部分是培养怀旧情绪。大量的带插图的版面再现了慈父般的沙皇、无畏的将军和忠诚的农民。该报还刊登了许多国内战争时期的照片，生动而详细地追述了波罗的海战役、西伯利亚战役和乌克兰战役，并且还以大量白军英雄（如科尔尼洛夫、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画像、侧面浮雕像来加以说明。俄国法西斯组织被弄得好似俄

国伟大军队和帝制传统的继承者，尼古拉二世肖像的四周巧妙地用旺夏茨基的肖像作为点缀。为了突出与罗曼诺夫的关系，在1933年12月号的《法西斯主义者》第一版上复制了10岁的尼基塔·尼基季维奇(尼基塔·亚历山大罗维奇亲王的儿子)在1933年12月3日写给旺夏茨基的一封信。这个小孩写道：“我为成为一名俄国法西斯分子而十分快活。”

除了幻想和怀旧外，《法西斯主义者》还大肆宣扬旺夏茨基的反革命诀窍：停止在意识形态上的诡辩，努力接近俄国的群众。只有利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忿怒才能实现国民革命。旺夏茨基确信，俄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他争辩说，俄国法西斯组织必须首先在农民中寻求支持，把农民对集体农庄的反感转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为了争取农民，他制定了一个三点宣传要领：恢复和保护私人财产，把集体化的土地全部分给农民，取消对农产品贸易的一切限制。

旺夏茨基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观念是实用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就是有效的反共主义。1933年末，首脑对一个记者发表言论说：“哦！我们的名字是赤色分子给予的，他们称我们是俄国法西斯分子，我们采纳了这一称号。”与罗扎耶夫斯基一样，旺夏茨基把“法西斯分子”当作苏联国内最激动人心的反共产主义的时髦口号。只要苏维埃把每种反对他们政权的敌对的事物都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他们便会不知不觉地在群众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反抗的象征。

除了反对共产主义这一点之外，法西斯主义并不意味着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联合。在后来的年代中，旺夏茨基被谴责为纳粹分子。他极力否认俄国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在体制上有相似之处，或在目标上有共同之点：

我认为，法西斯分子一词的意思就是百分之百的反共分子，不一定含有它在德国或其他国家所具有的那种含义。

他又说，

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的法西斯主义有许多不同之处。俄国法西斯党只是俄国人反对共产主义的一种联合运动，并且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世界上能消灭共产主义的唯一的政治制度。

旺夏茨基坚持说，他们选择卐符号作为俄国法西斯组织的标志并不是模仿第三帝国。每当有人用非难的语气问及他为什么要使用“纳粹的符号”时，他必定要长篇大论地解释一番说，卐字既不是纳粹的发明也不能被他们所垄断。他指出，古代印度和古希腊人都使用过卐字符号。最早的基督教徒把卐字符号画在罗马地下墓穴的壁上。亚历山德拉女皇把卐字雕刻在叶卡捷琳堡的房子的门框上，1918年，她与家人在那房子里被布尔什维克枪杀。1932年，旺夏茨基与西奥多亲王在美国西南部旅行时，他注意到亚利桑那州公路的界标使用了卐符号（这种作法直到1937年才改掉）。首脑抱怨说“为什么仅仅由于希特勒采用了它，我就必须改变它呢？”实际上，旺夏茨基的确在许多场合作了改变卐字的实验（把它

的臂改为逆时针方向延伸)。

尽管旺夏茨基对卐字加以否认，但他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选择了纳粹的敬礼姿势(还伴随着“俄罗斯万岁”的呼喊)、诸如“敢死突击队”之类的称号以及个人效忠于首脑的宣誓(这使人想起“元首”所要求的那种宣誓)，等等。更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旺夏茨基把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作为俄国法西斯组织的国歌(《高举旗帜!》)。孔尔创作了新的抒情的歌词，其中用俄国黑衫队代替了德国褐衫党，用旺夏茨基代替了希特勒：

同志们！祖国期待着我们
祖国号召我们
聚集在这旗帜下
蔑视叛逆和懦弱
首脑旺夏茨基
领导我们法西斯主义者从事伟大的事业

胜利的日子就会到来
粉碎集体农庄、斯大林和格别乌^①
当我们黑色军团
在莫斯科穿城行军的时候
一个闪光的卐字徽记
照耀着克里姆林宫上空

① 格别乌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缩略语。这个总局于1923年改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缩略语为奥格别乌。——译者

旺夏茨基并不满足于仅仅发表他的党歌，而且还把《高举旗帜》录了音。他还购买了能够灌制每分钟78转的唱片的音响设备，并与孔尔和马梅多夫组成了一个三重唱小组。然后他请了一个当地乐队帮助伴奏。用双倍低音提琴和萨克斯管代替鼓和小号，使《高举旗帜》具有爵士乐的味道。

旺夏茨基不单借用了纳粹的标志和歌曲。在音乐喜剧中的表演是他登场演出的第一步，但一个明正言顺的法西斯主义首脑需要具备使广大观众为之入迷的生动表演的个人才能。毫无疑问，阿道夫·希特勒具备这种神授的能力，伯爵认为他的演说风格是供模仿的理想典型。旺夏茨基不失时机地把收音机里播放的希特勒在体育宫的表演录制下来。他对这些讲演的内容不很感兴趣，而是集中精力注重其音色、声调、韵律和渐强音。然后，他想出了录制自己的讲演的主意，这一方面是为了作出批评性评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享受听到自己声音的乐趣（讲演中间还掺杂着鼓掌喝彩声）。在第一批录制的一张唱片中（可能是1934年录制的），这位首脑的声音有几分象患了消化不良症的鲍里斯·戈杜诺夫。更糟的是，那劈劈啪啪的鼓掌声与其说是看台上欣喜若狂的追随者发出的声响不如说是十来只手和脚在疯狂地拍打。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连这点声音也是孔尔和马梅多夫用他们的四肢竭尽全力发出的。

1933年某时，具体的时间不清楚，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与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相互知道了对方的存在。与远东俄国法西斯的首脑相比，一眼就看出旺夏茨基像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在法西斯的潮流中是个迟到者，既没有配得上

首脑这一称号的经验，也没有那样的追随者。没有政府赞助他。但康涅狄格州的伯爵却用丰富的幻想、有感染力的炫耀和金钱弥补了这些不利条件。

这两个放弃了原国籍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相隔半个地球，在汤普森和哈尔滨相互注视着。他们会集合他们的力量在所有散居国外的俄国人中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运动呢，还是会各自主张自己拥有排他性的领导权？1933年后，他们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给俄国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和发展增添了色彩。

第九章

拼凑法西斯联合阵线

如果战争是游戏，
和平怎能不是开玩笑？

——俄罗斯格言

1933年，苏联两翼的紧张局势逐步升级。在欧洲，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使德国落入这样一个人的手中，他不仅痛恨共产主义——这在西方领导人中并不罕见——而且公开极力主张德国人在东方寻求生存空间。在亚洲战线，日本继占领满洲之后，窥视西伯利亚和外蒙边界。当外交官们在莫斯科和东京相互指责之际，红军同关东军剑拔弩张，准备摊牌。报界人士推测，这场冲突将采取什么形式：是苏德战争？苏日战争？还是德日共同讨伐苏联？

约瑟夫·斯大林察觉到了这种资本主义合围的致命突变，产生了警惕。他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置于一旁，开始以集体安全的建议向法国、英国和美国求援。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口号，在

以后的四年中，这口号就像华格纳的主旋律，贯穿于苏联的宣传中。

引起克里姆林宫忧虑的事情却激起了散居在外的俄国人的希望。居住在欧洲、远东和南北美洲的流亡者们注视着这期待已久的预示着反革命的战云。旧日的梦想和被抛弃的方案又一次复苏：战争曾使罗曼诺夫王朝从他们的宝座上摔了下来，同样，战争也必将推翻布尔什维克，使俄国人民有机会表明他们的愿望；在集体化的压迫下呻吟着的农民肯定会拒绝交纳粮食；红军将拒绝作战；全国的少数民族势必会退出苏维埃联盟；斯大林和他的心腹们面对国内外的共同压力将束手无策，只能丢下无人领导的俄国而逃之夭夭；在德国和日本的支持下，一个以反共流亡者为核心的新政府必将产生。按照这些灵感丰富的人的想象，在反革命力量扎根后，德国和日本当然将从俄国撤出他们的军队。

德国和日本即将成为苏联的敌手，这也使行动主义的流亡者受到了震动，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混乱状态。面对这大好机会，他们产生了一种紧迫感。

法西斯主义的和其他右翼的流亡者团体在1933年对利用苏德或苏日战争毫无准备。这些俄国流亡者散居于世界各地，互相隔绝，相互猜疑。在满洲，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在日本人的庇护下统帅着俄国法西斯党，但他在远东以外的地区却缺少追随者。帕韦尔·伯蒙特—阿瓦洛夫的俄罗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盖世太保猜疑的眼睛下，在德国像小人国的小人似地蹒跚而行。亚历山大·勒沃维奇·卡泽姆—贝克组织的俄罗斯青年运动的成员开始上了年纪，在巴

黎以外的地区已没有什么影响。

一些比较敏锐的右翼分子逐渐领悟到，为了利用德国和日本进攻苏联而造成的天赐良机，他们这些毫无联系的团体必须合作。有些人认为，准备迎接这个良机的最佳方法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只是模模糊糊还不明确，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有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那就是流亡者只有携手联合，才能避免导致衰弱的、最终不战自败的派别活动，才能在俄国群众的眼中尽量使他们的形像变得高大，才能使潜在的德国与日本主子注意到他们的作用。

一眼就能看出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最不可能是负责把散居国外的右翼分子联合起来的人选。名牌大学花花公子和康涅狄格州乡绅的生活使他与苦难相隔绝，而这些苦难影响了他的许多同代流亡者的心理。更糟的是，他意外获得的财富（报界对此极力夸大）引起了人们的羡慕与忌妒。他对远东几乎一无所知，缺乏政治手腕，卤莽而欠老练，动不动就神经过敏。俄罗斯流亡者的敏感是众所周知的，更不用说乌克兰流亡者了。

另一方面，旺夏茨基则是唯一具备便利条件向全世界的选民们传播行动计划的人。与罗扎耶夫斯基和伯蒙特—阿瓦洛夫不同，他没有受惠于任何政府。他扎根于美国，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自由在满洲和德国都是不可想像的。美国公民的身份使他能随意到除苏联外的世界任何地方旅行。亏得马里恩，使他能大量的现款去开放门户，安抚竞争者和罗致追随者。

但是，促使旺夏茨基投身于建立一个全球性法西斯联合阵线的长远打算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那不屈不挠的自信心。1933年后，他从不怀疑，他能够利用这场日益逼近的大屠杀而使俄国受益。十九穴军事室中收藏的一大堆球门柱屑片使他确信，他，只有他，才可能在这种混乱的危难关头夺得胜利。

柏林的聚会

1935年5月，旺夏茨基建立了全俄法西斯组织后，很快就决定他的第一个战略任务是把全世界右翼流亡团体结合成一个法西斯联合阵线。他采取一种刺激手段鼓励人们参加该阵线，对易于控制的流亡者领导人都将授予在“国民革命”的“总参谋部”内的职务。他用军队的头衔作为诱饵来吸引白军的老战士们，否则，他们或许不会倾向于法西斯主义。

旺夏茨基理所当然地把欧洲作为着手创建他的联合阵线的地区。1927年和1931年，他与马里恩在旅行中接触了象库捷波夫之流的帝制派将军们。1933年，库捷波夫想发掘和挑选一代年轻人。不用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看到在希特勒德国发生的事情”，也感到难以理解。

9月底，旺夏茨基渡过大西洋直达柏林，住进了优雅的阿德隆旅馆。这个旅馆位于下林登和威廉大街的拐角处。他选择了以巴黎为基地的组织“俄罗斯青年”和当地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的时间到达柏林。

俄罗斯青年和俄国纳粹分子开会讨论进一步合作，这说明在散居国外的右翼流亡者中已经开始充满了向心的愿望。

俄罗斯青年的头头亚历山大·卡泽姆—贝克从巴黎带来了两个同伙——谢尔盖·奥博连斯基伯爵和一个名叫格列布·巴列茨基的乌克兰人。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脑帕韦尔·伯蒙特—阿瓦洛夫由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书记梅勒—扎科梅尔斯基和该运动的一伙可靠分子陪同。旺夏茨基独自一人代表全俄法西斯组织出席了这次会议。孔尔和马梅多夫留在康涅狄格出版《法西斯主义者》和经营俄国熊餐馆。三边讨论在用卐字装饰的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总部进行，这个总部设在布莱特罗大街。

会议是安排在一种比较有礼节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便是柏林会议取得的主要成绩。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骑兵遵照外交礼节脱掉了他们的长统靴。盖世太保没有干预。另一方面，由于实质性问题未达成一致看法，故再无其他收获。确实，每个人都表示相信俄国国民革命不可避免，并且口头上还说要在反苏斗争中精诚团结。但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国民革命胜利后是否应给予乌克兰人自治权这个问题上，这种团结瓦解了。最敏感的问题连讨论都没有讨论，这问题就是：谁将成为反苏阵线的首脑？伯蒙特—阿瓦洛夫认为，作为一个能够接近希特勒的日耳曼化的第三帝国的外籍居民，他是必然的当选人。旺夏茨基谦虚地等待着自己在掌声中被提名。卡泽姆—贝克讨厌他们俩，他拒绝使俄罗斯青年服从一个纳粹分子的领导，也不能容忍一个来自美国的暴发的舞男。由于领导人问题未能解决，除了交换充满陈词滥调的誓言外，便无事可作。这誓言就是：今后所有各党应更加紧密地联合工作。除了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机关

报《俄国的觉醒》登载了一篇奉承旺夏茨基的文章外，他在柏林毫无收获，当然也没有向实现建立联合阵线的梦想前进一步。

在柏林停留期间，旺夏茨基没有努力去寻找与纳粹领袖们会见，尽管有些朋友怂恿他这样做。他们列举了同罗森堡、戈培尔或戈林建立个人友谊可能带来的种种好处。目前，他宁愿作为一个旅游者来观察第三帝国，并且坚持不投靠纳粹主子。

旺夏茨基于10月回到纽约，他兴奋地发现他自己（又一次）成为国际上引人注目的人物。欧洲、美国和远东的流亡者报纸用显著的版面登载了这次柏林会议；各报按照编者的政治倾向，或为之欢呼，或对此斥责。旺夏茨基利用免费宣传材料，使1933年12月号的《法西斯主义者》为他的欧洲之行唱颂歌。为了加重份量，还增添了一种基督教会的色彩，翻印了卡尔洛瓦茨（南斯拉夫东北部）的安东尼大主教写给这位年轻首脑的一封信。

招致臭名昭著

旺夏茨基的自我宣扬必然会引起反作用。他暂时还只是受到开明的和亲苏的报刊的斥责。但是不久，诋毁他的人就采取了更积极的步骤来团结公众反对他的行为。

1933年11月11日，哈莱姆俄国人社会的成员举行停战纪念日活动，把旺夏茨基痛斥为法西斯分子。人们对他的注意使他受到了鼓舞——他细心地保存着一本有关此事的剪报册。这位伯爵对此的回答是在下一期的《法西斯主义者》上填

满了法西斯组织在苏联国内进行恐怖活动的新闻简报：

俄国西部的战果！

10月7日(1933年)，A—5号法西斯三人小组弄翻了一辆军用列车。据收到的情报说，约有100人死亡。

在莫齐尔地区的布列辛村，一组战友击毙五名共产党员。

在斯塔罗宾斯克地区，由于战友的出击，播种会战完全遭到破坏。几名负责此会战的共产党员神秘地消失了。

9月3日，在奥泽拉—克尼亚兹地区，167号和168号战友打死了一名共产党的集体农庄主席。

旺夏茨基不停地编造进行破坏活动的消息。1933年末，美国承认苏联后，为了立即鼓动人们的情绪，《法西斯主义者》作了个姿态，宣布设立一项1500兹罗提(300美元)的基金，要奖给从华沙监狱释放出来的博里斯·科费达尔。科费达尔在1927年刺杀了苏联驻波兰大使皮奥特尔·拉瓦雷维奇·沃伊科夫。1918年7月，作为乌拉尔苏维埃成员的沃伊科夫征用汽油和硫酸处理掉了被杀死的皇室成员的尸体。旺夏茨基毫不掩饰他认为刺杀沃伊科夫是值得奖赏的——借此暗示刺杀其他苏联外交官也值得奖赏。

美国《工人日报》表示的愤怒使旺夏茨基受到了鼓舞，他

在1934年的《法西斯主义者》上塞满了更为耸人听闻的幻想作品。在更为臭名昭著并被广泛引用的例子中，有他对空想的全俄法西斯组织在苏联境内的地下组织下达的杀人令：

布置暗杀军事教官、军事记者、政治委员及最坚定的共产党员。

暗杀契卡人员、格别乌人员、担任要职的工作人员、党员和所有那些明确支持赤色政权的人。捣毁国有的赤色银行、金库和保险库，把这些钱用于兄弟会（全俄法西斯组织）的工作。

尽一切可能破坏赤色政权机关。火烧或炸毁格别乌的建筑物以及所有共产党委员会和俱乐部的建筑物。

首先暗杀共产党的书记们，人民委员的政权的真正走狗们。

扰乱赤色政权的通讯联络。砍断电线杆，捣毁陶瓷绝缘子，切断电线，干扰和破坏一切电话通讯。

不让人民的商品输出。夺取能夺取的一切并予以分配。无法夺取的东西就毁掉。如果无法毁掉，就想方设法使准备输出的商品损坏掉。要根据每种商品的特点选择最适合的破坏方法。在食品中放进各种垃圾与污物，放进死老鼠，投进寄生虫、蟑螂和臭虫。

看来，一些应当较为了解——以及也许已经了解——此类丑角的人，已经按这类丑角的表面价值来对待他。例如，1931年以来，《工人日报》一直攻击旺夏茨基。1931年，它揭露十九穴是个反苏阴谋集团的“隐蔽点”，“纽约和哈特福德资本家们”为其提供资金。1932年，这家美共机关报认为这位伯爵与暗杀在苏联工作的美国工程师们的阴谋有关，并把他牵连进了暗杀犬养毅一案。1932年5月15日，这位日本首相在东京被海军士官生枪杀。《工人日报》追查旺夏茨基与国务院的关系，断言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的嫂子（一个叫“卢米斯夫人”的女人）是旺夏茨基的支持者。

确实，1922年柳巴·穆罗姆斯基在巴黎向美国大使控诉了旺夏茨基的重婚罪以来，美国国务院就知道旺夏茨基了。1933年，由于他的一场惊人表演，华盛顿为他立了个新档案。伯爵在这场表演中编造出一个名叫伊万诺夫—克里弗科夫的战友，使俄国法西斯组织的国际功绩戏剧化。这个把戏开始于7月份，当时，多纳特·孔尔给波兰内务部发去了下述电报：

伊万诺夫—克里弗科夫是我们的人 我们将感谢
他获得自由 我们愿给予财政援助 （署名）代理参
谋长 唐纳德·孔尔贝

波兰内务部核对了国内所有的监狱，没能找到叫作“伊万诺夫—克里弗科夫”的犯人。内务部没有复电，而是派了一名波兰官员于8月7日带着这份电报找到了美国驻华沙

的总领事，要求做出解释。总领事将此事提交给华盛顿，几周内，美国国务院东欧事务司在陆军部查证核实这个“代理参谋长”。虽然查出这份电报发自汤普森，但旺夏茨基是否受到了责备却无记载。当时，《法西斯主义者》发表了“伊万诺夫—克里弗科夫”的英勇业绩：

全俄法西斯组织成员伊万诺夫—克里弗科夫上尉已越过捷马热维奇地区的波苏边界。他是本组织的积极分子，几个月前到那里去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但他被格别乌发现了，被迫逃出苏联。他现在被波兰当局拘押，但全俄法西斯组织中央总部已经为他的获释采取了措施。

“伊万诺夫—克里弗科夫”这个把戏的成功在于，不仅使旺夏茨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且使他在流亡者中更加臭名昭著。它集中体现了演出诀窍和公众轻信的混合体，凭着这种诀窍和轻信，伯爵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了。

发展基层组织的运动

全俄法西斯组织的代理人并不全都喜欢空想。1933年后半年，旺夏茨基勤奋地着手在南北美洲、欧洲和中东建立该党的基层组织。这项任务并非像所宣传的那样困难，因为招收新成员的工作只集中在有俄国流亡者飞地的城市中进行。旺夏茨基与国内战争中的许多老战士们保持了联系，其中一些人成为他的国际网络的骨干。《法西斯主义者》的订户名单提供了另一些代理人来源。旺夏茨基在马里恩每年给他的

25000美元(其中约10000美元用于全俄法西斯组织)的费用中抽出一些作为津贴，使他能够吸引一些支持者。有些全俄法西斯组织的代理人从未见过旺夏茨基。他们仅仅接受他的金钱并自称是战友。全俄法西斯组织拥有这些地理上分散的赞助者，必然成为一个以汤普森为“中心”的通讯联系的党(“中心”一词是旺夏茨基的用语)。

为了尽快地发展成员，旺夏茨基规定了加入全俄法西斯组织的主要标准：

我党成员资格的唯一条件是从个人角度表现了有加入组织并帮助发扬组织原则的兴趣。党的原则是帮助俄国人推翻共产主义，并建立一个俄国人民自己的理想政府。

米哈依·米哈依洛维奇·格罗特是通过通信招收的新成员，他最终成了全俄法西斯组织的理论家。人们只知道格罗特居住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经常为《法西斯主义者》写稿，有时用斯帕索夫斯基这个笔名外，对他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该党的宣传小册子大部分是格罗特写的(《关于我们的秘密工作》，《我为俄国服务》，《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的策略》)，在十九穴印刷，封面用纸是褐色，上面印有全俄法西斯组织的标志：卐字的后面衬以罗曼诺夫王朝的双头鹰。格罗特毫不掩饰他的疯狂的反犹主义以及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崇拜，从1934年到1940年，《法西斯主义者》连载了他用俄文翻译的《我的奋斗》。《法西斯主义者》把格罗特描绘成“俄国法西斯

运动的伟大的思想家”。事实上，旺夏茨基并不同意格罗特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观点，但却让他自由地阐述意识形态的问题。阿纳斯塔斯对理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提出精辟论点的才能，看来，他乐意让这位东普鲁士的记者成为党的哲学家。

旺夏茨基在纽约市建立了第一个汤普森以外的基层组织。这个城市的曼哈顿商业区的小组由亚历山大·普利什诺夫领导，他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流亡者，与右倾观点的俄国日报《俄罗斯》的出版者尼古拉·雷巴科夫共同使用卡纳尔街480号的破旧的事务所。看来，雷巴科夫不是全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但是，旺夏茨基于1936年在十九穴改建的鸡棚中建起自己的印刷车间之前，他的印刷所出版了几期《法西斯主义者》。

普利什诺夫反对与由叶夫根尼·博戈斯洛夫斯基和他妻子组成的住宅区小组分享权利。博戈斯洛夫斯基具有戈林那样的身材，蓄着一撮浓密的小胡子以弥补他的秃头；他的小眼睛如同小黑豆，悬在他那向里倾斜的眉端上。他的相貌配不上他那善良的性格及运动家的风度，而他的性格和风度得到旺夏茨基的喜爱。博戈斯洛夫斯基夫人由于绣了党的旗帜和袖标，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全俄法西斯组织的贝特西·罗斯^①。

伊万·诺沃季洛夫代表波斯顿小组。人们只知道他的妻

① 贝特西·罗斯（1752—1836），传说是缝制第一面美国国旗的女工。

子华伦蒂娜帮助经营伯里大街的俄国熊餐馆，他的女儿娜塔莎受到马里恩的宠爱，至于诺沃季洛夫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西海岸的约50名全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归这个地区的一位名叫乔治·杜姆巴杰的人领导，他在好莱坞工作。但1936年，杜姆巴杰被德美同盟吸收为成员，他的工作被洛杉矶的费奥多·西门斯所接替。此人同时还为北卡罗来纳的自称为银衫党的法西斯分子威廉·达德利·佩利工作。在旧金山，全俄法西斯组织以拥有几个积极分子而自豪，这几个积极分子的背景都没有弄清楚，他们是瓦莱里安·冯·迈耶，克利斯特·拉茨加尔夫和他的女儿玛丽娜，以及赫伯特·万茨夫妇。作为旧金山的“积极分子”，显然意味着把《法西斯主义者》分发给未来的新成员。旺夏茨基资助在西雅图出版油印刊物的普罗科佩·瓦西利耶夫（“第293号法西斯战士”）。该刊的名称为《黎明与道路》，印刷地点在拉凯维尤大街911号。

在美国以外的旺夏茨基的代理人往往是依靠党的施舍过活的流亡者。作为对每年600美元津贴的报答，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达霍夫于1933年加入了全俄法西斯组织，并在他的圣保罗的《俄罗斯报》上为首脑唱颂歌。近东的全俄法西斯“总部”设在开罗，第一个成员名叫塔尔别佐夫，后来又发展了格奥尔吉·塔乌别“男爵”，此人是前白军军官，曾在邓尼金手下打过仗。旺夏茨基每年汇600美元给保加利亚一个名叫布托夫的人，从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组。布托夫在索非亚出版了一份叫作《俄国人》的周刊。旺夏茨基每年还付给一个叫勒克利茨基的人600美元，让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周刊《萨

克扎尔斯基通报》上发表赞扬党的文章，但南斯拉夫政府的法规禁止勒克利茨基真正地加入全俄法西斯组织。《法西斯主义者》还提到了一系列在国外的全俄法西斯组织的代理人：贝尔格莱德的亚历山大·雷布尔格（实际上并不是组织成员），加拿大的弗拉季米尔·吉申斯基和特罗菲姆·洛维亚金，布拉格的勒兹宾斯基，悉尼的弗拉季米尔·普鲁特科夫斯基和柏林的佩特拉舍夫斯基。他们究竟是专职代理人还是一般旅游者，或者是“伊万诺夫—克里弗科夫”式的人物，人们只能加以猜测。

真的或想象的全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没有人交党费。旺夏茨基在1941年回忆说，这些人对党的捐献是“微乎其微的”。1935年，有人真的从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寄了5.65美元，当时，《法西斯主义者》写文章大加赞扬，仿佛这是一件大事。

尽管旺夏茨基有国际联系，但在远东却没有追随者。每个懂得政治的流亡者都知道，1933年的远东最可能是苏联卷入战争的地方。当康涅狄格的首脑接到了哈尔滨首脑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的合作建议时，他为这个机会而欢欣雀跃也就不足为奇了。

来自哈尔滨的一张请帖

旺夏茨基必然会引起另一个自封的俄国法西斯首脑罗扎耶夫斯基的注意。这两个相隔半个地球的人是在什么时候怎样互相知道对方的还不清楚。旺夏茨基于1934年接见《哈特福德日报》记者时声称，他与罗扎耶夫斯基“同时”发现了法西斯主义，但到1933年秋，他们才相互知道了对方。阿纳斯

塔斯延长了这个“同时”所持续的时间，当罗扎耶夫斯基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满洲各地组建法西斯基层组织的时候，旺夏茨基正在写音乐喜剧，并梦想着下一场布朗——耶鲁球队的球赛。不过可以相信，他们只是在1933年才相互知晓。罗扎耶夫斯基首先作出了希望相互结识的姿态。

1933年10月28日，罗扎耶夫斯基写信给旺夏茨基，邀请他去哈尔滨，并建议把他们两个党合并成一个代表全体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的世界性组织。尽管信中的言词友好，但建议联合的动机既不是出于相信全俄法西斯组织的功绩，也不是出于对旺夏茨基的钦佩。确切地说，罗扎耶夫斯基是为了金钱。旺夏茨基的金钱——更确切地讲是马里恩的金钱——为哈尔滨那些靠反复无常的、小里小气的日本人的施舍过活的穷战友提供了诱人的前景。无论其目的如何，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无疑是找到了某种理由向他的关东军主子证明他的邀请是必要的。不经主子默许，旺夏茨基毕竟是不能进入满洲国的。

不久，旺夏茨基便“代表2000名全俄法西斯组织成员”接受了罗扎耶夫斯基的邀请，着手准备一次使他能前往日本、满洲国、中国、近东和欧洲的环球旅行。他感到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由于边界冲突和中东铁路方面的摩擦而恶化的苏日关系看上去似乎处于决裂的边缘。陆相荒木贞夫将军公开宣扬苏日必战的论调，并隐晦地号召先发制人地进攻西伯利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旺夏茨基告诉一个记者说，如果日本和俄国开战，他要求“一开始就到那里去”。在那里还有机会见到日本领导人，特别是荒木，他要同他共

议合作之事。这是动员全世界流亡者支持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有利时机。最重要的是，这是他向全世界亮相的天赐良机。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2月，这位首脑与孔尔和马梅多夫躲在十九穴的军事室中计划即将成行的环球旅行的每个细节。柏林会议使旺夏茨基认识到显示重要的重要性。首先，他需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忠实的随员（他曾经犯过一个错误，那就是独自一人到柏林去对付卡泽姆—贝克和伯蒙特以及他们的全体走卒们）。多纳特·孔尔极符合上述条件。阿纳斯塔斯为他的“助手”配备了一套美军剩余制服和一个公文包。第二，他需要证明他是真正的富有者。美国富豪阶层中慷慨的典范马里恩为他提供了这一条件。第三，他需要使这次旅行看起来很重要。阿列克斯做到了这一点，他通过《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写到他的其他任何报纸）来宣布这次旅行，称它为一次重要的招收新成员的战役，这个战役要在远东建立一支15万人的白俄军队以便最后进攻苏联——在日本人的协助下。

1934年3月1日，在纽约范德比尔特饭店举行了庆祝会，作为这次旅行的开端。阿纳斯塔斯、马里恩和孔尔由马梅多夫陪同从康涅狄格驱车前来。尽管马梅多夫很熟悉哈尔滨（十月革命后曾在那儿短时期地开过咖啡馆），但这次却留下来负责“中央”的工作。由普利什诺夫和博戈斯洛夫斯基领导的纽约的战友们在范德比尔特饭店与康涅狄格的代表团汇合了。普利什诺夫和博戈斯洛夫斯基暂时互相容忍了对方的出席。佩利的银衫党在纽约的代表约翰·约格汉·凯利也到场预祝首脑旅行顺利。佩利曾于1934年1月同旺夏茨基接

触过，建议聚会一次，但阿列克斯宁愿把一切会议推迟到他的环球旅行之后。凯利到范德比尔特露面可能反映了他的首领希望阿列克斯把他作为朋友——以至于家臣而记在心中。

旅行的始发地是纽约，乘火车驶往旧金山；3月6日，从旧金山乘金圆海运公司的范布伦总统号轮船开往檀香山、神户和上海。范布伦的乘客名册上是这样记载着这伙人的：“康涅狄格州汤普森，旺夏茨基伯爵和伯爵夫人以及孔利中尉。”

在离开旧金山前，旺夏茨基向几个记者炫耀地描绘了他的使命，包括他的预言，即日本将援助俄国法西斯进攻苏联。除了其他一些报纸外，3月7日的《俄勒冈晨报》也发表了他的这些讲话。这事件被日本驻波兰领事中村丰发现了，他及时地把这份剪报邮寄给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外务省很快为这个康涅狄格的伯爵所立的厚厚的卷宗中的各项材料里，中村传递的信息是最早得到的一项材料。

3月22日，范布伦总统号刚抵达神户，旺夏茨基便开始向一位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阐述他将投入150000俄国军队进攻苏联的计划。怀着对第二天的新闻报道感到喜悦的心情，阿列克斯带着马里恩和孔尔乘火车向东北250英里处的东京进发。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到来，罗扎耶夫斯基是从哈尔滨来迎接他的。

第 十 章

哈尔滨最高级会议

俄国法西斯主义已经取得了战术上的联合。

——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1934）
糖吸引着苍蝇。

——俄罗斯谚语

罗扎耶夫斯基也不是独自一人来到东京的。《我们的道路》宣传机构的领导人米哈依尔·马特科夫斯基与他同行。作为一名精明的战略家，马特科夫斯基在俄国法西斯党内有一批个人追随者，这对罗扎耶夫斯基在该党的领导地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但是，在与旺夏茨基关键性的第一次遭遇中，罗扎耶夫斯基需要马特科夫斯基的政治机敏。

罗扎耶夫斯基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哈尔滨会见旺夏茨基，是因为他想解决俄国法西斯党同全俄法西斯组织的合并引起的大量实际问题。日程表上安排在4月末在哈尔滨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将是庄重的但基本上是礼仪性的。同时，他很

想对这个与自己有相似的艰难经历的人作出估价。

从3月24日到4月2日，满洲的和康涅狄格的战友们在俄国法西斯党东京党部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中相互熟悉了。当地俄国法西斯党的代表瓦西里·佩特罗维奇·雷巴科夫充当了正式的东道主。经过许多小时的会议，两党明显地产生了分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妨碍联合。罗扎耶夫斯基坚持在新的党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俄国法西斯党的“各阶级合作”主义和反犹信条。旺夏茨基对各阶级合作主义的理论并不介意，但让他自己公开反犹却使他感到不安。此外，他想讨论反苏策略而不想“贩卖纲领”。完全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指导的罗扎耶夫斯基极力要求旺夏茨基与日本人以及他们的亲信哥萨克首领格里高里·谢苗诺夫靠近。旺夏茨基对此的答复是，眼下，他愿意使俄国法西斯的策略与日本的战略需要相协调，但无论如何不能同谢苗诺夫这个哥萨克恶棍进行任何合作。权衡了这些分歧，实用主义的考虑把罗扎耶夫斯基与旺夏茨基吸引到一起。尽管全俄法西斯组织对法西斯主义存有幻想，但却绝对缺乏俄国法西斯党所具备的力量。俄国法西斯党尽管有日本人的津贴，却迫切需要全俄法西斯组织的金钱。

为了解决这种僵局，旺夏茨基主动提出建立一个称之为全俄法西斯党的世界性组织的建议。全俄法西斯党将把俄国法西斯党的理论与全俄法西斯组织的策略融为一体，以便使它的远东部分与美国部分相协调。在得到旺夏茨基许诺以500000美元作为全俄法西斯组织对这次合并的开办财礼之后，罗扎耶夫斯基同意了这个无关紧要的抽象概念。

全俄法西斯党的组建使旺夏茨基得到了一个高级头衔，

也使罗扎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伙牢牢地控制了远东的活动。这个新党由八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来指挥，旺夏茨基任执委会主席，罗扎耶夫斯基任总书记。党的总部将设在哈尔滨。

1934年4月3日，会谈结果形成文字，并在横滨的新格兰德旅馆签署。这份文件称作“一号议定书”，它决定俄国法西斯党和全俄法西斯组织合并创立全俄法西斯党，这个党被说成是“取代苏联共产党”的“反共阵线”。

一号议定书遗留了两个未加解决的问题：是否与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合作和如何对待犹太人。目前，由于世界性的俄国法西斯党的存在，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令人兴奋的欢乐之中。舞台已布置妥当，旺夏茨基可以成功地进入哈尔滨主持一次被《我们的道路》吹捧为俄国法西斯主义者世界代表大会的会议了。

莫斯科甚至没有等一号议定书公布就谴责了它的作者。3月30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京的白卫军群像》的文章，文章痛斥了旺夏茨基，指责他企图把远东的白卫军引上纳粹的轨道——这种说法必然会引起柏林的苦笑。无论旺夏茨基与纳粹多么风马牛不相干，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称为德国的代理人了。

旺夏茨基于头一年的9月在柏林访问期间，那小心翼翼的态度束缚了他，使他没去找纳粹领导人。这次他不再那样小心翼翼了，他利用在东京的机会去会见了一个日本的显要人物荒木贞夫将军。一些俄国流亡者把向苏联开战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们的会晤是如何安排的，会晤的确切地点

与时间，会晤时罗扎耶夫斯基是否陪同旺夏茨基，这些问题都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康涅狄格的首脑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几次提到了他与荒木的会见，这次会见显然标志着他在远东逗留期间最为重要的活动。

1934年，荒木贞夫57岁时，他刚刚离开了他在日本皇军的权势生涯的顶峰，于当年1月辞去了陆相的职务。荒木有着矮小但挺直的军人身材，短短的头发，留着长八字胡，喜欢吹嘘日本“精神”，不断鼓吹对苏战争的必然性。这种花言巧语使他在前线军官中，在陆军士官生中，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文职人员中，享有盛名，但陆军省和中央总部的专家治国论者们发现他那注重精神因素的偏见并不符合现实，他那进攻苏联的倡议不成熟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这位反苏战争的预言家对俄国事务有丰富的阅历。十月革命前，他在俄国呆了八年，五年在圣彼得堡作语言官员和武官，另外三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俄国陆军参谋本部的联络官。在干涉西伯利亚期间（1918——1922），他曾当过哈尔滨特务机关赴俄战地谍报队的队长。这段经历使荒木结识了许多俄国朋友，并精通了俄语。回日本后，将军仍然喝俄国式茶炊烧的茶。甚至有人传言，这个日本精神的鼓吹者秘密信仰东正教。荒木对布尔什维主义深恶痛绝，因为在他的眼中，布尔什维克摧毁了他所熟悉和热爱的那个俄国。但是，他与苏联驻日本大使亚历山大·特罗亚诺夫斯基个人关系很好。

荒木对白俄很感兴趣，特别是对那些积极反对共产主义的白俄。他同情这些人的艰难处境，赏识他们对日本的潜在

作用。这位将军为这些白俄中的政治家们在协约国干涉俄国期间没有勇气接管东西伯利亚而感到遗憾。否则，日本就可以建立一个以傀儡国为形式的反革命滩头堡，永久地保卫它的北部边界。

这种想法可以说明为什么荒木在1934年4月初愿意会见旺夏茨基。伯爵与将军会谈的内容人们只能从旺夏茨基后来发表的谈话中加以推断。首脑回忆说，荒木保证帮助他的反苏阵线（全俄法西斯党），但不承担具体义务。会谈期间，显然大部分时间是旺夏茨基谈话，由于荒木将军的健谈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旺夏茨基的谈话取得了成绩。旺夏茨基保证说，俄国法西斯党在日益逼近的对苏战争中一定支援日本。在日本入侵西伯利亚之前和占领西伯利亚期间，他们将在西伯利亚人民中进行宣传。全俄法西斯党“突击队”将潜入西伯利亚地区，说服“农民和工人”把日本人作为国民革命的先驱来予以欢迎。把苏维埃赶出东西伯利亚后，日本人可以在从海参崴直至贝加尔湖的地区建立一个“白俄缓冲国”。用旺夏茨基的话说，“日本将在这占领的土地上进行统治和维持治安，直到国民党（全俄法西斯党）宣布可以把其所有权和权利移交给它自己的组织的适当时候为止。”荒木对这个方案并无反响，但旺夏茨基离开时确信将军对这个方案是赞同的。

如果旺夏茨基断定荒木一定会帮助他，那就错了。就在阿纳斯塔斯去哈尔滨途中即将乘船去大连之际，他得知满洲政府将不给他入境签证。他大吃一惊，日本人及其傀儡满洲国人不是他的同盟么？很遗憾，日本人的资料没有对这一事

态发展加以解释。也许东京告诫满洲国的外交部拒绝给旺夏茨基签证，是因为在苏日关系已处于薄冰上时他到哈尔滨散布日本支持反苏战争的言论将构成严重的挑衅。日本政府内部的反对派对此事施加了影响也是可以想象的。关东军与拓务省之间有一个关于他们在满洲国境内的权力范围的管辖权之争，这个争执持续不断。这个问题也可能仅仅是官僚政治中拖拖拉拉的办事程序的一例。

无论拒绝旺夏茨基入境的原因是什么，都使他气急败坏，他决定做一个放弃哈尔滨最高级会议的姿态。4月7日，他带着马里恩和孔尔一起乘胡佛总统号去上海。首脑预料他的愤怒离去将给罗扎耶夫斯基造成压力，迫使他去想点办法。

在这件事上，旺夏茨基想对了。4月8日，罗扎耶夫斯基到荒木贞夫私人住宅请求将军插手旺夏茨基的事情。他借此机会简要地向将军介绍了俄国法西斯党同全俄法西斯组织合并以及哈尔滨最高级会议在反苏斗争中的重要性。荒木回答说，他完全赞成俄国法西斯运动并同意给予帮助，但他没有直接谈及旺夏茨基。将军补充说，总有一天日本会同苏联开战的，他希望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对日本友好的“国民的俄国。”

罗扎耶夫斯基与马特科夫斯基抱着荒木会把这种想法坚持到底的希望于4月9日起程去大连。在横滨火车站，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在站台上向他的战友、行人和便衣警察发表了演说，宣称他与旺夏茨基的东京会谈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一个全球性的俄国法西斯党诞生了，日本保证支持他们使俄国免遭共产主义。

4月12日，罗扎耶夫斯基到达大连，他拜访了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罗扎耶夫斯基与旺夏茨基一样，对于同这个他认为不合时宜的哥萨克人合作的主意感到恼火。但日本特务机关却不这样认为，而罗扎耶夫斯基又无法背离“王道”。他自我安慰地想，或许谢苗诺夫在短期内毕竟是有用的，这个哥萨克首领在东京以及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总部所在地新京都有一定的影响。

罗扎耶夫斯基让谢苗诺夫为旺夏茨基的签证问题进行斡旋，借此机会试探一下他的能量。谢苗诺夫同意帮忙，他打电报给满洲国外务大臣，敦促给一个杰出的美国来访者以特殊的照顾。

谢苗诺夫和荒木插手此事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但满洲国政府立即给旺夏茨基发放了签证，而且关东军也把这位首脑称作重要人物。

此时，旺夏茨基还不知道为他所进行的这些活动，于4月10日到达上海，在华懋饭店登记了住房。那天夜里，他由于剧烈胃痛而病倒了。照顾这位首脑的是位犹太医生，这位医生在后来的几天中照料他恢复了健康。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旺夏茨基回忆说，此事使他深受感动。他对罗扎耶夫斯基产生了怀疑，认为罗扎耶夫斯基想毒死他。他反对全俄法西斯党纲领中的反犹太主义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旺夏茨基既然得到了可以去满洲国的通知，三人小组便于4月20日离开上海，乘青岛丸于4月22日抵达南满铁路的终点大连。如果旺夏茨基原打算直接去哈尔滨的话，他到达大连时却发现罗扎耶夫斯基对他另有安排。大连支部的头头

康斯坦丁·萨拉耶夫率领俄国法西斯党代表团的战友在码头上迎接他，并通知他当天晚上他将出席在当地俄国俱乐部特地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尔后，一个名叫谢尔盖·多洛夫的人站出来交给他一封罗扎耶夫斯基的信。如果这封信可信，它便是这两个人中唯一保存的通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同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和关东军的复杂关系。

全俄法西斯党中央执委会主席

旺夏茨基 收

俄国法西斯党总书记

1934年4月20日 缄

机密

俄罗斯万岁！

亲爱的战友！

趁您与孔尔到达大连之际，我们向您们致意。我愿通知您几件事情的进展情况，并表示某些可能性，对这些可能性您是会同意的。

当我到达大连时，我确信，在我到达东京前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给您的电报中的话是有可靠根据的。显然，谢苗诺夫与日本军界的关系明显地远远超出我原来的估计，在未来事态的发展中，日本军界人士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以下事情是谢苗诺夫办理的：

a、满洲国政府正式允许您进入满洲国，并通知了它在

东京的代表(遗憾的是那时我已离开了东京)。

b、大连当局已收到立即给您发放签证的指示，并且还发给特别文件，您可以到满洲国的任何地方旅行，无需签证。

c、满洲国政府在大连的一名官员将向您表示非正式的歉意。

d、日本宪兵队的一名负责人员将陪同您，以提供帮助。

e、在您经过时，大连——哈尔滨铁路全线将布置特别警卫。

f、警察处和宪兵队将为您的安全采取特殊措施。

g、最后，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代表将在新京接您，同您进行极为特殊的、十分重要的、绝对机密的会谈。

如您在信上所见，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做了多么多的工作。由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您对他4月12日从大连发给您的电报未曾赐复。为了我们事业的利益，您就说没有收到他们的电报，或者说您的回电他未能收到。

考虑上述事例，您无论如何不能直接前往哈尔滨，那会使有人认为您轻视谢苗诺夫将军。因此，我请求您作为一个朋友，在起程前同他进行会晤，然后去新京。您将在那里停留两天。谢苗诺夫将军也立刻乘飞机前往那里，如果需要，我也随后去与你们会合。在新京的两天中，您将同谢苗诺夫详细商谈，尔后，还要与关东军的

参谋们共同制定一项秘密计划。然后，您将于星期三到达哈尔滨。

鉴于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所期望的事情密切相关，而且认识到您将参加的会议的极端重要，所以我决定星期三在火车站为您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仪式，还要在俄国人俱乐部举行同样隆重的欢迎会。

由于这些原因，同谢苗诺夫达成一项协议是得体的，按协议让他带着他的全部哥萨克组织加入全俄法西斯党，并让他担任未来的法西斯军队的领导职务。

在访问大连期间，我们同谢苗诺夫讨论了关于他的组织与全俄法西斯党合并的专门条例的文本。这个条例的两个抄本现在在谢苗诺夫手里。据了解，这个抄本有待于修改、订正及详细重写，有待于您的同意。

此信由远东科的副科长多洛夫转交给您，他是俄国法西斯党最高苏维埃的成员之一。在我与马特科夫斯基离开哈尔滨期间，由他代理总书记的工作。他工作勤奋，我把他推荐给您，您完全可以信任他。请立即烧毁此信。

俄罗斯万岁！

致以法西斯的敬意

俄国法西斯党总书记
罗扎耶夫斯基

显然，旺夏茨基忽视了罗扎耶夫斯基最后的一点指示，没有把信烧毁，十之八九是因为他想把这封自鸣得意的信件保存起来。但他向多洛夫保证：当天晚上他会去会见西门诺夫并向当地的战友发表演说。

4月22日午后8点30分，大连俄国人俱乐部空前拥挤。当地俄国法西斯党的成员、记者和旁观者怀着好奇与希望而来。无法挤进正厅的人站在走廊上，伸长脖子向每扇门里张望，希望能看一眼首脑和他那富有的美国太太。

萨拉耶夫战友进行介绍后，旺夏茨基站起来讲话时，他的手发抖了。这里不是十九穴的军事室，而是真正的现实，是他在远东的首场演出，去哈尔滨演出前的一次彩排。在这里留下的印象关系到他名声的毁誉。阿列克斯竭尽全力来应付这个场面。他通过意味深长的停顿来加强他的歌剧男低音的音调，他以这种音调清楚地说明了反革命的法西斯方案。

旺夏茨基在大连的演说包括了在这次环球旅行的每一阶段再三重复的基本论点：共产主义使俄国堕落、贫穷到了爆发革命的边缘，但是，由于思想上不合时代，策略上不够协调，“白军”推翻布尔什维克的尝试失败了。国民革命必须“在祖国内外”找到一批同心协力准备同共产主义决一死战的俄国爱国者。只有法西斯分子能领导国民革命，因为他们体现了古老俄国的最优秀的传统，并且符合当代的潮流。他以战斗的口号作为结束语。

我们希望本地的全体俄国流亡者，俄罗斯民族的全体爱国者都加入这里的法西斯组织，以便于在决定性时

刻到来时，你在思想上将为推翻共产主义而执行任务有所准备。

《满洲日报》上登载的大标题为《法西斯分子筹划强大的俄国》的文章称旺夏茨基4月22日的讲演是“轰动性的”。文章没有提及有多少新成员聚集到全俄法西斯党的旗帜之下。

旺夏茨基在大连期间也许会见了谢苗诺夫，也许没有。据日本警察于4月10日呈送给内务省的一份报告记载，安排这次会议是便于全俄法西斯党的领导人同谢苗诺夫讨论他们的党加入远东哥萨克联盟的问题。但日本资料没有进一步谈到谢苗诺夫——旺夏茨基的会见。一般来说，阿纳斯塔斯喜欢谈及他与著名人物的交往，但对这次会面却例外地保持沉默。这两个人未必真的面对面相见了，如若真的见了面，其气氛也必然是冷淡的。谢苗诺夫为一些青年受到法西斯主义的诱惑感到痛惜。旺夏茨基公开诋毁白军的失败，这难以取得谢苗诺夫的欢心，因为谢苗诺夫在国内战争中曾经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自认为是远东白军事业的首脑。为了面子问题，双方都各持己见而不与对方交往。

4月24日，阿纳斯塔斯、马里恩和孔尔登上了南满铁路的快车前往新京。他们的路线是从关东丘陵地区穿过辽河低地到达满洲中部平原。在南满铁路终点新京，这一行人换乘中东铁路火车走完前往哈尔滨的最后150英里。

旺夏茨基是否象罗扎耶夫斯基信中所预计的那样在新京停留，与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代表“进行十分重要的、极其秘密的谈判”呢？日本和白俄的资料都未提及此事。甚至连旺夏

茨基也从未提过这样的谈判。关东军的司令官菱刈隆将军坐在总部与一个美国的旅游者(无论后者自命为什么人)谈论反苏战略，这有些令人难以想象。比较可能的倒是，当地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些俄国特务在把旺夏茨基送到他的同僚处之前对他进行了检查。

不管怎样，当罗扎耶夫斯基许诺说，大连——哈尔滨铁路沿线将加强保卫时，他并没有言过其实。确实，平板车的沙袋后面有成群的士兵，客车上有士兵来回巡逻。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没有告诉他的客人，南满铁路的火车上通常都载有这些警卫人员以防范遍及各地的红胡子。

旺夏茨基有一个私人陪同人员库尔布斯基，此人是《我们的道路》的记者。他们乘车向北行进时，库尔布斯基企图迫使首脑在计划、目标和意见方面表示态度。尽管阿纳斯塔斯经常信口开河，但在这种场合却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回避敏感问题的技巧：

库尔布斯基：您是怎样看待乌克兰问题的？

旺：这个问题需要特别重视，所以只能在全俄法西斯代表大会上解决。

库尔布斯基：您与俄国滑膛枪手全国组织(白俄民族主义的青年组织)的关系如何？

旺：我对旧金山的滑膛枪手组织很了解。我们的作用是相同的，旧金山的许多滑膛枪手已经加入了我们的组织。

库尔布斯基：您认为您将在哈尔滨停留多久？

旺：这取决于完成我们的任务所需的时间。

1934年4月26日，当旺夏茨基来到哈尔滨时，他的梦想看来就要实现了。罗扎耶夫斯基为在中心火车站给来访者以凯旋式的欢迎做了精心准备。他命令萨沙·博洛托夫尽量出动全部黑衫队，沿站台组成了一支仪仗队。他还动员了当地法西斯妇女运动、法西斯前卫队、青年法西斯联盟和法西斯少儿组织等单位。滑膛枪手代表团、哥萨克代表团和正统王权拥护者代表团也都到场。这五光十色的人群沿站台列队，欢迎一个几周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人。

下午2点10分，当这辆新京——哈尔滨快车进站时，这群人拥向轨道旁，渴望看一眼这些美国的来访者。阿纳斯塔斯出现在头等车厢门口时，人们高呼“万岁”的口号欢迎他。他小心翼翼地下到站台，看上去不像法西斯的首脑，倒更像个名牌大学的足球迷。他衣冠楚楚，身穿花呢运动大衣，里面套着羊毛背心，结着活结领带，歪戴着一顶浅顶软呢帽，只是对军队制服作了一点微小的让步——穿了件卡叽衬衫。孔尔看上去更为正统，身着军队剩余制服，佩戴卐字袖标，手提公文包。在丈夫与罗扎耶夫斯基互相呼喊万岁和敬礼时，马里恩端庄地留在不显眼的位置上。东道主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并向俄国法西斯党（后来的全俄法西斯党）中央执委会的成员介绍了旺夏茨基。旺夏茨基已经认识了马特科夫斯基、巴利科夫和多洛夫。现在，他与萨沙·博洛托夫面对面地相识了。

黑衫队站立在两侧，罗扎耶夫斯基和客人乘出租汽车沿

车站街到达南岗的俄国尼古拉大教堂。原计划在那里安排了一个铜管乐队，但日本当局反对这样做。在尼古拉大教堂，旺夏茨基进入西伯利亚圣母小教堂并点燃了几根长烛。然后，他们顺原路返回车站，穿过中东铁路，进入道里区，驶向霍夫曼饭店。

霍夫曼饭店说不上是哈尔滨的上等旅馆，但罗扎耶夫斯基不让他的客人住进该城的两家高级旅馆实在是不得已。位于中央大街177号的马迭尔饭店由于属犹太人所有，不在考虑之列。此外，该旅馆的主人约瑟夫·卡斯佩仅仅在4个月前得知，他儿子是被与俄国法西斯党有牵连的绑架者杀害的，很难指望他会欢迎一个法西斯的欢庆活动。属苏联所有的新哈尔滨饭店同样忌讳俄国法西斯党，尽管苏联人对尼古拉大教堂和日本军事代表团的看法良好。剩下的便是霍夫曼饭店了，这是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由于它紧挨着哈尔滨最时髦的夜总会凡塔西亚歌舞餐厅，从而部分地弥补了等级上的不足。

旺夏茨基在哈尔滨第一天的时间就安排得很紧。下午5点20分，罗扎耶夫斯基在霍夫曼旅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委托他的客人来圆满地回答关于俄国法西斯党同全俄法西斯组织的合并问题。在问及他来哈尔滨的目的时，他回答说：“为我们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设计一个总的作战纲领。”

当天晚上8点钟，旺夏茨基出席了在俄国人俱乐部为欢迎他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我们的道路》提前一小时印发了让党的忠诚党员集合的命令。早在开会之前，大礼堂里就已挤满了人。舞台上有一个讲台，一张长桌子和一些椅子，红、黑、黄色的旗帜围绕着一只巨大的双头鹰。当旺夏茨

基、罗扎耶夫斯基、孔尔、马特科夫斯基出现时，乐队奏起了俄国法西斯党和全俄法西斯组织的颂歌。然后，罗扎耶夫斯基说了几句开场白，听众们平静下来，听新首脑讲话。

旺夏茨基以重复他在大连详细讲述的话题开始他的讲话，这些内容是：白军运动的失败向俄国群众提出了要求，苏维埃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苏联国内危机的深化，以及迫切需要为准备国民革命建立一条反共流亡者联合阵线。尔后，他讲明了旨在争取农民的宣传要点：解散集体农庄，把土地分给个体耕种者，用国家资金援助贫苦的农民。他接着说，法西斯的宣传应避免抽象化，要致力于俄国“工农群众”的“日常需要”。他预言这种宣传：

……将使我们有可能为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全面斗争而利用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的全部潜在的革命动力，把所有俄国居民从反动的共产主义预备队转变成真正的法西斯革命的同盟者。

旺夏茨基注意到了与他同台的人，他表示，希望他对哈尔滨的访问能消除新近联合的法西斯分子中的“微小的摩擦”。他号召人们，为在与共产主义最后的决战中取得战斗的团结而“牺牲个人的抱负”。他用这个号召结束了讲演。据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雇佣的一个目击者说，旺夏茨基的话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讲演者对“微小的摩擦”没有详细说明，但听众明白他指的是犹太人问题。除了象马特科夫斯基等少数人外，俄

国法西斯党的战友们都发自肺腑地反对犹太人。旺夏茨基拒绝遵循这条路线，一方面是因为实用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旺夏茨基对犹太人问题的保留态度像一粒丸药，使罗扎耶夫斯基难以吞咽；但是，通过慷慨赠予金钱的许诺，这粒药变甜了，被吞了进去。旺夏茨基在哈尔滨期间，《我们的道路》甚至暂时停止了对犹太人的嘲弄。

只有少数旁观者心里明白，还有一个比犹太人问题更妨碍全俄法西斯党团结的“微小的摩擦”，那就是哥萨克首领格里高里·谢苗诺夫。罗扎耶夫斯基赞成（在日本人的劝告下）他担任未来白军部队的司令，而旺夏茨基认为谢苗诺夫只不过是个名声很坏的日本人的工具而已。

看来，4月26日的激动人心的欢迎之后，调子有所降低。马里恩去逛商店，罗扎耶夫斯基带旺夏茨基和孔尔游览哈尔滨，参观《我们的道路》办公室、一所为党培训宣传员和组织员的学校以及苏联领事馆的外观。5月4日，旺夏茨基在维斯米尔剧院向2000名听众作了讲演。第二天，他检阅了青年法西斯、法西斯前卫队和法西斯少儿队为他举行的阅兵队列。5月6日9点30分，这三位来访者登上了到新京和大连的快车；5月8日，他们乘青岛丸赴上海。

旺夏茨基看到报界注意到了他的旅行，并在地方报纸上找到了他的名字，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得到了满足，即使是敌对的文章也使他感到高兴。这位演出闹剧的首脑一直相信，苏联和日本的代理人从他离开十九穴起始终尾随着他。现存的日本档案表明，日本人只是一般地，而不是特别地注意他。旺夏茨基在东京比一个美国普通观光者引起的关注较

多一些。但与查理·卓别林1932年访问日本时比相差甚远。毫无疑问，苏联的代理人出席听取了旺夏茨基在大连和哈尔滨的讲话，塔斯社严厉地痛斥了全俄法西斯党，说它是德国的工具，但克里姆林宫是否认真地对待他还很不清楚。旺夏茨基并不明白这一点，但严密注视着他的行动政府可能就是他本国的政府（美国政府）。

美国官方从1922年起就注意旺夏茨基了，那时，柳巴·穆罗姆斯基从大西洋彼岸指控旺夏茨基犯了重婚罪，使得一些语言尖刻的文件在国务院和司法部之间传来传去。当阿纳斯塔斯在汤普森被豢养时，这种关注暂时中止了10年。1933年8月，当“伊万诺夫—克里夫科夫”的把戏引起了国务院东欧事务司的注意时，这种关注重新恢复。

1933年11月16日以前，旺夏茨基一直是一个令国务院烦恼的人，但是，11月16日美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外交关系之际，他突然成为一个问题。根据11月16日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交换的信件，两国都保证不允许旨在推翻对方政府的任何组织在其国土上组成和驻扎。按《法西斯主义者》的宣传，旺夏茨基的全俄法西斯组织不仅目的在于，而且实际从事于推翻斯大林的活动。但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司法部都未采取直接行动禁止他的活动，甚至没有对他进行调查。国务院东欧事务司司长罗伯特·凯利在亲苏人士中被指责对白军的活动熟视无睹，但很可能凯利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者》的宣传当回事，认为只是一派胡言而已。

然而，来自东京和上海的新闻报道终于迫使国务院于

1934年4月采取了行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弄清楚旺夏茨基——一个归化的美国公民——是否在为他的反苏运动谋求日本人的帮助。

5月3日，当阿纳斯塔斯正沉湎于哈尔滨的奉承之中时，远东事务司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给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发了一封“绝密”电报，要求“谨慎地调查和汇报阿纳斯塔斯·安德烈·旺·夏茨基和马里恩·里姆·旺·夏茨基的活动及去向，前者持有国务院1933年7月14日签发的国务院第53198号护照，后者持有国务院1934年1月11日签发的国务院第74421号护照”。美国驻北平的总领事埃德温·坎宁安把此项指令转寄给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及驻哈尔滨领事馆。在向东京都警察局的神户水上警察询问了旺夏茨基的航线及他在神户、横滨和东京住的主要旅馆之后，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只能向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汇报说“据谣传，旺夏茨基为了一些白俄或日本人组织的利益而旅行”。哈尔滨领事卡伯特·卡维尔知道得多些。在一名“可靠的白俄流亡者”的帮助下，他得以向华盛顿提供全俄法西斯党“最高级会议”的详细情报，包括旺夏茨基与罗扎耶夫斯基在犹太人问题上的不和。

格鲁和卡维尔只是在旺夏茨基已过了东京和哈尔滨后才收到国务院的命令。相比之下，当这些康涅狄格的旅行者于5月10日乘青岛丸第二次抵达上海时，坎宁安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指派来自财政部的一位使馆馆员尼科尔森监视这些人的行动。

在令人振奋的哈尔滨之行后，上海的情况却使旺夏茨基感到扫兴。他原指望激起当地白俄社会对他的联合阵线的狂

热激情。但上海与哈尔滨不同。这是大多数的俄国侨民更向往世界主义，很少着迷于反革命事业。而且，日本还没有控制这个城市。事实上，上海的日本当局，主要是外交官员，不像满洲国的关东军那样赞同公开支持反苏活动。

旺夏茨基在上海的东道主是一个俄国法西斯党的同路人扎伊采夫。他编辑了一份名为《言论》的坚定的亲日右翼报纸。扎伊采夫为首脑在属于每日新闻社(日本商办)所有的一个拥有1500席位的大厅中安排了讲演，讲演的题目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危机与俄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向所有的俄国组织和著名的流亡者印发了请帖。但在讲演前夕，日本领事馆人员对大厅的管理人员施加了压力，使之拒绝让旺夏茨基使用那个大厅，据说是因为他们避免激怒当地的苏联官员。旺夏茨基不但不取消这次演说，而是第二天在恩派亚大戏院重新进行了安排。当时他还邀请了曾光临每日新闻社大厅的人在华懋饭店的舞厅喝茶。

根据尼科尔森的报告，5月21日，旺夏茨基在大使馆剧院的讲演给人们的印象是“零”。听众们想知道在白军运动失败之处法西斯主义如何方能成功。尼科尔森报告说，相反，讲演者对他们“重弹”了陈腐的老调。即使是装模作样也掩饰不了这次讲演的老一套。听众们安静地听了50分钟，礼节性地鼓了掌。此后，上海的俄国人对旺夏茨基唯一感兴趣的便是他的金钱。

旺夏茨基在上海的努力并不是毫无收获，他结识了一个名叫康斯坦丁·斯特克洛夫的年轻人，此人为世界性俄国法西斯运动的理想所吸引，并与旺夏茨基一样，不同意让这个

运动完全从属于日本人的利益。这两个人成了朋友，在后来的七年中，斯特克洛夫成为旺夏茨基在远东主要的（实际上几乎是唯一的）真诚追随者。作为《俄罗斯前卫报》（1936——1942）的编辑，斯特克洛夫尽量使旺夏茨基抛头露面。这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差使，唯一能稍微减轻这种痛苦的是每年从康涅狄格获得600美元的津贴。

5月22日，三位来访者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欧洲。有关旺夏茨基环球旅行的后半部分资料很少，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国务院放松了对他的监视，部分原因是他自己也很少谈论这方面的情况。很清楚，他希望争取近东和欧洲白俄对联合阵线的支持。他也想认识认识自己的代理人，其中一些人他已经认识了，他还想在必要的地方指定新的代理人。

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阿纳斯塔斯对格奥尔基·塔乌别“男爵”表达了敬意，此人是全俄法西斯组织（后来的全俄法西斯党）在开罗的代理人。然后，旺夏茨基出发去那不勒斯。

虽然居住在意大利的白俄很少，但那里对旺夏茨基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那里有本尼托·墨索里尼。这位首脑直趋罗马，但没能见到“领袖”。意大利情报部门的一名“俄国专家”卡尔·博西不很热情地接见了，这使他感到满足。博西与俄国唯一可辨明的瓜葛是他是一位波尔多葡萄酒商的女婿，这个商人曾在圣彼得堡卖过红葡萄酒。博西怀疑旺夏茨基与日本人有联系（连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反共产国际的条约两年多以后才签订），对他很冷淡。旺夏茨基感到失望，但并不气馁。7月初，他到达巴黎，他觉得在那里他是有朋友的。

在旺夏茨基的感情上，巴黎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曾在那

皇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使他能
在13年中从福利斯—贝热雷歌舞场的一个拉幕人变成一个解
放俄国的世界性运动的富有的领导者。正是在巴黎，《一个君
主主义者的回忆录》使他第一次出了名；他为尼古拉二世皇
帝军事学院捐助资金，第一次尝到为慈善事业尽了力的甜美
滋味，也是在巴黎。

由于有这些天真的联想，旺夏茨基可以认为他在巴黎有
几个政治上的支持者。自从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
军于1930年被奥格别乌绑架后，他对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就
不再施加影响；一个对他较为陌生的，名叫叶夫根尼·米勒
将军的人取代了库捷波夫的位置。以巴黎为基地的俄罗斯青
年组织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卡泽姆—贝克自从两年前与旺夏
茨基在柏林见面以来，就对他没有好感。

1934年7月，阿纳斯塔斯到巴黎的主要目的是想使自己
轻松一下，并了解欧洲流亡者不稳定的政治状况。他在巴黎
有一些同他共同享受过美好时光的贵族朋友：费利克斯·尤
素波夫亲王、西奥多·罗曼诺夫亲王、丹尼尔·沃尔孔斯基
以及阿列克西斯·谢尔巴托夫亲王。曾经与旺夏茨基共同度
过了1930年和1932年夏季的建筑师西奥多亲王于1934年夏季
碰巧也在巴黎。阿纳斯塔斯半开玩笑地提出要雇他当两周司
机和警卫；西奥多由于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极有兴致地接受
了这个建议。不久，阿纳斯塔斯邀请丹尼尔·沃尔孔斯基和
谢尔巴托夫亲王在马克西姆餐厅用午餐，饭后，客人们应邀
乘阿纳斯塔斯的私人轿车出游。他们看见穿着号衣的罗曼诺
夫带着有礼貌的、稍微有些勉强的微笑为他们打开车门时，

惊得目瞪口呆，久久不能恢复平静。阿列克斯对此感到非常开心，但他对这件事引起的令人悲怆的因素并非无动于衷。

旺夏茨基在巴黎恢复了精力，又重新为联合阵线进行政治游说。其游说的路线是到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的主要俄国社会中去。他在每个地方只呆几天，与当地全俄法西斯党的战友取得联系，并发表一两次讲演就够了。他或多或少地重复在大连、哈尔滨和上海讲演的内容，每次露面都受到杂乱无章的接待。在柏林向2000名听众（主要是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发表演说后，他为热烈的掌声而感到洋洋自得。但在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当局禁止他在讲演中提及日本。此外，听众态度冷淡。贝尔格莱德的美国代办在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海底电报中报告说，一些听众感到旺夏茨基在“愚弄他自己”，而且看上去“有些醉意”。

旺夏茨基于1934年访问柏林时是否与纳粹高级人物有交往？阿纳斯塔斯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讲法是自相矛盾的。他对帕特南的至亲好友自夸说，他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他间接地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与纳粹官员没有联系。纽约警察局有关他的档案中装满了情报提供者的信件，信件上说他见到了希特勒、戈林、赫斯和罗森堡。

在这些矛盾的证据中，没有一件可以作为肯定首脑在柏林与人交往的证据。如果说旺夏茨基见到了第三帝国的高级人物，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艾尔弗雷德·罗森堡。整个1934年他都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外事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罗森堡对乌克兰事务特别感兴趣。也有理由设想，如果艾尔弗

雷德·沃尔德马罗维奇听说了旺夏茨基（他的旅行与讲话被广为宣传），那他至少会对这个企图讨伐苏联的富裕的从前的同胞有一点好奇心。如果说这两个人的确在柏林相聚，在一块儿喝了杯茶，就如旺夏茨基于1939年对一个记者谈及的那样，他们的见面也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的结果。就连象屈尊与斯拉夫人打交道的罗森堡这样的纳粹分子看来，阿纳斯塔斯也是太浮夸、太固执己见了。如果旺夏茨基更柔顺些，他就有可能像比斯库普斯基将军那样成为罗森堡的门徒或奴才。结果，盖世太保勉强容忍了旺夏茨基在柏林的讲话。他的党一年之后就在第三帝国被取缔了。

1934年8月，阿纳斯塔斯、马里恩、孔尔从马赛乘约翰逊总统号轮船前往纽约，阿纳斯塔斯可以心满意足地回顾他这五个月的奥德赛之行。第一个世界性的法西斯组织——全俄法西斯党——诞生了，以他作为首脑。他访问了在国外的俄国人最为集中的地区，见到了几十个流亡者领导人，招募了几百名追随者（当然是在金钱的帮助下）。他向几千人宣讲了法西斯主义者是怎样形成了俄国国民革命的前卫队的。他成了著名人物。孔尔的公文包中装满了证明这一点的报纸剪辑。法国一位著名的俄国问题评论家亨利·罗林在《时代》上称他是“俄国的希特勒”。以前他从未梦想过的一条法西斯联合阵线看来就要实现了。

旺夏茨基被宣传搞得飘飘然，忘记了他的胜利的脆弱性。但在1934年结束前，他所珍爱的联合阵线处于一团混乱之中，使他那流亡者联合的希望遭到破灭，把他进一步推进了一个虚假的世界。

第十一章

分 裂

对一个健康的政权的正常运转来说，反对派是不必要的。我们法西斯主义者就是要在内部消灭反对派。

——本尼托·墨索里尼

全俄法西斯党在刚刚诞生不久就发生了分裂，这并不怎样令人吃惊。全俄法西斯党成员之间存在着社会差异，地理上也很分散，在全俄法西斯党的纲领中还有尚未解决的矛盾，全俄法西斯党的首脑旺夏茨基和总书记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都怀着反复无常的利己主义，考虑到这众多因素，这个组织在哈尔滨最高级会议之后尚能维持它所维持的那样久，这倒是出人意外的事。的确，哈尔滨同帕特南的通讯联系很糟糕，致使满洲和康涅狄格州的“战友”之间不知道互相进行的诽谤，这很可能推迟了这种分裂。

1934年的整个夏季期间，全俄法西斯党处处表现出一副和睦家庭的样子。《法西斯主义者》和《我们的道路》狂热地谈

论全球的联合。3月，在哈尔滨新开办一所全俄法西斯党的高级党校，即人所共知的圣弗拉基米尔学院，或称斯托雷平学院。9月中旬，旺夏茨基首脑在十九穴接受《哈特福德新闻报》记者韦斯利·格里斯沃尔德采访时，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全俄法西斯组织与全俄法西斯党的“婚约”，使“从阿拉斯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满洲到柏林”的20000名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结为一体，形成了坚如磐石的力量，发展了一些新的法西斯基层组织，它们“犹如春天原野上的蒲公英，正在苏醒”，并且满洲有一支“150000人的大军”由他支配，等待着到苏联境内去进行渗透工作和宣传活动。

然而，在同志般的假相背后，旺夏茨基和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却彼此厌恶和互相蔑视。他们两个人都懂得，他们的合作从本质上讲是实用主义的，只有双方都能从合作中得到好处。这种合作才能维持下去。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贫穷，并且依靠日本人的恩赐。旺夏茨基富有，加上他的美国公民资格，使他更能独立。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因此对旺夏茨基心怀不满。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认为旺夏茨基是外行人，是无执照营业者，是侥幸攀上了一个美国女继承人的职业护花使者，而罗扎耶夫斯基自己却扮演了他的下属，他对此愤愤不平。至于旺夏茨基则发觉他的年轻同僚粗鲁而狂妄。在感到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的暴躁和忌妒之后，旺夏茨基越发下定决心向人们显示，他，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就是头头。旺夏茨基在其姐夫列夫·贝克·马梅多夫的影响下，对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的敌意更加深了。马梅多夫曾经在哈尔滨开过餐馆，深知这座城市的底

细。在旺夏茨基向他问起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这人怎么样时，马梅多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个无赖。”马梅多夫从未见过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因为在这个少年流亡者从海兰泡来的前一年，马梅多夫已经离开了哈尔滨。不过，就旺夏茨基来说，马梅多夫的话就是最终决定。

个性的抵触是损害全俄法西斯党内部团结的一股分裂力量。旺夏茨基和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在好几个问题上意见根本不一致。从直接方面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谢苗诺夫。

谢苗诺夫和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两人基本是对手。他们为了寻求支持者，在整个满洲展开竞争。谢苗诺夫这位哥萨克首领，一般说来在农村地区占上风（在那里他的人占优势），而罗扎耶夫斯基却在哈尔滨占优势。尽管他们都是反共分子，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存在尖锐的分歧。谢苗诺夫悲叹在俄国流亡者青年当中有人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号召；罗扎耶夫斯基却攻击哥萨克人的妄自尊大是犯了时代错误。他们两人的各自最终政治目标也不一样。罗扎耶夫斯基企图建立一个俄罗斯法西斯帝国；谢苗诺夫对地方的忠诚决定他按照建立一个自治的西伯利亚国家的思路来思考问题。

日本特务机关简直不能容忍在受它保护的人当中发生争吵，并且采取一些措施，迫使法西斯分子和哥萨克人解决他们的不和。1934年初，特务机关同哈尔滨的一些白俄组织的联络官秋草俊少佐，曾劝说罗扎耶夫斯基以后应该与谢苗诺夫合作。罗扎耶夫斯基拿着日本人的津贴，靠着日本人的支持，除了遵命照办而外，别无选择。

罗扎耶夫斯基为此在旺夏茨基4月间去东京的时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发觉自己在玩弄一种令人厌恶的把戏，即试图说服他的一个对手向另一个对手让步。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康涅狄格州的首脑对此采取回避态度。第一号记录和哈尔滨最高级会议都避而不提谢苗诺夫，以此来维持团结的假相。然而，旺夏茨基并不想让这事就此了结。罗扎耶夫斯基明白，他不能做到既对旺夏茨基妥协让步而又不损害日本主子的利益。

对犹太人的不同倾向性，也阻碍了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之间的合作。罗扎耶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分子。尽管旺夏茨基也不是没有这种感情冲动，但他不想疏远那些可能支持俄国法西斯运动的反共犹太人。他大体上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犹太人，他从哈尔滨回来不久就对一位记者说：“如果犹太人想要做我们的朋友和助手，我们会热情欢迎。”五年以后，他在接受另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把他的观点说得更加明白：

“喔，我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如果他们想要同我们一起走下去，那可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同他们斗。如果他们想要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作战，那我们说，行。俄国人的种族和民族太多了，不能让一个民族去打仗。它不象德国，在那里只有一个种族。

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停留在语言文字上。就象英

国法西斯主义者奥斯瓦德·莫斯利雇一个犹太拳师(“小山羊”刘易斯)来训练他的打手一样,旺夏茨基在纽约也聘请了一家犹太商号,专为他设计和裁制党服。1934年,纽约的俄文日报《新俄罗斯之声》的犹太主编马克·温鲍姆,同旺夏茨基在十九穴用了一夜功夫讨论他的报纸能不能作为全俄法西斯组织的宣传媒介的问题。按照旺夏茨基的说法,温鲍姆使汤普森感到有希望能设计出某种形式的合作。但是几天以后,他给这位伯爵写信说,合作是不可能的。阿纳斯塔斯推断,温鲍姆在他的同僚们的影响下改变了主意。其后多年,这位首脑继续对这个编辑“非常友好”。

个人的考虑和实用主义的考虑,使旺夏茨基对反犹主义持冷漠态度。他的第一个妻子柳巴·穆罗姆斯基就是犹太人。有一位犹太内科医生在上海照顾过他(据旺夏茨基说是救过他的命)。马里恩和孔尔在做环球旅行的不同时期都曾被称作犹太人。这些经验使旺夏茨基更加确信,种族仇恨同真正的俄国法西斯主义没有关系。

为了党的团结,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在哈尔滨最高级会议上暂时把犹太人问题搁置一边。《我们的道路》和《民族》都暂时停止了反犹的谩骂。在这些压抑因素下,罗扎耶夫斯基感到有些受挫。这从《民族》1934年7月号上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敌人从不错过在我们的队伍里制造纠纷的机会。他们发现了我们和“战友”旺夏茨基之间在犹太人问题上有一小分歧,就想要在这个问题上向我们煽风点

火。

然而，实际情况是，考虑到全俄法西斯党是在由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统治的美国运转这一实际情况，我们才判定目前提出犹太人问题为时过早……

和谢苗诺夫问题一样，暂时中止讨论并没有解决观点的根本分歧。两个人都不准备让步，使得闷在心里的争执早晚要爆发为公开的论战。

日本人在全俄法西斯党内部树立了另一支分裂势力。罗扎耶夫斯基必然紧紧跟着日本军官们在一起共事。如果不同秋草少佐或科斯加中村商量，他几乎不能做出任何一项政治上的决策。旺夏茨基生活在一个比较宽容的社会里，可以按他的天性处事而不必担心国家的干涉。虽然阿纳斯塔斯不反对让俄国法西斯的策略暂时服从日本人的需要，但在这种服从的程度和期限等问题上跟罗扎耶夫斯基的意见根本不同。这位康涅狄格州的首脑不打算像罗扎耶夫斯基那样，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或宪兵队的顾问的专横命令。正象他在1934年9月向一位记者披露的那样，他愿意承认，苏日战争爆发之后，俄国法西斯主义者将支持日本人，

一旦苏日间爆发战争，我们俄国法西斯主义者一定同日本人并肩战斗，因为日本是世界上能为我们的军队提供充足的武器和弹药的唯一国家，日本将从海参崴到莫斯科把布尔什维克切成碎片。

旺夏茨基赞成同日本保持事实上的有限联盟，但不
“王道”承担任何义务。

日本同俄国法西斯运动的关系的问题焦点也明显地落到了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的相互抵触的国民革命方案上。罗扎耶夫斯基的想像是靠外国人的刺刀把国民革命带到俄国去。而旺夏茨基正好相反，他坚决认为必须把俄国民众在外国人入侵以前争取到国民革命这方面来。根据旺夏茨基的意见，俄国法西斯分子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满洲替日本人效劳，而是在整个苏联的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宣传活动。正如他在1934年对《哈特福德新闻报》一位记者说的那样：

我从列宁和托洛茨基那里学会了关于造反技巧的基础知识。我们将采取的策略与共产党人的策略完全相同，与他们征服俄国的策略完全相同……我们将侵入俄国，但不是靠枪炮。我们的斗争工具将是深入工人和农民的头脑和心脏的语言。

旺夏茨基坚决主张国民革命必须发自俄国内部，而不可能由外部强加，或者“按照某个外国政府的指示来进行”。这话的言外之意很清楚。日本人的物资援助会受到欢迎，但日本人的政治上的操纵则不受欢迎。罗扎耶夫斯基私下也许会同意这种观点，但他却不能够公开这样说。如果他敢称日本是“外国”，那么特务机关会用一个更为顺从的被保护人来取代他。

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分裂的最终根源在于如何对待法西斯俄国中的贵族。罗扎耶夫斯基意识到散居在远东的俄

国人当中帝制派的力量，小心地修改了全俄法西斯党的纲领，为的是得到帝制派的支持。他虽然没有达到发誓要恢复罗曼诺夫王朝的地步，但用一些含糊的折衷的口号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至少那些想要看见这种可能性的人在心目中感到是如此）。旺夏茨基虽然有一些贵族朋友，可他并没有恢复帝国的想法，并且他把自己的主张表达得很清楚。1934年9月，他对一位记者宣称：“在法西斯俄国将不存在种种头衔，也没有种种特权。”在这位记者问起俄国流亡贵族不会喜欢这样的言论时，这位首脑回答这个问题的态度表明，他对过去的怀恋不超过十九穴的军事室和《法西斯主义者》上凹版印成的模模糊糊的照片所反映的怀旧的程度，他说：

我们没有问过他们〔俄国流亡贵族〕。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自愿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其他的人如果有意于此，我们也将乐意吸收为我们党的成员。然而，对他们来说，决不会存在恢复旧秩序的问题。

旺夏茨基认为，国民革命后的俄国要由一个像墨索里尼那样的具有领袖才能的独裁者来统治。尽管旺夏茨基出于谨慎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是了解旺夏茨基的人几乎谁也不怀疑他心目中堪当此任的人是谁。单是这一点就妨碍了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伯爵和来自海兰泡的小伙子的持久合作。

公开分裂

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的分裂，在全俄法西斯党内部

和谐一致的假象掩盖之下，经过1934年夏秋两季的酝酿，终于在12月戏剧性地突然表面化了。导致彻底破裂的“萨拉热窝”^①是一篇谈及谢苗诺夫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34年10——11月的第13期《法西斯主义者》上，题目是《他应该枪毙》。12月11日，《我们的道路》用全俄法西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谴责旺夏茨基并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以此予以回击。

《我们的道路》在一篇奇特的公告中放了一阵排炮，宣告全俄法西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2月8日召开了“紧急的特别”会议，讨论《法西斯主义者》对谢苗诺夫造谣中伤的问题，审查旺夏茨基自去年5月离开哈尔滨以来的所作所为。接着分条历数这位首脑的罪状：不按照第二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即哈尔滨最高级会议）所作的决议加强国民革命斗争；没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他同欧洲及北美法西斯组织的联系；“只注重吹嘘他自己而不作认真的宣传”；歪曲党的纲领和盗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权，在《法西斯主义者》上发表未经批准的文章攻击谢苗诺夫；企图“强迫全党甚至中央执行委员会放弃反犹原则”；“对他所担任的负责职务的重要性和党在划时代时期的目标的伟大性缺乏正确评价”。《我们的道路》上的这篇公告，最后宣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解除旺夏

①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检阅奥匈帝国军队演习时，被塞尔维亚秘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波斯尼亚”成员刺杀。奥匈帝国在德国支持下，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并于28日正式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萨拉热窝”在此处用来指引起全俄法西斯党内部分裂的导火线。——译者

茨基的首脑头衔，清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全俄法西斯党，并通知全世界的“战友”，今后只同哈尔滨联系。这一决议被列入定于1935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三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以便由全俄法西斯党全体成员批准。

旺夏茨基对《我们的道路》的攻势作出了反应。他在1935年1月号《法西斯主义者》上发表了他在1934年12月31日致罗扎耶夫斯基的“公开信”。他不理睬《我们的道路》的指控，他攻击罗扎耶夫斯基“背离”在横滨和哈尔滨商定的各项方针，显然那些方针都涉及谢苗诺夫和犹太人。同谢苗诺夫合作，不仅违反哈尔滨最高级会议的协议，而且威胁国民革命。如果像罗扎耶夫斯基计划的那样，指派谢苗诺夫指挥隶属于日本皇军的俄国军队，他就只会重蹈1918——1922年白俄的覆辙。旺夏茨基进而指出，俄国法西斯主义者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在苏联境内进行的革命斗争，并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看上去像是日本干涉者的傀儡。关于犹太人问题，旺夏茨基叫人注意哈尔滨最高级会议关于暂时停止反犹宣传的决定，并警告说，恢复反犹宣传“只会削弱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这个主要敌人的国民革命斗争”。

旺夏茨基继《公开信》后，又在《法西斯主义者》上开展了一场反对满洲“异端分子”的强劲运动。同时，他终止了给哈尔滨的汇款（这笔汇款还不到在东京允诺的50万美元的一小部分）。他委任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有马梅多夫、孔尔及其他一些他在纽约的老友（如叶夫根尼、博戈斯洛夫斯基、德米特里·西多罗夫），并继续采取行动，有如康涅狄格州的

汤普森已继承了俄国法西斯运动的首府的衣钵。

上述措施都没有使旺夏茨基摆脱在哈尔滨的不利地位。1935年6月28日至7月7日召开的第三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给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带来了个人的彻底胜利。在旺夏茨基及其支持者缺席的情况下，大会毫无异议地很快就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提议。200名代表分别来自满洲、关内、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叙利亚，其中包括罗扎耶夫斯基的婢娘，代表天津。他们投票剥夺旺夏茨基的首脑头衔和党员资格，并且选举罗扎耶夫斯基为首脑。大会在秋草少佐监视下，顺从地认可全俄法西斯党同谢苗诺夫首领及其远东哥萨克联盟的合作。

第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分裂，但并没有结束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之间的谩骂。从1935年秋季开始，《法西斯主义者》把罗扎耶夫斯基同俄罗斯青年运动的头目卡泽姆-贝克和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的头目米勒将军混为一谈，把他们看成是破产的旧白俄事业的残余势力。直到1936年，旺夏茨基还公开谴责罗扎耶夫斯基出卖俄国，让国民革命服从日本的“泛亚”野心。1937年2月，《法西斯主义者》使谩骂逐步升级，甚而认为黑衫队头子亚历山大·博洛托夫是杀害卡斯佩的凶手，并说这是罗扎耶夫斯基亲自下命令采取的行动。

旺夏茨基把罗扎耶夫斯基牵扯到卡斯佩案件中，显然是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在国际上的坏名声。自从尼古拉·马蒂诺夫和他的五个幸免于死的同案犯因为1934年10月的行动被捕以来，此案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已从一个利欲熏心的刑事案件变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案件。日本当局因为害怕他们与此

案的牵连被揭露，已把绑架者禁闭起来，而且根本不想审判他们。几乎是在单枪匹马地负责追捕拐骗卡斯佩的罪犯的法国驻哈尔滨副领事艾伯特·钱邦被公开宣布是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开满洲国。欧洲和美洲方面的不利报道，加上上海和纽约犹太人首领的强烈抗议，终于使东京方面加快了审判进程。第一次审判（1935年6月7日到12月25日）因审判长职务调动而中止。第二次审判（1936年3月23日到6月14日）在哈尔滨地区法院进行。在审判过程中，一个日本检察官竟激昂地为被告辩护。他们的犯罪动机被说成是由于政治上的目的引起的，即想要为俄罗斯真理兄弟会筹款。马蒂诺夫及其同伙被描绘成爱国者，“他们高举着反对一个世界性危险——共产主义——的旗帜”。但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被人们认为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中国法官竟判决马蒂诺夫、基里钦科、尚达尔、扎伊采夫死刑，判决科米萨连科和别兹鲁奇科无期徒刑，终生服苦役。《我们的道路》谴责这一判决，高呼被判刑的几个人是“神圣俄罗斯的烈士”，并为一封措词温和的请愿书征集了几千个签名，送给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亨利·溥仪。

结果证明，《我们的道路》的一连串活动都是多余的。日本当局很快就把这一案件上诉到新京最高法院。1936年7月，该法院的日本法官撤销了哈尔滨地区法院的判决。1937年2月，六名绑架者全部获释。马蒂诺夫又恢复了在哈尔滨市警察局中的职务。与此同时，从《真理报》到《纽约时报》都异口同声地发出一片义愤的声音。旺夏茨基正好希望利用对错误判决的普遍愤慨来反对罗扎耶夫斯基。但这一战术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大多数“战友”对一个富裕犹太人的被

杀不感到同情，而对罗扎耶夫斯基的卷入则认为是令人遗憾的但可以原谅的过分热情。相比之下，旺夏茨基却超过了界限而成了亲犹派，这几乎使他在全球法西斯党内得不到任何支持。

罗扎耶夫斯基显然是这场分裂的胜利者。全世界大多数战友声明他们支持哈尔滨而同汤普森断绝联系。远东的法西斯分子保留了全俄法西斯党这个正式政党的名称。同谢苗诺夫合作的姿态不管多么令人厌恶，却能得到以日本人的津贴为表现形式的直接好处。第三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使罗扎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领导地位充满了信心，无须再去理睬《法西斯主义者》的谴责。罗扎耶夫斯基也认识到，他的对手不怕臭名远扬而怕没有人理睬。因此他抑制住自己，对来自旺夏茨基的攻击不再作任何反应。1935年8月号的《民族》上宣布开除旺夏茨基，说他是光会说不会做、自我吹捧的人。此后，报刊上发表的涉及旺夏茨基的东西只剩下偶尔的笑料了。

旺夏茨基虽然被全俄法西斯党的首脑罗扎耶夫斯基击败了，但他手中还有两张王牌——金钱和想像力。这两者也能够塑造首脑的形象，尽管不是首脑的实质。他决心竭尽全力去使用这两张王牌。

补偿的幻想曲

为了反击从哈尔滨传来的关于旺夏茨基光说不做的说法，旺夏茨基为《法西斯主义者》设计了从1935年1月起的几期专刊。专刊被弄得看上去好像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秘密印

刷的一样。在追求时髦的标志（《法西斯主义者》这个名称被写成一个三角形）上首，写着这样一句口号：

红军战士们！

如果发生战争，

就把你们的刺刀插到地上！

这份报纸被认定是莫斯科全俄法西斯工农国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地下组织的报纸。莫斯科的《法西斯主义者》比美国的开本小，几乎没有什么照片，并且印刷在纸粕纸上（为使它有几分貌似在苏联出版的材料）。第1期刊登两篇文章，都是旺夏茨基撰写的。一篇的题目是《共产党给俄国人带来什么了？》（回答是：奴役、压迫和饥荒）。另一篇的题目是《法西斯主义者将给俄国带来什么？》（回答是：安全、昌盛、正义和自豪）。第1期的最后一页刊登一篇致俄国人民的宣言，要求他们不要相信布尔什维克有关外国国情的谎言，敦促他们为参加国民革命作好准备，成立法西斯的基层组织，阅读《法西斯主义者》报。这篇宣言的署名是“喀琅施塔得法西斯主义者”，狡猾地牵扯到列宁格勒附近的海军基地。那里的水兵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曾经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他们却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在十九穴刊印的“莫斯科版”《法西斯主义者》邮给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固定订户，用以说明旺夏茨基在苏联内部是多么活跃。若不是苏联当局把那份报刊拿到莫斯科去进行分析，究竟能否有一份寄到那里去都是值得怀疑的。

旺夏茨基不失时机地想要证明他的代理人在苏联境内确实很活跃。他声称对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说的“本世纪的罪恶”负责。这是指谋杀基洛夫的罪行。基洛夫是列宁格勒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据说已被选定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基洛夫是在1934年12月1日下午大约四点半钟，刚刚走出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党的总部之后不多一会儿被枪弹击中后背的。按照苏联官方对当时情况的描述，行刺基洛夫的凶手列奥尼德·尼古拉耶夫是代表已下台的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斯大林的“左派”反对派采取这一行动的。当时正过着流放生活的托洛茨基被说成是同谋者。也有些谣传，这些谣传只是在苏联境外公开传播，说是斯大林本人唆使了这次犯罪行为，为的是去掉一个受群众拥护、有可能同自己竞争的同志，并且给大规模清洗党内真正的和想像的敌人制造借口。

基洛夫事件为旺夏茨基提供了天赐良机：拔高他在全体散居在外的俄国人当中的形象，特别是拔高与他的主要对手罗扎耶夫斯基相比的形象。为什么不盗用列奥尼德·尼古拉耶夫作自己的代理人呢？因此，阿纳斯塔斯在《法西斯主义者》的版面上为尼古拉耶夫的功绩欢呼，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基洛夫的死是康涅狄格州的汤普森决定的。这种姿态并没有给罗扎耶夫斯基留下印象，但它确实为斯大林的目的帮了大忙。最后克里姆林宫得到了有利的材料来支持它的说法：受到外国支持的代理人同党的叛徒勾结在一起，正在从事暗杀苏联官员和破坏社会设施的活动。1934年12月19日，美国《工人日报》刊出了大字标题：“白卫军承认对苏联

领袖的暗杀阴谋。”《法西斯主义者》关于苏联境内进行谋杀和破坏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引用苏联《消息报》的话预言：“射向基洛夫同志的子弹”将会导致“法西斯恐怖分子的迅速消灭”。

可是，苏联的编辑们可能得到了政治局的许可，对于让旺夏茨基示众显得比消灭他更感兴趣。12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这个康涅狄格首脑的一张阴森森的照片，叫人注意他的反动的阶级出身（“宪兵队上校的儿子”）、他的反革命劣迹（“内战期间曾在白军中打过仗”）、他的富豪姻亲（“同美国的钢铁大王诺曼·里斯的女儿结婚”）、他同华尔街的交往（“同美国资本家有重要关系”）以及他们同“扶桑”的联系（“同日本军国主义者有密切关系”）。斯大林本人不能够虚构出一个更有用的鬼怪。旺夏茨基正好具有合适的阶级出身、合适的政治背景和合适的民族成分。克里姆林宫试图以合适的人物来编造它所需要的东西。唯有以各种条件混为一体的合适人物——旺夏茨基是这类人物的化身——才适于编造这种东西，这东西就是令人深信不疑的反对苏联的阴谋。

元首的地堡

旺夏茨基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他自己的恐怖主义代理人是幻想中的。然而，当他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时候，仅仅清楚这一点并不能使他得到安慰。阿列克斯把他自己看成是来自许多阵营的枪手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苏联纳卡夫德已把他记录在案，要予以消灭。罗扎耶夫斯基完全有可能派博洛托夫到汤普森来作一次跟踪追猎之行。而穆罗姆斯基家族

随时都可能从欧洲到这里来干掉他，因为他为了来到这个有人给生活费的理想的幸福国度而欺骗了柳巴。

旺夏茨基当众显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哈特福德新闻报》记者韦斯利·格里斯沃尔德1934年9月告诉他说：“你一定会意识到，你到处公开对共产主义宣战，使你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你甚至有可能被暗杀。”这位伯爵回答说，“在20000人当中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只要党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我个人无论出什么事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阿列克斯私下却非常担心他自己出事。尽管他非常喜欢公开露面，可是他父亲被暗杀的记忆总是萦绕着他。他反复思考自己卧病上海之事，越来越相信那是有人蓄意下了毒药引起的。

阿纳斯塔斯环球旅行归来不久，就作出决断：是应该采取具体办法保护自己的时候了。起初，他要求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加以特别保护，但这办法是难以办到的。接着他买来了防弹背心，但是这原来也是不令人满意的权宜之计。穿上防弹背心很热，又不舒服，还妨碍他打高尔夫时挥臂击球。这也妨碍向女人求欢并且会惹人暗笑。最后，他拿定主意，要使十九穴绝对安全，不致受到纳卡夫德的袭击。

旺夏茨基构想出设有内外防线的昆纳蒂塞特农庄。根据他和孔尔在1934年末逐渐形成的计划，应该让狗守卫四周环形防线，再巧用机关照顾中央棱堡。

1935年初，一窝德国牧羊犬品种的小狗崽在主仓南边新建的小围栏里定居下来。旺夏茨基把它们当作攻击型看门狗来训练，偶尔把它们的锁链解开，去攻击邻居迷路的家畜，

以检验它们技能的熟练程度。首脑十分喜爱他这群狗随从，他用马梅多夫每天从俄国熊餐馆带回来的当日的残羹剩菜为它们增加一次骨头餐。阿列克斯用他所钦佩的人的名字为狗取名。这一窝狗中的王后是一只灰色的母狗，被称作阿斯特夫人。

为了挫败已成功地突破了十九穴外层防御工事的未来刺客，旺夏茨基提出了一个堪与埃及法老陵墓相比的建筑设计。在最靠近主房而离枪炮陈列室最远的军事室北端，工匠们掀掉了那里的地板，留出一个豁开的洞口，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地窖，叫作牛奶室（从前附近牛奶场的奶牛所产的奶就贮藏在这里）。为了掩蔽这个洞口，沿军事室的北面修起了一道假墙，但留出一条进入这洞口的通道。修了通到下面牛奶室的台阶。台阶很陡，只有扶着栏杆才能走上走下。在台阶的上面悬吊着一个用制型纸做成的假楼梯。旺夏茨基想到下面去时，能把它提起来在它下面通过。不过，任何闯入的人想要下这纸板假楼梯，都会从这伪装楼梯坠落下去。发出响声，并摔得周身疼痛。

在楼梯脚下，旺夏茨基让木工把牛奶室改修成两个小办公室，只有从上面的军事室才能进去。紧靠楼梯底部的那间办公室里安放了一张桌子，上面覆盖着刻有阿·阿·旺夏茨基字样的饰板。那张桌子是孔尔的，他以大丈夫的气概自愿充当假目标。远一点的那间屋，只有通过孔尔的办公室才能进去，是一间至圣秘室。里面有一张桌子（没有识别主人姓名的饰板）、一个用大头针别着卐字图饰的废纸篓，还有一面饰以白色卐字的红旗。首脑把它叫作他的“幸运的约翰”，大概

因为它充当了最里圈的护身之物，像是一座神殿中的守护神。

纵然不很象贝希特斯加登那样坚不可摧，或者像威尼斯宫那样装饰华丽，十九穴作为一座堂吉诃德式梦想中的城堡，却是再好不过的了。对一个为了俄国法西斯运动的领导权而被赶到一边去的人来说，对一个意识到了权力和荣耀的外表同它的实质一样投合他的心意的人来说，十九穴就是一个理想的所在。在这个农村风味的乡间避难所里，旺夏茨基让自己沉浸在把俄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个人梦想之中，陷入了不加区别地把纳粹分子、共产党人和美国政府胡乱地搅在一起的意识活动之中。

与此同时，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正空前深沉地陷入同日本皇军的拥抱中，这种拥抱将决定他的命运。

第十二章

蔓 延

俄国法西斯团体明显扩大，已遍布整个满洲国。

— 日本驻满洲里的领事

(1936年11月6日)

在近代历史上，很少有几个十年像本世纪30年代那样，引起人们那么多不祥的想法。美国人在经济大萧条中迟疑不决，越来越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能够（或者甚至说是否应该）存在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正在从广播中倾听着从圣徒考夫林神父到共产主义总统候选人白劳德等预言家们的宣传。正当墨索里尼压垮埃塞俄比亚，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希特勒把莱茵地区、奥地利和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并入重新武装起来的第三帝国的时候，由于经济灾难而逐渐削弱的欧洲民主国家，由于政治上的争论而分崩离析的欧洲民主国家，由于实行绥靖政策引起的虚幻希望而进入催眠状态的欧洲民主国家，却自行退避。在苏联，斯

大林不可思议地指挥了抽去其党和军队的精华的内脏切除术，而那些滥竽充数的法官和纳卡夫德则把无计其数的人赶进劳动营而置于死地。日本受安全感变态心理的支配，受亚洲“新秩序”的救世主梦幻的迷惑，在中国陷入了一场长期战争，并准备同美国和苏联摊牌。

正当世界在朦胧中滑向同样可怕的边缘的时候，全俄法西斯党不断发展壮大。从1934年到1938年，其成员增加了一倍。在美国、欧洲和非洲的分支机构迅速得到发展，远远超过了对手旺夏茨基的组织网络。报纸、图书、杂志以及小册子，盛况空前地从这个党的印刷所发出，通过邮政渠道流向散居在外的俄国人所在的最偏僻的角落。在满洲国，这个党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高等院校都向年轻的俄国人进行思想灌输，要他们成为好战的法西斯分子。这个党获得了对白俄社会行使一定权威的委任统治权。

然而，全俄法西斯党并没有因为发展壮大而确保了自身的独立性。海外党的分支机构缺乏生存能力。在满洲国范围内，这个党从一小群无法无天的年轻人发展成为日本人的走卒，以此换取津贴和恩惠。大部分战友相信自己的口号，这些口号把自己当作白卫军的核心和解放俄国的国民革命先锋，但其余思想敏锐的人都意识到，俄国法西斯分子尽管有能力从事大量的破坏活动，但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傀儡。

扩大党的影响范围：俄国流亡者事务局

虽然全俄法西斯党在30年代初期可以利用黑衫队员威胁一般流亡者，但它对满洲国的80000俄国居民却没有“合法”

的行政控制权。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就在1934年4月第二次党代会之后的几个月，关东军提出了一项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无法拒绝的建议。

自1932年以来，在哈尔滨的日本军事代表团（它控制特务机关）一直在摸索对满洲国的俄国人行使更有效的控制办法。实际情况使这件事复杂化了。几乎一半的俄国人（1934年80000人中就有36500人）持有苏联护照，因此不在满洲国（日本人）的管辖之内。这36500人中有一些是苏联中东铁路雇用的“小萝卜”。然而，其他一些人，却都是非常忠于苏联而强烈敌视日本的人。余下40000多一点的人，都是“白俄”（大部分是满洲国的公民，但包括无国籍的难民），日本人就是想把他们组成一个恭顺的反苏实体。

从1932年到1934年，特务机关首脑板垣征四郎少将和他的参谋人员通过各流亡者组织的日本顾问，操纵了白俄，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哈尔滨。秋草俊少佐以特务机关和俄国法西斯党的联络官身份执行这项任务。

1934年末，特务机关逐渐形成这样的计划，即设立一个单独的机构，配备上授予广泛权力的俄国人来管理满洲国的白俄。当然这个机构要有一个日本“顾问”来指导工作。秋草少佐向罗扎耶夫斯基和米哈伊尔·马特科夫斯基提出了这个想法，很容易就说服了这两个人支持他的提议。

1934年12月28日晚上，在中央大街125号俄国人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集会。出席的是来自各主要流亡者组织（有正统主义者、武装部队联合会、哥萨克兵团）、哈尔滨市政委员会、满洲国政府、日本领事馆、几家报馆以及包括日

本宪兵队在内的地方警察机关的代表。会议是以讨论一个日本人表示愿意建立一个俄文图书馆为借口而召开的。然而，代表一齐集会场，与会的流亡者马上就猜到会有重大得多的事情尚未定案。

秋草少佐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不时地停下来，把他自己说的话翻译给日本人听。秋草少佐解释说，所有爱国的流亡者，如果真正想要把自己的祖国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话，都必须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在满洲国，这种团结将通过建立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去实现。

秋草停顿一下来观察他的话的效果。大家都很安静。他滔滔不绝地又继续讲下去。所有现存的各个团体——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团体——的成员，都要自动接受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管理。然而，这个组织不会成为任何小宗派的禁脔，它将是一个真正的超党派组织，由流亡者为了全体流亡者的利益而进行管理。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应该有自己的医疗所、餐室、图书馆和俱乐部。它应该从物质上给流亡者以帮助，给他们一种彼此休戚相关的感觉，教他们怎样在满洲国境内对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用“王道”教导他们，让他们对光复自己的祖国的划时代使命有所准备。

秋草接着转向一个就近坐着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宣布他要介绍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第一任局长韦尼亚明·韦尼亚米诺维奇·里奇科夫中将。里奇科夫是谢苗诺夫的老部下，不久前被授以全俄法西斯党“军事处”主任的名誉职务。就跟适合于拍照的俄国法西斯党前首脑科斯明一样，显然里奇科夫是被打算用来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里起装饰的作用。里奇科

夫1937年死后，先后有三个同样顺从的傀儡继他当了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局长。他们全都是“将军”，即阿历克斯·普罗克洛维奇·巴克谢夫(1937——1938)、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基斯利钦(1938——1944)和列夫·菲利波维奇·弗拉舍夫斯基(1944——1945)。

秋草少佐结束了他的讲话，在礼节性的掌声中就了座。会议没有进一步讨论就结束了。到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占领哈尔滨已经快三年了，有的适应性的流亡者对这位少佐的甜言蜜语退避三舍，猜测着一定有许多未明确说出来的情况。但当时，在听讲人当中没有几个人意识到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建立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行政机构包括七个处：(1)农垦；(2)文化事务，包括公众关系、教育和体育训练；(3)管理与规划，包括护照、执照及个人证件的发放；(4)财政；(5)福利；(6)法律事务；(7)军务，包括退伍军人的活动和对白俄青年的军事训练。为恪守秋草的诺言，行政官员都来自不同的流亡者组织以防止俄国流亡者事务局落入任何宗派的控制。然而，法西斯主义者同他们的同盟者担任了大部分关键性职务。罗扎耶夫斯基担任了俄国流亡者事务局连续几任局长的顾问，兼作第二处(文化事务)的首脑。马特科夫斯基主持关键性的第三处，发放居留许可证、就业卡片以及满洲国的全部白俄所需要的护照。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和列奥尼德·勒沃维奇·切尔内赫分别是第四处(财政)和第五处(福利)的首脑，他们都不是全俄法西斯党的成员，但受马特科夫斯基的影响。第七处(军务)先后由如

弗尔兹比茨基将军这样年纪大的沙俄军官领导。

所有的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官员都要对秋草少佐负责；秋草每隔一定时间同他们见面。哈尔滨日本军事代表团的俄国雇员伊万·安德里亚诺维奇·米哈依洛夫也是有影响的。米哈依洛夫以前曾任1919年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短命的鄂木斯克政府的财政部长。

到1935年中期，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在整个满洲国的白俄社会中开展了工作。在沈阳、长春、满洲里、海拉尔、瑷珲和绥芬河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当日军在1937年至1938年间占领了中国北方和沿海地区的时候，为了管理白俄事务，在天津、上海 当地日本军事指挥官的监督下建立了一些同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相类似的组织。不用说，在这些组织当中，全俄法西斯党的战友扮演了重要角色。

俄国流亡者事务局不仅对俄罗斯族人行使管辖权，而且对曾生活在原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的人也行使管辖权，如乌克兰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等等。这些非俄罗斯人加在一起的总数大约占满洲国“白俄”人口的百分之十。

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对1934年居住在满洲的36000多苏联公民根本不能行使权力。但在1935年，当日本把满洲国作为前方，购买了中东铁路的时候，上述苏联公民的人数陡然减少。仅在1935年夏季，就有25000多苏联公民归国。1936年末留在满洲国的只有5000人，而在1939年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许多红皮白心的“小萝卜”乐意中东铁路被转卖，他们好

转为“白”俄身份，从而落入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管辖之内。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白俄离开满洲国去上海、天津和北平等地。整个人口统计数字涨落的记录表明，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注册人数从1935年的42581人略增到1939年的45295人^①。

全俄法西斯党利用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里所行使的职权，不声不响地扩大了对满洲国白俄的权力，对中国白俄的权力也略有扩大。尽管罗扎耶夫斯基能够通过第二处对俄国人的学校施加一些影响，但是能够影响每个流亡者命运的正是第三处（管理与规划）的米哈依尔·马特科夫斯基。马特科夫斯基利用他的职权广泛收集有关满洲国内每一个白俄个人和企业的情报。所有年满18岁的流亡者都必须在他这个处登记。未经这个处的了解和批准，任何人不准搬迁、改变工作或者出门旅行。中东铁路在1935年变成为日本人的企业（称北满铁路）以后，马特科夫斯基兼任中东铁路的官员，审查所有可能成为雇员的人。许许多多拼命想逃出满洲国的人，除了向马特科夫斯基申请护照和旅行证件而外，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纳塔利亚·伊利娜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归来》中生动地再现了陷于满洲国的无国籍的俄国人进退维谷的困境。这些双重逃难者（最初是逃避布尔什维克，后来又逃避法西斯主义）懂得，他们只有求宠于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眼泪汪汪地保证忠于“王道”，才有可能获得逃走的机会。

① 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管辖下的白俄实际人数，事实上要更多些，因为上述数字只包括年满18岁的注册人口数。——原注

马特科夫斯基的同事第四处(财政)的首脑戈尔杰耶夫为流亡者从银行到报摊的商业活动建立了发放许可证的制度。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检查员为了查明这种法规的执行情况而往来于各商业设施间。

到1936年，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在军事代表团和全俄法西斯党共生关系的实质方面履行职责。日本人为“清匪”战役得到了新兵，并且在得知满洲国白俄正在其头领控制下遵奉着“王道”后更感到放心。全俄法西斯党获准把它的意志实际上强加给整个白俄社会。

俄国流亡者事务局也为全俄法西斯党和渴求占有更多的哈尔滨市场的日本商人之间的合作提供了组织机构。例如，1936年9月，俄国流亡者事务局指示所有贩卖俄国纺织品和杂货的商人一律从广岛商行进货。同年11月，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帮助日本人接管了满洲国的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零售商行秋林公司。罗扎耶夫斯基为这一行动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在《我们的道路》上连续发表文章，指控秋林公司的总经理卡夏诺夫是共产国际的间谍。

无论俄国流亡者事务局使全俄法西斯党扩大了多少权力，都没有对全俄法西斯党的偿付能力作出贡献。1937年以前，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收入来自许可证收费和彩票进款。哈尔滨军事代表团为俄国流亡者事务局每月提供10000日元(相当于3300美元)的津贴。这些钱勉强够支付行政人员的薪水和维持一个图书馆、一个出版机构以及沿松花江建起的水上运动设施所需的资金。全俄法西斯党不能够把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岁入抽到党内，只好采取一些其他办法应付，如收

党费(每月一满洲国元)、举办义演舞会、出售“反共斗争邮票”——全俄法西斯党版的圣诞节图章——以及指望得到日本人的津贴。究竟军事代表团给全俄法西斯党多少津贴不得而知。津贴数额可能年年都有所不同，但为数不可能很多。罗扎耶夫斯基住在一套小房间里，过着艰苦的生活，身上的衣服总是不换。

全俄法西斯党除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供职而外，还加入了日本人发起的叫做协和会的庞大组织。这个组织是应关东军和民间理想主义者的需要于1932年7月创立的。原来的宗旨是在“五族(满、汉、日、朝、蒙)协和”的口号下，动员人们忠于满洲国并抵抗少数民族的自国主义。这一组织成立之后，就吸收了满洲国所有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组织，并为每一个组织指派一名日本顾问，这顾问常常就是关东军的军官。然而，同发起人的意愿相反，这个协和会却逐渐地蜕变成了由关东军的官僚操纵的宣传机器和情报机构。这对罗扎耶夫斯基说来无关紧要，他欢迎在以哈尔滨为基地的协和会俄国科中求得一个适当职位的机会。

俄国科由一个名叫阿尤努马·穆楚米的享有很高荣誉的装饰品做科长。副科长嘉藤廉一负责同包括全俄法西斯党在内的一些流亡者组织的实际联络工作。罗扎耶夫斯基似乎赢得了嘉藤的信任，因为他成功地让战友维克托尔·阿布拉莫夫就任协和会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这位首脑在整个满洲国作演说旅行时直截了当地提到“全俄法西斯党与协和会的兄弟情谊”，打算在损害与之竞争的流亡者组织的利益的情况下，抬高这个党的形象。实际上，在协和会里面也有帝制派

和哥萨克组织的人，但这没有阻止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在口头上盗用他们的成员资格。

吸收新党员及全俄法西斯党与哥萨克的摩擦

发展全俄法西斯党党员人数的决心，经常萦绕在罗扎耶夫斯基的脑际。1935年5月22日，在全俄法西斯党成立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这位首脑声称，他已拥有20000名战友。这个数字可能把全俄法西斯党的力量夸大了三倍。但这个吹嘘的党员人数，在一年内确实在实际上达到了10000人左右。

这增加的党员人数，是苏联的中东铁路于1935年卖给满洲国后铁路雇员加入全俄法西斯党而自然增长的。由于马特科夫斯基负责发放北满铁路的工作许可证和接见求职的人，没有几个铁路工人敢于放心大胆地拒绝加入全俄法西斯党的邀请。

在30年代中期，满洲国的白俄中出现了人口流动，导致居住在农村地区的白俄人口比重增大。这种人口流动主要是由于农村出生率较高以及哈尔滨的商人和专业人员向北平、天津及上海等地大批迁移。罗扎耶夫斯基注意到了这种趋势，设法利用这种趋势来发展全俄法西斯党的党员。他利用他作为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第二处负责人的权力，要求整个满洲国界内分散的俄国人社的学校教师，在课程中采用法西斯教材。他还竭力在农村青年中吸收新党员。通过以上措施，很快就使全俄法西斯党发展到了可以同哥萨克人抗衡的程度。

几千个外贝加尔哥萨克人居住在一些小居民点，这些小居民点分布在从满洲里到绥芬河沿苏联边境的广阔弧形地带上。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随着1922年白卫军的崩溃，从西伯利亚和海滨地区撤到满洲国寻求避难的。他们带着家属和家畜而来，保持着内聚性，同其他的流亡者保持距离。他们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普遍的反共思想，除在1935年有一次短暂的却是流血的反对日本人的地方叛乱之外，坚持不问政治，和和平平地照料自己的饲养场。如果他们把什么人看作是天生的领袖的话，那么这个人最大可能就是格里高里·谢苗诺夫首领。谢苗诺夫住在大连，通过设在哈尔滨由贝克谢夫将军领导的远东哥萨克联盟与他的追随者保持联系。

历史环境似乎反复地把罗扎耶夫斯基和谢苗诺夫抛到一起，强制他们进行两个人谁都不情愿的联合。他们除了对共产主义的憎恨而外，很少有共同语言。谢苗诺夫梦想瓜分苏联，在外贝加尔建立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共和国。他怀疑罗扎耶夫斯基是一个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并反对他的法西斯主义，认为那是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有害迷恋。罗扎耶夫斯基则把谢苗诺夫首领看作是战败的白军事业的象征，一个毫无希望的迂腐而狭隘的乡巴佬。他们在思想上不一致，就个人而言有敌对情绪，迫于他们日本主子的要求才结成联合战线。自1934年以来，罗扎耶夫斯基就不断接到指示，要他解决同谢苗诺夫的分歧。这种劝告是难于忍受的，特别是旺夏斯基大骂谢苗诺夫时，刚好用了罗扎耶夫斯基自己喜欢用的那些话。

罗扎耶夫斯基由于处于被制约的地位而采取了狡诈的手

段。在第三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上(1935年6月28日—7月7日)。他为了说给与会的日本监听员听,保证和谢苗诺夫充分合作,而对他的心腹则吐露出他的隐衷: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暗中败坏这个哥萨克首领。

这位首脑的打算很快就变得明显起来。全俄法西斯党的征兵人员开始出现在沿额尔古纳河地带的哥萨克居民点,要求当地青年加入法西斯先锋队。不久,黑衫队员和哥萨克青年就在哈尔滨、海拉尔、齐齐哈尔和满洲里等地争吵开了。与此同时,全俄法西斯党和谢苗诺夫的官员就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内部互相攻击和指责。

关东军感到白俄的内部纠纷有损于“王道”精神。危害反苏计划,于是坚决制止,并命令他们永久和解。1937年11月22日,在几名日本联络官的监视下,全俄法西斯党和哥萨克联盟的首脑在哈尔滨的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办公室开会。头部有旧伤加上伏特加的作用而略有醉意的基斯利钦将军主持了这次会议。谢苗诺夫亲自从大连赶来。这位哥萨克首领同罗扎耶夫斯基坐下来,分别由巴克谢夫和马特科夫斯基作助手签定了一项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双方今后都要克制自己,避免激动,协调他们的反苏活动,保证未经双方同意,不同第三者结为同盟,要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内部和谐地工作。一位日本观察家把这项议定书说成是“法西斯——哥萨克盟约”。

1937年的法西斯同哥萨克的联盟是一种缓和手段。从表面上看,全俄法西斯党对谢苗诺夫的敬重都有些过分。《我们的道路》载文欢呼,拥戴这位哥萨克首领为“白俄国际”的支

柱。把他同墨索里尼、希特勒和荒木贞夫将军相提并论，说他们是“新人类的领袖”。1938年1月，全俄法西斯党甚至更名为俄国法西斯联盟，转弯抹角地表示出这个党走向普遍化的姿态。

但到这个时候，法西斯分子和哥萨克人同样都从他们的日本主子那里学会了如何摆出一副协调的共同阵线的样子。在这种假象的后面，以往的长期不和仍然有增无减。只要他们感到他们是在监视之下，就都表现得规规矩矩，一旦他们认为无人监视，总是故态复萌，争吵不休。

输出俄国法西斯主义，满洲的模式

当法西斯党的活动渐渐扩大到海外时，罗扎耶夫斯基同他的美国对手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相比，所处的条件就非常不利了。旺夏茨基富有的妻子和一张美国护照，使他能享有自由和灵活性。罗扎耶夫斯基却只能靠反复无常的日本人的津贴勉强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而且未经日本人的许可，就不能离开哈尔滨，更不用说越出国境线了。然而，这些不利条件并没有阻止这个远东首脑逐渐扩大其国际支持者。到1938年，他拥有的国际支持者远远超过了他的康涅狄格对手所拥有的。

1931年，罗扎耶夫斯基在开始认真考虑在满洲之外建立法西斯党的分支机构时，他首先就注意到天津和上海。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有很大的流亡者侨民区。但天津和上海也有一些特殊困难。这两个城市的外籍白俄更为具有世界性，拥有各国国籍，同哈尔滨相比，更不容易受法西斯宣传的影响，

不要提中国的主权，单是英国和法国享有治外法权的飞地，就限制了日本的势力，而罗扎耶夫斯基一直是依赖日本势力对一般流亡者施加压力的。

在上海有两个流亡者社团，都声称有权代表当地白俄。一个是俄国流亡者委员会，由前沙俄副领事梅兹勒领导；一个是俄国人联合组织苏维埃，由格列博夫将军领导。法西斯分子在这两个组织之间玩弄手腕，好不容易于1932年在上海露飞路（今淮海路）俄国法西斯党总部出版了一份《民族》杂志，以此方式为自己开辟了一块小小的地盘。无论《民族》在宣传方面可能达到了什么样的预期效果，它却很少能产生有血有肉的战友。对罗扎耶夫斯基在上海的代理官员佩尔米诺夫和斯帕斯基来说，当地条件对他们极不顺心。1935年，一个由旺夏茨基的远东代表康斯坦丁·斯捷克洛夫领导的可与之竞争的法西斯组织组建成功。斯捷克洛夫利用他的报纸《俄罗斯先驱报》像攻击苏联那样，大肆嘲笑全俄法西斯党。于是，为了解决罗扎耶夫斯基的问题，下台的前俄国法西斯首脑科新明将军来到上海，在俄国流亡者委员会中赢得一个席位，并立即给他从前的战友制造麻烦。但真正使罗扎耶夫斯基在上海丧失战斗力的是逃避满洲国“王道”的数以千计的白俄的毫不妥协的敌意。他们的反法西斯态度在上海不像在哈尔滨那样容易让日本人批准的报复行动的威胁压制下去。

罗扎耶夫斯基在天津的处境较好，那里的情况同哈尔滨的情况相近，特别是日本华北军在1937年8月占领了这座城市以后更是这样。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天津白俄侨民区由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一个复制品反共委员会管辖。反共委员会

交给一个叫帕斯图欣的酗酒的哥萨克人负责。帕斯图欣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新闻记者；他也确实编辑了一份亲日报纸《亚洲之新生》。他的合作编辑乌沙科夫同时领导全俄法西斯党在天津的支部。乌沙科夫和他的助手卡拉米舍夫能够利用他们同帕斯图欣的友谊对反共委员会施加影响。因为住在天津的流亡者不首先从反共委员会获得证明，就不能领取护照，所以有许多进行威胁和强迫捐款的机会。罗扎耶夫斯基的婶母佩特洛娃住在天津，尽管身份不明，但看上去在党务方面很积极。

全俄法西斯党除了它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外，从北方的桦太岛(南萨哈林，也就是库页岛)，到南方的鹿儿岛，在整个日本都有它的代表机构。全俄法西斯党桦太岛支部由一个名叫塞盖·列科恩热夫的男子服饰用品商负责，因为在整个桦太岛只有72名俄国人，所以没有更多要说的。克·布·扎布欣领导下的全俄法西斯党神户支部，自称有好几十个战友来自天津市人口比较稠密的俄国侨民区。东京支部因为最接近陆军省和帝国本部，理所当然被看作是仅次于哈尔滨的最重要的支部。办公地点设在本乡街尼古拉东正教大教堂附近。从1932年到1936年，瓦西里·佩特罗维奇·巴利科夫在东京代表全俄法西斯党，同像荒木贞夫将军这样的日本保护人及极端民族主义的黑龙会保持联系。1934年4月，巴利科夫主管了当地为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会面所做的各种安排，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段经历。1936年，尼古拉·基普卡耶夫接任了巴利科夫的职务。他又是一个同时为皇军参谋本部俄国科工作的神秘人物。

早在1932年，罗扎耶夫斯基就想把他的党派活动扩展到欧洲和美洲去。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愿望，使他在1933年写信给旺夏茨基，建议双方联合起来。1934年12月，在把旺夏茨基开除出全俄法西斯党的时候，罗扎耶夫斯基冒失地企图接管他在欧洲的和美洲的代表机构，便发布了一项公告，命令所有海外分支机构断绝与康涅狄格州的联系，只能同哈尔滨联系。

出于同旺夏茨基的个人友谊和期待他慷慨的援助，许多全俄法西斯党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对执行罗扎耶夫斯基的命令犹豫不决。然而，一旦舆论的倾向性明朗化，旺夏茨基的财力又明显受到限制，大多数战友就撇下了这位美洲首脑而选择了远东首脑。在第三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1935年6月至7月）上，德国、澳大利亚、叙利亚、南斯拉夫、爱沙尼亚以及芬兰的全俄法西斯党代表函告大会承认罗扎耶夫斯基的领导地位。

罗扎耶夫斯基因为贫困和日本人的限制而不能出国旅行。他就通过信函在各大洲几乎每一座有俄国侨民的城市建立法西斯党的分支机构。在当地挑选合适的领导人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他几乎不可能亲自同候选人会面。任何一个愿意零售《我们的道路》的人，都有资格成为法西斯党的普通成员。可是为了分支机构领导人这样的岗位，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却要寻找有进取心的、有表达能力的宣传人员。这样的人要能演讲，并能吸收新的追随者。大多数流亡者社会，都设法提出了至少一个候选人。1938年，远东以外的法西斯的代表有伊·普·罗杰斯特文斯基（澳大利亚的

布里斯班)、特·德·杨诺夫斯基(纽约的布朗克斯区)、谢尔盖·佐洛特尼特斯基博士(巴西的圣保罗)、鲍里斯·厄恩(巴拉圭的亚松森)、米哈依尔·列兹涅夫(布宜诺斯艾利斯)、伊·弗·雷奇科夫(贝尔格莱德)、克·普·孔德列耶夫(索非亚)、阿·斯·米海洛夫(布加勒斯特)、弗拉季米尔·谢利克霍夫(华沙)以及叶·夏尔斯卡娅夫人(巴黎)。在中东,法西斯党设有“巡回大使”。在“巴勒斯坦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口号下,他活动在伊斯坦布尔和开罗之间,向《我们的道路》快件发回声讨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法西斯党的政策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其前提是他们和白俄的命运相同,都是被“国际犹太人”赶出了祖国。

罗扎耶夫斯基极其重视在意大利和德国建立法西斯党的代表机构。他把罗马和柏林看作是法西斯的圣地,感到在这两个地方哪怕只有一个徒有虚名的全俄法西斯党的代表机构,也会给全俄法西斯党增添精神力量和政治上的正统性。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曾梦想有那么一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同日本联合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如果在那个重要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柏林和罗马还没有战友扎根,那么他将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但他一想到旺夏茨基可能就近取得全俄法西斯发言人的官方地位时,就不寒而栗。

罗扎耶夫斯基经过好几年耐心的准备,才得以在意大利建立起一个全法西斯党支部。尽管墨索里尼同日本并非不友好,但是在其他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他迟迟不准许承认满洲国。与此同时,罗扎耶夫斯基以一种不失于取悦意大利人的方式灵活进行他的宣传,推测着意大利人当中总会有人

看到这种宣传。《我们的道路》和《民族》称赞“领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民族领袖。在1935年到1936年间，这两个出版物都为埃塞俄比亚战役叫好，谴责国际联盟干涉意大利的“民族命运”。

罗扎耶夫斯基为拉关系所作的努力，在罗马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1937年11月6日）并同满洲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37年11月29日）以后不久就结出了果实。1938年春，一批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官员访问了满洲国。罗扎耶夫斯基趁他们在哈尔滨的机会安排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这件事发生在4月29日，正值裕仁天皇的诞辰。这使招待会具有了双重意义。这位首脑向与会的每一个位高职显的人行法西斯礼，首先向意大利驻满洲国大使贾科莫·保卢奇侯爵行礼。两个月内，全俄法西斯党（到那时已更名为俄国法西斯联盟）在罗马已有了一个代表，名叫德米特里·罗迪奥诺夫，是科洛内蒂大街“俄国人圈子”的首领。这个“俄国人圈子”只有极少的成员，但即使同这个“不朽城”只有一种象征性的联系，也使这个来自海兰泡的小伙子心满意足了。

虽然在给第三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发来支持信函的国家中也包括德国，但全俄法西斯党在第三帝国还没有一名代表。在30年代中期，俄国法西斯党在第三帝国的开创工作，对罗扎耶夫斯基的智慧和才能提出了严重挑战。纳粹党的种族主义把斯拉夫人说成是劣等民族，从生物学角度看，不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希特勒藐视斯拉夫人的民族性。他在《我的奋斗》中断言，俄国人昔日的伟大品格的基础是革命前统治阶级中的日耳曼人成分。艾尔弗雷德·罗森堡是俄罗斯

出生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外交政策办公室首脑，流亡者把他看成是一个潜在的保护人，甚至连他也偏爱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乌克兰分离主义者，而不喜欢俄罗斯人。因为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和乌克兰人主张独立的愿望，符合他的瓜分苏联的梦想。全俄法西斯党除在第三帝国遭到冷遇和敌视而外，还面对着已经建立起来的如“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全国劳工联盟”这样的右派流亡者组织。可以料想，这些组织不会满意另一个祈求元首恩宠的人闯进来。

然而纳粹党卫队的确对满洲国的俄国法西斯分子发生了兴趣。1935年10月18日，俄国事务专家、党卫军部级指挥官奥托·布劳蒂加姆博士向海因里希·希姆莱提出一份关于世界各地流亡者政治组织的报告。布劳蒂加姆对全俄法西斯党的分析，暴露了这份报告是敏锐同误传的奇妙混合物。他说全俄法西斯党由罗扎耶夫斯基“公开”领导，而由谢苗诺夫首领“秘密”指挥。不过，他把全俄法西斯党的特点归结为“日本参谋本部的工具”，这还是非常准确的。

当时，盖世太保和特务显然没有看出全俄法西斯党有直接搞颠覆活动的潜力，因为1936年罗扎耶夫斯基终于被允许在柏林的瓦尔茨堡大街设立一个“全俄法西斯党”的德国小组。科兹洛夫斯基被任命为当地的代表。1937年，一个前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阿韦尔基耶夫接任他当代表，并把全俄法西斯党分支机构的驻地迁到霍亨佐伦达姆。

纳粹分子对全俄法西斯党的宽容，可能出于实际上的考虑。1936年6月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官员（按日本的文献记载，此人叫欧文·冯·舒尔兹）访问了大

连、新京和哈尔滨，会见了如罗扎耶夫斯基和谢苗诺夫这样的流亡者首脑，以便测定满洲国白俄的反苏潜力。舒尔茨在柏林可能为全俄法西斯党说了情。设在斯图加特的德国奥斯拉学院可能与全俄法西斯党获准在帝国境内活动有关系，这也是可以想像的。德国奥斯拉学院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的助手，其力量是用在同国外日耳曼种族的人保持联系。1939年，居住在亚洲的197000日耳曼种族的人当中，有306人居住在满洲国（其中152人居住在哈尔滨）。几乎所有的满洲国的外籍日耳曼人都来自从前帝俄时代的波罗的海省份，所以他们都要受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管辖。既然俄国法西斯分子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内有权有势，奥斯拉学院很可能通过对德国的有关当局施加影响，默许全俄法西斯党在柏林设立分支机构，以此来求得俄国法西斯分子对日耳曼人的好感。尽管这种联系是推测出来的，但苏联《消息报》在1937年6月指责斯图加特学院支持俄国法西斯分子时，就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除在各国首都任命当地代表之外，罗扎耶夫斯基想要一名在需要时能在欧洲各地代表他采取行动的巡回总管。他终于发现一个叫波里斯·彼得罗维奇·特德利的人是渴望担任这个角色的候选人。

特德利属俄国人和德国人的混合血统，1901年出生在基辅，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他一直怀着学习医学的志向。其后他在瑞士伯尔尼做了报纸撰稿人，辛苦工作度日。20年代期间，特德利对俄国乃至他本人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和愤怒，从而陷入了反犹的人世悲剧之中。他很快接受了右派流

亡者社会的流行观点，认为犹太人一直支持十月革命。他渐渐变成了《犹太长老会谈纪要》和艾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的信徒。他赞赏地看着希特勒的兴起，于1933年6月宣称自己是在瑞士的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者领袖。事实上，只有他和另一个鲁里翁·科特泽比尤耶两个人。后者30岁，是满洲出生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住在洛桑。从1933年到1936年，这两个人通过去第三帝国朝圣——多次出席爱尔福特的反犹大会和在纽伦堡的纳粹党集会——以此抚慰他们孤独的灵魂。

至于罗扎耶夫斯基是如何同特德利联系上的，人们只能推测罢了。但有一点很清楚，即他们的需要是互为补充的。他们各自都企图塑造一个席卷欧洲的强大的俄国法西斯组织的形象，尽管实际上这种“组织”的构成要素不过是几个附属于大船的供应小船般的办事处、几纸匣小册子以及几印张邮票。

1936年4月，特德利作为全俄法西斯党的“欧洲首脑”开始为该党供职，并且很快就显示了他的用处。他答应罗扎耶夫斯基向盖世太保提供控告旺夏茨基的材料。特德利实际上是否同盖世太保在德国镇压旺夏茨基的一小撮追随者有联系还值得怀疑，但哈尔滨方面看起来很高兴。1938年1月，罗扎耶夫斯基提升特德利做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欧洲和非洲”领导人。

特德利利用他来头不小的头衔，从伯尔尼迁到柏林，让科特泽比尤耶一个人留在瑞士继续坚持下去。在柏林，波里斯·得罗维奇整天忙于想法傲视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脑伯蒙特·阿瓦洛夫，满怀希望地指挥着从开罗伸向哥本哈根的一个虚无飘渺的选区里的全体居民。

第十三章

远东风格的国民革命

全俄法西斯党已经宣布了法西斯的三年计划。这意味着，到1938年5月1日（不迟于并且很可能大大提前），苏联共产党在国内外打击下将不复存在。

——《我们的道路》，1935年11月7日

到了30年代中期，全俄法西斯党在四个不同方面进行活动。第一，它是一部宣传机器，出版一份报纸、一个理论刊物和一些小册子，开办学校和俱乐部，主办演讲会、广播无线电节目，保持住海外分支机构，以争取对散居国外的所有俄国人具有最大的能见度。第二，它是一个管理机构，帮助日本当局通过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对满洲国的白俄少数民族实行控制。第三，它是一个“满洲黑手党”，从事吸毒、卖淫和为了日本宪兵队某些个人的利益而进行绑架和勒索活动。最后，在第四方面，它是一个特务组织，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吸收、训练和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打入苏联境内。

进行第四方面的活动，使全俄法西斯党成员遭到最大的

生命损耗。许多年轻党徒为俄罗斯的爱国心所冲动，不喜欢共产主义，被派往外贝加尔和滨海地区之后未能生还。这样的战友究竟有多少永远也不为人所知。只是在1939年之后，一些幸存者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他们不是国民革命的突击队，而是日本陆军情报处可供牺牲的天竺鼠。

白色游击兵

1922年，俄国国内战争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结束。其后不久，白色游击兵开始从满洲基地侵入阿穆尔和滨海地区。这些团伙人数都不多，每一团伙大约在二三十人上下。其中有些团伙是由海参崴周围的农民组成的。他们是十月革命后到满洲国定居在绥芬河这样的一些城镇附近，离开他们从前的家乡只有几英里远。另外一些团伙是由曾经在高尔察克或谢苗诺夫部队服役的退伍军人（战士和哥萨克骑兵）组成。这些白色游击兵由于给养不充足，行动不协调，只是在接近满洲边境的人口稀少地区漫无目的地进行活动。如活动在兴凯湖周围地区（在海参崴正北）、伊曼的乌苏里江沿岸和伯力与海兰泡之间的黑龙江沿岸，以及渡过额尔古纳河到尼布楚（俄文名叫涅尔琴斯克）和斯列坚斯克。白色游击兵只不过是暂时占领一些孤村，杀死几个“政治委员”，此外很少有其他活动。实力越来越强的苏联格别乌边境部队和特工人员使白色游击兵的行动受挫。苏联格别乌特工人员潜入满洲是为了暗杀白色游击兵的头目。高死亡率降低了，但并没有排除。年轻的自愿兵为了有机会返回祖国和打击他们所憎恨的布尔什维克而随时准备承受任何风险。

20年代期间，许多个人都想把这些彼此没有联系的一个个团伙组成统一的游击兵运动。哈尔滨挤满了自命的统一者，各自都声称只有他自己才具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和资格。来自巴黎的苏伯特是最高君主主义委员会派来的。萨哈罗夫将军坚持认为他代表了前俄国部队司令官兼沙皇皇位觊觎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本人的意志。基地设在柏林的俄罗斯真理兄弟会也有在哈尔滨的积极分子德米特里·科斯明将军。由姆·克·季泰尔赫斯和格·阿·弗尔兹比特茨基二将军率领的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远东分支机构则认为，组织白色游击兵战线是他们独占的特权。这些自命的统一者当中没有一个获得成功。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拒绝彼此合作，其次是因为当地的白色游击兵首脑们并不信任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把意志强加给所有远东白色游击兵，进而把他们变成为日本人大陆战略的工具的，不是任何俄国领导人而是关东军。

早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军队就已经开始在西伯利亚进行谍报工作，当时伪装成中国工人和朝鲜工人的间谍收集了有关正在建设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进展的情报。在日本妓女当中也有一些特务在铁路设营地和黑龙江的一些港口从事这种勾当。西伯利亚已经有了它自己的真田针——海兰泡的迷人美女尾菊。此时，日本在西伯利亚的情报任务带有某种异乎寻常的英雄色彩，特别是福岛康正上尉的活动带有这种色彩。他独自骑马从柏林来到海参崴(1892—1893)，经过乌拉尔山和外蒙古，然后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而下到日本海。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的“英勇之士”和“大陆探险家”(其中

许多人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黑龙会^①的成员)，袭击俄国远东地区，进行掠夺，有时同军队当局分享他们的所得物。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干涉(1918——1922)为日本军事人员对外贝加尔、阿穆尔河以及滨海地区进行侦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尽管这次干涉最终在国内变得不得人心，并且在外交方面对日本来说是一种损失，但它留下了一代西伯利亚问题专家。这些专家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在皇军参谋本部第二处(情报处)俄国科和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服务。日本部队可能在1922年撤离了海参崴，但特务机关的特务们(其中一些人是中国人和白俄)却继续在苏联国土上活动。

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实际上从1918年刚成立时起就招募流亡者来执行谍报任务。到了20年代末，白俄渐渐显示出具有比较大的潜力而不仅仅是做情报收集者。1928年，上田方种少佐草拟了一项白俄在苏联远东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计划。然而，这个特务机关在关东军1932年占领哈尔滨之后才大批地吸收俄国人。

1932年，哈尔滨的特务机关被改成针对苏联的皇军情报和反情报活动的战地指挥部。新任命的特务机关长小松原陆太郎少将是1927年到1929年间一直驻莫斯科的武官。他上任后立即向弗尔兹比特茨基将军提出在日本人指挥下把所有白

① 黑龙会流行的英文名字叫“黑色之龙协会”，这是令人费解的，其实它是“黑龙江协会”之意。由内田良一和葛生元三郎创建于1901年。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一样，黑龙会推动日本人向黑龙江扩张。

色游击兵团伙统一起来的建议。这个计划由于诸方面的原因而失败了。基本原因是特务机关想要把白色游击兵变成一些间谍——大概是弗尔兹比特茨基不能支持的什么格斗者之类的人。同时，至少在这个阶段，弗尔兹比特茨基也不乐意丧失他对日本指挥官的独立性。最后，小松原将军不久就意识到了，使这个由分散在满洲国境内各地的农民、哥萨克骑兵和沙皇部队退伍军人完全自发形成的组织协调起来是很困难的。眼下，特务机关只限于一点一点地吸收和训练白俄。

日本陆军情报处吸收白俄同苏联在满洲加强谍报活动在时间上恰好相一致。奥格别乌(1934年后为纳卡夫德)的特工人员挤满了哈尔滨的上流社会和咖啡馆，他们凭借外交豁免权安全又可靠。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苏联公民都能免遭折磨。到1935年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的时候，中东铁路持苏联护照的员工经常被当作“第三国际的间谍”而遭到拘留。1936年归苏联所有的远东银行的一个雇员在受嫌被日本人拘留期间屈服了。当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莫斯科方面的强烈抗议，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批评性宣传。但即使一些白俄中了格别乌的枪弹身亡或在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大楼的“二楼”上突然失踪，也根本没有人会感到吃惊。

白俄在苏日情报争斗中首当其冲。作为无国籍的难民和作为满洲国的公民(实际上是一回事)，他们都是非常容易遭受攻击的。没有政府保护他们，也没有领事代表他们的利益而进行抗辩。他们的这种危险处境甚至更使他们令人怀疑。苏联当局怀疑他们是日本的奴才，而日本当局很快又看出他们当中的颠倒红白的小萝卜(外白里红)。定居在边境地区的

哥萨克人特别容易遭受双重危险。额尔古纳河地区的哥萨人从20年代苏联突击队的搜捕中恢复平静，现在又在日本30年代绥靖运动中胆战心惊了。甚至在压迫白俄的同时，苏联和日本的安全机关出于战略目的，都很内行地利用了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受到伤害的爱国精神。流亡者是任何人都可利用的狗爪子，俄国法西斯分子也不例外。

预计在1938年爆发的国民革命

1935年5月22日，在纪念俄国法西斯党（自1934年起为全俄法西斯党）四周年的讲演中，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作了一个自命不凡的预言：到1938年5月1日，苏联将要爆发国民革命。他在讲演一开始就断言，全俄法西斯党仅在满洲国就拥有“两万名积极分子”，标志法西斯运动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的成就是，“准备和集合了力量”。他继续讲道，第二阶段是“法西斯三年计划”时期，这期间要“在俄国土地上肃清犹太人的统治”，并且最迟不超过1938年5月1日让全俄法西斯党执政。

在一个月以后召开的第三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上，这位首脑阐明了接管苏联的方案。方案规定了五点：（1）加强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2）在全俄法西斯党指导下协调满洲国的白俄；（3）进一步密切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合作；（4）进一步密切同日本的联系；（5）渗透到苏联内部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建立联系。上述五点的实现同“犹太人的”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1932——1937）的失败在时间上正好相一致。这将使全俄法西斯党能够在估计1938年初爆发的自发的

俄国国民革命中担任领导。

1935年夏季，全俄法西斯党在实现五个目标过程中，有四个目标似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全俄法西斯党的学校和出版物中，宣传材料正在最大限度地编制出来，甚至全俄法西斯党的无线电广播节目也在齐齐哈尔电台对苏联广播。通过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和协和会，全俄法西斯党正在同满洲国的白俄进行“协调”。虽然全俄法西斯党在柏林还没有一个代表，但在罗马开辟一个分支机构的前景看起来还是好的。同哈尔滨特务机关的首脑小松原将军的继承人安东林三少将的关系是彬彬有礼的，并且罗扎耶夫斯基的友好的指导者秋草俊少佐继续做全俄法西斯党的顾问。此外，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是荒木贞夫将军的私人友好，而荒木是理想主义的年轻陆军军官的崇拜对象，是日本陆军“皇道派”的最重要人物。这个皇道派寻求同苏联最后决一雌雄。这位首脑也满足于得到日本教父们极端民族主义幕后操纵者头山满的欢心。1935年，头山派一个叫富田的在黑龙会中很受信赖的人到哈尔滨，把一口陆军军官的战刀赠给了罗扎耶夫斯基以表示敬意，并捎来口信说，头山支持俄国法西斯运动，并希望它在反苏斗争中获得成功。

不管全俄法西斯党对第一项到第四项目标进展得多么顺利，但是第五项目标，即渗透到苏联内部同反斯大林分子联系，证明是主要的困难。尽管罗扎耶夫斯基话说得漂亮，但全俄法西斯党在1935年末到1936年上半年实际上在渗透到苏联内部这一目标方面毫无进展。

全俄法西斯党在苏联境内毫无活动，这不是由于缺乏决

心和勇气，而是因为日本人的否决。特务机关目前要的是情报而不是煽动叛乱。特务机关虽然不允许全俄法西斯党把它的宣传队伍和搞破坏活动的队伍派到苏联境内去，但特务机关自己确实吸收了个别的全俄法西斯党成员，通常是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训练他们偷越国境去收集苏联红军部队的部署情况。这些战友们发现他们是朝鲜人和白俄混合编组的一部分，是为日本陆军情报处而不是为国民革命充当职业侦察员。

尽管这种违法的渗透并不带有国民革命的性质，可还是激怒了莫斯科。1936年4月，苏联的康斯坦丁·尤里涅夫大使在东京对日本在苏联内部组织白俄“恐怖主义”提出强烈抗议。外务省一位发言人堀内坚助无动于衷地回答说，莫斯科应该从满洲国政府方面寻找满意的答案，因为日本同这种活动毫不相干，并且“对于干涉满洲国的事情感到很为难”。可以想象，这种回答不能使莫斯科方面满意。当外交官们交换着措词越来越强烈的照会的时候，满洲国和苏联边境的紧张局势便加剧了。

1936年夏季的一个时期，日本特务机关关于在苏联境内可以进行哪些活动的政策好像已经改变了。当时特务机关持一种比较广义的“情报”观点，以便把宣传活动、破坏活动和情报活动都包括在内。是什么原因使特务机关不那么严格坚持“纯粹”的情报，这只能推测。不管是什么因素促使的，新确定的方针给予俄国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祖国检验一下力量的机会。

1936年9月，一个叫铃木 的少佐向罗扎耶夫斯基提出

建议：成立一个全俄法西斯突击队，由日本专家进行训练和装备，以便在东西伯利亚执行宣传和破坏的任务。这支突击队无论到哪里活动，都应该建立一个“法西斯的地下组织”。罗扎耶夫斯基欣然接受建议，指定他的一名助手马特韦·普拉托诺维奇·马斯拉科夫同铃木一起实施这一计划。

到10月末，铃木和马斯特科夫招募了好几十个年轻“战友”，在射击技术、短波无线电发射以及爆破方面给予起码的训练。11月初，这支部队分成好几个小队，从分散得很广的各点上，越过了满洲国与苏联的边境线。他们的任务是在11月7日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制造动乱。

这些小队有一半在边境上被苏联边境警察截击并消灭了。有一支小队设法越过离海兰泡不远的黑龙江，费了好些时间在结雅河（黑龙江支流）地区徘徊，切断电话线，向老百姓开枪。只有一支小队到达了指定的目的地。六个全俄法西斯突击队员偷偷溜入外贝加尔靠近86号联轨站（这是从哈尔滨来的北满铁路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条短支线相汇合的边境站）以后，又沿铁路行进250英里到达赤塔。赤塔是一座中等规模的省会城市（1939年拥有12550人）和军事基地，内战时期曾充作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指挥部。

突击队员们不引人注意地混杂在节日的人群中。这些人集合起来准备观看11月7日的游行和收听当地党的领导人通

过颂扬斯大林来纪念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突击队员们不声不响地散发了宣称斯大林是罪人的传单。过了一会儿，拿到传单的人恐惧和慌乱得不知所措。几分钟之内，消息传到了治安官员那里，说有人正在散发煽动性传单。由战士增援的纳卡夫德分队直扑向人群，发现身上带有指控斯大林有罪的传单的人就全都抓了起来。很快，赤塔的城市商业区，就像蚂蚁群中闯入白蚁引起了反应一样。但到这个时候，突击队员们已经匆匆逃离了现场，正经陆路取道回满洲国。

罗扎耶夫斯基决心不要被置于这次行动之外，便让他的哈尔滨“战友”们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袭击苏联领事馆，时间定在11月7日，恰好同突击队的行动相呼应。特务机关抱着一种冒险的心情，不仅同意罗扎耶夫斯基的这次行动，而且指点这位首脑在什么地方部署他的黑衫队，以便突破领事馆的庭院。可是当地日本领事馆的官员获悉了这种流传中的消息以后，开始设法制止这次行动。外务省不想卷入又一次危机，恰恰是因为军队里的一些“劳伦斯”们想要激怒苏联。对这个问题，不同于其他许多问题，外务省的干预是有效的。在11月7日这一天，哈尔滨市警察局派人把苏联领事馆的驻地围得水泄不通，全俄法西斯党的黑衫队甚至连靠近它都办不到。

尽管还不是真正国民革命的序幕，可是1936年11月7日事件也使罗扎耶夫斯基得到极大的满足。当时，他可以毫不夸大地宣称，俄国法西斯分子就在苏联纳卡夫德的鼻子底下破坏了共产党最神圣的仪式。他可以从正好在他的家乡海兰泡出版的《阿穆尔州真理报》上读到严厉谴责一群“法西斯恐

怖团伙”劫掠结雅内地的文章。他可以听到关于纳卡夫德的亲信在赤塔当地居民当中追捕第五纵队时进行大批拘留的消息报道。然而，罗扎耶夫斯基的满足是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全俄法西斯党的突击队员有一半一去未归。

在这次袭击的前夕，哈尔滨自身已经处于一种小小的战争恐怖之中。11月7日这天，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话里肯定有话地推测，防毒面具在哈尔滨畅销，将促进日本橡胶工业的发展。是什么造成的恐慌，并不清楚。但袭击无疑使这种恐慌更加剧了。

1936年11月26日，当东京宣布日本和德国已经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并保证共同合作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时候，罗扎耶夫斯基实际上可以听到那唤他去获取不朽声名的国民革命的鼓声。

可是，罗扎耶夫斯基以为已经听到了的鼓声，却预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他想像中的命运。首先，不是斯大林失去对俄国的控制，恰恰相反，当纳卡夫德清洗了真正的和猜想中的敌对者的时候，斯大林更加紧了对俄国的控制。再者，在如何使用满洲国的白俄斗士问题上，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想法。特别是特务机关为它的法西斯门徒渐渐想像出一个纯粹的军事角色，一个专门适用于实现日本战略目标而不是实现白俄梦想的角色。

这些趋势是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间在中国长城以南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出现的。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同蒋介石的全面敌对行动以后，日本军事策划者们几乎没有人看出在“中国事件”解决之前有对苏联远东采取行动的任

何可能性。同时，苏日关系随着对共产国际公约的缔结而恶化。中国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苏联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这些都使关东军的军官们更加确信，苏联仍然是日本的首要敌人。关东军无力向北方发动全面的进攻，而又很想试试苏联的力量，于是采取了在满洲国与苏联的边境上以及在满洲国与外蒙古的边境上选择几个地点进行试探的办法。对于这个办法，白俄迟早是有用的，特别是如果他们愿意面对死亡的话。

浅野 旅

继国内战争失败之后，在中国寻求避难的数以千计的白俄士兵当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外国雇佣兵。山东军阀张宗昌为了准备对付他在华北的对手的战役，雇佣了由涅恰耶夫指挥的俄国人支队。关东军在1931至1932年占领了满洲之后，效法这一先例，也招募白俄部队和个人。但这种雇佣关系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在中国人雇佣下，白俄为薪金而打仗，他们自己是知道的。在日本人雇佣下，白俄相信他们是在为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并使他们重返祖国的国民革命而打仗。这里就包含着关东军和参谋本部无法驱散的悲剧性的幻想。

起初，关东军企图通过罗致流亡者的一些首脑人物作招募人员来发掘白俄的军事潜力。1932年夏，特务机关长小松原陆太郎少将要求俄国法西斯党首脑科斯明将军建立一支武装支队。小松原向科斯明保证，这支部队会成为满洲国“白军”的核心，有朝一日会在苏日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科斯明

欣然同意，组成了各有好几百人的两支部队。这两支部队被分派到从沈阳到山海关和从吉林到拉法两条铁路沿线执行警卫任务。此后不久，小松原要求科斯明招募另外的部队。这位将军因为梦想着“白军”，便又一次照办了。新招募的兵员在海林和穆稜一带（大致在哈尔滨和海参崴之间的中途地区），紧张地追赶中国和朝鲜游击队。科斯明的兵团是由帝制派和哥萨克人组成的完全相同的两支部队，是日本人为了同一目的雇佣的。

到了1936年末，关东军一位参谋军官河毛虎四郎大佐想把彼此没有联系的流亡者支队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单一的白俄作战部队。这样一支部队要从全体居民中吸收人员。它的一般成员要接受日本军官或他们任命的人员的命令，而不是接受目前流亡者领导人的命令。这支新部队，经关东军军官的磨炼和训导可以在谍报活动和破坏活动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在得到上级准许之后，河毛把这个想法带给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安东林三少将，他表示同意合作。1937年间，特务机关的一位俄国专家负责落实河毛的这项计划。1938年初，这支新组建的部队诞生了，部队以其日本顾问浅野隆志大佐的名字命名，称作浅野旅。

浅野旅基地设在二站，是位于松花江畔哈尔滨上游60英里处的一个村庄。俄国人把这个地方叫作第二松花江。浅野旅最初由200人组成，后来很快就扩大到五个连队，士兵总数达700人。

浅野旅同1931年以来的所有白俄团体一样，由一名日本军官做顾问。但是，同先例全部相同之处到此为止。浅野大

佐对在新京的关东军总部负责而不是对哈尔滨的特务机关负责。这种安排反映了浅野旅作为满洲国陆军的一个部队的官方地位。浅野旅虽然受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但是，它被打扮得看起来像是满洲国的部队。除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时候而外，军饷由满洲国的陆军部发给，旅长身着满洲国的军服。

关东军决心防止任何一个白俄派别控制浅野旅，就挑选了一位亚美尼亚人来领导它。久尔根·纳戈伦坚定、顽强，正如他那矮胖的身材和黝黑的皮肤使人想到的那样。他在20年代后期离开哈尔滨市法学院，去同中东铁路警察一起工作。他觉察到了1932年的政治风暴中的机遇，应募参加了新组建的傀儡满洲国部队。他对“王道”的理解给一些日本顾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就在这些顾问指示下，纳戈伦很快被提升为少佐，在浅野旅里，他被授予大佐军衔。

像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这样的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不愿意看见他的“战友”在一些亚美尼亚人的指挥下服役。但日本人懂得如何使他表示愿意。1938年3月，特务机关长樋口纪一郎少将邀请这位首脑到他的私人住所，就为了进行消灭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埋葬同其他流亡者集团的微不足道的争端一事，进行“坦诚的谈心”（罗扎耶夫斯基语）。樋口熟练地拨动罗扎耶夫斯基的野心加忧虑的心弦。他吐露说，日本打算把苏联远东变成一个白俄缓冲国，在那里法西斯主义者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这种角色要看法西斯分子在浅野旅里所起的作用而定。樋口的继承人秦彦三郎少将在1939年重申这一具有双重目的的使命，正像荒木贞夫将军和板垣征四郎将军派来的代表们所做的一样。荒木当时是教

育大臣，板垣是1931年沈阳事件的设计者之一，1938年6月3日被委任为陆相。

罗扎耶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接受了他的保护人的劝告。他除了听来自能够确保——或者能够断送——他的前途的人的劝告之外，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此，他当众为浅野旅欢呼，还去第二松花江向浅野旅的旅长表示问候。可是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同时又暗自祈祷希望有个好机遇。同谢苗诺夫共事就够糟糕的了，现在又加上一个亚美尼亚宪兵，再下一位会是谁呢？

为了把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年轻人汇集到浅野旅中来，罗扎耶夫斯基指派列夫·奥霍廷负责在党内进行招募。奥霍廷本人刚刚才加入俄国法西斯联盟，是个27岁的小伙子，长得强壮，体重200磅。他的热情和能力引起这位首脑的注意，罗扎耶夫斯基也有意让奥霍廷的妻子尼娜·格里戈雷芙娜接替谢茵娜·鲁缅采娃^①为全俄妇女法西斯运动的第一夫人。

关东军不失时机地指派浅野旅去承担那些冒险的任务。这些任务由于其保密性，甚至在人死以后也不会带来荣耀。浅野旅成员穿上红军的服装，偷越国境去侦察苏联情况。有时候，他们在满洲国领土上开枪，上演“苏联挑衅”的把戏。对这种诡计红军并不陌生。这些渗入者由于缺乏高深训练，又没有身份证件，在苏联极易遭到袭击。即使浅野旅的有些年轻成员是在满洲出生的，但是如果稍有畏缩，就会被当作

① 波里斯·鲁缅采夫的妻子，俄国法西斯组织（1925）的共同创始人，1932年退出俄国法西斯党。

——原注

叛徒而予以枪毙。

在满洲国，日本宪兵监视着浅野旅成员，在苏联，纳卡夫德对他们穷追不舍，直至抓获，加上一个亚美尼亚人对他们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浅野旅的损耗率很高就不足为奇了。但似乎总有另外一些俄国青年补充到这支大批被杀死的队伍中来。

1938年到1939年间，满洲国和外蒙边境以及满洲国和苏联边境的紧张局势日益升级，这给浅野旅成员足够的机会证明他们是在炮火的射击之下。1939年5月至9月，在蒙满平原上一个叫诺门汗(或称哈勒欣)的地方的一次战斗，使浅野旅官兵面临着最引人注目的严峻检验。在参战的日本军队当中，表现突出的是由前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小松原陆太郎将军指挥的关东军第23步兵师和小松原指挥下充当侦察员、渗入者和译述员的未标番号的浅野部队。这些部队发现他们正处于被屠杀的地位。苏联的带有火焰喷射器的重型坦克，靠机动优势制胜，包围了日本步兵。在平展展的没有树木的大草原上，躲在壕沟里的日本步兵像地鼠一样被消灭了。在日本部队中，第23师遭受的损耗最大。在10天的战斗中，它的15140人当中就有11240人死亡。如果白俄辅助部队中有幸存者的话，究竟有多少人没有记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的保密检查机关对诺门汗灾难一直保守秘密。在战斗期间，数以千计的满洲国白俄在收听关东军在诺门汗战胜红军的新闻公报的时候，以期待苏日战争的心情蠢蠢欲动。可是，这些期待都无情地落空了。

幻灭的种子

到了1939年，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开始对俄国法西斯运动的前途产生怀疑。他的泄气，有一部分原因是由过分劳累引起的。他年仅32岁，就未老先衰。多重日本保护人接连不断地提出各种要求，长期同其他流亡者集团进行抗衡以及他自己党内的派别活动，更不用说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可能，这一切都损害着他的神经。外界的事变进一步使他曾经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发生了动摇。尽管他竭尽全力，可是俄国法西斯联盟在1939年接管苏联的可能性比1931年俄国法西斯党接管苏联的可能性更小了。俄国从共产主义解放出来的最后期限1938年5月1日已经来了又去了，没有一点国民革命的迹象。当然，罗扎耶夫斯基当众解释说，没有发生国民革命是斯大林进行清洗的结果。这场清洗清除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他资深的红军军官。“他们一直在筹划废除共产国际。”然而，似是而非的理由并不能抹掉对1935年作的所有那些过于自信的预言的羞辱性记忆。

罗扎耶夫斯基可以据以夸耀的、唯一被公认的成绩是1938年6月远东纳卡夫德首脑留什科夫将军的变节。留什科夫在对海参崴附近的边疆地区进行了一次假视察之后，就走进了满洲国境内。他的变节对日本特务机关来说是头等的好事。《我们的通路》企图把这件事作为反共意识形态的胜利来宣传。可是留什科夫已经安然逃跑，不表示任何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他是在莫斯科通知他将有一个新人去接替他作远东纳卡夫德首脑时嗅出危险气味的。因为一年以前，留什科夫来到伯

力时，就清算过他的前任。所以，他的预感也许是有道理的。

国民革命在1938年没有发生，加强了罗扎耶夫斯基长期抱定的信念，即外国的打击对推翻苏联政权是绝对必要的。谈到外国的打击，罗扎耶夫斯基的心目中想的是日本和德国同时对苏联的进攻。直到1939年以前，在这位首脑的盘算中，这个思路变得空前明显了，他把德日军事同盟看成是最后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苏日关系以及苏德关系，在1939年初确实紧张了。但建立德日军事同盟的前景看起来还不能确定。这主要是因为在日本领导层中存在分歧意见。关东军和参谋本部的一些军官、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官僚内部的一些派系，包括外务省，都赞成同第三帝国结盟。而海军、外务省内占优势的派系、商界和财界以及有影响的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全都对把日本同阿道夫·希特勒拴在一起抱有很多的保留意见。这些意见分歧在俄国法西斯联盟内部也反映出来了。

罗扎耶夫斯基的亲纳粹倾向，使他同米哈伊尔·马特科夫斯基发生了抵触。态度和蔼、说话温柔的马特科夫斯基，由于他那恰如其分的现实主义和对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第三处的有效管理，在俄国人和日本人当中都同样博得越来越多的尊敬。虽然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却在党内知识分子当中吸引了一批他个人的追随者。例如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供职的弗拉季米尔·基巴丁，粗短身材，白晰皮肤，生就的金发碧眼，一副学者风度；再如《我们的道路》的编辑谢尔盖·拉杰夫；

还有根纳迪·塔拉达洛夫，在高级党校任教，是《法西斯主义入门》一书的作者。在1935年第三次党代会之后不久，这些人就在全俄法西斯党（后来的俄国法西斯联盟）中形成了日渐为人所知的“马特科夫斯基集团”的核心。马特科夫斯基集团认为自己比这个党的主流更有文化、更注重实际。这个集团怀疑反犹主义的价值，哀叹黑衫队的暴行，避免同日本宪兵队中的骗子科斯加中村这样比较下流的日本保护人合作。这个集团同罗扎耶夫斯基的关系从来不亲密，1939年，在是否寻求同纳粹德国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变得紧张起来。

罗扎耶夫斯基与马特科夫斯基的分裂，在第四次（最后一次）俄国法西斯代表大会期间终于表面化了。这次会议于1939年1月21—23日在哈尔滨举行。同上几次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对与会者照顾得很差，接待的态度也生硬。来自满洲国、上海、天津、朝鲜和日本的代表只有30多人，在特务机关顾问的监视下聚集在西经纬街^①一座楼房里。这次大会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成员人数自从1938年国民革命没有发生以来，已经减少了。白俄成批地从哈尔滨向天津和上海迁移使党的队伍进一步空虚。这种不利的发展形势促使马特科夫斯基集团大胆地发表意见。

马特科夫斯基及其追随者把希特勒说成是俄国和所有斯拉夫人的敌人，并且指出俄国法西斯联盟只有断绝同纳粹

^① 全俄法西斯党总部已于1937年从中央大街125号迁到西经纬街。

分子的联系并把卐字符号从党徽上摘下来，才能在移民当中保住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他们呼吁与会代表在所有散居在外的俄国人当中寻求同诸如全国劳工联盟之类的俄国人反共组织结成联盟。他们批评了这个党的财政管理，最后要求选出“新的领导”，对党的首脑直接击一猛掌。

在大多数代表对这些提议反应冷淡的同时，罗扎耶夫斯基也还是没有说服代表大会采纳公开亲德的纲领。第四次党代会只通过一项决议，抗议满洲国当局帮助犹太难民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自欧洲来到满洲国。除此而外，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引人注意的行动就闭幕了。散会时，沮丧的雾幕笼罩着代表们。罗扎耶夫斯基和马特科夫斯基两人在党内都失去了他们的崇高形象。自此以后，两人谁也不信任谁。

党的病态和内部的不满情绪使罗扎耶夫斯基感到心绪不宁，便决心去求得东京方面对他的领导职位的重新任命。他利用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第二处处长的地位，为白俄组织了一次去东京的旅行。尽管1939年4月17日至5月2日期间，他的任务是在东京各地观光游览，可他还是拜访了实际上或者潜在地同情他的事业的权势人物。

他首先拜访了秋草俊。1932年至1935年间，秋草少佐作为哈尔滨特务机关的俄国问题专家一直被指派作俄国法西斯党或全俄法西斯党的顾问。到1939年他已经调到东京，被提升为大佐，任命为侦察军官培训学校的校长。后来有人认为这是培养间谍和破坏者的“中野学校”的掩护名称。秋草大佐同意帮助罗扎耶夫斯基向挑选出来的日本官员谈谈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情况。在以后的十天里，他们两个人在一些支持

“积极的”对苏政策的人当中，拜访了一些名副其实的有名人士：日本皇军中所谓“满洲派”的主要的成员，陆相板垣征四郎将军；前陆相和首相，当时正在过退休生活的林銑十郎将军；机警多变，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南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冈洋右；首都（东京）警察局的前任警长，有名的国内共产党人的追捕者宫田三雄；还有两名平沼内阁的成员：拓务省大臣小矶国昭将军和教育大臣荒木贞夫将军。罗扎耶夫斯基以前从未见过小矶，但这位将军自1932年至1934年任关东军参谋长以来，就已经了解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情况。自1913年以来，小矶一直是日本入侵满洲和蒙古的支持者，他赞赏罗扎耶夫斯基的合作，答应竭尽全力支持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反苏活动。荒木几乎可以当然被看作是罗扎耶夫斯基私人朋友的一员。这两个人自1934年那次见面以来，一直通信。荒木也像小矶一样，保证支持俄国法西斯联盟。

最后，罗扎耶夫斯基有幸得以单独和头山满会面，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黑龙会首脑。头山满很少公开露面，他的影响虽很难估量，却能被普遍地感觉到。近60年来，他一直威胁着政客，榨取商人的油水，并动员超级爱国主义者，还被认为是一个谦逊而坦率的人。84岁的头山满，几乎成了活着的传奇性人物。头山满对俄国法西斯联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之后，摆好了姿势，同这位首脑合影。

罗扎耶夫斯基5月回到哈尔滨，满载着日本人的许诺，却没有一项具体承担的义务。他几乎还没有打开行装，这时候，一则关于关东军和外蒙部队在一个叫诺门汗的地方打了起来的报道就在报纸上出现了。到6月中旬，诺门汗战争逐步

升级，变成了把苏联空军部队和装甲部队都卷了进来的一场小型战争。

罗扎耶夫斯基读着关于诺门汗的战斗报道，感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冲突。双方投入这样多的兵力，只能表明日苏两国处在全力交战的边缘。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俄国从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便指日可待了。

7月初，《我们的道路》预言，德意日将迫不及待地结成反苏联盟，并呼吁建立在俄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下的“远东国民战线”，让白俄为国民革命作好准备。8月20日，红军大举进攻的那一天，诺门汗平原上遍布了燃烧着的坦克和腐烂着的尸体，苏日战争，看起来即使不是几小时即将发生的事，也是只有几天的事了。

这种战争前途，在一个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新政治组合中突然消失了。1939年8月21日，德国和苏联宣布了两国已经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8月23日签字的这项条约，不仅规定了任何一方不得进攻另一方，而且还规定了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应该保持中立。此外，签约各方保证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把矛头指向另一方”的国家集团。一周以后，当德国和苏联在它们之间瓜分波兰、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协定的逻辑推理变得显而易见了。

纳粹与苏联的条约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使它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日本自从在诺门汗与红军摊牌以来，一直在同柏林方面协商反苏联盟。8月21日德国的公告在东京引起的不止是惊讶和震动，它激起了反德的公愤。平沼内阁承担了重

大的外交倒退的责任，于8月30日辞去内阁职务。平沼的继任者阿部信行将军对与德国联盟抱悲观看法，而且避免卷入欧洲战争。军人和平民中鼓吹亲德方针的人，严重受挫，除了暂时保持沉默而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满洲国很快感到了纳粹和苏联合作所产生的震波。9月7日，梅津美次郎取代植田谦吉做了关东军的司令官。梅津从华北调来，长期反对荒木将军先发制人地进攻苏联。虽然梅津根本不亲苏，但是他认为日本应该一个时期处理一个难题。现时的难题是中国。梅津这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是配备来使关东军在1939年9月间同苏联军队脱离接触的几个高级陆军军官之一，当时关东军正为其诺门汗的耻辱而大为恼火。

纳粹与苏联的条约使那些把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反共救世主来信仰的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希望破灭了。罗扎耶夫斯基处于他自己所从事的宣传的大混乱之中，不知道怎样对待马特科夫斯基。这个来自海兰泡的小伙子也许是平生第一次为该说些什么感到为难。

所有散居在外的俄国人，无论他持什么政治信仰，都和罗扎耶夫斯基一样感到震动。公告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没有几个人懂得希特勒和斯大林搞到了一起的全部意义。但在波兰彻底覆灭之后，遍布世界的流亡者都集合起来支持英国和法国。1939年至1940年冬季，英法两国不仅对希特勒作战，而且站在与斯大林为敌的边缘（由于苏联进攻芬兰）。

这些飞速的发展变化使俄国法西斯联盟已经减少了的成员人数又急剧下降了。在满洲国的战友的辞职引起成批人的出走，这有转变成大溃退的危险。在德国，盖世太保对所有

反苏的流亡者、法西斯分子或其他人采取了严厉措施。尽管法西斯联盟驻欧代表波里斯·特德利欢呼纳粹与苏联的条约是德国使西方财阀保持中立的极大的成功，可还是于11月被驱逐到瑞士去了。俄国法西斯分子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现他们是大国策略的可作牺牲的走卒。但特别令人感到羞辱的是当了希特勒欢迎斯大林的门前的擦鞋棕垫。

9月3日的《民族》上披露了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对纳粹与苏联条约的公开反应。他哀叹这个条约是德国在反犹、反共斗争方面的“致命错误”。也许指望着将来有可能同德国合作，他没有点名提到希特勒。他没有足够根据地断言，近来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日本是俄国的真正救星。他望穿秋水地断定：“日本和俄国人民的联盟”有朝一日会推翻苏联政权而无需任何来自欧洲的反复无常的朋友的援助。

然而，日本皇军根本不关心俄国的国民革命，除非这种国民革命服务于日本的民族利益。1939年8月以后，日本的民族利益一般可以从东京和新京两地看得出来，那就是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和建立“东亚新秩序”。欧洲战争爆发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实现这两个孪生的目标，其关键似乎在于东南亚。在日本看来，从缅甸和印度支那经陆路把物资送到蒋介石手里，他才有可能进行抗战。此外，在面对美国日益加紧禁运的情况下，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拥有对日本战争机器极为重要的橡胶和石油。1940年4月至6月，德国的“闪电战”横扫比利时和荷兰，打得法国退出了战争。^①把英国军

① 德国于1940年5月攻入法国本土，6月法国贝当政府投降。——译者

队赶出欧洲大陆，使荷兰、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变成许多熟透的果子，随时可以采摘而无需害怕报复。

由于东南亚隐隐出现于日本的脑际，苏联便失去了作为日本的一个目标的诱惑力。莫斯科在欧洲冲突中仍旧保持中立，便放手把部队集中在远东地区，并且苏联在滨海地区的各空军基地全都在进攻东京的距离以内。此外，红军在诺门汗已经表现出了机动多变和技术优势，使关东军的指挥官们充满了一种新的慎重感。

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使在荒木以后的日军中残留的西伯利亚的冒险热情大为减弱。不管关东军渴望为诺门汗战场雪耻的心情多么急切，更宏大的战略思考还是阻止了复仇主义的冲动。“保卫北方，进军南方”，这个口号响遍政府各省、各个军队指挥部以及各个兵营，表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姿态。

在纳粹和苏联签定条约的几天内，就在满洲国看到了这种新姿态。9月16日，一项休战协定结束了诺门汗的敌意，并且规定成立蒙一满（事实上是苏一日）边境委员会，勘定有争执的边境界线。这个委员会于12日在赤塔举行会议。与此同时，莫斯科和东京通过互相释放没收的渔船来促使改善关系。贸易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在德国和日本之间转运大批货物。那时德国被英国舰队切断了水路、封锁在陆地上。

罗扎耶夫斯基被苏日和解的迹象搅得心神不安。为了弄清楚日本的意图和使日本首脑牢记俄国法西斯联盟的用处，他在10月对东京进行了一次飞行访问。他的主要军方保护人

荒木和小矶在不久前的政治改组中未获成功。平沼政府8月垮台时，两位将军都失去了他们的内阁职位。罗扎耶夫斯基拜访小矶，这位退职的将军所能提供的一切仅仅是肯定他的看法：“日本应该把苏联赶出太平洋。”这是振奋人心的话，但没有什么权威性。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又一次两手空空地从东京回来了。

不管罗扎耶夫斯基在东京获得了关于日本意图的什么秘密，都使他茅塞顿开。1940年1月5日，蒙满边界委员会把审议工作从赤塔移到哈尔滨。哈尔滨军事代表团极力避免发生麻烦事件，命令所有的白俄领导人在委员会开会期间必须离开哈尔滨。

为了安抚白俄合作者当中的急躁情绪，特务机关长柳田元三少将于1月26日主办一次宴会，招待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官员。罗扎耶夫斯基、马特科夫斯基以及其他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战友”出席了宴会。宴会上的主宾和主要发言人是关东军参谋长今村志将军。今村耸耸肩，对关东军将会同苏联“妥协”的想法表示轻蔑，并且否认解散“忠诚的”白俄组织的打算。他在讲话结束时说了几句带有恭维色彩的劝告话：

仔细看看你们的一些组织的活动，我非常高兴地注意到，你们这些俄国移民的领袖是正确理解日军意图的。作为指导白俄的基础而拟定的各项原则没有改变。在考虑到政治形势的同时，我深深信任你们，并且请你们不要相信种种谣传。相信日军吧。

相信日军吧。罗扎耶夫斯基或者在满洲国的任何流亡者，难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相信日军吧。这话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宴会上说出后的几天之内，满洲国的白俄发现，或者说重新发现这话的含意。1940年3月，关东军指示谢苗诺夫首领组织俄国人部队，准备调往华中地区去作为已经成为日本在长城以南的主要合作者的前国民党官员汪精卫的一支部队的“核心”。3月末，三个各有1000人的俄国人团踏上了去南京的征途，准备为汪精卫新建立的傀儡政府服役。

相信日军吧。在满洲国，关东军宣布一项到1941年将有30000白俄服兵役的目标。宣布年龄在17到45岁的男性俄国人作为服义务兵役的合格条件。

相信日军吧。在1940年3月，24名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战友”在哈尔滨和海参崴铁路沿线上的城市牡丹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牡丹江属于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普诺夫的管辖区，他是以绥芬河为基地的小号实权人物，享受当地日本宪兵队的保护。谢普诺夫对俄国法西斯联盟侵占他的“领地”不满，决定一举除掉他们，因此便向日本宪兵队告发：当地所有的俄国法西斯分子是正在家畜中间传播瘟疫、在人们中间传播斑疹伤寒的苏联间谍。日本宪兵队不仅逮捕了24名“战友”，还从哈尔滨劫持了一名俄国法西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康斯坦丁·阿尔谢尼耶夫并进行审问。阿尔谢尼耶夫在牡丹江的日本宪兵队总部遭到蛮横的审问，包括动用水刑。

阿尔谢尼耶夫的失踪是他精神错乱的妻子报告的。罗扎耶夫斯基到特务机关长柳田将军那里去寻求解释。柳田否认

知道阿尔谢尼耶夫的下落，但答应予以调查。

阿尔谢尼耶夫经受了两天的折磨之后，在一份“供状”上签了字，把他本人同24个战友都牵连进了为苏联纳卡夫德进行的间谍活动和细菌战之中。他们随即被带往新京关押起来等待审判。

几星期后，在审判时，起诉方面出示一个旧无线电接收机和一些玻璃广口瓶作为控告的证据，并要求判处死刑。经日本专家检验，这台无线电接收机已经不能使用了，这些玻璃广口瓶没有盛装细菌的痕迹，加上被告带有许多遭受肉体虐待的痕迹，于是一位日本法官宣判他们无罪。阿尔谢尼耶夫返回哈尔滨，其他24人回到牡丹江市。

两天后，罗扎耶夫斯基接到一份牡丹江市拍来的电报，通知他24名“战友”已经在到达牡丹江时全都被日本宪兵队枪毙了。这位首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他气冲冲地闯入柳田将军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引用柳田的原话来说就是：“他们被处死了，这是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一举动给日本皇军的制服上留下一个污点。我由衷地表示歉意。”

受害者的亲属源源涌入哈尔滨。柳田拒绝同他们见面，而是命令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财务处，发给每一个丧失亲属的家庭1000元(330美元)，作为哈尔滨军事代表团的“慰问”。除了这个姿态之外，牡丹江事件被认为已经结束了。

在30年代期间，数以千计的俄国人着迷于国民革命的幻想，为日军效劳。然而没有几个人看到他们自己是他们的雇主和保护人的可作牺牲的工具。他们经受不住睁开双眼看那样的现实，因为他们别无他处可投。

第十四章

康涅狄格州的把戏

“新英格兰的美丽风光，俄国人的殷勤款待。”

——俄国熊餐馆的广告(1934)

正像俄国法西斯运动有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情节一样，它也有其滑稽场面的时候——有些滑稽场面可能表现得过分了。这种悲剧和喜剧成分分别集中体现在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两个人身上。这两位首脑1934年在哈尔滨短暂聚会之后便分手了，除了通过各自的报纸进行情况交流而外，便再也没有见过面。罗扎耶夫斯基于1934年12月从旺夏茨基那里夺走了对全俄法西斯党的控制权之后，同在满洲国的日本皇军保持空前密切的合作。对照之下，旺夏茨基却靠着重新施展吸引观众的手腕来维护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并沉溺于通过他重新命名的党（全俄国民革命党）及其报纸《法西斯主义者》，使回荡在康涅狄格州东北部的火红的政治幻想有一个伟大的突破。

旺夏茨基1938年到欧洲进行了一次匆忙的旅行，1936年

和1939年分别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除此之外，从1934年到1941年的数年间，他一直舒舒服服地蛰居在十九穴。他很少会见外国人；除了有几个流亡朋友定期从纽约、波士顿或者普罗维登斯顺便来访问他一下外，他主要生活在本地的绅士、家仆、零售店主、农场主以及各种志趣相投的人们中间。

30年代中期，一帮形形色色的陪同人员群集在旺夏茨基周围，他们或受他的金钱所吸引，或受他的抱负所吸引，或受他对娱乐的爱好所吸引。这帮陪同人员是背井离乡的俄国人和本地坚定支持他的人的混合体，显露出一种对沙皇的怀旧幽情、美国佬的精明灵巧和青少年的蓬勃朝气相结合的特殊情趣。其成员不管意识到与否，他们都是一部编制得富于想象力的戏剧作品的剧中人。

家 族

早在1934年，阿纳斯塔斯就完全被确认为是里姆家族的信天翁^①。他不只是帮助破坏了他的小内弟路易斯·马歇尔·里姆的婚姻，而且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不但收集橄榄球球门柱削片，还收集枪枝的行为古怪的人。而他新产生的政治抱负，则是十分使人烦恼的根源。放荡的花花公子本来是富有而自尊的家族共同的烦恼，但是，有多少像马里恩的弟弟罗伯特·克拉克·里姆那样的收录在《全美人名百科全书》的名门望族的骄傲子孙，不得不为了一个姻亲而向一个自称的

① 意为不祥之物。

——译者

法西斯陆军元帅作斗争呢？当然，在上流社会，认为希特勒有解决德国失业问题的功劳，赞美墨索里尼使意大利的火车正点运行，都是允许的。但是，旺夏茨基显然超出了风雅得体的界限。他在昆纳蒂塞特高尔夫球场上打口哨吹奏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对仆人们大声喊着口令，好像真有纳粹的青年义务劳动军在面前。他还吹嘘有朝一日他的大批军队通过红场的情景。他的内弟罗伯特，纽约保险行业的一位高级官员，是坚定的共和党和圣公会人士。有一回他举行一次半正式的宴会。旺夏茨基身穿卡其布军装、脚穿黑色马靴、佩上武装带、胳膊上还带有红白蓝三色卐字袖标去出席这次宴会。

马里恩没有充分意识到阿列克斯的行为是多么严重地搅扰了她的家族。这部分地是因为有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博爱主义倾向的感情蒙蔽了她的眼睛，这种感情早在1921年就曾经使她亲近一个福利斯-贝热雷歌舞剧院的拉幕人。马里恩把她的阿列克斯当作一个无依无靠的弃儿，一个革命的悲惨孤儿，一个需要收养和受教育的流浪儿。她看不出阿列克斯把他的小小法西斯党作为业余爱好有什么毛病。正像她对一个朋友说的那样，让她的丈夫有点事做，总比让他老是无所事事要明智些。

马里恩因为不能完全了解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也忽视了阿纳斯塔斯的特性。马里恩虽然只有50岁，但已开始显出上了年纪的迹象。她的听觉早在30年代就不稳定。那以后尽管作了三次手术，可是退化得更厉害了。旺夏茨基许多言行她都没有注意到——这里说的是许多，但并不是全

部。如果她能观察听他丈夫说话的人的面部表情，她就能猜测出她丈夫说的是哪类话。一个朋友回忆说，当客人们的脸色变得苍白或者骤然变得通红时，马里恩就转向她的丈夫，用颤抖的声音说：“阿列克斯，不管你现在说什么，都不要讲了。”

当旺夏茨基更深地卷入政治的时候，马里恩对他们的关系作了一些调整。她继续给他每年25000美元的生活费用，其中大约有10000美元花在“业余爱好”上。但是马里恩意识到旺夏茨基常常使她的朋友为难，她便单独款待她的朋友。他们分别发展了不同的朋友圈子，只是偶尔地互相看望一次。

家务安排成了十九穴仆佣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都对马里恩表示同情而对阿纳斯塔斯表示冷淡。理查德·巴顿是上了年纪的老花匠，自1903年以来一直为里姆家族做工。他替马里恩的弟弟罗伯特监督着旺夏茨基。两名汽车司机詹姆斯·摩根和沃伦·汤感到这位伯爵架子十足。女佣人埃利奥特也坚定地站在马里恩一边。看门人埃米尔·拉耶尤内斯塞很倾向于对男主人和女主人一样看待，但于1932年辞去职务找了新工作。也许是拉耶尤内斯塞的继承人史蒂夫·罗沙克最能保持同马里恩和阿纳斯塔斯的平衡关系。史蒂夫七岁时由拉耶尤内斯塞从纽黑文孤儿院领来收养，在十九穴周围的环境中长大，在他的养父迁到别处去工作后，继续留在那里做一名勤杂工。史蒂夫结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海伦就在俄国熊餐馆为列夫和娜塔莎·马梅多夫招待顾客。

马梅多夫是阿纳斯塔斯唯一的从俄国逃出来的亲戚。列

夫·马梅多夫是从前的炮兵上校，和他的内弟同样怀有迷恋武器和怀恋沙皇之幽情。他大体上赞同阿列克斯的政治冒险行动，并且加入了全俄法西斯组织(1933年)和全俄国民革命党(1935年)。然而，他拒绝同罗扎耶夫斯基发生任何关系，甚至在阿列克斯1934年同满洲法西斯分子短暂地共度蜜月的时候也是如此。娜塔莎·马梅多夫是能压住阿纳斯塔斯的有锐气而又不触怒他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无论什么时候，她的弟弟忘乎所以时，她就把他叫到俄国熊餐馆来吃些东西。马梅多夫的儿子安迪是完全美国化了的十几岁的少年。他把他舅父舅母的心完全吸引住了，可以填补他们因为没有子女而感到的空虚。

亲密朋友

为了给他的伟大抱负造成一种合适的环境，旺夏茨基让许多助手和同伴把自己包围起来。他的助手当中有一些是政治上幼稚的本地年轻人，对俄国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例如从新罕布什尔州来的爱尔兰姑娘莎迪·洛克为这位首脑做速记工作。里姆家所拥有的昆纳蒂塞特高尔夫俱乐部的看门人的儿子诺曼·沃森，是为高尔夫球运动员背球棒出身。他为旺夏茨基把一捆捆《法西斯主义者》从十九穴拖送到汤普森邮局。一个大家都叫他米萨的皮肤白皙的十几岁的少年迈克尔·卡普拉尔，做些奇怪的工作，如穿着宽松的党服摆姿势拍宣传照。

然而，旺夏茨基没有完全依靠本地的人才。多纳特·约西弗维奇·孔尔(孔兹)当上了这位首脑的秘书兼《法西斯主

义者》的编辑。相貌好看，为人谦虚又会说话的孔兹，很可能是温得哈姆县最让人喜欢的法西斯主义者。据谣传，他是犹太人，可惜他并不是犹太人。如果他是，这位伯爵就会有机会来强调他的党所宣传的主张，即犹太人完全能够成为好“战友”。

阿列克斯内心深处对报界人士非常敏感，因为他们毕竟许诺过对他加以宣扬。虽然害怕暗杀使旺夏茨基对陌生人一般都存有疑心，但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在这九穴却受到欢迎，在某些情况下，还被邀请在那里过夜。这位伯爵1934年环球旅行归来之后，几十位有事业心的记者去到汤普森寻找生动的故事。他们通常都如愿以偿。

旺夏茨基为了最大限度地收到戏剧效果而对款待客人进行了筹划。用冲锋队员的装束打扮起来的孔尔，在大门外迎候客人。沃森、卡普拉尔和马梅多夫姐弟留在附近，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用一条紧绷着的皮带牵着攻击型猎狗“阿斯特夫人”，好像是提醒来访者，只是由于主人的恩典他才能免遭猎狗咬死而活在世上。然后，客人们被引入主房，越过机枪防守的楼梯，进入石头群房。在那里这位首脑本人面带一种莫名其妙的威严等待着。一旦进入军事室，客人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穿卡其布军装、带卐字袖标的六尺汉子向他走来，双臂热情地伸展着。1937年一位记者惊异地写道：“这好像是被允许拜会希特勒元首。”

不管客人有无这个要求，总是被领去对军事室作长时间的参观。旺夏茨基骄傲地说明一些旗帜、步枪、相片、球门柱削片、以及披在人体模型身上被打了些弹孔的俄国军大衣的来

历。他从来不忘记详细讲述给这件军大衣打了一个孔的那颗子弹至今还留在他的腹内的情况。

参观了军事室之后，客人才听取正式介绍全俄国民革命党活动的秘密。旺夏茨基踱来踱去，用模仿意大利新闻片进行了反复排练的姿势，详细说明他的全俄国民革命党的宗旨，背诵在苏联境内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的统计数字。在言谈中常以亲切随意的口吻提到日本和第三帝国名人录上的显要人物，以显示他自己的价值。当记者匆匆作笔记的时候，这位首脑会偶尔停下来，等待他的听者把他的话说完全。然后故意提出一些特别生动的比喻；他懂得这很可能被引用。

“俄国法西斯党是供去克里姆林宫乘坐的汽车。它所需要的就是推动力。”1935年，他对《普罗维登斯日报》的加勒特·伯恩斯这样说。

问他统帅了多少人马时，阿纳斯塔斯随心所欲地回答：

“20000人。”（1935年）

“1000000人。”（1937年）

“在小麦已开始抽穗之后，你能数清有多少麦粒吗？”（1934年）

“我们从来不赞成透露我们有多少人。你要知道奥格别乌喜欢查明这个数字。”（1939年）

怀有敌意的记者同友好的记者一样受欢迎。1937年《工人日报》的哈里·雷蒙德在十九穴受到了款待，他在收集资料以便使这种报纸能够不断刊登“法西斯堡垒”的故事。旺夏茨基对于向他的攻击，远不是憎恨，而是欣然接受。他剪辑

《工人日报》关于他本人的报道，向朋友们和《法西斯主义者》订户传播。这位伯爵认为在苏联肯定会看到《工人日报》，他把那上面的宣传看成是在俄国广大群众当中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理想宣传途径。

在参观十九穴的记者当中，有三个人几乎可以称作是旺夏茨基的亲密朋友。他们是理查德·麦考利、乔治·康内尔和詹姆斯·理查德·巴克。

麦考利住在帕特南。他为好几家报纸写文章和摄影，其中有《伍斯特新闻报》、《诺威奇公报》、《哈特福德时报》以及《哈特福德新闻报》。他首次同这位首脑见面是在1933年，自那以后他常常去看望旺夏茨基，其中既有职业上的来往，也有社会方面的交往。他们喜欢在军事室里取乐，收听德国进行曲乐队的演奏和希特勒的演说的录音。

乔治·康内尔是《帕特南爱国者》的编辑，1935年同旺夏茨基结识。1942年以前，他同旺夏茨基每年大约有一个月在一起。每年秋季，这位首脑就邀请他去看布朗-耶鲁的球赛。他们是同孔尔和马梅多夫结成四人小组一同去那里的。康内尔欣赏在他个人活动的天地里有这样一种情调。这使地方新闻生动起来，也为他给全国性杂志写文章提供了机会。1937年，康内尔写了一篇关于旺夏茨基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发表在《真实》杂志上。

詹姆斯·理查德·巴克被一位朋友描绘成“活泼、莽撞和经久不变的滑稽角色”，是汤普森的乡村知识分子。他到什么地方都喜欢带一本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粗略地读过尼采著作之后，就把他自己叫做“白肤金发碧眼的流

浪汉”。巴克20年代为旺夏茨基当过球童。后来，作了《帕特南爱国者》和《韦伯斯特时报》的特约记者。他写了关于旺夏茨基的虚构的国内战争功绩的特写，诸如他在高尔察克的马中弹后如何从马身下救出这位海军上将的情况。1937年，巴克创办了一份周报，叫作《帕特南民主主义者》。虽然乔治·康内尔作为《帕特南爱国者》的编辑是巴克的竞争对手，但两个人在《真实》杂志上合作撰写关于他们的共同朋友的故事。

巴克与旺夏茨基的友谊靠着对幻想的共同爱好来巩固和发展。两个人都喜欢聚在军事室，喝上几杯酒，录下配有欢呼声的他们自己模仿别人以便进行嘲笑的矫揉造作的演说——阿列克斯是一个擅长模仿的小丑。录下自己的演说之后，他们就坐在沙发上收听自己的声音，为他们造成虚幻的宏伟壮观场面的荒唐行为而哄堂大笑。关于这样的聚会，巴克从来没有写过，写了会使《真实》杂志上的这位首脑的俄国富曼丘^①形象化为乌有。这种形象是这两个人都想要它永不消失的形象。

法律和秩序

虽然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策划对苏联造反，但他却认为自己是美国境内法律和秩序的朋友。因为他是宪兵的儿子，所以对警察感到有某种职业上的了解。他也知道警察们

① 富曼丘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于1913年出版的小说《富曼丘》中的主人公（当时西方流行辱华观念中的一个中国人，阴险狡诈）。

的命运并不总是那么好。他不时地招待他们并伸出援助之手，竭力启发他们的治安责任感。

到旺夏茨基于1924年搬到汤普森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有关美国警察的第一手知识。1922年到1923年间，他的精力充沛的开车习惯使他在费城周围地区和县政府所在地成了人们熟悉的人。阿列克斯在搬到汤普森之后，继续收到超速驾驶违章传票，特别是他横冲直撞往来于波士顿、普罗维登斯和纽黑文足球赛场期间更是如此。这并没有妨碍他同驻扎在十九穴以南12英里的丹尼尔森兵营的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官员们建立个人友谊。在这些友情中，最早的是同埃尔顿·托马斯·诺兰警官的交情。

诺兰警官在1927年第一次会见这位首脑，当时旺夏茨基要求警察调查主房前面墙上的一块大石头失踪的问题。这块大石头虽然没有找到，可是它的主人却得到了一位好友。到1930年，诺兰在业余时间总要顺便到十九穴来喝几杯酒，打一局高尔夫球，有时还带来一个女朋友。诺兰喜欢同阿列克斯交往，但对他持保留态度。没过多久，这位警官的老练的眼睛就发觉军事室中的大部分枪支是不能用的。

1933年，旺夏茨基对诺兰的上级，一个负责驻扎在丹尼尔森的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兵营的军官罗斯·厄克特中尉友好相待。同诺兰一样的是，厄克特到十九穴来是为喝几杯酒和玩玩高尔夫球。同诺兰不一样的是，他向旺夏茨基借钱。阿列克斯始终总是乐意用现金来培养友情。

旺夏茨基同康涅狄格州警察局的关系，在维持温得哈姆县的法律和秩序方面进行实际合作时达到了成熟期。1934

年，在汤普森西北三英里处的北格罗夫纳谷的面粉厂工人罢工的时候，这位首脑由于对俄国无产阶级骚乱预示了革命的情景记忆得太清楚了，所以立即行动起来。这位伯爵是怎样把他的特殊才能提供给执法事业的，这还是用他给州警察局的长官爱德华·希基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明吧：

1934年9月4日，两位州警察局的警官来到我这里，问我能否把我的催泪瓦斯手榴弹借给他们一些，因为他们预料到由于北格罗夫纳谷面粉厂（原文如此）工人罢工，第二天可能会有骚动。我告诉这两位警官说，我很高兴把我的所有的催泪瓦斯手榴弹借给他们，不但如此，我还把两支一寸半口径的催泪瓦斯连发短枪连同一些一寸半口径催泪瓦斯远程发射器和几个警棍都借给了他们。

因为在丹尼尔森的州警察局警官没有多少使用这种催泪瓦斯连发短枪的经验，我就对这两位警官说，我感到给你们一切可能做到的帮助是我做公民的义务，我告诉他们，如果需要的话，我和我的秘书孔尔先生（一个前白俄军官）将一起亲临现场帮助他们使用这种短枪。

第二天早晨，9月5日的上午6点钟，孔尔先生和我把这些装备亲手交给了厄克特中尉。他负责指挥北格罗夫纳谷的警察行动。孔尔先生和我同州警察局的部队一起等待了几乎一整天，随时准备给予帮助。很幸运，事态在北格罗夫纳谷平息下去了，也就用不上我的供应品了。不过，后来在别的工厂地区用上了。”

旺夏茨基并没有因为这次效劳得到官方的褒奖，但是警察确实向他赔偿了用完了的催泪瓦斯手榴弹，是用从一个康涅狄格州国民警卫队的武器库取来的等价军用品来代替的。

在其后的若干年间，阿纳斯塔斯·安德烈维奇定期做一些认为能够讨好执法机构的姿态。比如，1939年夏季，他提出要把十九穴的35亩地给康涅狄格州警察局作打靶场地。这种提议表面上被谢绝了，但希基长官确实到十九穴来作了一次访问，其后在信函中对阿列克斯的殷勤招待表示了谢意。

政治伪装

全俄国民革命党在其全部存在期间，自始至终等于一个肥皂泡。1934年末旺夏茨基同罗扎耶夫斯基决裂以后，实际上他对在中国和满洲国的流亡者已不再发生影响。那里是俄国法西斯分子聚集了一点力量的仅有的地区。尽管如此，阿纳斯塔斯还是不断声称有大致20000到1000000党员分布在43个国家，并且断言他可以组织一支150000人的白俄军队向莫斯科进军。30年代后半期，大约3000000份《法西斯主义者》和无数的传单和明信片从帕特南和汤普森邮局流向世界各地。据这种宣传材料说，全俄国民革命党正在苏联境内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破坏军事设施，暗杀人民委员，等等。

任何政治运动都很少表现出这种想象和现实的矛盾。全俄国民革命党事实上由十几个在新英格兰的成员和十几个通信联系的小组构成。这些小组的活动要依据来自汤普森的汇款的多少而变动不定。除旺夏茨基、孔尔和马梅多夫之外，只有东海岸的三个活跃的俄国法西斯分子。埃夫根尼·博戈斯

洛夫斯基和亚历山大·普利什诺夫在纽约，一个住在曼哈顿商业区，一个住在非商业区。伊万·诺沃吉洛夫从波士顿报告说，他在那里协助管理俄国熊餐馆的一家分店。

然而，1935年全俄国民革命党由于招收了一个当牧师的“战友”而戏剧性地扩大了这个党的成员人数：亚历山大·朱格列维奇牧师是俄国东正教会的牧师，主持长岛海湾边上（昆斯）的一个圣乔治教堂。他矮个子，剃平头，留着络腮胡和八字胡，戴一副眼镜。在他成人生活的大部分时光里，他遭受到政治剧变和基督教会的争论的打击。他在圣彼得堡当学生的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于是他加入了南部地区大批出国的移民行列。他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所俄国人学校里，从事过一段短期的教学工作，后来流落到了布拉格。1924年他被任命为俄国东正教教堂的牧师。五年以后，因为他在一个斯洛伐克人村庄里企图引诱希腊天主教会员离开他们的高级教士而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他在纽约的俄国人大教堂露了面，1933年成功地把斯洛伐克语专门知识用于代表维塔利大主教到喀尔巴阡山脉去的布道团。

朱格列维奇牧师同全俄国民革命党不只是发生精神上的联系。他使旺夏茨基强烈地感到他这个传教士的热诚，以致在1936年，这位首脑让他掌管全俄国民革命党的第一个教育机构——纽约俄国法西斯圣经学校。尽管它有堂皇的名称，这所圣经学校并不太大。西144大街507号，博戈斯洛夫斯基的公寓住宅就是圣经学校的“校园”。年龄在8岁至14岁的男女学生共24名，都来自哈莱姆俄国侨民区。朱格列维奇和博戈斯洛夫斯基分担教学任务。前者领学生吟诵赞美诗，并教

授俄语。后者穿着全套全俄国民革命党党服讲授俄国历史。旺夏茨基和尼古拉二世的画像挂在四壁，装点着纸做的十字垂饰。

圣经学校既不给学生发证书，也不给学生分配工作，没有稳定的基础。学生都是在正规学校放学后，在下午很晚的时候来上学。朱格列维奇和博戈斯洛夫斯基由于高声争论教会特权与世俗特权之间的界限，更增加了不稳定气氛。博戈斯洛夫斯基于1939年死去后，圣经学校没有了校园。朱格列维奇又不打算把哈莱姆的小“战友”用公共汽车接到他那位于市中心区的住宅去上学，于是整个学校无声无息地彻底垮掉了。

圣经学校也使旺夏茨基想到了为纽约的俄国人社区的孩子们创办一个夏令营。温得哈姆县的田园生活环境似乎为户外活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于是在1936年6月，这位首脑在十九穴创办了一个“青年先锋夏令营”。朱格列维奇和博戈斯洛夫斯基从纽约来到十九穴帮忙。他们照顾12个被旺夏茨基称作“俄罗斯童子军”的孩子，但主要担子还是落在米萨·卡普拉尔身上。从1936年到1938年，每年夏季，这些孩子便突然来到十九穴，搞些行军、游泳、唱歌活动。到周末列夫·马梅多夫常常请这些青年先锋分子到普罗维登斯去看电影。马梅多夫偶尔装扮成女子，这增加了许多热闹气氛。要不是他有山羊胡子，倒完全可以让人信以为真。

同他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全部创业功绩相比，旺夏茨基在寻找外国保护人方面特别不成功。德国和意大利的官员把他看成讨厌的人。1934年有一阵子，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可能是他的守护天使。在他进行环球旅行那年，他表露出对日

本人的支持抱有很大希望，他对一个美国记者说：“日本是世界上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弹药的唯一国家。”在贝尔格莱德有人问他是否曾经怀疑过日本的最终目的时，阿列克斯自信地回答：“他们(日本人)不寻求一英尺俄国领土。他们懂得他们的最高利益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主义的俄国作邻邦。”

然而，旺夏茨基在同罗扎耶夫斯基决裂之后，突然转而反对日本。他公开谴责关东军虐待满洲国的白俄，警告俄国爱国者决不要依靠日本的帮助去推翻斯大林。

旺夏茨基也没有培植同欧洲法西斯分子的关系。看起来他同法国的查尔斯·莫尔拉斯、英国的奥斯瓦德·莫斯利、挪威的维德库恩·吉斯林、荷兰的艾德里安·安东·马塞特、匈牙利的弗伦茨·萨拉西以及罗马尼亚的科尼利厄斯·齐利亚·科德里亚鲁等人既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他没有出席1934年在瑞士蒙特勒召开的国际法西斯代表大会。虽然诬蔑者把旺夏茨基同亲纳粹的荷兰石油大王亨利·德特丁爵士联系在一起，但没有证据证实这两个人彼此有任何关系。

这位首脑也同美国的右翼组织保持距离。美国的白卫军缔造者亨利·艾伦于1936年试图说服旺夏茨基共同进行反犹宣传而未成功。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的美国保卫者组织的首脑弗兰克·皮尔斯少校，设法同汤普森建立书信联系，但也不过获得在梅森—迪克森线^①以南分发《法西斯主义者》的特许权而已。阿纳斯塔斯确实同银衫党首脑威廉·

① 美国南方各州和北方各州的分界线。

达德利·佩利以及天主教广播电台的有名人物查里斯·库格林神父通信，但他们的关系从来没有超越《法西斯主义者》偶尔从《佩利周刊》和《社会公正》上转载一些文章这个范围。

由于种种原因，旺夏茨基对美国极右分子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对这些极右分子对华盛顿的敌意感到一点也不自在，因为他从未忘记美国政府给了他避难所和国籍。“我们的处境迫使我们特别小心，不能违背我们作为客人的身份。”他在1938年对一个记者这样说。事实上，一个法西斯主义美国的前途特别不合乎他的心意。正像1939年他坦率地对一个记者提出了这一点一样：“我不愿意看到美国成为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国家里，不会允许我们〔俄国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我们的工作。”总之，这位伯爵不相信美国的右派偏激分子会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给予巨大帮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左派而不是在右派当中旺夏茨基找到了最多的宣传机会，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同《工人日报》在苏联境内宣传全俄国民革命党这方面的共生关系。

在1937年至1938年间，使苏联受到极大折磨的清洗，给旺夏茨基提供了许许多多对《法西斯主义者》有用的东西。不过，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没有仅仅满足于攻击斯大林的残暴或偏执狂。相反，他使用想像和幽默写作以吸引对他本人的注意。例如，1937年12月21日，《波士顿记事晚报》刊登了一份旺夏茨基拍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亚历山大·特罗亚诺夫斯基的电报，提出了显然是有所影射的邀请：

如果斯大林召您回莫斯科的话，我建议您和您的妻

子到汤普森来同我呆在一起。向您致意，并希望早日见到您。

特罗亚诺夫斯基在1939年被召回莫斯科的时候，他拒绝了旺夏茨基的邀请，并且他仍然活着，没有为自己作出这样的决定而后悔。

在戏弄左派的过程中，旺夏茨基欣赏那两面刃式的颂扬之词。1938年他在纽约流亡者的报纸《俄罗斯新言论》上颂扬斯大林：“斯大林是所有人中最优秀的法西斯主义者，他杀的共产党人比谁都多，甚至比我杀的还多！”

然而1939年这位伯爵对一个记者说“托洛茨基是我的天然同盟者”时，他并不是在开玩笑。阿列克斯评价这位流亡在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军事战略家是对斯大林具有毁灭性的批评家，称赞他是一位“百分之百的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据说就在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城附近被暗杀前不久，旺夏茨基给他写过信。如果说信发出去了，也没有得到复信。

整个30年代，旺夏茨基的政治言论前后矛盾重重。正如乔治·康内尔比较有克制地述说的那样：“他为人坦率，但不能始终如一。”阿列克斯今天热心地大讲日本的好处，明天则公开指责它。他先欢迎一个共产党记者到十九穴，然后驾车到纽约去扰乱一个前沙皇军官的讲演。他称赞托洛茨基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指责斯大林是个法西斯主义者。

这些政治把戏部分地是旺夏茨基渴望尽快获得名声并对传统的人物分类法和各种标签持冷漠态度的产物。话虽这样

说，更深一层地讲，人们不得不承认，阿列克斯还是一个流亡者，他不满足眼前的现实，他要在幻想中寻找对失去的过去的答案。

汤普森的活报剧

俄国国民革命法西斯党正在向康涅狄格州的汤普森移动，但不必惊恐——至少美国不必惊恐。不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原文如此)最好要提防。

《普罗维登斯晚报》1937年7月2日

到了30年代的中期，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在汤普森鼓足干劲工作。这座城镇已经成了他小规模地上演他梦想着有朝一日在整个俄国上演的戏剧的舞台。由于本地报纸的广泛报道，到1937年，要是听说在温得哈姆县有谁还没有听到过这位“伯爵”的事情，那是会让人吃惊的。到了那个时候，阿列克斯不再仅仅是一个戏中角色，他正在成为一个知名人物了。自然，对他的评价存在着很大差异。自觉的正派公民，包括马里恩的较为守旧的朋友在内，都把他看作社会上使人困窘的人。对他自称是贵族的说法，按其表面价值来对待的人比今天承认它的人要多些。不过，甚至连容易上当的乡下佬对他的政治抱负也像对一个有点发疯的装腔作势的人的政治抱负一样不予考虑。不少本地居民感激他，是因为他给新英格兰村注入了兴奋剂，要不然这个乡村还在酣睡中。在千百万美国人正通过看电影寻求逃避经济萧条的冷酷现实的时

候，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毕竟为数以千计的帕特南人和汤普森人提供了免费的生气勃勃的消遣。

任何一个瞥见壮年时期旺夏茨基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他驾着橄榄绿的皮尔士箭牌汽车到处奔跑，汽车前挡泥板上插着带卅字的三角旗；他那穿着卡其布衣服的身影是人们熟悉的身影，帕特南的店主们，还记得他把硬币投到柜台上的情景，那姿势就好像他在玩马蹄铁。有时他炫耀一个单片眼镜和漂亮的手杖；这些东西加上他那军人的派头、刷状的发型、黑色的马靴，给人一种比埃里奇·冯·斯特罗海姆更有成就的印象。孩子们和几个胆怯的人，都同他保持着距离，他们被旺夏茨基的大块头和高嗓门吓跑了。但是大部分本地居民看穿了他的大吵大嚷，知道他是一个积习难改的装腔作势的人。

旺夏茨基不让别人可能想到的事情来妨碍他的狂想。他喜欢把自己称作是“顺天意而生的人”。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他的生日按天意恰好同彼得大帝的生日巧合。他赞许地把自己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比，勉强把他们都划在正在塑造20世纪的“世界三人小组”里面。在比较轻松的时候，他把这三人小组叫做“三个滑膛枪手”。感到窘迫的时候，他就会退一步承认佛朗哥可以取得配角资格。

阿列克斯完全确信最后能获得成功，便津津有味地为光辉灿烂的未来制订详细的计划。他为在俄国建一个赛马场设计了蓝图，其中为他本人留出一个可容纳52匹马的马厩。他不是一个忽略细节的人，他给每匹马规定了名字和安排配种。他断言，军事室里穿着他那留有弹孔的军大衣的同真人

一样大小的人体模型，有一天会在莫斯科成为国家的圣物。他印制了带有他自己肖像的邮票，但想到了美国的邮政法，只好满足于在新俄罗斯可能需要它们的时候才用来作圣诞节的标志。在国民革命恢复了俄国的旧货币以后，阿纳斯塔斯也不会感到现金不足。1936年，他购买了票面值为750 万美元的沙俄卢布，盘算着在国民革命以后，他会发一笔金融横财。

旺夏茨基为了把本地人拉入他的幻想世界，想出了许多天真的计策。据报道他把老朋友和家仆都列入俄国未来地方长官和部长的花名册。他在把体育运动用于政治目的方面显得特别内行——反过来也是一样。在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的首脑)于1930年在巴黎被苏联奥格别乌绑架后不久，阿列克斯在帕特南举办世界轻量级拳击运动冠军艾尔·辛格对前届冠军本尼·列昂纳德的拳击表演赛，以此筹集库捷波夫援救基金。七年后，当库捷波夫的继任者叶夫根尼·米勒将军突然落入苏联之手的时候，旺夏茨基提供了25000美元奖励金追捕这位将军的劫持者。

早在1937年，正当苏联的清洗进入高潮阶段的时候，旺夏茨基把十九穴的牛棚改成一个射击场。他把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成员的画像钉在一面墙上，邀请客人用BB型手枪测验他们的枪法。到底有多少记者、警察、农场主以及学生向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以及叶若夫的像开枪射击，人们永远不会知道。然而，人们都知道，1939年，一位名叫戴维·卡尔的记者来到十九穴，为名叫《钟点》的美国反对纳粹宣传委员会的机关报收集在美国的颠覆分子

的材料。卡尔采访了旺夏茨基以后，同孔尔一起参观了这座庄园。孔尔问他是否愿意向苏联政治局成员试几发子弹。卡尔就对着靶子连续发射，竟然几次打中斯大林的鼻子，直到打完了BB型手枪中的子弹为止。这个特殊的插曲没有刊登在《钟点》上。

作为射击场打靶的活翻版，旺夏茨基于1938年7月18日宣布举行“屠杀预测打赌”的开幕式。游客被请来打赌，奖品为现金，打赌的问题是哪些苏联领导人在正在进行的清洗中可能被杀掉。那天，这位首脑公布了他自己的关于斯大林的下一轮受害者的名单，这个名单上有：瓦西里·勃柳赫尔将军^①（远东军区司令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政治局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兼政治局委员）、巴维尔·波斯蒂舍夫（政治局委员兼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党的高级官员）以及尼古拉·叶若夫（苏联纳卡夫德首脑）。阿列克斯获得50%的分数，勃柳赫尔、波斯蒂舍夫和叶若夫的命运他猜对了。

一年以后，这位首脑列出了第二个打赌名单，但正如他对一个记者抱怨的一样：“……可供挑选的人很少。越来越难猜了。大部分好鸟都飞走了。”

第二个名单上有莫洛托夫（他已经在上一年5月继李维诺夫之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还有卡冈诺维奇、伊万·迈斯基（驻英大使）、什捷尔恩将军（勃柳赫尔在远东的继任者）以及贝里亚（苏联纳卡夫德首脑叶若夫的继任者）。

^① 中国称他为加仑将军，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译者

“用不了一年，他们都将无影无踪。”这位伯爵高兴地宣布道。这一次，除什捷尔恩而外，全猜错了。

旺夏茨基在散居国外的俄国人中间施加政治影响的机会越少，他越是决心要摆一摆权力的排场。没有什么比阿列克斯个人武装力量的诞生更能说明这一点了。

自1930年以来，这位伯爵收集了各种类型的能用的和不能用的武器，这有几分是出于怀旧，也有几分是因为害怕行刺，还有几分是为了炫耀。可是他的美国陆军预备军官的任职令到1935年3月16日期满之后，他就不再享有在艾伯克龙比—菲奇公司可以得到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的特权。不用说，重型武器——大炮、坦克、军舰——不是阿列克斯所能买到的，甚至持军官任职令也买不到。此外，不能指望邻居们会容忍大炮开炮，马里恩决不会允许坦克履带翻腾她的花坛。至于军舰，流经帕特南的昆纳波格河连一艘普通快艇也容纳不下。

旺夏茨基用玩具和供玩赏的动物建起他的军队，从而一下子克服了上述所有的那些障碍。这个主意很可能是他在浴缸里想出来的。他习惯了泡在浴缸里不出来，在那里练习他的演讲术。每一个喜欢泡在浴缸里的懒家伙都知道，审慎地眯着眼睛从一个适当的角度看去，再加上一点想像力，于是洗澡水看起来就像是开阔的大海。为什么不用一支海军去占领那一片大海呢？

1937年，阿列克斯从伍尔沃思公司订购了700套模型战舰的成套元件。这张定货单倒空了这家公司在新英格兰的全部存货，最后不得不从芝加哥专门运货来填补不足之数。当货

箱运到的时候，这位首脑和孔尔就开始拆箱并进行装配。每艘战舰都是按照旧时帝俄海军的真正战舰的名字命名的。沙皇伟大的无畏舰队是首先装配起来的，它们的名字都用西里尔字母漂漂亮亮地装饰起来，有佩特罗帕夫洛夫斯克、坎古特、塞瓦斯托波尔和波尔塔瓦。其余的每艘战舰的名称，都是根据追忆一件光荣的往事命名的，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玛丽亚皇后、尼古拉一世皇帝、安德雷·佩尔沃兹万尼、博罗季诺等等。700艘比阿列克斯和孔兹所能操纵的数目多多了，于是他们在装配起36艘之后便停止了装配。那些没开箱的成套元件就保存起来，以备万一爆发海军军备竞赛时使用。

俄国法西斯海军在里姆池塘举行了首航典礼。这个池塘在昆纳蒂塞特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正北，从十九穴穿过县中心路的地方。那些没有倾覆和沉没的战舰被取回来，分成四个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白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并在主房和附属的石头群房周围的窗台上摆开。

因为在全世界有空想的“战友”20000到100万，所以阿列克斯感到不需要招募玩具士兵了。但他确实感到缺少装甲部队。然而，他没有继续使用在伍尔沃思公司选购的特权，而是决定面向有生命的武器。阿列克斯、孔尔、马梅多夫和吉米·巴克搜遍了本地的池塘，千方百计抓来了一打左右啮龟。他们在每只啮龟的龟壳上面都用油彩涂上全俄法西斯党的徽章：红底白卐字，周围镶蓝边。这位首脑不是把他的坦克龟关起来，而是让他们趑趄趑趄地爬回树林里去。据一份资料说，这样就可以改变它们的同类。这位首脑虽然在用古

德里安^①的坦克部队的闪击战来鼓励他的全俄国民革命党的爬行动物兵团方面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但是他观看着这支乌龟队伍有目的地穿过草坪，朝着想像中的沿昆纳蒂塞特小溪排列的苏联防御工事前进，从中得到不小的满足。

1927年，阿列克斯受查尔斯·林白的鼓励，曾短暂地驾驶过一架单引擎飞机在温得哈姆县上空飞了一圈。但10年之后，他的航空时代所能留下的全部痕迹就是军事室里的飞机推进器的速度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帝俄空军首领亚历山大大公于1931年访问过十九穴。可是他死于1933年，致使这位伯爵没有从这方面得到指点。孔尔只具有飞机技工的基本知识。他的这些知识是他在斯特拉特福的西科尔斯基工厂里学到的。德米特里·奥尔舍夫斯基是旺夏茨基的一个熟人，他在新泽西州东奥兰治的埃克利普斯航空公司工作，懂得更多有关飞机的知识，但是这位首脑在1935年11月出版的《法西斯主义者》上面把他叫做“苏联格别乌的特务”，从那以后大概失去了他的友情。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旺夏茨基就把信鸽确定是他的空军，并在牛棚里为这些鸽子修筑了鸽笼。鹰本来更威武（更不必说同全俄国民革命党的徽章有多么协调一致），可是如果没有别的东西，鸽子还是现成合用的。

如果相信本地流言蜚语的话，那么阿纳斯塔斯对拉皮条

① Heinz Guderian (1888—1954) 纳粹德国的将军，1935年受命组建坦克部队，其后长期指挥坦克兵，鼓吹集中使用坦克快速进攻的“闪击战”。——译者

越来越感兴趣也有其性欲驱使的一面。诚然，他始终有一些轻佻的调情之事。但到了30年代中期，调情取乐也许已经不够了。因为马里恩越来越老了，同时听力的困难也使她越来越不接触周围的事物。阿列克斯发觉他正处在一种使自己好色的冲动摆脱约束的地位。

流言盛传而细节模糊。“阿列克斯选择伴侣是不加区别的。”一个从前的庞弗雷特学校的校长谨慎地回忆说。别的汤普森人追忆这位伯爵常常开车去纽约同一些女人（从来没有确定是谁）在范德比尔特旅馆恣意胡作非为，其后把帐单送给马里恩。根据本地的口头传说，旺夏茨基对豪一马罗特女子学校的妙龄女学生很有眼光。这是一所座落在汤普森西南边上的专设进修中等学校。一个长期居民承认，在比较冒失的豪一马罗特学校女学生当中，确有一些在十九穴前面的县中心路上卖弄风骚地来回走动，以此挑逗这位首脑。可是，引起阿列克斯去追求一个妙龄女子不需要费很多事。

尽管马里恩身体虚弱，好像还是发觉她丈夫的行为不检点。一天夜里（确切的日期不大清楚）这位年长的夫人及早从去波士顿买东西的途中归来，发现阿列克斯正在一帮“放荡家伙”中间。当她的凯迪拉克旅行车在自家门前车道上刹住的时候，汽车前灯照见一些女人惊慌失措的场面，这些女人衣衫不整地在房子周围跑动着。

马里恩对这个异常事件的反应没有人记下来，但她显然既没有叫阿列克斯作出解释，也没有威胁着要同他离婚。1942年有人问起马里恩为什么要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不端行为，当时她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回答说：“她终于意识到

她受了欺骗，但是完全处之泰然。”

马里恩确实是“完全处之泰然”，她竟容忍了阿列克斯7月4日的集会。这些欢乐活动需要她付出很大的耐性，因为到了30年代中期，这些集会如果说不具有纽伦堡集会那样的规模，也已开始具有了纽伦堡集会的性质。1937年7月4日，适逢星期日。碰巧在7月5日星期一，阿列克斯的朋友西奥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亲王从英国来到纽约。于是旺夏茨基决定为他的“战友”安排一场周末假日表演。其中最精采的场面可能要算尼古拉二世的一个侄儿的亲自露面了。

为了保证参加集会的人能够到齐，阿纳斯塔斯为周围200英里以内的“战友”提供旅差费，并让朱格列维奇牧师和叶夫根尼·博戈斯洛夫斯基在纽约的俄国侨民区组成一个代表团。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进行宣传，他让从《帕特南爱国者》到《工人日报》各种的报纸处于待命状态。

7月2日，星期五深夜，周末已经开始。此时，旺夏茨基、孔尔、马梅多夫和卡布拉尔驾车来到了帕特南火车站，准备迎接从纽约到来的大约30名“战友”及其家属。午夜，在车站站台上举行过欢迎仪式之后，用了六辆出租汽车才把大家都接到十九穴。

7月3日，星期六，正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大约35名战友已经把工作装和礼服换成带有卐字袖标的褐色衬衫，在孔尔把全俄国民革命党的红白蓝三色旗在石头群房上空升起来的时候立正站立。6名记者拿着照相机和采访本跑来跑去，记录着《哈特福德新闻报》很快会大肆宣传的内容：坚强的俄

国法西斯团体在汤普森举行会议，共谋本国的独立。

星期六用于会议发言和汇报工作情况。全俄国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夫·马梅多夫在牛棚里召集了大会。在这里，满是BB型手枪弹孔的苏联领导人画像和点缀着卐字的寓意画，分别占据了牛棚的墙壁。36名褐衫战友坐在折叠椅上，聆听着首脑的讲话。旺夏茨基对大家到“中央”来表示欢迎，为战友们的政治工作表示祝贺，并且表示相信：如果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清洗还要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全俄国民革命党在圣诞节到来之日就会开进俄国^①。接着，全俄国民革命党各支部的头头都站起来说上几句关于自己所辖地区的情况的话。普列什诺夫、博戈斯洛夫斯基和朱格列维奇始终瞪着眼互相注视着，但都忍住了性子。午餐以后，这位首脑会见每一个战友以资鼓励。当天晚上，娜塔莎·马梅多夫在俄国熊餐馆设了一次庆祝宴会。

7月4日，星期日上午，由全俄国民革命党的教士朱格列维奇牧师支配。11点钟，他在军事室主持了宗教礼拜式。没有做完整的弥撒，只是做了小型的“战斗弥撒”。他声称这是国内战争期间在堑壕里为白军做的一种弥撒。军事室里，那如同大教堂一样的屋顶，悬吊着数面卐字旗和一些帝俄军队的团徽。大家在祭坛前跪下。那祭坛由一张圣像构成，圣母

① 一个未辨明姓名的“战友”后来对一位记者抱怨说，到全俄国民革命党占领俄国的时候，不可能有任何斯大林主义分子留下来受惩罚了。

和圣婴正俯视一个暗红色的酒杯，酒杯里燃着火焰。这些聚在一起的人，为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生活的亲属和同胞大声地祷告。

星期日下午，朱格列维奇为改成存放《法西斯主义者》印刷机的鸡舍进行一番祈神赐福之后，全部时间用于欢庆活动。阿列克斯带领他的宾客穿过县中心路去到里姆池塘。仆人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备好了野餐。一些人开始唱歌。悦耳的歌声同在池塘里溅起水花的孩子们快乐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那歌声飘过昆纳蒂塞特高尔夫球场，最后消失在假日鞭炮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里。

在这整个田园诗的集会场上，穿着褐色衬衫、牵着“阿斯特夫人”和其他德国牧羊狗的警卫们，赶走了好奇的人们，只有那些证明了自己身份的记者们才允许周旋于用餐的人群中。一个记者问一个“战友”是否感到在汤普森有受到共产党人攻击的危险，回答是：

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共产党也听说在这座房子里〔石头群房？〕我们有按钮，有秘密按钮，我们可以按，一按就可以把整个汤普森炸掉，而且我们到处都有机关枪，不过我们没有按。然而，名声在外是我们最好的保障。

过了一会儿，真好像共产党人就在附近似的，两架飞机在庄园上低空盘旋，投下一包包切碎的红色薄纸，像婚礼上的五彩纸屑似的飘落下来。用《哈特福德新闻报》记者弗兰克·

奎因兰的话来说：“空投红色薄纸片，究竟是表示共产党的警告呢，还是仅仅是假日的鬼把戏，无从知道，因为飞机很快就飞走了，无从辨认是谁的飞机。”

7月5日，星期一，高潮突降，周末结束了。贵宾西奥多亲王预定下午到达十九穴。他上午已经乘“欧罗巴”号班轮到达了纽约。可是，偏巧，在汤普森玛利亚诺波利斯学院附近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而使他的行程受阻。玛利亚诺波利斯（从前的卡罗林公馆，即里姆家族的庄园）是玛利亚修道会的神父们开办的一所宗教学校。其中大部分学生是立陶宛人后裔的男孩子，是为培养教士的。碰巧1937年7月4日这天，玛利亚诺波利斯学院庆祝立陶宛人的节日，大约10000立陶宛人移民及其家属从整个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南部突然来访汤普森。7月5日，数以千计的汽车堵塞了101线公路和193线公路，把那个地区留作立陶宛人启程回家的地方。西奥多的轿车卷入了大批离去的车流当中，直到晚上11点钟才到达十九穴。这时大多数战友都已经出发到哈莱姆和巴克湾去了，有一些人在交通阻塞中由于不认识他而失之交臂。

西奥多可能恰恰没有赶上旺夏茨基为他准备的招待会。这个高个子罗曼诺夫皇族的子孙很喜欢阿列克斯，但一提起全俄国民革命党就苦笑。这位亲王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这样说，但他很可能为没有同36个过于激动的同胞见面而感到宽慰。他居住在新英格兰很安静，不管俄国是什么政权形式，他都不希望回到俄国。”为了聚集在十九穴的记者们的利益，他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形式能很容易变成为法西斯国家。”

他的意思是说将会发生国民革命呢，还是说斯大林主义正在变成法西斯主义呢，这不清楚。

西奥多的访问剩下的时间都平淡无奇地过去了，至少对新闻界来说是这样。汤普森的居民都让立陶宛的人流吸引住了，很少留神西奥多的到来，也没有注意到前一天十九穴的欢庆活动。本地人到现在对阿列克斯的外来客人名单和7月4日的欢乐毕竟已习以为常了。但是旺夏茨基还不知道，这种特殊的周末集会使得一些力量运转起来，这些力量有一天会使他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他的古怪行径似乎已开始使他在纽约和华盛顿声名狼藉。跟在汤普森不一样，在那两个地方可有人认真对待他。

第十五章

风暴骤起

当时在康涅狄格州有白俄法西斯分子。我可以带你们到那儿去，让你们看看像本大楼一样大小的军火库，有炸药、枪支和弹药。在康涅狄格州就有50000名法西斯军队。康涅狄格州州长为什么不管事呢？

——众议员萨缪尔·迪克斯坦
(代表纽约)1937年7月27日在众议院的演说。

迈达斯有点物成金的魔法^①，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则有“点物成臭”的魔法；他每做一事，都使他臭名远扬。他一再通过把幻想和烦恼毫无戒心地结合在一起，而把最平庸的事件转变为耸人听闻的新闻故事。早在1921年，他由于在《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中“供认”有六名凭空想像的杀人

① 据希腊神话，迈达斯是弗利治亚国王，贪婪钱财，求得神仙赐给点物成金的法术。

——译者

犯而使自己名声扫地；接着在1922年，他在同马里恩一起去教堂结婚的时候，就以大发婚姻横财而引起世界的注意；然后在柳巴·穆罗姆斯基指控他犯有重婚罪的时候，对他的注意到了更高程度。整个20年代，他违章超速驶车的传票、放荡集会和音乐喜剧似乎接连不断使这位康涅狄格州的伯爵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公众的视线。

然而，在30年代，旺夏茨基臭名昭著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那以前，非议他的人——主要是他的一些姻亲——主要是把他看作一个讨厌的人。但是到30年代末期，他被人描绘成一个对美国和苏联都有严重威胁的人。报纸和国会对他发出一片喧嚣的谴责声，这迫使华盛顿方面努力要弄清楚旺夏茨基到底是什么人。1933年到1941年间，至少进行了20次政府的和私人的调查。为进行这些调查，且不说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和财政部的官员所耗费的时间是可想而知的。可是，甚至在1941年，联邦调查局还没有肯定它究竟是在对付一个德国——日本的超级间谍呢还是在对付一个不关痛痒的装腔作势的人。

实际上在汤普森，人人都知道阿纳斯塔斯·安德烈维奇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那么，他怎么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焦虑不安呢？首先，人们离开汤普森越远，就越容易夸大这位伯爵的能量和重要性。其次，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记者，更愿意使旺夏茨基显得重要。《工人日报》显然发现选定他当怪物是很理想的；连不关心政治的记者都发现，旺夏茨基是报道的好材料。他是一个有吸引力、有生气、令人憎厌和有异国情调的人。他恰到好处地蒙上了一层

神秘面纱。与此同时，他使自己适合于所有记者的口味，而无论他们持什么样的政治态度。

除有意为旺夏茨基树立声望者而外，还有另一些事先倾向于按表面价值理解他的主张的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自由主义者。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他们感到惊恐和反感，并且倾向于把苏联当作阻止法西斯主义蔓延的堡垒（至少到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之前是这样）。在这些人的眼里，把旺夏茨基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旺夏茨基自称法西斯主义者，又带有卐字袖标并哼着《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尽管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并且公开反对苏联。所以，他一定是一个纳粹分子。一旦“纳粹”的标签贴在这位伯爵身上，那么凭那个词产生的一切联想也就附着在他身上了。

最后，还有几个政客，不管他们是否把旺夏茨基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但他们把旺夏茨基当作他们自己发迹的垫脚石。正是在这最后一群人当中，这位首脑终于遇到了他的难以对付的敌手。

全国性的波及旺夏茨基的风暴酝酿了大约10年。这是由于有被几次间歇分开的四次爆发而显得突出的10年。虽然每一次爆发都指出阿列克斯的古怪行为最终会把他引向何处，但是他根本没有注意——直到注意之时，已经为时过晚。

1931年至1935年的微波

公众对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的攻击开始于1931—1932年，当时《工人日报》把旺夏茨基同反苏的资本主义阴谋集团联系起来，把他同谋杀在俄国的美国工程师的阴谋联系起

来，还把他同谋杀日本首相犬养毅的案件联系起来。接着在1933年，当旺夏茨基建立全俄法西斯组织并创办《法西斯主义者》的时候，当他在柏林同俄国右派分子协商的时候，以及当他发动反对美国在外交上承认苏联的宣传运动的时候，《工人日报》和自由主义流亡者报纸对旺夏茨基的攻击升级了。但是，引起更普遍反应的是他在1934年企图成为全世界俄国法西斯主义者首脑。

作为一个宣传花招，旺夏茨基1934年的环球旅行是一次绝对的成功。他使他的肥皂泡般的全俄法西斯组织同罗扎耶夫斯基的比较有实力的满州组织联合了起来，而且被人认为他会见了日本将军、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罗森堡——这是他有意不予纠正的误解。他还在上海和巴黎之间的俄国侨民地区提高他自己的知名度。《法西斯主义者》把他的旅行作为罗马征服者的旅行来加以记述。甚至连一般说来还是很严谨的法国《时报》也宣扬他是“俄国的希特勒”。

1934年的环球旅行在华盛顿引起了一阵忧虑和慌张。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这位首脑将于1934年3月访问日本甚为警惕。他不心存侥幸，听任自然，而是通知在中国、日本、中东、巴尔干半岛各国和法国的使节准备随时报告旺夏茨基的活动和言论。在夏威夷准州谢夫特堡的军事情报机关接到通知说，这位首脑的旅行路线将经过檀香山。

1934年4月至8月间，华盛顿接到从东京、哈尔滨、上海、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和巴黎等地发来的关于旺夏茨基的情况报告。这些报告常常伴有报纸剪辑和流亡者中提供情报的人草草记下的和翻译的旺夏茨基的讲演内容。国务卿赫尔

从所有这些材料中了解到：第一，旺夏茨基持有美国陆军后备役中尉任职令，而与日本军事人员进行过多次讨论；第二，旺夏茨基刚刚被任命为首脑的全俄法西斯组织企图推翻苏联政府。这样，这位国务卿立刻面对着确定旺夏茨基的活动是否构成违反1933年美苏建立外交关系时签定的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的问题。双方在这协定中保证，不允许任何有以下目的之一的组织或集团在各自的领土上形成或居留，即“旨在推翻或准备推翻，或者旨在用武力改变对方国家的政治或社会秩序”。为了向国务院回答这个问题，东欧事务司副司长厄尔·帕克奉命对旺夏茨基进行调查。他立刻派遣特派员班纳曼去汤普森。

1934年11月7日，班纳曼从纽约给旺夏茨基打了电话，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就坦率地讲明了自己的任务。这位伯爵告诉他说，这种机密的事情不能在电话中讨论，并邀请他当天下午4点半钟到十九穴来。当班纳曼到达的时候，他受到了一个男秘书的“非常仔细的查看”，而后被引进军事室，并接受多纳特·孔尔的讯问。然后孔尔拿着班纳曼的身份证下楼去了。一会功夫，一个穿着便服、高个儿、腰板挺直的男人大步走进军事室。他谦恭地问来访者他能帮助他做些什么。

其后一个半钟点班纳曼听取了这位首脑关于他的党及其目标的叙述。这位伯爵向来访者保证说，在美国的俄国法西斯主义者只从事宣传活动，而不卷入军事干预的各种计划。当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苏联会同时面临内部的剧变和外部的入侵。那时，在美国的全俄法西斯党的“冲锋队”将加入他

们远东战友的行列。他们的任务将是在日本军队占领的地区先于日本军队争取俄国农民和工人。伴随着“国民的”俄国的建立，日本军队将会撤退，或者面临着他们手上的“第二个爱尔兰”。阿列克斯说，他已经同日本领导人讨论过这项计划。可是这些日本领导人的态度还不明朗。同时，旺夏茨基承认他的冲锋队中有些人是反犹的，但他认为全俄法西斯党总体上不反犹。事实上，《新俄罗斯言论》的犹太人编辑马克·温鲍姆最近在十九穴用了一夜时间讨论同《法西斯主义者》协作的可能性。然后旺夏茨基交给班纳曼一些关于他自己的报纸剪辑，并向这位特派员保证，他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班纳曼于11月10日向帕克提交了一份关于他同旺夏茨基谈话的报告。报告声称在这位伯爵身上看不出有害的东西，并且断言：

……这是一个旧时的贵族白俄，热衷于干尽可能有损于苏联的事。以他的幸运和显然幸福的婚姻，再加上他那有迷惑力的个性，他能够把他的愿望大规模地转变成行动。

阿纳斯塔斯得出结论，他给班纳曼留下了好印象。六个星期之后，他接受《华盛顿明星报》采访时声称，国务院的调查员们(他用了复数)已经给了他一张“无疫证书”。

旺夏茨基对《华盛顿明星报》说的话，引起了亲苏派的愤怒反应；他们很快就严厉申斥国务院与旺夏茨基的罪行有共

谋关系。纽约的苏联之友的机关月刊《今日苏俄》上，刊登了一系列有关旺夏茨基的文章，其中列昂·登南确认帕克的上级、国务院东欧事务司司长罗伯特·凯利就是未决犯。按照登南的说法，凯利是一个华尔街的臭名昭著的反苏工具，他的大部分情报都是从在巴黎和美国出版的白卫军报纸上获得的。据推测，凯利“张开双臂”接受旺夏茨基来充当暗中破坏苏美关系的工具。

登南的文章作为30页的苏联之友的小册子在1935年再次发表，书名是《白卫军恐怖分子在美国》。这本小册子已经成了“旺夏茨基逸闻轶事”的样板：这是一种富于想像的危言耸听的文学，它把这个伯爵捧为对苏联和美国的威胁。文章介绍说，阿纳斯塔斯是“一个杀害俄国工人的凶手，并且是一个凶手的儿子”，他的目的是“通过制造恐怖、暗杀苏联领导人和策划对苏联的战争”来接管苏联。在他的背后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继承人马里恩·里姆，更重要的是，她同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关系”，就不用提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亨利·德特丁爵士、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及阿道夫·希特勒了。1934年在柏林，艾尔弗雷德·罗森堡亲自“赞扬并款待了”旺夏茨基，希望在已有所计划的德——日入侵苏联时争取这位伯爵的军队的援助。按照这本小册子的说法，倒不如说旺夏茨基随时准备效劳。事实上，登南警告说，旺夏茨基正在组建一支全球性军队：

至少在全世界有100万白俄军队正在策划打垮苏联。其中仅仅在纽约就有3000多人……在墨西哥、阿根廷、

美国、德国、波兰、中国和满洲，在全世界，旺夏茨基之流的代理人正在招募反革命军队。

旺夏茨基对登南的小册子非常满意，三年以后，他用它作为委托他人撰写他自己的传记的样板。

登南和旺夏茨基认为国务院已经给了这位伯爵“无疫证书”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1935年3月13日，国务卿赫尔写信给陆军部长乔治·德恩略述了旺夏茨基的活动并询问他的军官任职令是不是该撤销了，德恩把这封信转给了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在3月26日向赫尔保证，旺夏茨基的任职令在10天以前就已经到期了，并且不会再换新的。

赫尔并没有让这件事就此了结。5月18日，他送给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一包报纸剪辑和一些关于旺夏茨基的机密报告，询问这位伯爵的反苏活动是否违反了任何法律条款。卡明斯在6月17日回答说：“审查了已揭露的这些事实，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表明旺夏茨基先生的活动违反了联邦法律的任何条款。”

这位司法部长是在故意对那种公开表示要推翻外国政府的行动熟视无睹吗？这个问题很快就成为一个苏美关系中的尚在争论的问题。当美国的共产党人在1935年7月到8月间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全世界代表大会的时候，赫尔认为他们的到会是一种“公然违反1933年11月16日我们作出的互不干涉的保证”，并立即起草了一项措词强烈的抗议书。莫斯科在拒绝接受这个抗议书时，要求对“白卫军”

在美国的活动予以注意——简单扼要地提到旺夏茨基。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务院或任何美国政府机构准许这位伯爵的古怪行为。政府暂时把旺夏茨基丢下不管，很可能是因为他好像不起什么作用。至少他再不能穿着美国军装到处游荡了。

1937年的阵风

在第一次对旺夏茨基的政治行为产生一系列的风波两年以后，他再次发觉自己是公众义愤的对象。虽然引起这种愤怒的直接原因是无足轻重的（在前一章已经描述过的7月4日周末的壮观景象），但这次强烈抗议却表现出更为重要的一面。

在这次周末的一个多月以前，由于有关旺夏茨基的图画故事在1937年5月21日一发表，震颤就开始了。这篇故事是在《匹兹堡新闻》上用这样的大字标题发表的：

“反抗俄国！美国的女继承人把财产奉献给丈夫的反苏政党。”

这篇故事是通过一些照片来叙述的：有旺夏茨基身穿全套军装的照片，有戴着阔边遮阳帽的马里恩的照片（“把她5000万美元的财产奉献给她丈夫的事业”），有石头群房的照片（“名副其实的堡垒……可以抵得住围攻”），有军事室内圣像的照片（“圣像在摆得密密麻麻的步枪和头盔当中”），还有米萨·卡普拉尔的照片（“在人们熟悉的纳粹党旗旁边敬人们

熟悉的纳粹礼”）。在一幅古里古气的枪支的图片下面写着这样的解说词：“这些枪支是用来训练他的私人白俄军队的，这支军队是他从纽约城用大客车运来的。”这篇未署名的文章的结尾加了个注解：“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发觉旺夏茨基先生是个近便的邻居。他们偶尔借用他的步枪和催泪瓦斯来平息罢工的骚乱。”

《匹兹堡新闻》的一个读者的情绪被完全搅乱了。他写信给国务卿，询问无论什么人在美国境内建立“私人军队”究竟是否合法。国务院向司法部长转达了这个询问。司法部长通知《匹兹堡新闻》的读者说：“司法部长由法律授权只对总统和政府各部发表意见。”这种答复不足以解决旺夏茨基的7月4日周末集会引起的后果问题。

7月5日从汤普森周围立陶宛人造成的交通阻塞中最后走脱的战友，几乎还没有推开家门，愤怒的信件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向华盛顿。在第一批信中有一封是写给罗得岛众议员艾梅·福兰德的，信中这样谴责说：

……一伙法西斯分子、颠覆分子和不满政治现状分子的乌合之众，正在利用我们国家相对的自由来策划推翻一个友好国家，也就是苏联。我还注意到，这帮罪犯和谋杀者显然拥有杀人的武器。

写信的人要求立即由联邦调查局和情报机关进行调查。福兰德把这封信转交给国务卿。国务卿只起着反射作用，把信送给了司法部长，让他去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除了来自公民个人的信件而外，还有来自三个共产主义阵线组织的信件和电报。这三个组织是美国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联盟、苏联之友和国际工人公会。美国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联盟康涅狄格州诺沃克支部的书记赫斯特·亨廷顿，7月19日打电报给康涅狄格州众议员威廉·西特伦、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弗朗西斯·马洛尼和国务卿赫尔，抗议违反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的旺夏茨基的党的存在。苏联之友纽约地区的书记斯坦利·伦道夫，在7月12日至29日的一连串信函中向马洛尼、赫尔、康涅狄格州州长威尔伯·克罗斯以及司法部长卡明斯转达了同样的意见。设在纽约的国际工人公会从7月到8月发动了一场以书面形式提出要求的运动。来自哈特福德、普罗维登斯、纽约和芝加哥当地的国际工人公会的信函雪片似地飞向赫尔和罗斯福总统。芝加哥国际工人公会领导人尼古拉·库兹科指控旺夏茨基“利用他的住宅作军火库，以贮备用来反对苏联及其国内外的朋友的军需品”。国际工人公会的主席威廉·韦纳声明：

俄国国民革命法西斯党是对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和对我们美国的民主政体的一个恐吓和威胁。必须取缔这个党，禁止它进一步活动。

信函和电报也不是7月4日周末集会所激起的揭发旺夏茨基逸闻轶事的唯一形式。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的名字很快就在国会中回荡。国会的关注不但来自康涅狄格州或罗德岛的代表，而且也来自纽约市的民主党人萨缪尔·迪克斯

坦。他于1885年生于俄国维尔纳(维尔纽斯)附近,1891年就已移居美国,是在纽约下东城长大的。1922年,他被选入众议院。他专门研究移民事务。随着希特勒的兴起和在德国迫害犹太人,迪克斯坦成了一名热心在美国境内追捕极右分子的人。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他担任约翰·麦科马克特别委员会关于纳粹宣传问题的副主席职务。1937年1月,他作为众议院移民和归化委员会主席,提出一项把那些想尽快获准进入美国而缔结婚约的“不受欢迎的外侨”驱逐出境的议案。也许,旺夏茨基就是他心目中的那种人之一。

1937年7月9日,迪克斯坦通过广播讲话向旺夏茨基发起了公开的攻击。他把这次广播讲话附录在议会记录里面。在广播中,这位众议员作了些故弄玄虚的暗示,使旺夏茨基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魔鬼:“在今天的康涅狄格州,有一个组织,在美国控制着50000名法西斯分子。他们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颠覆性外国集团在一起密谋策划。”

17天以后,迪克斯坦在众议院的讲话中确认“其他颠覆性的外国集团”就是德国的纳粹和意大利的黑衫党:

这些纳粹分子、黑衫党徒、法西斯分子以及肮脏的白衫分子形成了一个组织。兼有纳粹分子和黑衫党徒性质的白俄头目就是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如果我不正正经经地宣布他的名字,那么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打口哨来召唤他。有那么一个拥有大量金钱的女人,她积资达数百万元,竟完全发疯了,同这个所谓的从前的伯爵或前任的大人物结了婚,并把这全部财产用来在美国建立白

俄组织。这个组织正在同纳粹分子结合到一起，目的是推翻俄国政府。

就在第二天，7月27日，迪克斯坦继续揭露旺夏茨基。这一次，他确定康涅狄格州共有“50000名法西斯分子”，并相信十九穴有一个“像这座楼房（可能指美国国会大厦）一样大小”的军火库。此外，他要求知道康涅狄格州州长威尔伯·克罗斯针对这种情况正在做些什么。

迪克斯坦从什么地方获得50000名康涅狄格州的法西斯分子这个数字，尚不清楚。除了旺夏茨基想入非非地宣传的数字而外，即使把乌龟和信鸽都算在内，50000这个数字也远远超过了全部实在数字。这些细节没有阻碍这位众议员在整个7月的最后几天和进入8月以后，大胆地反复说到“肮脏的白衫分子”。

在这种愤怒的猛烈袭击下，用迪克斯坦的话说，国务院不得不“做点事”了。就在迪克斯坦讲演的几乎同一个时间，特派员班纳曼奉东欧事务司司长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之命再次查访旺夏茨基，要揭露他到这时为止是什么人。班纳曼在驱车去汤普森之前，走访了设在哈特福德的康涅狄格州的司法部长办公室，想知道对旺夏茨基正在采取些什么措施。显而易见，什么也没有做。谁也没有提出这位伯爵的古怪行为让司法部长注意。然后，班纳曼驱车来到帕特南，同当地邮政局长谈起声名狼藉的7月4日周末的事。他了解到：

……关于旺夏茨基的情况没有最新的宣传材料。只有一条从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报纸上引述的地方新闻，谈到属于那个运动的一些代表于7月4日在旺夏茨基的庄园上集会。除此之外，本地对这次集会不感兴趣，因为在同一个周末，玛利亚修道会的神父们的一次大型集会在同旺夏茨基庄园相毗连的一座庄园里举行。而这次聚会在帕特南的报纸上处于突出的地位。没有关于县检察官被要求采取任何行动的流言蜚语。不曾有任何扰乱治安的行为，也没有旺夏茨基的代表穿军服或者参加军事训练或游行的迹象。实际上，如果布里奇波特的那条消息不在本地报纸上被引述的话，这次聚会在帕特南没有人注意就开过了。

班纳曼断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去见县检察官了，就从帕特南给旺夏茨基打了电话，约定同他见一次面。这位伯爵邀请他直接来。15分钟之后，7月26日的下午3点钟，两个人在十九穴前的草坪上会面了，而后就来到了军事室。

当问到最近的报纸宣传是不是使他的活动有所改变时，这位伯爵回答说，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宣传员。他接着说，宣传是他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最好武器，并且是真正适合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人数较少的白俄使用的唯一的武器”。所以，他欢迎有关他的任何宣传。

至于7月4日的周末集会，旺夏茨基解释说，他邀请了大约35名党员及其家属作为他的客人，并且见到了尼古拉二世的侄儿。确实进行了政治方面的讨论，但没有进行军事训

练。7月4日的几天之后，《工人日报》的哈里·雷蒙德从纽约打来电话，询问关于周末的事。得知雷蒙德将利用手头的一点材料谴责全俄国民革命党的时候，旺夏茨基邀请他进行一次个人会晤。雷蒙德接受了邀请，并且同预料的一点不差，《工人日报》大肆宣传“法西斯营地”及其“巨大的军火库”。阿列克斯本人对这种宣传表示非常满意。这些宣传不管怎样对他不利，都会使他和他的事业在苏联境内为人所知。

班纳曼问起他同国外的联系，旺夏茨基怨恨地提到日本。日本无情地对待在满洲的白俄妨碍了全俄国民革命党同东京的合作。至于德国，阿列克斯宣称，他既不是希特勒的拥护者，也不是希特勒的敌人。这位首脑对希特勒的态度将取决于这位元首对白俄的抱负的理解和政策。

接着，旺夏茨基带班纳曼去参观军事室，解说着他在什么地方买的枪，背诵着关于每一面团旗和每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画像的故事。自然，他不能不详细讲述那披在人体模型上的带有弹孔的军大衣。他宣称，不是颠覆性的目的，而是对个人安全的忧虑支配他建起地下办公室、养德国牧羊狗以及购买催泪瓦斯弹。他提醒班纳曼注意，这些催泪瓦斯弹自1934年9月以来从未被州警察局使用过——尽管报纸上说使用过。

当特派员班纳曼在那天傍晚离开十九穴的时候，他已承认：

把旺夏茨基住宅的附属群房描绘成一个军火库是完

全歪曲事实……没有任何军事活动的证据……对一个居住在相当偏僻地区的积极反苏宣传家来说，在庄园里养着狗和储存着炸弹一定是为了更加保证安全。完全没有看到他拥有侵略性的军事设备或者抱有任何军事目的的证据。

7月28日，班纳曼在起草给莫法特的报告之前，派两个部下到百老汇大街501号去核对弗朗西斯父子公司的售货单。因为从1930年起，旺夏茨基在那里买了五打步枪。店员斯科特找不到办理这些业务的装货清单，但因为买主的“显眼的外表和贵族式的举止”，店员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由雷明顿军械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为沙皇政府制造的这些步枪，都是合乎俄国的弹药和瞄准器（是步幅，不是英尺）标准的。由于爆发了二月革命，这些枪支没有交货，后来就包扎起来放在曼哈顿商业区的一个枪炮商人的库房里，每支标价14美元。斯科特回想起来，旺夏茨基当时解释说，他在康涅狄格州组织了一个本地的射击俱乐部，因为是俄国人，便想买同祖国有联系的设备。这个店员不认为这笔买卖有特殊意义，因为“射击俱乐部、美国军团的兵营以及相类似的组织按汤普森顾客所说的理由买走若干步枪并不是奇怪的事”。

在班纳曼的7月29日的报告送达国务院的时候，国务卿赫尔也从助理司法部长布里恩·麦克马洪那里收到了关于旺夏茨基的活动并不违法的意见。麦克马洪在仔细审查了所有的控告以后得出了结论，这位伯爵没违反任何联邦刑事法规。

然而，旺夏茨基是否违犯了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那是另外一回事。麦克马洪对这后一个问题听候司法裁决，叫赫尔请求司法部门进行一次正式调查，如果他想得到答案的话。

很明显，国务院不愿请求司法部门对旺夏茨基进行正式调查，就暗示司法部长按照罗斯福—李维诺夫的协定，就这位首脑的活动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一个非正式的意见。8月12日，国务卿赫尔的一个助手把班纳曼1934年和1937年的报告的抄本连同罗斯福—李维诺夫通信的副本一起送给了麦克马洪。送交这些文件的说明信问道：旺夏茨基触犯了“总统1933年11月16日给李维诺夫信中所包含的任何承诺吗？”

在麦克马洪8月17日的答复中，可以觉察出官僚主义无精打采的乒乓球来回推挡声：

我已考虑了随信送来的材料中所包含的那些陈述，但在我看来，本部不能就所提出的问题发表观点。理由是，这似乎纯粹是应由你部从行政观点予以决定的外交问题。

国务院根据它自己的对策又推了回去，便不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了。

如果麦克马洪没有向国内税收高级专员和联邦调查局通报旺夏茨基的活动情况，旺夏茨基可能已经堕入了被官僚主义遗忘的角落。由于麦克马洪的通报，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在8月和9月间徘徊在汤普森的周围。9月24日联邦

调查局的调查员乔治·斯塔尔在十九穴会见了旺夏茨基。他的成果——26页打字纸，连同一些图片和《法西斯主义者》合订本——全部交给了埃德加·胡佛；胡佛于1938年1月4日把它们转交给司法部长卡明斯。从这个时候起，联邦调查局坚持对旺夏茨基进行全面的监视。

1938年至1939年风暴暂时平息

随着7月4日周末而来的、围绕旺夏茨基旋转的公众抗议和政府审议，到1937年末渐渐消散了。迎来了一个几乎持续两年的比较平静的间歇。这种不平常的宁静，一部分是由于阿列克斯常常身在国外造成的。

1938年春，阿列克斯和马里恩到了欧洲。3月初，他们在第三帝国逗留得太久，感到不受欢迎，便去到奥地利。3月14日，当阿道夫·希特勒为了完成德奥两国的“政治经济联合”进入维也纳的时候，他们站在数以千计的旁观者当中。他们继而到了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会见了国内战争的白军英雄、库班哥萨克骑兵首领安德雷·什库罗将军；这位将军邀请旺夏茨基出席了一次大约150名哥萨克老战士的宴会。旺夏茨基作了讲演（他后来回忆说“博得热烈掌声”），并且被尊为库班哥萨克骑兵的名誉成员。这一插曲标志着他旅行中的顶点。

旺夏茨基于5月回到汤普森以后，发现他的名声陡然衰落了。没有报纸提及他的这次旅行。国务院、司法部和财政部似乎也如此，都不理睬他。众议员迪克斯坦好像已经把他忘记了。众议院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也称戴斯委员会，根

本没有注意到他。阿列克斯的名字在这个委员会举行意见听取会期间确实出现过一次（在1938年11月21日），当时有人说“他有一个军火库和他自己的一小股军队”，但这些话没有引起明显的兴趣。按照布里奇波特《星期日先驱报》的说法，旺夏茨基实际上有点感觉受到戴斯委员会的轻视。

湮没无闻似乎使阿列克斯烦躁不安。1938年后期，他和马里恩商定再进行一次环球旅行，即五年^①中的第三次旅行。尽管（或者说由于）同罗扎耶夫斯基发生了分裂，但阿纳斯塔斯还是想要检查一下他在远东的一小撮跟随者，其中大部分住在上海。他也担心德国政府对他的不友好的态度，感到在这第三帝国中进行一点疏通活动可能有用。最后，他正计划委托别人写一本他的自传，打算找一个顺从的作者和便宜的出版社。

1938年，在圣诞节的前几天，阿列克斯和马里恩（这次没有孔尔）从纽约登上多拉尔公司的波尔克总统号轮船，经由巴拿马到洛杉矶去。他们1月16日抵达那里，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全俄国民革命党分支机构的首脑费奥多·西门斯的欢迎。在短暂的中途停留期间，旺夏茨基会见了一些当地德美同盟的成员。这是一个亲纳粹组织，西门斯同它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旺夏茨基还访问了正在预言将在罗马尼亚发生战争的《洛杉矶时报》。然后这对夫妇继续乘波尔克号轮船沿海岸上行，于1月18日抵达旧金山。他们在圣弗朗西斯旅馆登

① 他们的第二次环球旅行是1936年乘坐亚当总统号轮船进行的一次平淡的环球旅行。

——原注

记住下。此后三天的时间，旺夏茨基用来会见当地全俄国民革命党的代表和旧金山俄国人社區的一些重要成员，其中包括俄国人报纸《新霞光》的编辑格里戈雷·季莫弗耶维奇·苏霍夫和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亲王（他是亚历山大大公的小儿子，西奥多和尼基塔二亲王的兄弟）。1月21日，马里恩和阿列克斯重新登上波尔克号轮船横渡太平洋。

1月28日，在檀香山10个小时的中途停留期间，“旺夏茨基伯爵和伯爵夫人”（这是波尔克号轮船旅客名单上证明他们的身份）在一等家庭客舱里会见了檀香山《广告报》和檀香山《明星公报》的记者。尼古拉二世从悬挂在舱壁上的像框里凝视着下面的举动。

当记者问起他的使命时，这位伯爵耸一耸肩说“无论如何间谍也将会知道。我为什么不该把我的计划告诉全世界呢？毕竟，它关系到全世界。”

旺夏茨基以一种阴谋家的低声细语吐露，他是正在奔赴约定地点去同远东的党的首脑们集会。

我出于战略的考虑来安排我的行程。一支宣传人员大军正在俄国等待着在俄国境内发动一场进攻。我的数以千计的党员在俄国外面等待着援助俄国境内的那些人。今年的活动很重要。斯大林的统治一直在削弱。

预料到要问起他的西服领上的卐字徽章，旺夏茨基解释说：“不，这不是纳粹党徽。希特勒的党徽是黑字红底。我

们的党徽是白字蓝底。我们早在希特勒上台执政以前很久就采用这种符号了。”

像往常一样，旺夏茨基把十九穴描绘得像一座“转变成坚不可摧的要塞的城堡”，从而为记者增添了生动的笔触。也许两位檀香山的记者被石头棱堡冲昏了头脑，竟用普利茅斯代替了汤普森。

阿列克斯和马里恩2月7日抵达上海(当船停留在横滨和神户的时候，旺夏茨基甚至连船都没下)，在国际饭店登记住下。他们受到康斯坦丁·斯特克洛夫和十几个当地战友的欢迎。斯特克洛夫喜欢别人叫他“上校”，他一直在出版一种亲旺夏茨基的报纸(《俄罗斯前卫报》)，并从汤普森领取津贴。他也拥有一个崇高的而主要是装饰性的头衔——全俄国民革命党远东首脑。

旺夏茨基1939年对上海的访问，得到了纳塔利亚·伊利娜用夸张语言进行的描述。伊利娜本是个流亡者，1947年返回苏联，后来出版了两卷小说化的回忆录。伊利娜估计马里恩拥有价值5000万美元的财产，暗示旺夏茨基和东京之间有导致灾难的关系，并描述了俄国法西斯联盟首脑罗扎耶夫斯基从哈尔滨专程到国际饭店同旺夏茨基交换意见。

伊利娜所写的情节本来使阿列克斯很满意，但日本外交档案和陆军档案却都画了一幅有点不怎么引起人们兴趣的图画。它们没有提到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的会谈；两位首脑中谁也没有提到曾经在1939年或者另外哪一年在上海短暂相见。日本陆军情报处认为斯特克洛夫的报纸是反日的，而三浦义明领事表示旺夏茨基可能企图在上海白俄中间煽动反

日情绪。因此，他警告东京方面，这个美国人值得“严密监视”。

旺夏茨基不需要担心日本人。他仅仅停留四天之后，于2月21日登上开往欧洲的班轮。他在这座城市的唯一收获是找到了一个为他写自传的作者——格罗津。

格罗津的获得补助金的写作成果《防护衫》于1939年晚期在上海由俄语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能完成得这样快，是由于它的大部分是从苏联之友出版的利昂·登南1935年的小册子《白卫军恐怖分子在美国》上摘取的。

其余的旅途令人扫兴。不像1934年在中东和在巴尔干半岛各国那样，有记者成群结队地来采访他，不像在1938年那样，有哥萨克将军款待他。当他到达柏林并在阿德隆登记住宿时，他获悉全俄国民革命党和《法西斯主义者》在整个德国被取缔了。

旺夏茨基因为好几个原因同德国当局发生冲突。诸如伯蒙特—阿瓦洛夫这样的当地俄国纳粹分子把他看成是一个争地盘抢山头的人并不遗余力地败坏他的名声。旺夏茨基缺少反犹热情，这使他容易受到攻击。他的对手加紧利用这一点，并且谣诼四起，说孔尔是犹太人，说马里恩的雅利安人世系值得怀疑，说全俄国民革命党由美国犹太人提供资金。罗扎耶夫斯基驻柏林的代理人波里斯·特德利，竭力使盖世太保注意这种种流言，可是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推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全俄国民革命党战友，也许是旺夏茨基在德国的唯一追随者，被传唤到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问他是愿意在学校完成学业，还是愿意到集中营去。他很快

表示愿意选择前者。这个惊恐万状的小伙子被通知与旺夏茨基断绝关系。在这种环境下，全俄国民革命党在柏林的白俄社会甚至连一小部分赞助者也没有指望得到。

旺夏茨基在离开四个月以后，于4月20日又回到了汤普森。他审视了政治形势。国际形势看上去很有希望。苏联似乎同日本和德国走在相撞的轨道上。斯大林的清洗似乎已经伤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元气，使政权——根据旺夏茨基的判断——严重削弱。这位首脑意识到，命运的召唤随时都可能到来。可是，他准备好作出响应了吗？他的党还没有外国保护人。它在德国和日本被取缔，没有多少希望趁机利用苏德战争或苏日战争。

旺夏茨基担心即将来临的大变动会把他关在门外喝西北风，便做了命运攸关的抉择。他将要去讨好德美同盟，并由此在柏林树立他的信任。

1939年的狂风

旺夏茨基对这个德美同盟或者对它的好战的蓝眼睛的首脑弗里茨·朱利叶斯·库恩来说并不十分陌生。库恩1896年出生在慕尼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堑壕里度过了四年，而且作为自愿军团的一个自愿兵在波罗的海沿岸同布尔什维克打了一年仗。他1921年加入纳粹党，据说两年后参加了慕尼黑啤酒馆暴动。1928年，他经由墨西哥来到美国，取得了国籍，而且在密执安州的迪尔本找到了工作，成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化学师。1933年，库恩加入了新德意志之友。这是一个德国人和德裔美国人同戈培尔的宣传部密切联系的

纳粹组织。库恩很快就晋升为这个组织的中西部首脑。当一个“纯粹美国人”的德美同盟于1936年形成的时候，库恩晋升为首脑。库恩和旺夏茨基有着共同的军事背景、移民身份以及好出风头的嗜好。他穿着一套定做的制服（他声称这种服装是按美国军团的制服样子做的），大摇大摆地到处走动，发表恐吓的演说，过分地装腔作势。但他同旺夏茨基不一样，库恩憎恨犹太人，崇拜阿道夫·希特勒，并且既无想像力，也缺少幽默感。

库恩和旺夏茨基恰恰是在一次舞台演出中开始认识的。1937年1月，同盟首脑写信问这位伯爵是否想要一些定于2月12日星期五在纽约马戏场举行的一次大会的免费赠送的入场券。这次大会预计要把同盟的成员以及意大利裔美国人、西班牙君主主义者和帝俄的代表召集到一起，大肆谴责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西班牙共和派以及反纳粹的抵制运动。旺夏茨基出于听听库恩的讲演术的好奇心和渴望能作“帝俄”的代表，便决定接受这次邀请。但当时他想到了，他一定不能单独一个人在马戏场亮相。他毕竟是一位首脑，有权维持体面。于是这位首脑指示多纳特·孔尔以全俄国民革命党的名义订了50张票。当装票的信袋寄到十九穴的时候，旺夏茨基把它转交给曼哈顿住宅区的全俄国民革命党首脑博戈斯洛夫斯基，吩咐他凑足人数以便占据全部留出来的座位。

2月12日，阿纳斯塔斯、孔尔和马梅多夫身穿全套军服来到马戏场。旺夏茨基望着幽深的大厅里一排排数不尽的座位，顿时感到一阵精神上的刺痛。但是在他看见博戈斯洛夫斯基那张肥胖的脸时，忧虑便减轻了。他大步通过入口，脸

上带着胜利的微笑。在他的后面，拖拖拉拉跟着一群混杂的、狼狈不堪的、穿着黄褐色大衣、戴着皱皱巴巴软呢帽的人。叶夫根尼·米哈依洛维奇圆满地完成了分派给他的任务，把差不多50张票硬塞给哈莱姆俄国侨民区的各色各样的成员。

这一群人安然就座后。旺夏茨基看了看节目单，愤怒地哼了一声。节目单上除他自己的名字而外，另外还有一个俄国人的名字：尼古拉·梅尔尼科夫，身份是“俄国国民联盟”的首脑。这位伯爵立即认出了他是各流亡者小集团的秘密万神殿中的一个仇人。他知道俄国国民联盟刚刚同罗扎耶夫斯基建立了友好关系。

正当这个时候，库恩来到跟前，作了自我介绍之后问旺夏茨基是否愿意向大会讲几句话。阿纳斯塔斯很生气，因为闯入一个亲罗扎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人，分散了人们的注意中心，于是他粗暴地说患了喉炎，不能讲话。库恩点点头，回到了讲台。在大家立正站立，伸臂致纳粹礼并唱了“美国国歌”之后，演讲开始了。轮到梅尔尼科夫讲话时，旺夏茨基十分不安。一个梅尔尼科夫的同事走近讲台开始介绍俄国国民联盟。在他拖着长声说“希特勒是我们的领袖”和“俄国国民联盟正在投入反对共产主义的军事力量的实际斗争”的时候，旺夏茨基再也按捺不住了：

我示意孔尔离开，于是我俩都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博戈斯洛夫斯基带进来的全部与会人员都站起来跟着我们走出会场。这给人一种明显的大批人退席的感

觉。弗里茨·库恩赶紧出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没有什么事，是孔尔和我要赶火车。

这一插曲使德美同盟与全俄法西斯党的关系受到挫折竟达两年之久。

1939年4月，旺夏茨基第二次环球旅行回到汤普森以后不久，他接到了库恩的邀请，要他去出席齐格菲营的开营式。齐格菲营紧靠长岛亚普汉克美国军事基地厄普顿兵营，是德美同盟的训练场兼娱乐场。同孔尔讨论了这问题之后，旺夏茨基认为，这是与同盟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的好机会。他指望通过和解最终能够使俄国民革命党在德国重新复活起来。他还抱有希望同库恩合影的意思。这将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好材料。

5月21日，星期日，旺夏茨基、孔尔和马梅多夫驾驶马里恩的凯迪拉克旅游汽车来到齐格菲营。他们身穿正式制服：卡其布衫、马裤、黑色皮靴和武装带。库恩热情地迎接他们三人，把他们介绍给他的俄国出生的秘书詹姆斯·惠勒一希尔和他的国民宣传机构主任威廉·戈尔哈特·孔兹。当一支乐队开始演奏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时，库恩示意旺夏茨基到他身边去，而后两个人开始齐步绕场行进，后面跟着大约3000名同盟成员，其中包括青年组织中的200名男孩子们和女孩子，还有300名执勤突击队员（报界人士给起的绰号叫“德美同盟党卫军”）。摄影记者很多，这使阿列克斯感到满意。

所有这一切吹捧使旺夏茨基振奋起来，他冲动地给库恩

和其他同盟官员发出公开邀请，请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到了十九穴附近的地区就顺便来十九穴。在6月和7月间，同盟宣传机构的主任孔兹几次受到这位首脑的热情款待。不久，阿列克斯称孔兹为“威廉·格哈达维奇”。这种亲善关系迟早会见报，从而使得十九穴显得更加邪恶。可是无论是《工人日报》还是布里奇波特《星期日先驱报》都未能编造出比这件事——它一下子就使同盟和旺夏茨基的关系引起全国的注意——更加不大可能会发生的故事来。

1937年7月15日，星期六下午，在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主持了一次同盟会议之后，库恩和三位副职官员（威廉·孔兹、詹姆斯·惠勒—希尔和同盟司库古斯塔夫·埃尔默）驱车往波士顿。孔兹想起了旺夏茨基的持续的邀请，就建议说“正好顺路，咱们顺便走访一下阿列克斯吧。”

两小时以后，由阿斯特夫人报信，同盟成员把车停在十九穴的车道上。虽然阿纳斯塔斯没有想到有客人来，但似乎很高兴见到他们，便打电话通知俄国熊餐馆娜塔莎·马梅多夫准备四副特别好的餐具。多纳特·孔尔感到库恩令人讨厌，便向他打招呼之后，表现出不冷不热的态度，强压住心中的不满。阿列克斯款待客人时，马里恩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这是他的习惯。她的弟弟路易斯·马歇尔·里姆正巧在昆纳蒂塞特俱乐部同一个世交朋友弗兰克·德克尔打高尔夫球。阿列克斯看见他们穿过县中心路时，大声喊他们，邀请他们来同几位客人喝几杯酒。路易斯小声对德克尔说，他不愿接受邀请。于是德克尔对阿列克斯喊道，他们很对不起，还有别的约会。德克尔后来回忆说，如果他知道“几个客

人”当中有弗里茨·库恩，那么他出于好奇心是会接受阿列克斯的邀请的。可是路易斯·马歇尔·里姆受到他姐夫的伤害的次数太多了，他再没有什么好奇心了。

库恩那天心境不好。甚至连娜塔莎的鸡肉和上等咖啡酒饼也未能分散他考虑自己的问题的心神。库恩认为报界和罗斯福政府正在迫害他。两个月以前，在曼哈顿同盟办公室丢失14548美元以后，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告他犯有偷窃罪。纽约地区检察官托马斯·杜威正在用传票纠缠他。他一直在监狱进进出出，眼下他是付了5000美元的保释金才出狱的。库恩半躺在军事室里的印花布沙发上，陷于自怜的情绪中。给他端来什么，他就喝什么，愁眉不展，似听非听地任凭他的主人唠叨着大公和军大衣的故事。

大约在午夜时分，库恩突然脱口而出：“谁想出去兜一兜风？”同盟的这位首脑感到烦躁不安，难以入睡，这种感觉使这几个喝酒的人兴奋起来，此时，他们的头脑既不十分清醒，也不十分糊涂。孔兹、惠勒一希尔和埃尔默顺从地点头表示同意。阿纳斯塔斯、孔尔和马梅多夫显得没有多少兴致。但是由于来客不熟悉本地道路，就决定让旺夏茨基的19岁的外甥安迪·马梅多夫陪他们出去。

当惠勒一希尔驾车驶上通往汤普森的县中心路的时候，安迪勉强地指点着清楚可辨的界标：豪一马罗特女子学校、玛利亚诺波利斯学院、弗农·斯泰列斯旅店。汤普森在夜生活方面没有多少场所，于是惠勒一希尔驱车开往12号公路，向北拐，进入韦伯斯特。这是一座恰好位于马萨诸塞州界上的小镇。这时这几个黑夜驾车人已离十九穴八英里

了。

7月16日星期日，凌晨刚过1点钟，安迪就带这些同盟成员来到韦伯斯特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可是当他们走进去后，才听说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不许在周六午夜以后卖酒。几个人很不高兴，慢悠悠来到另一家咖啡馆。他们喝了些咖啡，吃了些蛋糕。与此同时，安迪在外边人行道上等着，同韦伯斯特的夜间警卫员佩特罗尔曼·亨利·普拉斯聊天。

1点半钟左右，库恩、惠勒一希尔、孔兹和埃尔默从餐馆出来向他们的汽车走去。普拉斯注意到库恩步履蹒跚，就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好不要开车。库恩转过身来咆哮着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认为你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普拉斯发火了，反驳说，他不管库恩是什么人；谁都不可以酒后在韦伯斯特开车。

接下去的争吵更为难分难解。按照同盟成员的说法，库恩当时说：“让我们离开这鬼地方吧。”可是普拉斯回忆说，库恩说的是“见鬼去吧！”不管确切地说了什么话，普拉斯还是把库恩带到了警察派出所。他因为喝醉了酒和说了亵渎的话而被记录在案。

四个小时以后，阿列克斯一起床就赶到韦伯斯特警察派出所，付了54美元的保释金，库恩和他的伙伴们才得以返回十九穴。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关于这件事的流言传开了。本地记者顿时都来访问韦伯斯特，把普拉斯团团围住，要求他叙述事情经过。到星期日夜里，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已经在全国主要广播网播出并在报纸上发表了。7月17日，星期一上午，《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则消息。

起初，宣传媒介的报道歪曲了7月15至16日事件的真相，只为耸人听闻。库恩被描绘成威胁了当地的警察。一份报纸谈到了“未遂暴动”。警官普拉斯成了从纳粹分子霸占下拯救了不设防的新英格兰乡村的英雄。在好几种报纸的报道中，旺夏茨基被说成一直在现场，或者甚至说卷入了这场纠葛。

7月20日，旺夏茨基同一群记者和旁观者来到韦伯斯特法院出席旁听审讯马萨诸塞西部地区人民诉弗里茨·库恩案。这位首脑到这里来不是只来看这位德美同盟的首脑服罪（“为避免一场戏剧性表演”，库恩坚持要服罪和付五美元的罚金，这是法令规定说亵渎话罚款的最高限额，对于喝醉酒没有罚金。阿列克斯在那里是为了否认他卷入这个事件，并带来一位波士顿的律师约翰·迪瓦因。迪瓦因向报界说明，经库恩口头证实，他的当事人旺夏茨基根本没有参与韦伯斯特事件，甚至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他都不在韦伯斯特。

阿列克斯对报界把他同本地“暴动”联系起来非常恼火。他不在意谴责他企图推翻斯大林政权，而在意在一个邻近的小镇把他同喝醉酒和说亵渎话联系起来，以他的污点破坏他的好名声。旺夏茨基为了向报界说明他是严肃认真的，对好几家报纸提出犯有诽谤罪的控告。这些指控不曾送达法院，因为这几家报纸发表了更正或者道歉。但是，这些撤回错误报道的更正是在耽搁了几个月以后才见报的。例如《纽约时报》1940年6月5日刊登一项表示歉意的说明文字（在第52页）。到那时，韦伯斯特事件已经引起另一个更大的旺夏茨基逸闻轶事的爆发。

这一次爆发，开头几炮是美国反纳粹宣传委员会放的。这个委员会由前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爱德华·多德主持。美国反纳粹宣传委员会用来进行攻击的一个媒介物是它的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钟点》；《钟点》的编辑是艾伯特·卡恩。经过理查德·麦考利的斡旋，帕特南的一个自由撰稿人，阿列克斯的朋友，《钟点》的一个叫戴维·卡尔的记者，在韦伯斯特事件之后不久在十九穴先后三次采访旺夏茨基。卡尔利用这个机会收集有关全俄国民革命党的重要资料，并拍下这位伯爵及其军事室的照片。在8月2日第三次采访以后，卡尔和麦考利草拟了一份经过公证的宣誓书，证明旺夏茨基向他们承认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的原作者。这份材料构成了在纽约42街《钟点》办公室中关于旺夏茨基的一本厚厚卷宗的基础。从7月30日这期开始，《钟点》登载了旺夏茨基的故事。这些故事旨在引起公众的惊恐和促使政府对这位首脑采取行动。37年以后，卡恩编辑回忆说：

据我所知，第一份关于旺夏茨基第五纵队活动和他隐秘的经历的公开资料是在《钟点》上发表的，并由此而在其他新闻媒介上转载。我想，也正是《钟点》上的故事，导致政府开始对旺夏茨基采取行动。

8月3日，继《钟点》首次揭露的材料之后，美国反纳粹宣传委员会向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透露，委员会据有记实材料，证明旺夏茨基在1927年申请美国国籍的时候，隐瞒了1920年在雅尔塔犯有“刑讯杀人”罪。美国反纳粹宣传委

员会要求立即调查这个犯罪行为，并提交了“支持记实材料的证据”（可能是8月2日卡尔和麦考利关于旺夏茨基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的原作者的宣誓书）。8月18日，美国反纳粹宣传委员会主席多德打电报给众议员马丁·戴斯，强烈要求传唤旺夏茨基，以便在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证实他同德美同盟以及同德国的关系。

美国反纳粹宣传委员会的行动很快就开始奏效。全国越来越多的报纸讨论这个耸人听闻的“刑讯杀人”的问题，要求戴斯委员会采取行动。一些人坚持要把这个“俄国纳粹分子”驱逐出境。

果然不出所料，众议员迪克斯坦也把自己的声音加进了这场喧嚷的喊声中。8月21日，迪克斯坦给国务卿赫尔写信说“旺夏茨基是一个正企图在本国土地上制造骚乱”的人，他的活动是“非美的”，“应该受到镇压”。他请求赫尔，“让我掌握一切你可能提供给我的情况吧。”8月30日，赫尔答复了迪克斯坦，建议这位纽约的代表提供“支持你的信中所提出的指控的证据”。国务卿也把迪克斯坦信函的副本转交给了司法部长弗兰克·墨菲，争取他采取他“可能认为恰当的行动”。

赫尔经过周密考虑，把这种材料送给了司法部长，因为当事情临到旺夏茨基头上时，不容置疑的是，司法部是最了解情况的政府机关。自1937年以来，联邦调查局一直把这位伯爵置于监视之下，而且对他进行过两次专门调查，调查的结果分别在1938年1月和1939年5月呈交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包括同旺夏茨基本人、同他的朋友、同帕特南和汤普森老居民的谈话，还有提供情报者主动提供的许多

信件。一个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被分派专门监视旺夏茨基，他伪装成一个肥皂推销员，住在帕特南达两年之久。有一回，阿列克斯开车外出，无意中几乎把钉梢的人撞到马路外面去了。司法部长也从移民归化局和财政部收集关于旺夏茨基的情报。1939年3月，财政部向司法部长提供了阿列克斯1933年以后每一年的所得税的税单。所有这些资料都揭露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揭露——什么都揭露了。财政部的一项调查证实旺夏茨基的唯一可用的火器，即1930年在艾伯克龙比一菲奇公司买的汤姆生式冲锋枪，已经正式地向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和国内税务局登记过。或许，更中肯地说，它还没有盘形弹夹。联邦调查局的彻底调查“没有揭露出任何情报表明旺夏茨基正在从任何外国或集团接受任何经济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至于经常讲的在“要塞庄园”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的说法，联邦调查局驻帕特南达两年之久的监视旺夏茨基的调查员报告说：

……如果有这种训练，在高速公路上都看得见，并且会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找不到情报表明任何仆人、随从或其他个人可能在这些房屋(十九穴)里组建任何类型的经过训练的军队。值得提到的是，关于这方面的谈话是在帕特南和汤普森同许多人进行的，目的在于核实这项情报，而这项情报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认真研究了联邦调查局的案卷以后，司法部官员亚历山

大·霍尔佐夫于1939年5月31日向司法部长墨菲报告说，根据他的观点，旺夏茨基不是外国委托人的代理人。移民归化局在调查了“刑讯杀人”的指责之后说，这个案卷表明“在他获得美国国籍的归化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欺诈行为或其他不合法行为”。9月13日，在审查所有这些证据之后，司法部长助理约翰·罗格通知众议员迪克斯坦说，旺夏茨基没有触犯联邦刑法的任何条款。

司法部的调查结果暂时使迪克斯坦沉默了。但是得到旺夏茨基亲自提供弹药的《钟点》在进入1940年以后还在继续着它的攻击。

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的暴风中心

1939年8月23日，一个外交上的大转变震撼了世界。当时想像中死敌德国和苏联通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携手联合了。这个条约的重要性在一周以后更明显了：当时希特勒入侵波兰，而斯大林在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的时候作为一个仁慈的中立国袖手旁观。这一德苏条约在美国国内产生了难以理解的反响。美国共产党人（至少是经受住了这一震荡并且仍然留在党内的那些人）和德美同盟分子发觉他们同样都在暗中叫苦。相信希特勒是一个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散居在外的俄国流亡者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德国境内，俄国纳粹分子除了偃旗息鼓、不引人注目而外别无其他选择。

旺夏茨基对德苏条约作出了一种满不在乎的反应，这是硬把现实编制得符合个人的幻觉的人的反应。《法西斯主义者》表示欢迎这个条约，把它同1807年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

一世(暂时)的和解相提并论。旺夏茨基的态度把一些人弄糊涂了。例如，一个诋毁他的人、康涅狄格州威利曼蒂克的俄国东正教牧师约斯金·特科奇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说，旺夏茨基已经同“斯大林讲和”了，而且正在为共产党人效劳。

与此同时，德苏条约也使旺夏茨基同德美同盟的关系出现紧张局面。这位伯爵不再出席同盟的集会，除“威廉·格哈达维奇”孔兹外，同盟的成员也不再访问十九穴了。在这个插曲期间，德美同盟有着自己的难题。11月28日，弗里茨·库恩被发现犯有偷窃罪而被判处五年徒刑。在他往辛辛监狱去的时候，纽约《每日新闻》把这件事称为“向奥斯宁进军”。^① 孔兹接管同盟任首脑。

德苏条约给予全俄国民革命党的打击比《工人日报》、苏联之友、国际工人公会、迪克斯坦以及《钟点》所作的全部攻击加在一起还更具有毁灭性。从来就不太充实的“战友”行列，让1939年2月11日叶夫根尼·博戈斯洛夫斯基之死弄得更稀疏了。但是最让人痛苦的是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握手言和时出现的背叛。

这位首脑的姐夫和全俄国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夫·贝克·马梅多夫于1939年10月退了党。马梅多夫对俄国国民革命的前景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决定，最好还是把他的时间用来照料俄国熊餐馆的烹饪。

《法西斯主义者》编辑，全俄国民革命党秘书多纳特·约西弗维奇·孔尔自“伯爵和孔兹”于1933年共创全俄法西斯组

① 辛辛监狱地址在纽约的奥斯宁。

织以来一直是阿列克斯的忠实伙伴，但在德苏条约签订后不久也离开了这个党。孔尔在十九穴逗留了一阵，于1940年6月离开康涅狄格州和阿列克斯的生活，到加利福尼亚学习飞行去了。

1940年7月在会见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时，旺夏茨基承认，全俄国民革命党的许多党员正在退党并且不再订阅他们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只剩下阿斯特夫人、乌龟和鸽子，几乎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

正当他的党在他周围瓦解的时候，旺夏茨基又抛弃了一些他的梦想世界的支撑物。1940年6月7日，他把45口径的汤姆生冲锋枪给了诺兰警官。他解释说，他想要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在一旦需要时”用它。

1940年7月4日，这通常是战友们在十九穴聚会的日子。就在这天阿列克斯发表一项声明，对他的政治活动提出了修改：

由本人担任首脑的全俄国民革命党不支持德国或者日本称霸欧洲或者远东的野心。

德国人和日本人从未对由全俄国民政府取代现存的斯大林统治表示过明确的态度。

我们的组织的唯一宗旨是把俄国归还给自由的人民，有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民选政府。

我们的目的是在俄国成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

我们的党不反犹太人。

我们的党不收党费；只靠其党员和同情者自愿捐献来筹集资金。不接受任何外国或外国个人的津贴。

我们的组织在德国和日本被取缔了。

只有在美国我们才能享有在这个国家的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行动和思想自由。

本人兹藉此郑重声明：我们组织的活动只是反对苏联政府，无论如何决不作反对美国宪法或者触犯我们衷心拥护的法律的事。

阿纳斯塔斯·阿·旺夏茨基

于康涅狄格州汤普森

1940年7月4日

7月4日的声明反映了旺夏茨基想同任何“非美活动”割断关系的愿望。到1940年，这位伯爵知道了他正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此外，特别是在罗斯福于11月再次当选总统之后，他预感到，美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卷进欧洲战争。当1941年3月11日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的时候，旺夏茨基确信同德国的战争只是数月之内的事了。这位首脑也猜想到，虽然德国和苏联暂时还遵守他们的互不侵犯条约，但罗斯福和邱吉尔最终会依靠同斯大林的联盟来共同对付希特勒的。这样一

种发展趋势有碍于全俄国民革命党在美国的行动。

租借法案的通过使旺夏茨基意识到应该把全俄国民革命党总部从美国转移到远东去，并且应该辞去他的首脑职务。此外，全俄国民革命党在美国也没有剩下多少人来供他领导了。1941年3月17日，这位伯爵给康斯坦丁·斯特克洛夫（全俄国民革命党远东代表，住在上海）写信，请他担任全俄国民革命党的首脑职务，并通知他，《法西斯主义者》在1941年7月号以后要停刊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旺夏茨基在1940年和1941年初一点一点地退出政治的时候，旺夏茨基的逸闻轶事却空前兴旺起来了。《钟点》正忙于把这位伯爵描绘成为对美国的威胁。《自由》杂志于1939年末加入了这一运动。它告诉读者，旺夏茨基已经把他妻子的庄园变成了一个兵营，在军事战术和打靶练习方面训练德美同盟冲锋队。1940年，哈罗德·拉文的《第五纵队在美国》专门用一个章节写旺夏茨基，声称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偷运武器给佛朗哥，并在汤普森训练穿军装拿枪的人。

旺夏茨基的逸闻轶事还有私下的方面：“有关公民”传达给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关的信息。纽约市警察局在接到一封声称旺夏茨基和希特勒、戈林、罗森堡和赫斯有来往的信以后，开始立了旺夏茨基的卷宗。1940年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一个提供情报的人告诉加利福尼亚州第12海军区海军情报处说，旺夏茨基是个德国间谍，还是“在美国的第五纵队活动的主要头目之一”，他企图在新德意志之友和爱尔兰共和党之间组成一个阴谋集团，破坏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制造厂。这个

扬斯敦情报人员甚至吐露，旺夏茨基于1940年8月22日在纽约第三街的全爱尔兰餐馆出席了一次同谋者的秘密会议。纽约罗彻斯特的一个妇女，1940年8月13日写信给纽约市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说，旺夏茨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他盼望推翻美国政府而把阿道夫·希特勒引进来。

也许比出版物的攻击和谴责信更能对司法部施加影响的是一个编辑的活动，他既是个记者同时又是政府官员。《钟点》的编辑艾伯特·卡恩，向司法部调查人员公开了旺夏茨基的档案。这些档案中的某些文件夹杂着情节剧^①的味道，正像卡恩在1976年回忆的那样：“你知道，在以往的那些日子里，我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文件和其他资料的，有些是公务上的手段，有些是非公务上的手段，有些手段虽不能完全像水门事件中堵防泄密人员的那些手段，但也具有一定的那种手段的性质。”人们怀疑这些文件中也包括旺夏茨基亲自送到《钟点》编辑部的文件。这位首脑是经不住免费替他作宣传的诱惑的。

另外，在1940年至1941年间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肯尼恩·沃森给司法部送去许多根据他采访指名的和不指名的情报人员写成的“秘密报告”。有一个约翰·梅特卡夫是情报人员之一，他就是1938年在戴斯委员会提到旺夏茨基的“小军队”的证人。

1940年至1941年间，农业部长的一个经济学顾问莫迪

① 情节剧是一种不着重刻画人物，一味追求情节奇异的戏剧。

凯·伊齐基尔也可能影响了司法部对旺夏茨基的态度。在1940年末或1941年初，伊齐基尔给司法部长写信，询问是否有理由撤销旺夏茨基的美国国籍。他在信中附有“证据”，证据的内容不得确知，但这些证据大概同所谓1920年的“刑讯杀人”有关。1941年1月15日，司法部长代理助理温德尔·伯奇把伊齐基尔的证据转交给移民归化局的专员，他于1月31日把这些证据送给移民归化局纽约办事处进行全面调查。

在2月和3月期间，移民归化局的特别检查员米切尔·所罗门把纽约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纽约市警察局、海军情报处以及《钟点》的所有档案彻底梳了一遍，搜寻显示旺夏茨基有罪的材料。所罗门当然看见了提供情报的人员（如罗彻斯特的妇女和扬斯敦的男人）提供的情报，这些情报被正式收进所罗门4月1日的报告中。这份报告后来又进了司法部关于旺夏茨基的档案。在每一个阶段上，道听途说的证据的合法性都显得比前一阶段更大了一点。

这样，政府的和私人的各种各样旺夏茨基逸闻轶事于1941年终于顺利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冲击波，尽管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从1934年到1940年对他的调查没有揭示任何触犯联邦法令的证据。

如果旺夏茨基像他在1940年和1941年初这一时期所作所为那样，保持一个卑微的形象，那么他很可能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都不会遇到麻烦，尽管还有些旺夏茨基的逸闻轶事。可是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的入侵苏联，重新点燃了这位伯爵心中昔日的火花，而且驱使他重新回到政治中来，这一次返回政治舞台具有决定命运的后果。

第十六章

预示未来的一年

战友们！俄国国民革命开始了！我们决不回头。俄国要么毁灭，要么是属于我们的。

——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

1941年6月27日

只要纳粹旗帜在莫斯科一飘扬，我立即在20小时之内通知美国国务院：我就是俄国国民政府在美国的代表。

——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

1941年7月25日

希特勒入侵苏联同他22个月前与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样使散居国外的俄国人感到惊讶。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这些流亡者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反应。亲苏分子立即重新集合在斯大林周围。有些反共分子发现他们自己被对斯大林的仇恨之心和由衷的斯拉夫爱国热忱撕裂成两半，心神十分不安；这种爱国热忱促使他们去保卫他们的祖国。另一些

人，用马里耶·阿维诺夫的话来说，“盲目地产生一种天真的想法，错误地把希特勒看成是潜在的救世主”^①。在后一种人当中，不仅有法西斯分子，而且还有君主主义者。特鲁佩茨科伊亲王从巴黎向柏林提出请求，请求允许他成立一支白俄自愿军，在苏联境内与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

俄国法西斯分子把德国入侵苏联看作是等待已久的国民革命的先兆而欢欣鼓舞，并且争先恐后地去接近德国主子。柏林方面，比斯库普斯基和伯蒙特—阿瓦洛夫给希特勒“元首”送去了给予无条件支持的保证。罗扎耶夫斯基在欧洲的代表波里斯·特德利在德苏条约签订后被从德国驱逐到瑞士，他在瑞士纠缠着德国驻伯尔尼大使馆，恳求让俄国法西斯联盟对战争作出贡献，并“参与俄国的重建”。特德利诅咒发誓地说，俄国法西斯联盟把希特勒当作它的“精神领袖和导师”，并且慨然承认德国“在新欧洲的领导地位”。他唯恐被认为他只是口头上支持德国，便夸耀地指出，他的儿子艾伯特正出色地在德国党卫军中服役。

甚至在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以前，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就已自信，德苏之间尽管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早晚总会发生冲突。同时，他于6月22日早晨给《民族》杂志写了一篇社论，断言战争已“逼近”。那天傍晚，他正在参加一个洗礼命名仪式的时候，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这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建议作一次祈祷，并领着在场的人高唱俄国法西斯的赞歌。那天晚上，这位“首脑”召集了一次俄国法西斯

① 引自阿维诺夫所著《通过地狱去朝圣》一书第193页。——译者

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与此同时，他的助手们狂热地工作，以便为《我们的道路》出一期专刊。日本新闻检察官立即将这专刊查禁，理由是专刊可能构成过分的刺激，引起反苏事件。^①

在不多几天里，罗扎耶夫斯基宛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那样行事。他忙于向驻华沙、索菲亚、巴黎和伯尔尼的俄国法西斯联盟代表发出一系列命令。1941年6月27日的第3号命令建立了“解放支队”，要以这“解放支队”形成“俄国国民军”的核心。“富有的俄国移民”要为党军经费提供资金，否则就要按叛徒治罪。7月3日的第15号命令任命了俄国法西斯联盟在俄国的欧洲地区、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地区领导人。建议所有的战友“赶快研究他们地区的领土和人口情况”，并“准备充分的现金，要足够他们到达俄国境内的指定目的地”。

罗扎耶夫斯基电告柏林，俄国法西斯联盟将承认“在解放了的俄国土地上最先成立的国民政府”。他没有忘记向德国人推荐国民政府的适当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从他自己开始，包括尼古拉二世的妹妹奥尔加的离婚丈夫留赫登堡公爵；波里斯·特德利；俄国法西斯联盟驻华沙的代表弗拉季米尔·谢利霍夫；在柏林出版的俄文日报《新言论》的编辑米哈依洛维奇·德斯波图利；在美国的俄国人全国联盟的特库

① 日本政府（外相松冈洋右除外，他叫嚷进攻苏联）起初对德国入侵苏联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在西方局势澄清以前，东京和关东军宁愿避免同苏联发生摩擦。在6月22日以后不久，《我们的道路》编辑部大概是应日本特务机关的要求从哈尔滨迁到了上海。

——原注

尔将军；以及住在东普鲁士科尼斯堡的反犹时事评论员（国际法专家）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格罗特。

罗扎耶夫斯基1941年6月末和7月初从哈尔滨邮出的命令很少送达目的地。它们被英国和加拿大的邮政检查官所拦截，收存在外交部和军事情报机构的档案里。

1941年夏季期间，罗扎耶夫斯基一刻也不怀疑红军就要瓦解，农民工人就要转而反对政治委员，纳粹的卐字旗很快就要在克里姆林宫飘扬。他专心考虑战后的各个细节，这使他想起希特勒应下命令印制1941年在列宁格勒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圣诞节盛大宴会的请柬，还应该命令国防军计划人员考虑究竟是在70度经线与日本瓜分苏联呢，还是沿叶尼塞河进行瓜分。罗扎耶夫斯基的天真远不限于他相信德国人会迅速取胜。他公然相信希特勒不仅会建立一个俄国国民政府，而且还会给这个政府配备上在满洲的俄国法西斯分子。同几十个于1941年被预示未来的幻想扫到一起来的其他流亡者一样，他不能理解，在纳粹关于如何统治被征服的俄国的计划里，并没有斯拉夫人的地位。

在世界的另一边，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一听说德国入侵苏联，也突然重新活跃起来。自从德苏签约以来，旺夏茨基由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全俄国民革命党的背叛以及反斯大林事业看来无望感到沮丧，已逐渐退出政治活动。在这期间，阿列克斯把欧洲战争看作是一场娱乐活动，已从这场活动中撤了下来。1940年6月13日德国军队逼近巴黎时，他冲进十九穴的起居间，抓起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高声喊道：“好哇！第三共和垮了，只有五码可走了！”这句话使

屋里马里恩的朋友全走光了，并留下了旺夏茨基是个劲头十足的希特勒崇拜者的印象。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尽管他竭力模仿希特勒的演说术，但是，他实用主义地看待这个德国领袖：

如果希特勒出来反对俄国，俄国法西斯党（全俄国民革命党）就要出来反对他。但是，如果他反对奴役俄国的人——布尔什维克，那么，俄国的法西斯主义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策略上的利益将是一致的。

因此，当旺夏茨基听说了6月22日德国的巴巴洛萨行动^①的时候，他感到这是实现他所怀抱的希望的一个机会，便决定重返政治舞台。

旺夏茨基对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一个反应是具有出风头特色的表演。他打电报给斯大林，以全俄国民革命党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不流血的和平投降”的条件。康士坦丁·斯特克洛夫在上海出版的《俄罗斯前卫报》（《法西斯主义者》已不再出版）7月22日发表了要苏联投降的六项条件的电文，大意如下：

1, 允许对苏联政府成员实行大赦，不施行报复。

① 1940年法国投降后，希特勒下令秘密制订进攻苏联的计划，这个计划于同年12月18日正式下达，代号为“巴巴洛萨”，它以闪电战为基础，包括进攻、占领和肢解苏联的一系列计划。1941年6月22日德军按此计划采取行动，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就是这里所称的巴巴洛萨行动。

——译者

2,保证苏联政府、共产党和纳卡夫德全体成员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3,保证保障苏联政府所有职员职业。

4,赦免所有红军军官,但政治委员除外。

5,保证所有共产党员充分参与俄国的国家生活。

6,保证所有共产党员只要得到人民的允许可以自由出国。

电文的结尾说:

上述条件可以经中立国家的仲裁而予以修改。接受这些建议将制止俄国的内战,并自动结束俄国和德国间的战争。现在的俄国政府的任何反建议可以经由俄国驻瑞典、保加利亚、葡萄牙、巴西或中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转达,送致全俄国民革命党总部。

6月22日以后的最初几天,旺夏茨基听了战报后,不禁沉醉于幻想之中。他最喜欢的方案之一已由多纳特·孔尔奉命在全俄国民革命党党歌中作了表述:“黑色军团在莫斯科街头齐步前进,卐字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招展。”《法西斯主义者》就在寿终正寝前,还刊登了一幅军队在红场列队游行的照片,那是经过窜改的空中摄影照片,照片中配上了卐字旗在克里姆林宫塔楼上、在红墙上、在列宁陵墓上飘扬。阿纳斯塔斯把打高尔夫球的五号铁头球棒像步枪那样挂在肩上,漫步跨过昆纳蒂塞特高尔夫球场,在夏天的微风轻拂

中，可以感觉到即将凯旋还乡的激动心情。也许希特勒会委任他担任某种负责的职务。当然，他将不得不默认对德国割让领土，也许对日本也要割让领土。但是，俄国一旦重新获得它从前的势力，它会同东方和西方的邻国算账。

这种沉思冥想在6月26日被一桩个人悲剧打断了。消息传来，在那前一天，多纳特·孔尔死了，他乘坐的飞机在圣地亚哥上空爆炸了。散落在地上的遗体已经烧焦，面目全非，凭牙齿的样子才把他辨认出来。“孔茨”同马里恩和马梅多夫夫妇都是阿列克斯最亲密的伙伴。他们在俄国内战中曾并肩作战，共同分担失败的痛苦和流亡的孤寂，并且自1933年以来致力于恢复他们思念和热爱的俄国。孔尔由于德苏条约而丧失了信心，于1939年退出了全俄国民革命党，1940年离开了汤普森。在德国戏剧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展现了美妙前景之后才三天，他突然死于非命，给予阿列克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

阿列克斯听说他那最亲爱的战友要“像垃圾那样”在圣地亚哥火化，十分愤慨，命令将遗骨运到汤普森予以隆重安葬。这位伯爵头一年已投资20000美元在西汤普森公墓建造了一个地下墓室，准备了一个适合英雄们安息的地方。这墓室离十九穴约两英里。那是一个给人以很深印象的建筑：外面是花岗石砌块，里面是意大利大理石；尖顶拱门入口面对彩色玻璃窗，在窗子上，在精致的窗饰之间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圣婴，摇幌着催他入睡；六个宽大的石棺一边放三个。地下墓室的倾斜屋顶上树立着东正教十字架。这个“陵墓”耸立在柏树丛中，高出于许多朴素的墓碑，显得很不协调。要不是有

这个陵墓，这些墓碑刚好构成一个地道的新英格兰墓地。旺夏茨基的哥特一拜占廷式大建筑完成得正及时，刚好接纳多纳特·约西弗维奇7月初的残骸。

柏林—东京—帕特南轴心

虽然德美同盟和全俄国民革命党的正式关系在德苏条约签订时仍然很冷淡，但是，德美同盟的首脑威廉·孔兹每次行经康涅狄格东北时，还是要顺便访问一下十九穴，去喝点饮料和求得一点施舍。1941年2月下旬，孔兹带来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克拉普罗特的砌砖工人，他编辑德美同盟的报纸《自由美国人》，并且在新泽西州安多弗管理诺德兰营。德美同盟有九名领导人因1940年6月在诺德兰营的一次集会上发表反犹演说，触犯新泽西州1935年的“种族仇视”法而被苏塞克斯县法院判处徒刑；孔兹和克拉普罗特就是这九人当中的两个。同盟的律师威尔伯·基根对这判决提出上诉。他们于2月4日获得保释，然后，孔兹便去寻求资金向新泽西州交纳2000美元的罚金。他知道旺夏茨基是潜在的现金来源，但是他决定等待适当的时机才提出来。

多纳特·孔兹的葬礼于7月3日举行，这正好给孔兹提供一个他一直在寻找的机会。要争取德美同盟与全俄国民革命党重新和好（并且提出私人的恳求），这次悼念一个反共战士殒落的仪式是最好不过的机会了！孔兹带来了同盟的全国书记雨果·“威利”·卢特克。但是，要搞清楚，他请求阿纳斯塔斯给予特别帮助的时候，是避开卢特克的。

孔兹要钱不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除了应向新泽西州缴纳

罚金而外，他还需要钱以便能够一得到通知就到德国去。德国和美国间的战争看来一天天逼近，他不愿意在德美战争期间留在美国。孔兹的父母是从德国移入美国的移民；孔兹本人生于新泽西州的卡姆登。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宾夕法尼亚公立学校几乎每天挨同学们的揍，这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他不想重蹈覆辙，已于1941年1月把老婆孩子送到了德国，并打算自己随后也跟着到德国去。在此时此刻，孔兹还没有向同盟的同事们泄露他的计划。相反，在7月初他还向克拉普罗特（当时是美国东部地区工作部的头头）和奥托·艾伯特·威卢梅特（美国中西部地区工作部的头头）保证，如果在定于劳动节在圣地亚哥召开的下一次全国会议上他连选为同盟主席，他就会留在美国。但是，孔兹决定向旺夏茨基暗示他要回德国的计划，因为，这会是引诱伯爵慷慨解囊的诱饵。

孔兹不必去说服旺夏茨基，使之相信他的作用。首脑已经同他想到一条路上去了，正如他后来向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讲述的那样：

……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我认为德国可能比以往更有助于我的党和我党的宗旨。1941年夏天，看来德国好像就要直捣莫斯科的时候，我感到德国人无疑会在俄国建立一个政府，这政府类似于德国人在挪威和被占领的法国所建立的政府，需要有一个俄国人来当元首。由于这个原因，在孔兹于1941年7月来我家〔参加孔尔的葬礼〕的时候，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德国，他说他不知

道，但是，打算在可能的时候立刻动身。我问他是否愿意作我的代表，帮我同在俄国建立新政府的人接触，不管这个人是谁……我的想法是避开美国有关部门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直接同孔兹打交道，让他同新政府的代表保持接触，在理论上说来，美国最终也许可能承认这个新政府，并承认我为新政府在美国的代表。

这两个人在孔尔的葬礼之后，进行了私下协商，很快达成了口头协议：旺夏茨基给孔兹2800美元（2000美元交纳新泽西州的罚金，800美元作去德国的费用）；孔兹回到德国后，要利用他的影响力在德国为全俄国民革命党进行游说。孔兹是否真的打算履行讨价还价达成的协议，是很可疑的。

尽管阿纳斯塔斯拥有有钱人的名声，但是，手上也没有足够完成这笔交易的现金。所以他叫威廉·格哈达维奇在大约十天之后再去做。在这期间，他将卖出一些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普通股票，并把收入存入他在帕特南的银行帐户，以备分配。

孔兹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十九穴。也许是为了表示他的好意，他在7月10日的《自由美国人》头版上发表了对已故孔尔的热情洋溢的颂词。孔兹赞扬死者为美国公民中的日耳曼人和其他民族成员的朋友和战友；他所用词句会引起多纳特·约西弗维奇这个坚定的反同盟分子一阵苦笑。为了加重分量，他还补充上一句：旺夏茨基是个“伟大的俄国人”。

7月12日，孔兹只身从纽约来到十九穴。旺夏茨基以一

张2800美元的支票等着他。当问起孔兹的打算时，他回答说，他德国之行的日期还没有定，但是，答应决定后通知阿纳斯塔斯。此时，孔兹补充说，他正要去密歇根的同盟营地休假，然后到芝加哥呆一些时候。因此，阿列克斯说，他刚好打算到西海岸去一趟，也许在7月末经芝加哥回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纽约聚会一下？旺夏茨基并不是随便提议在纽约会面。他想要保持与孔兹的联系，因为他对孔兹已下了本钱并寄予希望。孔兹同意在芝加哥见面，并建议见面日期为7月30日，见面地点在同盟总部豪斯一瓦特兰。

两天后，孔兹回到纽约，写信给旺夏茨基感谢他的钱，并向他保证不辜负他的信任。尤其是信中有两段阿谀奉承之词，一定使这位伯爵自我陶醉：

我钦佩和尊重您和您的战友们所体现的俄国人品格，并乐于协助将您和您工作在即将建立自由的新俄国的地方广为宣传。……我将竭尽全力使那个地方对您有利，您可以在那里在重建你们伟大的国家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这关键时刻给予我这个积极为神圣事业效力的机会，使我不至停留在口头的诅咒上而实际无所作为，我把这机会当作是对我的伟大奖赏接受下来。如果条件不允许我在适当时间离美赴德，请相信，上述全部款项，除了准备过程和踏上征途所必须花销者外，将奉还给你。您对我如此信任，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光荣，并且决不辜负您的信任。您我都在为共同的事业效命。我祈求上帝，愿觉醒的美国力量也有助于这共同事业！

俄罗斯万岁！嗨尔，希特勒！再见！

大约一星期之后，阿纳斯塔斯出发去旧金山。由于重要的原因，马里恩没有陪他去。有一个名叫泷太百代的日本年轻女人乘辰太丸班轮，定于7月24日从横滨到达旧金山，阿纳斯塔斯正打算去接她。泷太百代的身份和她与伯爵的关系至今仍然不清楚。一些支离破碎的证据说明，她同另一个名叫中村房子的日本女人相识，而对这中村房子，旺夏茨基曾奉献过他最真挚的爱情。

旺夏茨基在1934年作环球旅行期间，有一次结识了一个名叫中村蓓的世界性富商，东京人。他的女儿房子同阿列克斯，用伯爵自己的话来说，很快就变得“特别友好”。他于1936年作第二次环球旅行时，在东京又一次看见房子。中村蓓由于业务关系到了美国，旺夏茨基公开邀请他一家人到汤普森作客。1936年秋，中村蓓一家，包括房子，在十九穴消磨了一个半月。阿列克斯带着房子到纽黑文去看了几次足球赛，11月28日又到费城市体育场去看了陆海军运动会。其后房子到巴黎去上学，1938年和1939年，阿列克斯带着马里恩路过巴黎，又在巴黎同她见了面。可能是想到有马里恩在身边，阿列克斯同中村房子互相谈话总是说法语。在巴黎，中村房子送给阿列克斯一张她自己的照片，上面有日文题词。^①阿列克斯在后半生中始终保存着这张照片。

① 这题词是“值此巴黎分别之际，我由衷地感谢你。愿我们的友谊永远继续下去。”

——原注

1940年秋，中村房子来到十九穴，同阿列克斯混了三个星期。这种事情使马里恩的朋友们感到不安。她们不允许有这样一个“年轻而聪明”的女人在阿列克斯身边。现年63岁的马里恩像以往一样对她保持沉默，不做任何一点动作去干涉她的丈夫选择伴侣。她甚至允许阿列克斯同中村房子于11月2日到纽黑文去看布朗—耶鲁的比赛，并参加在塔夫脱饭店举行的运动会后的舞会。

按辰太丸班轮旅客登记表的记载，泷太百代27岁，未婚，准备到加利福尼亚州蒙特贝洛去。她可能是中村房子的朋友，因为，据旺夏茨基说，她寄给他一个碗，作为中村家的礼物。中村房子本人可能也在那艘船上，因为后来旺夏茨基对一些朋友说，他希望在码头上接到的不只是泷太百代一个女人。

谁在船上对实际的目的都没有意义，因为旺夏茨基一直没有看见辰太丸班轮。它原定于7月24日到达旧金山，但是在海上意外停留了六天，因为听说日本宣布它打算占领在印度支那南部的法国（维希政府）基地，罗斯福发布报复性行政命令，要冻结在美国的日本财产，从而使国际形势捉摸不定。

旺夏茨基于7月23日到达旧金山，以艾伯特·冯的名字在马克·霍普金斯饭店登记住下。然而，他到达旧金山无论对联邦调查局或者当地俄文日报《新霞光》的记者叶夫根尼·塞雷布伦尼科夫都不是什么秘密。塞雷布伦尼科夫于7月25日在马克·霍普金斯饭店访问旺夏茨基时，这位伯爵情不自禁地信口开河，并同意在7月26日的《新霞光》上发表对他的访问记。阿列克斯高兴地不考虑可能的后果，把他最宏伟的抱负抖落在光天化日之下：

问：在美国的俄国法西斯党对破产清算有什么打算？

答：不……我已作好准备在这里代表俄国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将设在莫斯科。

问：它将在什么时候行使职权？

答：在最近的将来。德国军队一占领莫斯科，它立刻就行使职权。

问：德国军队什么时候占领莫斯科呢？

答：大约两个星期之后。

问：那么，政府已经成立，也许你知道内阁成员的名字了吧？

答：是的，政府已经成立，但是，你当然理解，我不能向你透露名字，不管是正式透露还是非正式透露都不行。

问：这一切希特勒全知道吗？

答：当然知道。

问：得到他的准许了吗？

答：当然。

问：这么说来，你已经同在柏林的政府成员建立了通讯关系罗？

答：当然，只是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和环境，通讯联络是暗地里秘密进行的。

问：据认为，美国最后终于要参加对德作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你将怎么办？

答：我将代表俄国国民政府。

问：但是，如果美国不承认那个政府，你怎么办？

答：我还是要通知美国国务院，我代表俄国国民政府。

问：但是，美国不是可能不承认俄国国民政府吗？

答：在那种情况下，由谁来代表俄国政府就不用美国操心了。

接受《新霞光》的访问就是旺夏茨基在旧金山所作的一切。他向日本邮轮公司在当地的办事处打听，知道辰太丸已改道去墨西哥^①。阿列克斯无可奈何地离开约定的见面地点，于7月26日动身去芝加哥。

阿列克斯7月29日星期二一到达芝加哥马上就到豪斯一瓦特兰去找孔兹。这位同盟主席热情地迎接他，并问他是否乐意会见一位来自南美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伙伴，他现在住在芝加哥，是同盟中西部头头威卢梅特的朋友。阿纳斯塔斯肯定地回答说，他们可能在南美俄国社会中有共同的朋友。于是孔兹叫威卢梅特与那个俄国人联系，并于那天晚上9点钟把他带到俾斯麦饭店鸡尾酒休息室里来。

这个“俄国人”原来是个乌克兰牧师，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名叫亚历克修斯·佩利彭科。佩利彭科一身兼有虚幻的想像力和对重大事件的鉴别力，他把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达到可以同这位伯爵相匹敌的程度。阿列克斯不仅就要遇到他的对手，而且就要遇到严重的麻烦。

① 辰太丸最后于7月30日在旧金山靠了码头。如果中村房子在船上，她也没有到东海岸去。浅太百代从中村房子家送给旺夏茨基一件礼物后，就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原注

佩利彭科1893年生于喀尔巴阡—乌克兰。喀尔巴阡—乌克兰由于俄国、波兰和奥匈帝国的边界变化而长期遭受折磨；这个备受折磨的地区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变幻无常形成了佩利彭科的性格和人生。他在1915年献身当了东正教牧师并在帝俄军队中服务之后，转移到华沙，并于1925年改而皈依路萨尼亚的希腊正教（拜占廷—罗马）。随后，他到慕尼黑讲授天主教神学，1937年作为派到阿根廷的乌克兰移民团的传教士而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佩利彭科一心想从苏俄统治下解放乌克兰，而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馆又许诺给予帮助，他便对这许诺着了迷，于是，便在大使馆顾问的指引下，在阿根廷的乌克兰人当中开展亲德宣传。这位顾问名叫斯蒂芬·茹·肖姆贝格—利普亲王，曾经一度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助手。过了不久，佩利彭科开始怀疑德国人不会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他转向英国人，并成了他们的间谍，而在这期间，一直保持着同德国人的良好关系。1940年下半年，美国大使馆官员同他打交道，并问他是否愿意替美国政府工作（没有具体说明为哪个机关工作）。在这同一时间，佩利彭科又向斯蒂芬表示，他同意在美国的乌克兰人当中替德国工作。1941年3月24日，佩利彭科到达纽约，受到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迎接，并当场接受雇用。联邦调查局派他到芝加哥去。他到了芝加哥，在一家饭馆里结识了奥托·威卢梅特^①。佩利彭科使威卢梅特对他的亲德感情确信

① 威卢梅特回忆说，那是一家俄国饭馆。毫不奇怪，佩利彭科坚持说那是一家乌克兰饭馆。

——原注

无疑；威卢梅特便把他带到豪斯—瓦特兰介绍给孔兹。旺夏茨基于7月29日到达芝加哥时，这两个德美同盟成员把这两个斯拉夫人拉到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7月29日晚9时刚过，这四个人就在俾斯麦饭店鸡尾酒休息室聚首了。佩利彭科一身牧师装束：黑色长袍盖着脚背，黑色宽沿礼帽，帽顶很矮。其他三人，穿着外套，系着领带。佩利彭科德语说得流利而不会说英语，而旺夏茨基不会说德语，于是，这四个人的交谈实际上很不方便。佩利彭科对孔兹和威卢梅特说话用德语，对旺夏茨基说话用俄语。旺夏茨基同这两个同盟成员交谈用英语。因此，任何人说的任何话都必须经过翻译才能使大家都了解。这种复杂的语言矛盾现象也许部分地说明，那天晚上所讨论的内容到后来为什么成了争吵的主题。

俾斯麦饭店会议的四个与会者一致同意，讨论涉及孔兹如何能回到德国去的方法问题。此时，孔兹向威卢梅特说，他可以回到德国，甚至说，如果德美关系破裂，墨西哥可以作为中间庇护所。威卢梅特曾劝阻孔兹，理由是他这样的关键时刻离开美国会危及同盟。但是，孔兹除了答应在劳动节（9月1日）召开同盟的全国大会之前不离开之外，拒绝作任何承诺。孔兹也为如何走法而伤脑筋。虽然他有了旺夏茨基给的2800美元，但是，他担心是否能得到美国的护照，更不用说还有英国海军的封锁包围了欧洲大陆的问题。佩利彭科说， he 可以从波兰驻费城领事馆弄到“移民证书”，这个证书可以使孔兹进入阿根廷。孔兹好像很感兴趣，但是当晚没有采取行动。

据威卢梅特说，大部分讨论是在佩利彭科和旺夏茨基之间进行的。他虽然不了解他们讨论的细节，但是，他推测旺夏茨基向那个乌克兰人吹嘘他的党和在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对阿列克斯来说，这是很糟糕的，因为听旺夏茨基说话的人是认真对待的。

他们在那晚上分手之前，佩利彭科对旺夏茨基说，他打算去纽约一趟，愿意到汤普森去拜望伯爵。阿纳斯塔斯回答说，他任何时候到那里都会受到欢迎。

四天之后，也就是旺夏茨基回到十九穴两天之后，收到佩利彭科的电报，说他将于8月6日到汤普森。这个乌克兰人到达后刚一坐下就脱口而出地问道：“你认识日本大使馆的什么人吗？”旺夏茨基立刻产生了怀疑，回答说他不认识。但是，这位首脑决定考验考验佩利彭科：

……他为什么问这问题，我感到奇怪。我想起了我访问日本时，中村房子家的人或他们的朋友给我的那张名片，我说，我可能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将对你有所帮助。我把名片给他，又说一遍，这名片对他也许会有所帮助。

旺夏茨基还叫佩利彭科在日本大使馆打听一下泷太百代的下落，“为的是确定一下佩利彭科是否坦率”。

8月13日，佩利彭科再次访问十九穴，并对阿列克斯说，日本大使馆找泷太百代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使馆武官在这时候打听旺夏茨基是否有熟人在阿拉斯加当间谍。于是

阿纳斯塔斯对他极端怀疑，他叙述他的反应如下：

我对佩利彭科的话感到愤怒，因此决定立刻摆脱他。我把他带到俄国熊餐馆，给他付了饭钱，叫我的姐夫〔列夫〕贝克·马梅多夫去喂他一顿饭，然后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以便我们摆脱他。

此后旺夏茨基同佩利彭科再也没有见面。8月18日联邦调查局终止了它对佩利彭科的雇用；但在这之前，这个乌克兰人还是对前三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提交了一个特别报告。

佩利彭科在8月中旬以不同的说法分别向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归化局的一个机密情报人员打报告，说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既是德国间谍，又是日本间谍，从事于一个反对美国的大阴谋。他已收集了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基地的绝密资料，打算交给一个名叫“泷太夫人”的日本女间谍，这女间谍原定乘辰太丸到达旧金山。旺夏茨基除了匿名到旧金山去会见泷太夫人外，还打算在西海岸与“军事间谍和破坏者”联系。佩利彭科报告说，辰太丸没有如期抵达旧金山，旺夏茨基就急匆匆奔赴芝加哥，以便把军事秘密交给威廉·孔兹，孔兹再经墨西哥和阿根廷把军事秘密带到德国。

佩利彭科的报告继续说，五个人^①聚集在俾斯麦饭店讨

① 佩利彭科在他1941年8月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说，芝加哥德美同盟领导人乔治·弗罗波塞也参加了俾斯麦饭店会议。但是，在1942年7月30日审讯库尔特·莫尔赞时，佩利彭科宣誓声明参加会议的只有四人（孔兹、威卢梅特、旺夏茨基和他本人。）——原注

论如何把孔兹和军事秘密偷运出美国。旺夏茨基催促佩利彭科为孔兹准备旅行证件。孔兹告诉佩利彭科，这类旅行证件可以借助于费城的一个名叫库尔特·莫尔赞的路德派牧师获得。那天晚上讨论的一部分内容是“如何除掉罗斯福和他的犹太人公务员”。据佩利彭科报告，那三个人“不时地”交相呼喊“嗨尔，希特勒”。会议最后结束时一致同意，下次会议在旺夏茨基的康涅狄格庄园举行，以便最后决定“要在美国干些什么”。

据佩利彭科报告，他于8月6日来到十九穴，在那里旺夏茨基命令他同华盛顿的日本武官联系，告诉武官（用佩利彭科的话）：“……他的（旺夏茨基的）间谍系统组织得非常完善，在他下达命令几小时之内就能够——几小时之内就能够把关于〔美国〕军队的情报送达东京和柏林。”旺夏茨基交给佩利彭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驻满洲国日本陆军司令”的名字。^①旺夏茨基还命令这个乌克兰牧师向日本大使馆官员打听“一个十分重要的日本籍间谍”的下落，这个间谍名叫“泷太夫人”。

据说佩利彭科在华盛顿访问了日本大使馆，并同武官谈了话。这位武官（佩利彭科始终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来）说话的大意是他想亲自会见旺夏茨基本人，以便弄清楚美国将要经由阿拉斯加向苏联送去多少飞机。佩利彭科于8月13日带着

① 名片上印的是“日本陆军炮兵司令小林军二”。在审问时，旺夏茨基说他是日本驻巴黎武官。日本军部档案说明，驻外武官中没有这个人，而在1939—40年期间，在供应装备局里有一个炮兵上校叫小林军二。

——原注

这个口信回到十九穴时，旺夏茨基声称，他收集的军事秘密中有关于飞越阿拉斯加的细节，并说他急切希望同日本武官建立联系。

佩利彭科对从俾斯麦饭店会见（7月29日）到他第二次访问十九穴（8月13日）之间的事件的叙述有一个内在连贯的线索。但是，其后不久，这个乌克兰人的想像力好像就难以控制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在替很多主子办事的原故，这些主子包括德国外交官、德美同盟成员、白俄、联邦调查局和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佩利彭科意识到他受到双重间谍的包围，便开始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在这过程中，他很可能无可救药地慌乱起来。他对移民归化局情报人员说，旺夏茨基在8月间曾返回芝加哥去会见孔兹和威卢梅特。他对联邦调查局报告说，8月间，孔兹和威卢梅特曾到汤普森去会见旺夏茨基。

佩利彭科不知道移民归化局同联邦调查局一样是同一个司法部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他向移民归化局的情报人员吐露，他扣压了关键性情报，^①不给联邦调查局，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乌克兰双重间谍渗入了联邦调查局，这个间谍把他的（佩利彭科的）新发现又返回去泄露给德美同盟。

由于重重幻影笼罩着他，佩利彭科就不大注意联邦调查局原来指派给他的任务——提供关于同盟分子的情报——而

① “关键性情报”（最后经过移民归化局终于送到联邦调查局）包括：8月13日旺夏茨基曾给佩利彭科看（1）在阿拉斯加的七个间谍的姓名、地址，这些人把军事情报送给他，他再送给华盛顿的日本武官，（2）圣保罗一个巴西新闻检查官的名字，他把柏林的命令转达给旺夏茨基。

——原注

专心致志地去查出联邦调查局的乌克兰密探当中的神秘纳粹分子。这种无纪律的行为，必然引起埃德加·胡佛的注意，他立即终止了佩利彭科的任务。但是，佩利彭科决没有偃旗息鼓、无所作为。如果说联邦调查局不欣赏他，自有别的人要利用他来服务。

在佩利彭科编造旺夏茨基的故事的时候，旺夏茨基把8月下半月和整个9月都消磨在汤普森，沉溺于旧金山和芝加哥之行之后表面上的宁静中。《法西斯主义者》不再出版了，伯爵有的是时间。十九穴的一切显得异常宁静。列夫·马梅多夫已退出了党，孔尔死了，亲爱的人马里恩的声音也越来越不大听见了。安迪·马梅多夫急于要驾驶“烈性女人”飞机，已跑开了，甚至不告诉列夫和娜塔莎就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列夫和娜塔莎只是在他们的儿子到达英格兰之后才知道他参军之事的。

田园生活式的宁静不符合阿纳斯塔斯的性格，特别是战争正在进行，而这场战争展现了使他的祖国摆脱斯大林的希望，在这样的時候，他更不能静下来。他仔细跟踪报刊上的德苏战报；德国国防军沿着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战线几乎每天都传来捷报，这些捷报都使他受到鼓舞。在布里奇波特《星期日先驱报》8月16日的一篇访问记中，他滑进了特别欢快的状态。他宣称，下一期《法西斯主义者》将在莫斯科出版（他显然忘记了，1935年以来，有几期《法西斯主义者》专刊就曾声称是偷偷摸摸地在克里姆林宫内部出版的）。他预言，到来年春天，德国人将把红军残余部队撵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而把扫荡的工作留给白俄部队。

旺夏茨基除了扮演空想战略家外，把他的精力消磨在（用《帕特南爱国者》的话来说）“改善昆纳蒂塞特乡村俱乐部”上。阿列克斯不再向世界各地的俄国国民革命党的支部和报纸提供津贴，而是把从马里恩处得来的补助金用来种花植树、施加肥料、美化通道、绿化整个县中心路。

在这暂时平静的当儿，一片疑云笼罩着伯爵的心绪，这疑云就是威廉·孔兹。阿列克斯已向这个同盟领袖投资2800美元，指望他在德国为俄国国民革命党进行游说。但是，孔兹没有表示出回德国去的迹象，旺夏茨基开始意识到，他将来参加俄国国民政府的机会正在一天天地溜掉了。

孔兹正在德美同盟、联邦调查局和他自己的莫名其妙的冲动之间玩弄着微妙的平衡把戏。8月间，当他想离开美国的想法为其他同盟领导人所知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是否还配继续当同盟的主席。在8月里，孔兹不得不留在芝加哥，受到治安当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这两个机构对他还在新泽西受到起诉期间就离开美国感到关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孔兹在豪斯—瓦特兰举行的同盟全国会议上连选为主席，但是，在这之前，他向他的支持者许诺他将留在美国，并且归还旺夏茨基2800美元。不过，他并没有把钱还给旺夏茨基，并且用同盟成员的捐款交纳了2000美元新泽西州的罚金。

缩紧包围

在30年代中，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轻易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经受了三次对他的攻击。每一次都是他那放肆的、

甚至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出风头的招数引起的。1934年，这位伯爵的环球旅行和在《法西斯主义者》上提出的异想天开的要求，激起美国《工人日报》和苏联的朋友的公开愤怒，但是，国务院和司法部的调查证明他的行为并不违犯联邦法律。1937年，在十九穴举行的轰动一时的7月4日周末联欢会，刺激起共产党组织开展一次书简运动，并且引起国会中的滔滔雄辩，但是，经过调查，这一回原来也是小题大作。1939年，旺夏茨基在参与西格弗雷德营的同盟集会并被错误牵连进弗里茨·库恩的韦伯斯特“暴动”之后，引起了进步组织、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一位众议员的谴责，但是，经几个政府机关的紧张侦查，发现他的行为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直到1941年7月15日，司法部一位官员还写道，旺夏茨基既不是罪犯，也不是外国间谍。他只不过是一个该死的讨厌家伙。

旺夏茨基未能逃脱第四次攻击，这次攻击于1941年7月末积聚力量，1942年6月达到高峰。大体说来，使得1941—1942年的攻击与前几次攻击有所不同的是在美国流行的舆论。在1934年和1937年被明事理的观察家们视为滑稽而不予理会的那些古怪行为，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全国紧张气氛中，看起来就是很凶恶的了。此外，过去根据长期具有法律效力的不成文法，对各种各样传闻和告发，司法部收到后，认为不可靠的，归档了事，而现在则开始给予越来越大的重视，重视的程度，远超过各方面重视的总和。

如果阿纳斯塔斯对他的卖弄之舟正要冲撞的急流险滩哪怕有一点点认识，他也许早已回头是岸，可以避免这场灾

难。在德苏签约后，他也朝这方向动了一动。但是，22个月后德国人入侵苏联扫除了他的一切顾虑，他对似乎即将到来的斯大林的垮台感到十分兴奋。1941年12月阿列克斯最后终于看见前面的瀑布时，为时已太晚了。

虽然旺夏茨基自己不知道，但是，由于佩利彭科奉命揭发，他于1941年9月遇到了麻烦。虽然联邦调查局辞退了佩利彭科，但是，他的报告还是归入了旺夏茨基的档案。尽管在档案上加了警告性按语，说明佩利彭科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但是，档案不可思议地把旺夏茨基说成是“德美同盟全国委员会的显要人物”。因此，任何一个不熟悉佩利彭科的人看了他关于旺夏茨基的报告，都会对他收集情报的能力和旺夏茨基的犯罪事实留下深刻的印象。

司法部内部有一个部门叫做特别防护分队，由劳伦斯·史密斯领导；这个分队于9月上旬着手进行调查，以便决定旺夏茨基是否违犯了第583号公法，这项公法一般称为沃勒斯法案，是1938年国会通过的，它要求外国老板的代理人一律要登记。史密斯的助手基思·凯恩被指定负责向萨缪尔·比斯盖尔作调查，比斯盖尔又利用了司法部分析员路易斯·内姆泽尔提供的帮助。内姆泽尔开始整理来自各种渠道的关于旺夏茨基的材料，包括来自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国务院、海军情报处、《法西斯主义者》、原告来信以及谍报人员的报告。内姆泽尔和比斯盖尔于9月末完成了对材料的初步调查。

10月6日，比斯盖尔起草了一份给旺夏茨基的信件，宣布司法部要求俄国国民革命党按沃勒斯法案进行登记。

在这时候，财政部于10月4日，在未加警告的情况下，封存了阿列克斯和马里恩在纽约信托公司和卡吉尔信托公司（帕特南）的银行帐号，并且查封了他们在帕特南公民国民银行的共同存物保险箱。此后不久，马里恩设法获得许可，使她每月能提取不超过1500美元作为生活费。

由于美国政府向旺夏茨基包围过来，在孔尔坐机坠毁之后仅仅四个月，悲剧再一次打击十九穴。10月14日，列夫和娜塔莎·马梅多夫得到通知，他们的独生子安迪五天前驾驶英国皇家空军鹰中队的“烈性女人”在战斗中阵亡。安迪·马梅多夫被埋葬在为英国皇家空军中的美国志愿人员保留的专用墓地里。阿纳斯塔斯虽然为外甥之死感到凄凉，但是，他于10月15日轻率地对《诺威奇公报》记者说，安德鲁的死是“不必要的”。这句话加上他平日的亲德名声，在公众中造成很坏的印象，加速了这位伯爵在社会上的孤立。

旺夏茨基于收到司法部10月6日信件后，去向纽约的乔特、米切尔和伊利的合伙公司寻求法律咨询。高级合伙人克拉伦斯·米切尔于10月27日代表他的当事人写信给司法部表示如下意见：俄国国民革命党仅仅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因而不属沃勒斯法案管辖范围。司法部特别防护分队首席助理基思·凯恩于11月14日答复米切尔的信，重申旺夏茨基应就俄国国民革命党进行登记，并且建议让一个律师到华盛顿来讨论这件事。于是，米切尔去到汤普森，并从旺夏茨基得到一份长达九页的证明，详细说明伯爵的家庭出身、职业和现在的情况。律师于12月6日星期五上午11点钟在华盛顿访问凯恩。凯恩接受了证明书，交给米切尔一份32页的登记表

要旺夏茨基填写。

在这同一天(12月6日)，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1935年的“种族仇视法”违宪，撤销对孔兹和其他八个同盟成员因在诺德兰营发表反犹演说而定的罪。但是，孔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庆祝他在法律上的清白。他已于11月6日逃往墨西哥。11月中旬，他从墨西哥城写了一张明信片给阿纳斯塔斯，兴高彩烈地报告说，他正在去德国的途中。(他写明信片是为了让大家看见。)

米切尔于12月7日星期六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便立刻去信向凯恩保证，他“下周”将同旺夏茨基见面，要他填写登记表。到了下周，美国对日本宣了战。

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旺夏茨基猛击一掌，使他意识到了他的危险处境。纳粹和法西斯现在是美国的敌人，而斯大林是同盟者。阿列克斯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共分子，同德国人和日本人有千丝万缕联系，他认识到，在紧张不安、怒气冲冲的美国人到处寻找奸细和第五纵队的时候，他站了出来，活像一个令人讨厌的脓疱。他马上烧掉了孔兹的明信片和其他文件。

但是，孔兹好像是个拒绝让人抛弃的女人那样，于12月8日又写信给旺夏茨基：

亲爱的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

罗斯福终于得到了他认为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不久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日本战争再等几个

星期爆发，我可能已经到了日本。既然现实情况已如此，在这封信奉达你手时，我已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我原来想的是乘飞机横越大西洋，那样的花费比我现有的钱要多2600美元，并且要等几个月。旅行的另一条路，唯一剩下的开放的路，需要的钱比我现有的钱多1000美元。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回头路了，我走得越远，寄钱给我也就越困难。请把您能够汇给我的钱，汇到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梅萨街111号沃尔夫冈·埃贝尔博士处。他是我的挚友，我已请他把寄给我的钱和邮件转寄到另一个地点。现在，请您在汇票或信件上不要写我的名字而写他的名字。不要写很多，因为他的邮件要受到检查。

我用钱非常精心，原来随身带的旅行费（800美元）还有约三分之二。不管您汇给我多少钱，我一定尽量为您节约。莫斯科再见，俄罗斯万岁，嗨尔，希特勒。

威廉·格哈达维奇

这样一封信是已经受到惩戒、极度紧张不安的旺夏茨基最不愿收到的。如果它被检查人员看见了，可能使他因为帮助一个逃亡的纳粹分子而遇到严重的麻烦——或者还更糟糕。如果阿列克斯知道了这封信连同佩利彭科编造的故事已经在他的联邦调查局档案里，他会更加紧张不安。

旺夏茨基有生以来第一次试图尽量不引人注意。他在填

写米切尔给他的登记表时，把俄国国民革命党填写得像是个笔友俱乐部。这个党被说成是“没有工作人员”的党。它的活动包括“与具有同样思想的俄国人通信”和出版《法西斯主义者》（“现在已停刊”）。阿纳斯塔斯在一份追加的宣誓书中，确认他的四个主要通信的人是康士坦丁·斯特克洛夫（在上海）、乔治·陶布男爵（在开罗）、埃弗多金·马茨科夫（在南斯拉夫的苏博蒂察）以及费奥多·西门斯（在洛杉矶）。这种通信的目的，“是使全世界的白俄与其他的人保持联系，以便他们在苏维埃政府最终被推翻的时候，在他们的祖国占有一个适当的地位，并尽力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当然，俄国国民革命党并不迷信暴力。“……虽然我当然乐意看见苏维埃政府垮台，但是，我在美国从来没有提倡以武力来实现这一点。”

后台老板的这种否认于1941年12月30日呈交司法部备案。就在此时，另外几股力量已在发挥作用，以确定旺夏茨基是间谍和罪犯。有一个被司法部官员称为“本部熟悉并有好感”的俄裔比利时记者，名叫艾基维森，于1941年12月9日写信给司法部说，日本政府已雇佣旺夏茨基为代理人。反诽谤同盟的阿诺德·福斯特和迈尔斯·戈德堡直接同特别防护分队的比斯盖尔联系，提供了得自一个名叫康士坦丁·卡列丁的谍报人员的情报。《钟点》报的艾伯特·凯恩把他那“充满”旺夏茨基逸闻轶事的“卷柜”提供给特别防护分队，其中包括阿列克斯“委任七个杀人凶手的自白”。

比斯盖尔把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材料交给分析员路易斯·内姆泽尔，他接受了弄清楚这些材料的意义的艰巨任

务。在11月和12月里，内姆泽尔仔细研究了从1922年被控重婚到1941年通敌之说的全部文件。内姆泽尔在他于12月19日交给比斯盖尔的34页备忘录中，概括提出可能对旺夏茨基起诉的三个方面：（1）违犯沃勒斯法案，（2）违犯麦科马克法案（对反对美国利益的外国主犯有效），（3）由于他虽然宣誓效忠于美国而又谎报财产状况、隐瞒“刑讯杀人”、“思想上有保留”，因而应取消其国籍。

珍珠港事件成功地做了十年来公众的愤怒和私下的谴责所未能实现的事情：使司法部相信：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不可能仅仅是个笑料。内姆泽尔在他12月19日交给比斯盖尔的备忘录中谨慎地写道：“……旺夏茨基很像一个喜歌剧里的演员，这种相似性使得他放纵地干他那些不引人注目然而非法的活动。”

现在还有待于检察官在法庭上去证实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事实上是德国—日本的间谍，是对美国安全的极大威胁。检察官为了得到大陪审团的起诉，还要对佩利彭科的揭发签字盖章证明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揭发是最有力的证据（在某些方面是唯一的证据）。更重要的是，检察官对嫌疑犯的具体性格和活动越来越熟悉，就不得不板起面孔。

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原来是司法部长的青年助理，他的名字叫托马斯·多德。

第十七章

小丑表演，受到惩罚

那并不仅仅是一个大杂烩行军俱乐部。我们认为那不是。

托马斯·约·多德

1942年5月14日

1942年头四个月，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耐着性子，尽量表现得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地避免有任何令人憎恶的表现，甚至避免发表引人注意的谈话，尽量显得有爱国热忱并且不引人注目。他43岁的年纪超过了征兵年龄；但是，为了表示他对战争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便借给帕特南民防连54支老式步枪。

在这同时，华盛顿的司法部一直不停地在转动着它的车轮。特别防护分队于4月间完成了对旺夏茨基的彻底调查，经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批准，把全部调查结果交给刑事处起诉。刑事处提出了控告，这次控告远比违犯沃勒斯法案和麦科马克法案严重得多。原来旺夏茨基被指控违犯了1917年间谍活动法第32条，将情报交给外国或外国代理人而

对美国造成危害。

必须由联邦大陪审团指控旺夏茨基搞阴谋才能对他进行审问和判刑。政府为了能够对他起诉，必须使联邦大陪审团相信，确实有合情合理的证据，说明他犯了罪。特别防护分队已收集了有关嫌疑犯的大量材料。然而，其中很大部分是基于道听途说的鸡毛蒜皮的事。大多数说明有罪的证据（如果还有这种证据的话）也许是在旺夏茨基的个人档案里面。

很显然，联邦调查局对十九穴进行搜查是合情合理的。

闪电战

阿纳斯塔斯在1934—1935年精心设计十九穴的建筑结构和犬牙交错的防御工事时，绝没有梦想到这些结构和工事不会受到苏联特务或罗扎耶夫斯基的枪手们的考验，而是要受到美国联邦执法官员的检查。但是，到了1942年，这位伯爵应该预料到这样的检查会来临。在国会里面，众议员迪克斯坦称他为“在美国的危险分子”。康涅狄格州警察局的罗斯·厄克特中尉甚至在春季早些时候来到十九穴，就联邦调查局进行搜查的可能性向他的朋友阿列克斯提出过警告。然而，当搜查真的到来时，伯爵完全感到突如其来，不知所措。

1942年5月9日，星期六，太阳刚偏西，13名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携带着联邦搜查证像旋风般地突然降临十九穴。他们由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分局局长理查德·西蒙斯率领，由康涅狄格州警察局丹尼尔森派出所所长维克托·克拉克中尉陪同（厄克特已调到另一个岗位上去）。当车队停在车道上

时，只有马里恩和仆人们在家，阿列克斯到波士顿去作周末采购去了。

调查员们毫不迟疑地穿堂进屋。他们搜索了拥有14间屋的庄园住宅，搜索了附属的石头建筑群，包括军事室和办公室、奶牛棚和改建后的鸡舍，鸡舍里仍然放着印《法西斯主义者》的印刷机。他们在两小时内，收集到六套黄卡叽制服，一打卅字袖标，一盒卅字别针，六支1916年的老式步枪，一台录音机，带有一些每分钟78转的录音盘，四筒催泪瓦斯，两打玩具船，一件看起来像是被虫蛀了的大衣，披在时装模特儿身上。有几个调查员去到西汤普森公墓，进入旺夏茨基的地下墓室，注视着石棺。只有孔尔的尸骨在那里。调查员们把注意力集中在11个铁公文柜上面，这些公文柜装满了来往信件、剪贴簿、办公室分类帐、《法西斯主义者》的合订本和几种小册子。由于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俄文写的，调查员们搞不清楚他们看到的是些什么东西。因此，他们等待着他们要找的人回家来。

那天晚上旺夏茨基从波士顿回来时，已是10点过后了。他看见车道上停满了车，就断定一定是马里恩在招待她的朋友。但是，当他一明白他是注意的对象时，他马上就热情地应付这个场面。他积极主动地带领调查员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检查，用一串钥匙打开锁着的抽屉和衣橱。他把他们领进军事室，重述着自1930年以来曾讲给纳粹分子、共产党人和至亲好友听的那些事情。他坚持要政府把11个公文柜全拿去，使得那里面的东西保持完整无损。

快到11点的时候，旺夏茨基坐下来同调查员穆尼尔和马

汉谈话。他毫不受打扰地一直谈到第二天(星期天)早上4点半。他对他们谈到他的生平，从华沙谈到温得哈姆县，详细讲述了他同威廉·孔兹的关系。听他讲话的两个调查员好像对他所讲的特别感兴趣，穆尼尔作了一大本笔记。

星期天，全国各地的报纸，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报纸，都对突然搜查十九穴一事作了显著的报道，但是，这仅仅是联邦调查局周末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西斯嫌疑分子所采取的行动之一。全俄国民革命党的战友中受到光顾的有曼哈顿的亚历山大·朱格列维奇牧师、昆斯的萨文、洛杉矶的费奥多·西门斯和乔治·杜姆巴泽、旧金山的赫伯特·范茨和安妮·甘塔毛拉公爵夫人。无论是这些人或者是旺夏茨基都没有立刻遭到拘留。搜查的目的在于为可能的起诉收集证据。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地方检察官罗伯特·巴特勒宣称，在旺夏茨基庄园收集到的证据要带到哈特福德去呈送给联邦大陪审团。联邦大陪审团按计划将于5月12日星期二在美国地方初审法院召开会议。

旺夏茨基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通宵达旦地谈话之后，星期天感到困倦。然而，他没有睡觉的机会，电话铃不断地响着，新闻记者来电话要求他发表意见。阿纳斯塔斯一反他那口若悬河的常态，对记者们的询问回答说，他只知道他在报纸上看见的那些事情。他的律师克拉伦斯·米切尔显然曾劝他少说些话，不签署任何文件。果然，三天之后马汉和穆尼尔把他星期六夜间滔滔不绝的独白的摘要带回十九穴要阿列克斯签字，他避免签署这个摘要的宣誓书。

5月11日星期一下午，一辆卡车开到十九穴来取公文

柜、步枪、零星什物和被《哈特福德报》称为存放“精心制作的法西斯制服的衣柜”。军事室里，除了一个一丝不挂的人体模型外，已空空如也，徒剩四壁。人体模型的雪花石膏的光泽，使得这个苍白的人像确实成为一个“白卫军”。旺夏茨基看见它就受不了，便把它包扎起来放在一个棺材似的木箱子里。

全俄国民革命党的文件都是用俄文写成，这使哈特福德的当地官员看不懂，于是决定从华盛顿请来三位通晓几国语言的人，对所有文件都进行详细审查，并把看起来有重要性的文件翻译出来。

星期一的报纸继续报道了搜查的始末，重新提起旺夏茨基的逸闻轶事，并且稍微作了些添枝加叶的叙述，以供战时的读者阅读。十九穴再也不仅仅是一个“堡垒”，而且逐渐成了“一个武装的营地，信徒们在那里接受严格的训练”。阿纳斯塔斯显得是罗扎耶夫斯基、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和关东军的“勾结者”。宪兵司令部的《每日画报》突出叙述了阿列克斯的年龄问题和他的男女私情，说马里恩比他大22岁。

星期一那天，各报还公布了司法部指定在哈特福德的大陪审团面前控告旺夏茨基的人的名字，他就是托马斯·约·多德。

起 诉

托马斯·约瑟夫·多德1907年5月17日生于康涅狄格的诺威奇，司法部指定他控告旺夏茨基时，还不满35岁。然而，他的青春年少同他的坚定顽强、聪明敏锐和争取成功的

强大内在推动力不相称。他的坚定顽强和聪明敏锐来自严格的训练。他是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长大成人的，他的家庭属于爱尔兰的中产阶级。他曾要求成为一个演员，但是，他的父亲不支持他从事这种轻浮的职业，而指导他走向法律界。20年代后期，旺夏茨基经常坐着梅塞尔牌黄色体育轿车去观看布朗队的足球比赛时，多德正在附近的普罗维登斯学院研究托马斯·阿奎那^①，那个学院是一个严肃的多明我教派神学的堡垒。多德对政治的兴趣萌发于耶鲁法学院，他在那里被选为耶鲁多明我俱乐部主席，并且挤出时间来在竞选运动中为主要候选人充当出面人物。这项工作使多德学到了实际的演说才能和辩论技巧，因为这项工作要求在工会大厅里、在县政府办公楼的台阶上、在露天群众集会上，不用扩音器唤起急躁的、有时是含敌意的意志消沉的人群的热情。有一个长期的助手后来回忆说：

多德在一种战斗的磨炼中学会了突出地表达他的意见和保留他的意见，以权威的态度制服当众诘问他的人，迅速衡量群众的情绪，判断群众的反应和群众不满的主要脉络。

多德争取晋升所作的努力引起了有势力的康涅狄格民主党人霍默·卡明斯的注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年任命卡明斯为司法部长后不久，卡明斯就把多德推荐给埃德

^① 阿奎那是中世纪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

——译者

加·胡佛。胡佛给多德安排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别调查员的工作。但是，胡佛的严厉的纪律，不适合多德的抱负。1935年他辞去联邦调查局的职务，参加了康涅狄格政界人士弗朗西斯·马洛尼的竞选班子。1936年马洛尼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任命多德为康涅狄格世界长老会联盟副主任作为酬谢。多德不久就升任另一个新政项目全国青年总署的州分署主任。1938年，多德又回到司法部当他的老导师霍默·卡明斯的特别助理。1939年卡明斯辞职后，多德继续在弗兰克·墨菲、罗伯特·杰克逊和弗朗西斯·比德尔手下工作。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多德由于有高血压病和五个孩子而感到从事军务不合格。于是，他专门从事告发逃避兵役的人的工作——直到他被指派来控告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为止。

旺夏茨基案件是多德所碰到的第一个大案。他有三条理由要给予这个案件异乎寻常的重视。纳粹引起了他道义上的愤慨。旺夏茨基看起来像德一日间谍网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情节很适合多德的刺探国际阴谋的志趣。最后，鉴于报刊上广泛张扬旺夏茨基的事情，这个案件必然要把起诉这个案件的人置于全国目光注视的中心。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如果处置得当，可以使多德在政治上的前途飞黄腾达。但是，多德深深知道，成功之道取决于使旺夏茨基看起来像是一个狡猾而危险的首要间谍。如果说仅仅是替美国除掉一个小丑，那么，他是得不到谁的赏识的。

多德投身于旺夏茨基案，决心争取起诉能够成立并且给予定罪。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时间来作准备（从十九穴

搬文件到大陪审团开始听证之间只有三天时间)。但是，由于艾伯特·卡恩的帮助，这个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卡恩替多德分担了审阅《钟点》收集的关于旺夏茨基的大量档案的任务。此外，多德并不担心没有准备，因为他认为这个案件是一桩简单明瞭、无需证明的间谍案。只是在审讯开始之后，证据中的错综复杂和矛盾重重才引起了他的重视，而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多德处理这个案件深深受到战时气氛的影响。美国正在对法西斯作战，而德国和日本就是法西斯的化身。旺夏茨基这个不打自招的法西斯分子保持着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联系，这种联系本身就是以反美阴谋为目的的。旺夏茨基的出身和他的反共本性、他与德日当局的实际关系、他与其他流亡者集团的关系、首先是他爱好夸张、炫耀和幻想的脾气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被这位青年检察官认为无关重要。事实上，他似乎认为，这些问题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真相——旺夏茨基正是《钟点》和佩利彭科所说的那种人物。

正式起诉于5月14日星期四上午在哈特福德的联邦大厦开庭。10点钟时，美国地区法院约瑟夫·史密斯法官让大陪审团23位陪审员宣誓就职；陪审员中11人为女性，12人为男性，陪审长是康涅狄格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退休督办。代表政府的是多德、地区检察官罗伯特·巴特勒以及两位助理地区检察官约瑟夫·库尼和瓦伦丁·萨科。旺夏茨基和他的辩护律师都没有在这一次或以后的任何一次陪审团听证会上露面，所有的听证都是秘密进行的。

巴特勒作了开场白。他强调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必须

保密，因为，“这是一桩我们认为十分严重地涉及我们政府、我们国家的安全的案件，也是涉及这次战争中我们的某些盟国的安全的案件”。他继续强调这个案件的重要性：“我一直在本地区担任美国检察官，迄今将近八年了，我认为本案是这段时间中在本地区由大陪审团所进行的最严重的调查。”巴特勒在结束讲话时说，美国司法部长的特别助理将负责提起公诉。然后他让多德讲话。

多德最后扫了一眼他的笔记，慎重地站起身来，慢条斯理地环视了一下大陪审团的23名陪审员。尽管他身材矮胖，但是，他表现出一种令人难忘的风度。他的面容除了有些红润外，完全是一副古罗马政治家的面容：两颊丰满、双唇平直、鼻子轮廓清晰、黑色浓眉底下目光炯炯、鬓角周围有一点过早出现的灰白头发。但是，多德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的有力动作。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辐射出能量和意志力。他的讲话如果说并不总是句斟字酌、出口成章，也是具有千锤百炼的说服力，真是滴水不漏。

多德从向大陪审团概述旺夏茨基的经历入手，“不打算向你们提出证据，也不打算以任何方式使你们怀有偏见……而是为了对这件事情的全貌至少有些明智的想法”。这位检察官从旺夏茨基的青年时代讲起，讲到他的成长、军事生涯、在巴黎与马里恩相遇、“通过里姆一家的影响”而移居美国，“里姆一家那时在政府圈内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多德叙述了这位伯爵加入俄罗斯真理兄弟会、他的法西斯党、1934年他出现在满洲国“公然穿着日本军官的制服”。接着谈到的是全俄国民革命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与德美同盟

的关系、韦伯斯特暴动、给孔兹2800美元支票、旧金山的短期旅游、芝加哥的聚会、有“完全可用的步枪”和轻机枪（带弹药）的军事室、十九穴的军事训练、纽约的法西斯学校、以及阿列克斯计划“在德国人征服俄国的时候接管俄国新政府”。多德在结束他的讲话时，着重强调了旺夏茨基与孔兹的关系、他有一张日本陆军军官的名片、以及他与阿拉斯加的不明身份的人的某些所谓通信往来。

不太久以前，旺夏茨基给一个俄国牧师一张名片，介绍他去日本大使馆；旺夏茨基承认名片是他亲手给那牧师的。名片上有一位日本陆军上校军官的名字。那个牧师持名片到了日本大使馆，日本人叫他回去向旺夏茨基打听阿拉斯加方面某些联系人的名字。我们知道，直到最近旺夏茨基还给阿拉斯加邮去挂号信。这样一来，你们便逐渐看清了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那并不仅仅是一个大杂烩行军俱乐部。我们认为那不是。

多德作了开场发言后，接着就询问证人。

39个人接到传票，来到大陪审团面前。他们全都在哈特福德进行了揭发，并且在5月14日到6月9日的八个整天听证期间提供了证词。这些人合在一起揭发了旺夏茨基的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当中有一个亲戚，这就是俄国内战的老战士列夫·马梅多夫。然后还有当前的和从前的全俄国民革命党战友：朱格列维奇牧师、诺曼·沃森、“米莎”·卡普拉尔。阿列克斯的亲密朋友们大举揭发，他们是《帕特南爱国

者》的乔治·康内尔；自由投稿的记者兼摄影师里查德·麦卡利；从前的球童、从前的报纸编辑、从前的保险业务推销员和现役的美国陆军士兵吉米·巴克；康涅狄格州警察官员罗斯·厄克特和埃尔顿·诺兰。家务仆人也按规定的日期到场，他们是里姆家干零活的里查德·巴顿；菲律宾厨师拉米罗·西森；挪威籍女佣人尼科利娜·约翰森；十九穴从前的看管人埃米尔·拉约内斯；从前的司机詹姆斯·摩根和沃伦·汤。马里恩的两位密友也 唤到庭 ，他们是弗兰克·德克尔和马里恩·德弗洛里斯。

其余的证人来自汤普森—帕特南社交圈以外，但是他们知道旺夏茨基的事情，或者同他打过交道。这些人中包括《哈特福德报》的记者们，韦斯利·格里斯沃尔德、弗朗西斯·昆兰、戴维·卡尔。格里斯沃尔德于1934年在旺夏茨基完成第一次环球旅行后采访过他；昆兰为《哈特福德报》报道过1937年7月4日的周末晚会；卡尔在1939年韦伯斯特暴动后为《钟点》采访过旺夏茨基。传唤到庭的还有弗朗西斯旗手父子公司的查尔斯·斯科特和劳埃德·柯蒂斯，旺夏茨基在那个公司买过步枪；联邦化学公司的杰弗里·奥伯迪克，旺夏茨基曾在那个公司灌过催泪瓦斯；普罗维登斯的摄影师马库斯·格雷厄姆，他曾给旺夏茨基拍过照（穿着全副军装）。到会的还有几个俄国流亡者；他们是亚历山大·伊戈罗维斯基和弗拉季米尔·伊林，他们的印刷厂曾经印过《法西斯主义者》；波里斯·布拉索尔，他从前是沙皇的检察官、刑法学家、反苏时事评论员、有名的反犹分子，以纽约为基地的俄国人全国委员会劲头十足的成员、君主制度的拥护者；莫

扎·普希尔，他来自华盛顿，是俄国血统的室内装饰家，1941年以来曾三次与旺夏茨基不期而遇；菲利普·金，纽黑文塔夫脱饭店退休的侍者领班，他证明，1940年耶鲁—布朗球赛之后，他看见旺夏茨基招待两个日本妇女吃饭，波士顿的律师保罗·基利安和他的妻子玛丽被传讯，问他们为什么曾经把他们在剑桥的克尔克兰寓所的房屋出租给一个自称为“俄国人俱乐部”的团体。联邦调查局特别调查员莱昂内尔·穆尼尔就他在5月9—10日搜查后在十九穴同旺夏茨基六个小时的谈话提交了一份证词。

最后出场的是一些关键性证人，他们在确定旺夏茨基卷入德日间谍网一案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人包括德美同盟成员奥托·威卢梅特和奥古斯特·克拉普罗特以及来自费城的路德派牧师库尔特·莫尔赞，他们全部指控旺夏茨基唆使孔兹从美国逃往墨西哥。但是，提出起诉的明星则是亚历克修斯·佩利彭科。2月以来，移民归化局在考虑对佩利彭科怎样处理的时候，他一直呆在马里兰州霍华德堡的外国人收容中心。然而，多德很快就把佩利彭科看作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证人，并且把这个被弄得稀里糊涂的人从霍华德堡提了出来，安顿在哈特福德的邦德旅馆住下。

在证人行列里缺少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旺夏茨基，这个人就是马里恩。马里恩同阿纳斯塔斯一起生活了20年；1928年以来，他每次出国旅游，她都陪伴着；据说在这些旅游期间，他卷入了德日政府的阴谋。马里恩为什么不来作证？其中原由只能臆测。可能是里姆家族竭力制止她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在大陪审团听证会上，不能强

迫一个人作不利于配偶的证明。也可能是多德了解到马里恩的年纪(65岁)、身体情况、在本地社会上的名望、不参与丈夫的政治活动等等，便决定免去她对丈夫的案件作证的痛苦和羞辱，但是，这一点不可能得到证实。此外，多德到这时也许已发现，旺夏茨基“与日本人的关系”还包含着两性关系的成分；他可能认为，在一个无辜的老太太面前摆出她丈夫的放荡行为，是无端的残酷之举。

多德的办案策略要求他从每个证人的证词中找出能给政府的起诉提供可靠的证据来；政府控告旺夏茨基曾阴谋策划把美国的军事秘密经泷太百代夫人之手交给日本，经威廉·孔兹之手交给德国。39个证人中，亚历克修斯·佩利彭科当然最卖力气来帮助多德使这桩起诉有根有据。

佩利彭科两次作证(5月20日和21日)，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只是有些时候借助翻译人员的翻译而说得有些松散。这个牧师不仅重述了他向联邦调查局谈过的旺夏茨基的情况，而且还即席添枝加叶、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譬如说，他向大陪审团肯定，在他于1941年8月6日访问十九穴的时候，旺夏茨基曾告诉他斯蒂芬·茹·肖姆贝格—利普亲王的名字，说这位亲王是旺夏茨基在巴西的代理人。佩利彭科曾经向移民归化局的一个情报人员报告说，旺夏茨基曾告诉他一个人的名字，此人在圣保罗，是巴西的报刊信件检查员，是个特务。但是，在这以前，佩利彭科从来没有提到过斯蒂芬亲王。这个亲王当然不是别人，就是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的官员，这位官员曾经派佩利彭科到美国来进行亲纳粹宣传。这个牧师竟然把他自己的接头关系说成是旺夏茨基的

接头关系，真是令人吃惊，甚至有点鲁莽。多德责骂这个听起来妖声怪气的德语名字，而对证词的其余部分却很欣赏，斯蒂芬·茹·肖姆贝格—利普亲王原来是旺夏茨基在巴西的人！

但是，佩利彭科还编造了更为惊人的故事。在一个关键时刻，他把旺夏茨基说成是“在美国境内的德国间谍网—日本间谍网的总指挥”。后来他又补充说，阿纳斯塔斯还“负责德国在加拿大的间谍工作”。佩利彭科引用这位伯爵的话说，他在科迪亚克岛上和阿拉斯加的锡特卡有代理人，并保持着联系。旺夏茨基在旧金山试图交给泷太百代夫人，最后交给了孔兹的情报，包括“美国陆军和海军舰队部署的位置”。佩利彭科唯恐听他说话的人 would 认为旺夏茨基对美国还有一点忠诚，便引用伯爵的话说：“我对美国国籍视若敝履。”

尽管佩利彭科卖力地帮多德的忙，但是他既是宝贝，有时也是个负担。他对旺夏茨基造的舆论有时也过分夸张，接近于滑稽表演。在多德看来，这样的证言显然是不合需要的。陪审员们可能持怀疑态度。的确，有一位女陪审员显然对佩利彭科产生怀疑，问他为什么被收容。这个问题引起这个乌克兰牧师勃然大怒，他口出狂言，叫嚷“波兰佬”对他被禁闭在霍华德堡要负责任。人们听说佩利彭科有个儿子的时候，一位陪审员问他，作为一个牧师怎么能有儿子呢。这个问题也触及他的痛处，他立即发表了一篇激烈的谈话，指责他在联邦调查局时的监督员，据说这位前监督员对牧师的儿子的合法地位比对捉拿间谍表现了更大的兴趣。

到这个时候，多德看见他的王牌证人已逐渐成了问题。

在他示意翻译员把佩利彭科带下去的时候，拖着长声问道：“还有别的话要说吗？就这样吧。〔对着佩利彭科〕很谢谢你。我们再也用不着你了。”

佩利彭科再也用不着了。他回到了霍华德堡。

尽管佩利彭科可能给多德带来了这些问题，但是，他至少是大胆地想把政府对旺夏茨基的控告拔高一些。其他的证人就不大与多德合作。威卢梅特、克拉普罗特、莫尔赞顽固地否认“有阴谋”这个说法。威卢梅特驳斥了佩利彭科关于俾斯麦饭店聚会的说法。克拉普罗特只承认在十九穴喝过酒、听过进行曲的唱片。莫尔赞证明他从来没有同旺夏茨基见过面或通过信。反苏作家波里斯·布拉索尔虽然承认，这位伯爵于1930年曾在信中要求接管在美国的俄罗斯真理兄弟会的领导权，但是也否认同旺夏茨基见过面。朱格列维奇神父甚至在多德紧紧催促下也回忆不起来在阿拉斯加有任何适合教士身份的联系。

多德由于不了解一般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不了解散居国外的俄国人的情况，在整个听证过程中，自始至终感到很棘手。他坚持认为罗扎耶夫斯基和谢苗诺夫是旺夏茨基的党的成员，领导着哈尔滨的一个“支部”。马梅多夫说到中村 蒨时，把“蒨”，（英文读音为Hitoshi）的音误说成“Hiroshita”，多德把他同日本天皇裕仁（英语读音为Hirohito）联系起来。波士顿律师保罗·基利安提到哈佛历史学家迈克尔·卡尔波维奇曾在剑桥的俄国人俱乐部作过报告（这个俱乐部是俄裔学术界人士、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者的非官方团体），多德疑惑地大声问道，卡尔波维奇是否也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使多德更为难的是，来自温德哈姆县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坚持立场，认为旺夏茨基是个幻想家和装腔作势的人，既不是德国人的间谍，也不是日本人的间谍。康涅狄格州警察局的警官诺兰从1927年以来就认识这位伯爵，他说：“我知道他是一个追求名望的大人物，喜欢在公众面前亮相。我敢说，他的谈话没有那一句伤害过与本国有关的任何人。”厄克特中尉响应诺兰的意见，他说，“是的，他〔旺夏茨基〕是个该死的傻瓜，这是其一；他的确追求他所能得到一切声望。”

多德问乔治·康内尔，当他听到旺夏茨基谈到要在1941年夏天在德国人帮助下接管俄国政府时，他有什么想法，康内尔回答说：“我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吉米·巴克穿着美国陆军制服来到哈特福德审判庭。他在30年代初期曾给旺夏茨基当过球童，30年代中期曾同他一起痛饮狂欢，1941年以来，曾把保险单拿去放在旺夏茨基地下墓穴的有色玻璃窗上。关于旺夏茨基，他说了这些：

我得到的印象使我难以想像他的〔旺夏茨基的〕活动有什么严重的意义……有什么影响足以使人担心。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我在这样说的时侯，我也许是代表居住在他的庄园附近的大多数人在讲话。我认为，别把这些活动看得太严重。

其他的证人也都热烈地谈到旺夏茨基。诺曼·沃森是哈特福德科尔特火器公司六角车床操作工人，他在20年代给旺

夏茨基当过球童，1933年到1937年间给他作秘书事务；他证明他的前主人心眼好，对人厚道，是个善良的美国公民。拉米罗·西森是菲律宾出生的归化美国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海军中服役，1940年以来在十九穴当厨师，他重新肯定了沃森对旺夏茨基的积极评价。

来自本地的最含敌意的证词是马里恩·德弗洛里斯的证词。德弗洛里斯是庞弗雷特的很爽快、很体面的贵妇人，是马里恩的最老的朋友。1921年旺夏茨基第一次访问汤普森在卡罗林公馆作客时，德弗洛里斯就认识了他。她始终觉得他粗鲁、冒失、回避他的老伴。1941年夏天，阿列克斯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希特勒先生希望我到俄国去当德国的代表，我也愿意去。”这引起她极大的义愤。她曾讥讽他说：“我非常怀疑希特勒是否知道世上还有你这个人。”尽管她不喜欢旺夏茨基，但是，她也不能宣誓证明他是个间谍。在问到她的时候，她也记不起在十九穴看见过一次日本人或德国人（她也许忽略了中村房子）。她最后终于附和其他证人的意见说：“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把他当作笑柄来看待。”

莫扎·普希尔是个24岁的室内装饰家，她秉性冒失，生于华盛顿，在头年的夏天，出于好奇心而到十九穴去过，她是受到她所听到的关于住在十九穴的那个人的故事的驱使。旺夏茨基向年轻漂亮的女人献殷勤的秉性难移，就请她在十九穴住了一夜，用美味佳肴招待她。他们后来又去纽约去吃了饭，到纽黑文去看了布朗和耶鲁的球赛。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吹嘘他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吹嘘他对俄国的宏伟计划。但是，莫扎的本能告诉她，“那只不过是些

肥皂泡罢了。”

多德面临着他办的案子有由于变化无常而被推翻的前景，开始表现出急躁的情绪。在这位提起公诉的检察官抱怨“是不是你的记忆力有毛病？”的时候，乔治·康内尔第一个感觉到他有点沮丧。厄克特中尉说，他曾经同嫌疑犯有过社交往来并且向他借过钱，但是，除了说阿列克斯的枪也许是不能用的坏枪外，就没有向大陪审团提供更多的情况；多德听了这些之后沮丧地说，“看来你们的人好像还应该掌握一些其他的情况。”当诺兰警官未能提出显示旺夏茨基有罪的证据时，多德几乎无法控制他的恼怒，他说：

这些年来你同他〔旺夏茨基〕谈过很多话，同他有密切的交往，看来你很可以挑些有价值的事来谈谈，而不要只是认为他是个小丑，我认为你是这样认为的。……你在那里有公务联系，因而你对他太了解了，这不是事实吗？除了你在这里对我们说的而外，难道你不知道他的别的事情吗？

当吉米·巴克证明他没有把联邦调查局的搜查当一回事的时候，多德暴躁地问道：

你是个美国公民，也是个美国士兵，你一定知道有些德国代表到那里去过〔到十九穴去过〕。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人〔旺夏茨基〕有些严重问题吗？

但是，巴克没有被吓倒：“我愿纠正你的错误，先生。我任何时候也不知道有什么德国代表到他的庄园去过。”多德警告巴克不要再同旺夏茨基见面，“这是要脑袋的事情，”以此来结束他们的谈话。

在多德发泄怒气时，诺曼·沃森首当其冲。因为他曾当过旺夏茨基的秘书(1933—1937年)，多德检察官觉得他应该能够向大陪审团谈谈他的主人同德国和日本的同谋关系。但是，沃森只记得写过信、付过帐单、陪同旺夏茨基去纽约镶牙、招待州里的警察吃饭、到汤普森和帕特南邮局去邮寄《法西斯主义者》邮件。多德所能得到的就是这些。下面是从多德对沃森提出的问题中摘录的几段话：

难道你不认为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忠诚地、如实地、正确地向联邦大陪审团陈述，并且不含糊其词、躲避听证，是你的责任吗？你明白过这个道理了吗？

你坐在这里，假装不懂我们谈到的问题，总的说来，你和别的人一样拒绝向你提问，难以向你提问。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聋了还是不想回答问题。

你出去找个地方坐下来想一想。走吧，出去吧。

〔沃森离开审判庭后〕他是个说谎话的人，这个家伙。

多德用不着这样心烦意乱。战争已经使像23个陪审团员这样的普通公民乐意接受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的花言巧语，即使这些花言巧语出自最靠不住的人之口，他们也乐意接受。6月9日星期二下午，大陪审团经过30分钟考虑后作

出了决定。陪审长斯科特向史密斯法官宣读了决定，陪审员们正式宣告对旺夏茨基起诉，控告他在1941年1月1日到12月6日之间参与了一个阴谋，把国防机密^①交给德国和日本，违犯了1917年的反间谍法案第32款。被列名为旺夏茨基的同谋犯的，有孔兹、威卢梅特、寄发孔兹的邮件的两个德裔美国人：费城的库尔特·莫尔赞神父和得克萨斯州埃尔伯索的沃尔夫冈·埃贝尔博士。

起诉书列举了阴谋者们所干的12条“明显的行为”，旺夏茨基在五条中赫赫有名：

1. 1941年7月12日在汤普森会见孔兹。
2. 1941年7月12日交给孔兹一张2800美元的支票。
3. 大约在1941年7月里去旧金山旅游。
4. 大约在1941年7月里在俾斯麦饭店会见孔兹和威卢梅特。
5. 大约在1941年11月，收到孔兹写的“一些信件”。

旺夏茨基现在面临着服罪或者受审的选择。

在联邦大陪审团调查他的活动的时候，旺夏茨基也没有呆着无所事事，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律师并没有无所事事。1941年后期，德美同盟的律师威尔伯·基根对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调查员说，马里恩“有她自己的律师”，这些律师正在代表阿纳斯塔斯进行工作。其中有一个叫克拉伦斯·米切

① 递交的机密包括：“文件、信件、密码本、信号本、草稿、照片、底片、蓝图、计划、地图、模型、笔记、仪器、器械以及与美国国防有关的情报……”

——原注

尔，他于1941年10月到12月之间就全俄国民革命党根据沃勒斯法案要求登记的问题同司法部通过信。但是，在1942年5月9日联邦调查局搜查十九穴之后，阿纳斯塔斯显然需要第一流的辩护律师。马里恩(也可能是她的弟弟罗伯特·克拉克·里姆，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老练得多)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国内最有名的辩护律师小马丁·利特尔顿。

利特尔顿是个合适的人选。他的父亲老马丁曾经为家财百万的花花公子亨利·索辩护，获得胜诉。亨利·索于1905年6月25日晚上11点零5分在音乐喜剧《香槟小姐》终场前几分钟在麦迪逊广场屋顶花园杀死了有名的建筑师斯坦福·怀特。这是本世纪以来广为人们所知的杀人案之一，利特尔顿在这场官司中表明索家族的精神病代代相传，从而为他的当事人赢得了陪审团“无罪开释”的裁决。在审讯期间，索约束着自己听任人家说他精神错乱，但是，辩护的策略起了作用。

4 小马丁继承了他父亲的素质，具有生动的表达能力和动人心弦的口才。一个合伙人羡慕地说，“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戏剧演员。”30年代中期，利特尔顿曾短时期当过纳骚县的地区检察官，但是，不久就转为私人开业，因为他发现私人开业更有利于挽救人们免遭电刑处死，而不是把他们送上电椅。

利特尔顿替旺夏茨基辩护的计划是仿效他父亲替索辩护的策略。要证明被告精神错乱从而对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利特尔顿决不是把旺夏茨基说成是有失常态的一个人。联邦调查局1939年的一份报告就说过：“他被认为在其

革命党活动中有些精神错乱。”任何朋友和敌人都说阿纳斯塔斯反复无常、稀奇古怪、夸大妄想、鬼迷心窍。利特尔顿的创新是把这些怪癖夸大到这样的程度：他的当事人应送进精神病院，而不是送进监狱。

旺夏茨基有没有按利特尔顿的计划办呢？他也许还有些疑虑。关在精神病院里同在监狱里坐牢一样难受。此外，旺夏茨基不像当年索那样在精神错乱和判处死刑之间进行选择。他知道他充其量会被判处最长刑期的徒刑，但还有假释的可能，而关进精神病院可是一辈子的事。

另一方面，里姆家族很有理由欢迎把阿列克斯关进一个精神病院，并且很可能对利特尔顿的计划起了作用。里姆家族从来就没有同意马里恩嫁给一个腰无分文、年龄比她小一半的流亡者。阿列克斯在两性关系上和政治上的胡作非为使里姆家族很为恼火和不安。一纸精神错乱的证明是使阿列克斯同马里恩分离并且再也不要看见他的方法，这方法既符合人道主义又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精神错乱毕竟还是离婚的理由。

给这位伯爵打上“精神失常、歇斯底里的条顿波兰佬”（正如埃兹拉·庞德说尼采那样）的烙印所作的努力于6月初开始了；利特尔顿把旺夏茨基带到纽约的贝莱维尤医院去请神经病专家福斯特·肯尼迪大夫给他进行检查。这位律师还聘请了三位著名的内科医生（纽约的里查德·霍夫曼大夫、布里奇波特的丹尼尔·格里芬大夫和哈罗德·里布内尔大夫）宣布旺夏茨基为“妄想狂——既对他有危险，也对社会有危险”。利特尔顿以这样有份量的医生意见为武器，打电

话给多德说，他的当事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危险”，那时多德正在康涅狄格州莱巴嫩城家中准备6月4日星期四的大陪审团听证会。利特尔顿没有告诉多德便通过格里芬大夫作好了安排，打算于第二天6月5日星期五把旺夏茨基送进费尔菲尔德的州立医院。

利特尔顿的策略已定，但事与愿违。多德很快就发觉旺夏茨基住院会帮助被告一方在法庭证实他精神错乱；他找到了阿纳斯塔斯的去向，便打电话给费尔菲尔德州立医院的负责人，负责人向他讲了格里芬大夫的安排。几分钟后，格里芬大夫本人也打电话给多德，承认对接收旺夏茨基入院的计划负责，但是，在与多德通话之后，改变了主意。旺夏茨基于6月5日来到医院时，医院拒绝接收他入院。

利特尔顿的住院计划促使多德于6月5日星期五在哈特福德去寻求一张拘留旺夏茨基的法庭拘票。拘票是6月6日星期六签发的。联邦调查局的两名调查员来到十九穴拘留伯爵。碰巧阿列克斯到普罗维登斯去找他最喜欢的理发师奥兰多给他理发去了。两个调查员驱车去普罗维登斯，抓住了他，把他关进普罗维登斯县监狱。保释金规定为25000美元。

如果阿列克斯认为有人会来帮助他，他就错了。马里恩的银行帐户已被封存。她的兄弟们最不愿意保释他出来。利特尔顿既然已经承认旺夏茨基是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他知道，急于保释会不利于办案。结果，伯爵在普罗维登斯度过了那个周末，尝尝牢房的铁窗风味。在这时，多德也来到普罗维登斯，但是没有他同旺夏茨基两人见面的记载。据联邦

法院执法官尼尔·墨菲说，旺夏茨基不安地度过了那个周末，在屋里踱来踱去，两手叉腰，用一个琥珀烟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6月8日星期一，在决定不举行特别听证会之后，这个囚犯由联邦法院执法官押送到哈特福德，投入哈特福德县监狱，听候大陪审团的决定。第二天大陪审团正式宣布对阴谋起诉的时候，顿时明白了，伯爵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不能获得自由。

6月10日，欧洲和太平洋的战役，包括对中途岛战事的报道，都被撤到了一边，因为《哈特福德时报》以头号标题宣布：

此间破获大间谍案

美国对旺夏茨基起诉

另外四人参与轴心国阴谋

这篇报道叙述了“在美国的特大间谍案之一”是怎样由于俄国法西斯“首脑”的暴露而被破获；这个法西斯首脑一直在与德美同盟分子阴谋策划“把军事秘密送交给轴心国”。

6月10日下午3点钟提审旺夏茨基时，他穿着漂亮的运动服。在他的律师提出无罪的申辩时，他两个鞋跟一碰，卡嗒一声立正站在史密斯法官面前。

在旺夏茨基步出审判室几分钟后，利特尔顿向史密斯法官提出一份请求书，请求举行一次审判前判断神志是否健全的听证会，理由是经四位著名的医生检查已说明，旺夏茨基

不能了解对他的起诉，患有妄想狂症，“对宏伟壮观抱有异乎寻常的幻觉”。利特尔顿把旺夏茨基说成是“有时守口如瓶，有时啰啰嗦嗦，有时对一些异想天开、稀奇古怪的想法唠唠叨叨没有完”。

在审判室外，利特尔顿向新闻记者详述了他在那时以前仅仅笼统地谈到的一些问题：马里恩估计是住在十九穴一间锁着门的房间里，避免同他见面；旺夏茨基发誓要在把德国和日本并入法西斯俄国之前，先杀死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旺夏茨基正计划使足球成为俄国的全国体育运动项目，并要亲自率领全俄橄榄球队赴美国比赛，以60：0的比分打败西点和威斯康星；旺夏茨基曾许诺，如果他争取到宣判无罪，他要奖给利特尔顿一个荣誉勋章。

利特尔顿对新闻界的谈话成为有声有色的报道材料，但是，并没有阻止多德寻求早日开庭审判。“他在进行起诉书中所提出的那些活动期间，是否精神不正常，在审判前不成其为争论的问题。”这位检察官坚持这样说。多德也不相信旺夏茨基精神不正常：“我们认为他犯了我们控告他的那些罪；在他干那些事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在干什么。”多德并没有忽视还可能指控旺夏茨基另外一些罪行，那些罪行是起诉书里没有提到的：这位伯爵1921年进入美国时隐瞒了关于克里米亚“刑讯杀人”的情况和同柳巴·穆罗姆斯基结婚的情况，以及1927年取得美国国籍时思想上有保留。鉴于旺夏茨基还有这些额外的罪行，多德于6月12日宣布，他正在草拟一份请求书，要求取消旺夏茨基的国籍。

利特尔顿的谈话和多德的谈话给人一个印象，关于旺夏

茨基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正在形成。肯尼思·沃森在6月15日的纽约《世界电讯报》上撰文，提出这样的问题：“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或者是美国最奇怪的精神病患者之一，对宏伟壮观的场面、富丽堂皇的生活怀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异想天开的幻觉，或者是反对美国政府的危险而狡猾的阴谋家，二者必居其一。”

预期的摊牌永远没有实现。好像是在多德和利特尔顿之间悄悄进行了些讨价还价之后，6月22日旺夏茨基又一次出现在史密斯法官面前，并且改申辩为认罪。他看来两颊瘦削，形容憔悴，和20天前所表现的干净利落、信心十足形成鲜明的对照。马里恩坐在审判室的后排，娜塔莎·马梅多夫安慰着她。

多德代表政府发言，发表了一篇冲淡佩利彭科对旺夏茨基、德美同盟和日本的叙述的谈话。多德好像不知道1934年以来，旺夏茨基一直是在日本和德国不受欢迎的人一样，提出了连佩利彭科也忽略了接触：1939年阿纳斯塔斯曾在东京同日本“陆军部”^①在柏林同“纳粹高级官员”交换过意见。但是，这个检察官以令人感到意外的低调继续说，旺夏茨基不一定是阴谋的“中心人物”。“我们相信另有人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此外，旺夏茨基由于改申辩为认罪，为政府节省了时间和开支。多德最后建议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和5000美

① 大概指的是陆军省或帝国参谋本部。据回忆，在螺旋桨蒸汽机船波尔克号1939年2月访问横滨和神户期间，旺夏茨基没有下船，日本高级军官也不可能上船去同他谈话。

——原注

元罚金：徒刑在司法部长指定的场所服刑。

于是利特尔顿告诉法院，旺夏茨基在17岁时（实际上是19岁时）“就遇上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兵荒马乱，坐牛车跑遍了整个俄国”，身子都快冻僵了；身上还有一颗子弹，是那些可怕的日子留下的纪念。旺夏茨基曾经同德美同盟和日本拉关系，只是因为他认为可以利用他们去反对斯大林。这位律师有点说走了嘴，打算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中止了申辩，但是，他马上又扭转话头，滔滔不绝地为四位医生“无可怀疑的正直性”辩解，这四位医生已宣布旺夏茨基为不可救药的精神错乱。最后，利特尔顿把话题转向马里恩，他说：“如果对旺夏茨基的妻子有任何指责，那都是极令人痛心、最没有理由的事情。”她是个“了不起的公民”，她对丈夫的违法行为一无所知，值得大家同情。

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发言后，史密斯法官说，旺夏茨基“糟塌了美国殷勤好客的好意”，任由他的反共情绪引导着他干了反对美国的坏事。史密斯承认，旺夏茨基被一种顽固的成见迷了心窍，“使得他变得十分乖戾，以致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他又说，“他过去虽然知道，他在干些什么”，正因如此，理应“重处”。但是，因为旺夏茨基不是阴谋的领头人，还因为他诚恳认罪为政府节省了时间和金钱，将不判极刑。史密斯按多德的建议，宣布判处五年徒刑和5000美元罚金。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阿纳斯塔斯静静地坐在那里，时而死死盯着多德，时而好像就要哭了出来，特别是在史密斯法官指责他糟塌美国殷勤好客的好意的时候。休庭后，阿列克

斯由一个卫兵押出审判室，马里恩和娜塔莎静悄悄地看着他离去。然后她们孤单单地驱车回到十九穴。

5月和6月的事情对马里恩来说也是不好受的。利特尔顿在审判室里为她开脱；《哈特福德时报》热情地谈论她在本地的声望（“人们恨他而爱她”）；史密斯法官在判刑24小时之后，得知修正后的《反间谍法案》没有关于罚钱的规定，便取消了5000美元的罚金——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马里恩得到宽慰。她心绪不宁，但是精神还没有彻底崩溃。她所具有的复原能力、果断气魄和献身精神比许多人所想像的要强得多。不管她的亲戚朋友怎样劝她，她都不仅仅因为阿列克斯进了监狱，就同他离婚或抛弃他。要同他离婚或抛弃他都很容易，在他坐牢期间，她要去看他，就像过去他在外面胡闹、乱搞女人和从事政治活动她曾去看他那样。

旺夏茨基很幸运，他接受判刑正是时候，因为如果再晚一个星期判刑，很可能被牵连到“田园牧歌行动”里面去，那是要炸毁东部和中西部的冰晶石工厂和铝工厂从而削弱美国飞机生产的一个“防御计划”。6月22日对旺夏茨基宣判时，法院还不知道：八名德国破坏者刚从德国潜水艇出来在长岛的阿马甘塞特附近和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登陆。所有这八个人全都在美国居住过，说英语带有无懈可击的中西部口音。阿马甘塞特这一伙人在被海滩上的一个青年海岸警卫队员发现后，立刻被逮捕了。其中一人全部招供，使联邦调查局在几天之内就把佛罗里达那一伙追捕到案。埃德加·胡佛于6月27日宣布抓住这些破坏者时，提供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6月28日报刊公布的这些发现说明，佛罗里达那一

伙中的一个人名叫赫尔曼·纽鲍尔，他1931年时曾在哈特福德饭店工作过，1936年到1939年又在芝加哥俾斯麦饭店工作。多德抓住哈特福德—俾斯麦的联系，作为旺夏茨基可能与纽鲍尔有牵连的线索。多德在6月29日《哈特福德时报》的一篇访问记中说：纽鲍尔“可能”在旺夏茨基阴谋案中“非常重要”。如果阿纳斯塔斯不是已经很谨慎地定了罪、判了刑，他可能被认为还有更多的颠覆活动。鉴于那个夏天的紧张气氛，这位伯爵还会遇到些什么事情，真不可预料。1936年在柏林奥运会上为美国队扛过美国旗的纽鲍尔于7月间被处决了。

据称曾同旺夏茨基密谋策划把美国军事机密送交给柏林和东京的四个德裔美国人在6月或7月被起诉并于8月21日判处徒刑。曾参与俾斯麦饭店会议的德美同盟中西部领导人奥托·威卢梅特服罪，接受五年徒刑。帕索医院的医生沃尔夫冈·埃贝尔博士在孔兹逃到墨西哥后曾替孔兹转交过邮件，他原来作无罪申辩，后来服罪，判七年。威廉·孔兹是7月3日在墨西哥城外捕获的，那时他化名为阿芳索·格拉特—卡贝德斯，在一个大牧场当工人；他被引渡到美国，服罪，接受15年徒刑。库尔特·莫尔赞神父是费城古犹太路德教派的牧师，曾收过佩利彭科寄去的孔兹的护照相片。他不服罪，是阴谋集团唯一受审的成员。

莫尔赞的审判(官方称为“美国诉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等人”)于7月28日到8月20日之间在哈特福德美国地区法院举行，这次审判看来好像是重演一次大陪审团对旺夏茨基的审讯。这次政府起诉，由多德领导，依赖佩利彭科，佩利彭

科又从霍华德堡放出来作证。由于缺乏把莫尔赞同日本联系起来的有力证据，多德便请来耶鲁大学的东方学家乔治·肯尼迪大声朗读《日本名人词典》中“荒木贞夫将军”一条，旺夏茨基在1934年曾与这个将军见过一面。多德充分利用陪审员们的敏感性，在盘问时指控埃贝尔事先已知道日本要袭击珍珠港；他这一手显然很奏效。

莫尔赞在8月20日被裁决有罪，并判十年监禁。他于1943年向美国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没有成功。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莫尔赞得到他那个教区的一些会众和路德教派的几个牧师的大力支持，那些会众还替他支付了诉讼费用。莫尔赞的律师之一、前司法部官员亨利·沃尔纳特后来称这次判决是“一桩大冤案”，理由是这次判决的根据是“扮演密探的传教士〔佩利彭科〕所说的同他〔莫尔赞〕的一次谈话，而这说法尚未证实”。沃尔纳特还断言，“检察当局在竭力证明有罪时，竟不惜采取欺骗手段。”沃尔纳特的谈话见于1943年的报刊，这也许是对托马斯·多德的第一次公开批评。

全俄国民革命党战友们的遭遇比他们的首脑及其德美同盟同僚要好一些。马梅多夫、朱格列维奇牧师、费奥多·西门斯、萨文和赫伯特·范茨都受到联邦调查局审问，但是，既没有拘留，也没有起诉。旺夏茨基的朋友中有些在应征年龄的，以特急电报撤销征召其入伍的通知。但是，没有谁试图把流亡的战友们驱逐回苏联去；1942年12月康涅狄格的美国地区检察官约瑟夫·库尼在哈特福德美国地区法院提出请求书要求剥夺这位伯爵的国籍时，旺夏茨基就遇到了驱逐回苏联的可能性。

监 狱

在7月14日以前，旺夏茨基一直关在哈特福德监狱里，7月14日那天，他获准在有人押送下到城里找牙医给他拔了坏牙。第二天，他由联邦法院执行官押送，登上到“司法部长选定的监狱”去的第一段行程的火车。阿纳斯塔斯对他的目的地一无所知。在纽约换车，又经一夜行程后，他发现到了芝加哥，刚好又赶上了另一趟火车。7月17日下午10点15分，这位伯爵被收容进他的新住所：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联邦犯人医疗中心。

旺夏茨基到达的那天晚上，给了他一个登记号（3775—H），并对他作了一次体格检查。自从6月初他被捕以来，他体重掉了21磅（从200磅掉到179磅），并且患了牙龈炎。所有其他情况都正常。在登记时，关于他的精神状况，医生说：“患者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说，有人说他是妄想狂。”

旺夏茨基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头几个星期里，受到严密的观察，监狱精神病医生经常找他谈话，并且写了连篇累牍的报告。这些报告涉及他从年少时在华沙的想入非非到在汤普森乱搞两性关系的全部过程的详细情况。在不审问他的时候，就通过他的牢房的窥视孔监视他。

斯普林菲尔德的医生很快就看出3775—H号不高兴，

他看起来有些意气沮丧。他从无笑容，他说起他的困难，特别是谈到他的妻子时，常常两眼落泪……他表现得焦躁不安。他不断咬指甲，在椅子上动来动去，不

断用指头拉指头。

马里恩的名字打动阿列克斯的心，使他落泪，因为他感到，用监狱报告的话来说，“他给她带来了耻辱，他做了可能使她离开人世的事情”。

旺夏茨基对他医疗监护人承认，他给孔兹2800美元，是当了“傻瓜”，但是，他不明白，这件事怎么会构成反对美国的阴谋。他很失望，像利特尔顿这样有名的（并且价钱很高）律师竟然作了这样糟糕的辩护。以有精神病为理由的申辩已经对他是个打击，在最后一刻又改变为服罪，对这一点，阿列克斯是按利特尔顿的建议而默认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妥协，而不是对罪行的承认。根据一份监狱报告：

在他不抱怨辩护律师和给他检查病的精神病医生时，他感到他们把他置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又感到他们无疑是要使他显得十分傻气、十分浮夸，以为这样也许能减轻对他的判刑。然而，他却宁愿让法院了解，他并没有搞反对美国政府的间谍活动的意图，他丝毫不知道孔兹带出美国去的计划。

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听了旺夏茨基的自述之后，在1942年8月11日作了如下的记载：

他的英语说得相当好，有显著的俄国口音……他在

各方面都很合作，说话坦率，很有条理。他既不疑神疑鬼，也不含糊其词……他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在历史地理方面。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他非常感兴趣，并且对正在发生的情况，表现出知道得很多……这个病人有理解能力，在思维方面颇有逻辑性，并且是一个很受人喜欢的人，而在集体中却突出自己，并且说，“我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我对180000000人有一个计划，跟着我干吧，我们将实现这个计划”，这也许是不正常的。伟大的领袖们用这种办法取得了成功，但是，伟大领袖毕竟可能不同于普通老百姓。

阿列克斯虽然在斯普林菲尔德感到不舒服，并且在他到这儿来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就请求转到一个正规的监狱去，但是他终于逐渐习惯了他的环境。1943年初，他担任了管理监狱图书馆的责任。他每天读几个小时书(多半是历史)，他一人单独在牢房里时，常常作祷告。

1942年9月间，关于阿列克斯头发长短问题的争执，在旺夏茨基和监狱管理当局之间引起一场小小的危机。阿列克斯坚持要把头发剪得很短，因为(在这里，他是遵循了古老的俄罗斯迷信)短头发“长根”，有助于头脑清醒。一个警卫队员说，监狱的规章不准剃头，阿列克斯就给看守员、看守长和医院委员会写了请求书。他的请求遭到拒绝，他就“不惜违抗规则”设法把头发剪短。医院委员会把旺夏茨基召去，发生了下面的情况(据医院委员会一位委员的记录)：

这个同狱犯人被召到委员会面前来答话时，他看起来十分不安，显得心烦意乱，哭哭啼啼，全身猛烈发抖；他要求我们宽容他这一回，或者允许他这一回，他愿意为了很好地调整生活习惯以适应监狱的环境而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并且做好本监狱内的工作。我们对他说，我们认为他把头发剪短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他坚持要那样做，就有必要把他送到精神病牢房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2—2号牢房）。这个同狱犯人说，如果能让他把头发剪短，他宁愿住2—2号牢房，而不愿住在其他牢房，让头发长得长长的。

旺夏茨基这一回显然胜利了。他保持了猪毛刷子头，而又不必住进2—2号牢房。

尽管发生了头发问题，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旺夏茨基给他的监护人的印象越来越好。一个牢房医生1943年2月3日的病情报告写道：“目前看来，该犯人送来本监狱前诊断为妄想狂病似乎是十分可疑的。他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显得相当好，并且很能适应环境。根本没有妄想和幻觉。”

1944年1月4日的病情报告对这犯人甚至作了更为积极的评价：

这个病人在本监狱内不断使自己适应环境，作得很出色。他彬彬有礼，善于合作，明辨是非。他慎于择友，很少看见他与别人起堆成团。他的工余时间多半用来看书。他每看一本书都探讨他的案情和他过去的人生

历程……他并未表现出有任何严重的妄想或幻觉的迹象。他显得情绪稳定，相当愉快。

在很大程度上是马里恩的非凡的献身精神使得旺夏茨基成功地适应了监狱生活。这个六十过五的“妈妈”表现了由于她的丈夫处于困难之中而重新焕发出关心他的激情。这种情况好像是她的人道主义本性为了支持20年前的那个俄国人而复活，而且表现得非常强烈。二十多年前，她是个红十字会的护士的时候，她从福利斯一贝热雷“拯救了”年龄只及她的一半的俄国流亡者，现在这个俄国人虽然已是中年，但在她眼里仍然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马里恩经常写信给阿列克斯，给他送去爱情和鼓励。她两次坐凯迪拉克牌旅行车，从汤普森到斯普林菲尔德，车行1400英里，横跨半个美国去看他。汽车由于杂活的工人史蒂夫·罗沙克全速驾驶，以50美元的钞票“浇油”使警察不加干涉。马里恩的信件和看望对阿列克斯来说比什么都更重要，否则他听不到任何好消息（如斯大林打了胜仗），并且他肯定已没有任何朋友。

根据战争期间所写的关于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的那些东西来判断，在美国人的感情上，他的地位排在希特勒和裕仁之间。

战时的喧嚷

在监狱里，当他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他的声名狼藉达到前所未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臭名声照例来自旁观者的眼睛，而不是由于他在被捕以前所作的任何事情或他在斯普林菲尔

德所能够作的任何事情。1942年到1945年间，某些政治家、作家、编辑和一位小说家有意无意地把他作为一个轴心国的妖怪，正如1934年到1937年间美国《工人日报》把他当成反苏妖怪一样。

1942年7月1日萨缪尔·迪克斯坦在众议院发言时，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定了调子，他在发言中庆幸他自己“在四五年前”就揭露了旺夏茨基是个间谍，并且责备议员同僚和戴斯委员会对他的警惕性如此差劲。

议长先生，旺夏茨基在一个星期前终于被起诉了〔原文如此〕。他供认当了间谍，反对美国，并且被判五年徒刑和2000美元罚金〔原文如此〕。几年前我在本议院讲台上点名的许多人，都已被作为间谍抓了起来，天知道到处漂浮着的还有多少。

迪克斯坦的娓娓动听之词与后来报刊上发表的论调比较起来，好像是他抹杀自己功劳的软弱无力的陈述。艾伦·海因德在《走向叛国的护照：美国境内间谍内幕》(1943年)中，把十九穴描绘成雄踞海角之上的巨大建筑，周围可俯瞰好几英里，屋顶上有炮楼，机关枪安放在旋转的炮架上，钢板分隔的小房间里储藏着手榴弹。军事室里挂着英国和美国的地图，在战略地点用大头钉钉着卐字旗。旺夏茨基利用德美同盟分子作他的代理人。孔兹提供他的房子开破坏活动的计划会议(这是佩利彭科和多德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联邦调查员通过高倍望远镜监视孔兹的家可以看见旺夏茨基——旺夏茨基在孔兹的起居室里来回踱步，打着手势，指着摊在桌子上的欧洲地图。这地图和这位伯爵大书房里的那张地图完全一样。

海因德还描写了东奔西走进行侦探活动的梗概：旺夏茨基坐着轿车周游美国，参观国防工厂，向工人中的代理人收集秘密：

他〔旺夏茨基〕就在造船厂外面的收费停车场打了个电话，大约十分钟后，一个穿工装的人从造船厂走出来，钻进了伯爵的豪华轿车。他们这两个人构成奇怪的一对：一个腌臢的工人，一个高雅的伯爵。

阿瑟·德劳尼安曾经当过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他于1943年以约翰·罗伊·卡尔森的化名写了《在伪装掩护下》一文，重述了如今已家喻户晓的故事：旺夏茨基曾经给佛朗哥运送武器，曾经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纳粹间谍网”。德劳尼安情不自禁地加上一些他自己的插话。“俄国熊”餐馆突然变成了“夜总会”，阿纳斯塔斯悄悄接近侍者小厮，成了“纳粹地下世界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说起令人可怕，他的事情令人窃窃私语”。

应该更了解情况的人是《钟点》的编辑艾伯特·卡恩。卡恩收集了厚厚一摞关于伯爵的档案，其中包括旺夏茨基自己送到《钟点》去的材料。卡恩是能够分清事实和无根据的假想

的。但是，他的判断结果是同迈克尔·萨耶斯合著《阴谋破坏活动！反对美国的秘密战争》（1942年出版）。

在《阴谋破坏活动！》一书中，卡恩用了一节的篇幅来写旺夏茨基，这一节的标题是“家财百万的破坏分子”。他大胆地变历史戏法，说旺夏茨基1934年“积极同德美同盟及其他轴心国特务合谋，要在美国搞法西斯政变”。（1934年之后两年德美同盟才成立。）

卡恩在书中许多地方把旺夏茨基同与之关系可疑（如果有关系的话）的人扯在一起。他“在诺德兰营纳粹冲锋队的大会上发表过演说”（没有旺夏茨基到过诺德兰的记载。）1934年，他“同艾尔弗雷德·罗森堡、戈培尔博士以及德国最高司令部军事情报处的代表们交换过意见”（旺夏茨基炫耀过他曾同罗森堡在一起啜过茗，但是，没有同戈培尔或德国反间谍组织进行任何磋商的证据）。“他最后一次去东京是1941年；他回到美国不久日本就袭击珍珠港”。（1939年以后，旺夏茨基没有离开过美国。）

卡恩对1941年7月29日俾斯麦饭店会议的叙述超过佩利彭科经授意提出的说法：

日本袭击珍珠港前不久，在芝加哥俾斯麦饭店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了将来在美国进行特务破坏活动的计划。孔兹强调从国外获得经费越来越困难。孔兹要求旺夏茨基资助在美国境内的纳粹特务的工作。旺夏茨基当即现付2800美元现金给这个德美同盟领导人。

卡恩显然忽视了这一事实：旺夏茨基于7月12日在汤普森给孔兹的是2800美元的支票。连佩利彭科也没有谈到在俾斯麦饭店会议上有交钱的事。连佩利彭科也没有谈到要求旺夏茨基资助美国境内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连佩利彭科也没有含沙射影地暗示俾斯麦饭店会议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开的，而不是在公共休息室开的。

卡恩对旺夏茨基的描绘和旺夏茨基对他自己的种种幻想之间的唯一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插进了一个反对美国的阴谋：

很少有一个星期没有日本、德国或意大利的重要官员访问康涅狄格州的汤普森。他们在旺夏茨基的陈设豪华的房间里，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同这位白俄元首讨论促进世界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在美国促使发生法西斯政变的方式方法。

卡恩在1976年被问起他揭露旺夏茨基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时写道：“我是在同纳粹作战，顾不得那样多的繁文缛节了。”

虚构的报刊文章混杂在新闻工作者的杜撰之中。1944年，厄普顿·辛克莱把旺夏茨基——用他的真名字——写进了流行的兰尼·巴德丛书的一本小说里，小说名叫《总统级的特务》。阿纳斯塔斯以安插在纽约百万富妇主持的第五大道社交晚会上的钉子的面貌出现。辛克莱在故事情节中安排了右翼的或保守的牛鬼蛇神，其中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包括一个虚构的法西斯出版商、一个真实的法西斯知识分子（劳伦

斯·丹尼斯)、一个真实的前副国务卿(威廉·卡斯尔)和两个虚构的高级军官。兰尼·巴德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进入这个黑帮(作为一个伪装掩护下的调查员),他听见旺夏茨基“大声”夸耀他的武器运送给了墨西哥金衫党。在离开社交晚会之后,巴德给他的首长FDR写信说:“德国在希特勒主义尚未成熟期间所有的一切,美国现在都有。”

沃尔特·温切尔和汤姆·弗利作为旺夏茨基案情辑录的创作者,超过了迪克斯坦、佩利彭科、海因德、德劳尼安和卡恩。温切尔在一篇题为《没有美国人我们也行》(见1942年8月1日《自由》杂志)的文章里,把旺夏茨基说成是“在美国的纳粹行动计划的一个关键人物”,他领导了“46个国家里的秘密军队”,他的指挥部“设在堡垒里”,以“几百挺机关枪”保卫着。在这位伯爵访问东京时(没有说出访问的日期),据说他用“请问什么时候开冰箱舞会?”这句话来同日本高级军官打招呼。温切尔解释说:“冰箱舞会”是他们的暗语,指的是美国革命。

汤姆·弗利在《严厉制裁那个疯疯癫癫的人》(见1942年11月28日《自由》杂志)中揭露,旺夏茨基的众所周知的怪癖只不过是新时代的残酷行为和颠覆活动的外衣而已。按弗利的说法,这位伯爵的本性早在1922年就已昭然若揭,那时,他用铜指节套打一个记者。他也有狡猾的一面,在纽约出租汽车里设一个圈套就把联邦调查局的侦探甩掉了。但是旺夏茨基一阵一阵地出卖他自己,譬如,他在汤普森对一些当地工人朗读一封他的朋友“乡巴佬”里宾特洛甫的来信,来信对他许愿,答应将来在纳粹俄国给他一个高级职位。旺夏

茨基得了日本情报机构50000美元，领导了一个间谍网，严重威胁美国。用弗利的话来说：

从在罗德岛边境附近旺夏茨基的堡垒里没收的资料来看，埃德加·胡佛抓住了战争开始以来所拥有一些最重要的情报。这时大西洋沿岸的每一个男女老少都具有潜在的危险。

一个匿名记者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星期日新闻和领袖》(1943年3月23日)上写道，联邦调查局已在“帕特南堡”发现了德日两国沿落基山脉瓜分美国的计划。有了那些“专家”的使人惊奇的揭发，又有谁能责备这位匿名记者这样写呢？

旺夏茨基是个幸运儿。恶作剧、想入非非、行为不端使他遭到麻烦。由于他的小丑表演，他被判处短期徒刑。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就不那么幸运了。

第十八章

哈尔滨的最后探戈舞

对着猫咪咪叫也帮不了耗子的忙。

——俄国谚语

随着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心中升起了一种对美好未来指日可待之感。不过，这种感觉为时不久就消失了。虽然整个夏季德国人对红军不断取得胜利，但是俄国法西斯联盟要在苏维埃国土上取得政治地位的前景很快就变得黯淡了。俄国法西斯联盟的首脑开始怀疑他那领导俄国国民革命的梦远远不能实现了。

就拿一件事来说吧，苏德战争实际上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联盟的统一。1939年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给战友们以沉重的打击。战友们刚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马上又发现新的原因使他们感到对希特勒又爱又恨，心里矛盾重重。他们听说德国人对红军被俘人员十分野蛮，成千上万俄国平民被送到德国去强迫劳动，在俄国国土上实行残酷的占领政策，并且宣布要用俄国人“到东方去开拓殖民地”。他们

无论多么仇恨斯大林，但也不能不感到他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中。甚至最铁心的战友也开始扪心自问：是否有可能保卫俄国而不帮助斯大林呢？是否有可能反对斯大林而不毁灭俄国呢？

对罗扎耶夫斯基来说，选择道路是很简单的。他一再重复一句口号：“始终反对布尔什维克，即使与魔鬼为伍也愿意！”无论希特勒多么麻木不仁，具有多大的破坏性，但他是俄国的唯一希望。俄国法西斯主义者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跟着任何一个摧毁共产主义的外国走下去。

罗扎耶夫斯基的论点没有说服几个战友。马特科夫斯基和他的小宗派自1939年以来一直反对俄国法西斯联盟与德国合作，他们继续保持沉默，等待时机，积极培植与日本军事当局的良好关系，履行他们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内所负担的责任。有些战友在1941年6月22日以后离开了联盟，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尼古拉·佩特林的作曲家，他曾一度是俄国法西斯联盟政治处的头头。在元首正试图消灭俄国的时候，他感到简直不能容忍同希特勒合作。佩特林就这个问题同罗扎耶夫斯基进行辩论，一直辩论到7月，然后，他辞职而去。他带走了利迪娅·马尔科娃；她是一个媚人的浅黑型女人，是首脑的第一房妻子。^①

尽管罗扎耶夫斯基公开宣布他热心于同纳粹密切合作，

① 利迪娅·格奥尔吉耶芙娜·马尔科娃的父亲是个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执政后不久他就自杀了。她于1929年同罗扎耶夫斯基结婚，1936年同他离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其后佩特林娶了她。

——原注

但是并没有引起明眼的德国人对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兴趣。1942年早些时候，德国领事馆官员开始向满洲国的白俄求爱，他们通过大连的哥萨克首领格里高里·谢苗诺夫开辟了提供津贴的渠道。俄国法西斯联盟没有受到重视，也许是因为柏林有这样的印象：无论怎么说，罗扎耶夫斯基只不过是谢苗诺夫的仆从。

罗扎耶夫斯基在欧洲的代表波里斯·特德利在争取德国人的恩赐方面，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特德利被驱逐到瑞士，直到德国进攻苏联之时，他一直呆在苏黎世。1941年夏天，他在伯尔尼缠着德国大使冯诺斯蒂茨，要求允许他重回德国。特德利卑躬屈节地表白对希特勒的忠诚，满口喷沫地汇报儿子在党卫军中的功绩，也未能使大使动心，直到最后，经欧文·冯舒尔茨担保，才获得了签证（冯舒尔茨是个纳粹官员，1936年在哈尔滨结识了罗扎耶夫斯基）。特德利于9月间直奔柏林，但是，当时德国东方占领区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他的俄国流亡者问题顾问奥托·布劳蒂加姆博士对他都不予理睬。布劳蒂加姆于1942年6月安排了一次在柏林的亲纳粹的流亡者大会，以团结白俄来支持德国的战争；无论是特德利还是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其他代表都没有得到出席大会的请柬。波里斯·彼特罗维奇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人问题研究所沉溺于反犹幻梦而聊以自慰。

罗扎耶夫斯基就是不了解这一残酷的现实：俄国法西斯分子不管对纳粹有多亲，在德国处理俄国的计划中，也没有他们的地位。纳粹的主要领导人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在德国

人取得巴巴罗莎行动的胜利之后，会有一个“俄国人的”实体。海因里希·希姆莱1942年给党卫军的沃尔特·谢伦贝尔格将军的信中写道：“俄国人决不能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1941年5月罗森堡草拟的苏联之后的俄国蓝图，要求把苏联划分为“独立国”（乌克兰）和“保护国”（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东波兰和高加索），由德国人统治或操纵。希特勒不愿意宣布任何具体的战后俄国计划，但是，1941年7月16日同罗森堡、戈林、凯特尔、鲍曼在东普鲁士拉斯登堡指挥部开会时，暗示了他思想上的总方针。德国将控制乌拉尔山以西的俄国领土，^①划分为德国的三个专员区（莫斯科、乌克兰和高加索），各设一个地方长官。科拉半岛（有丰富的镍矿藏）、克里米亚以及迄今一直为日耳曼人（如伏尔加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区，要并入德国版图。巴库油田将成为德国的“租借地”。列宁格勒要夷为平地，交给芬兰人。元首没有提到怎样使用俄国的合作者，不过据艾伯特·斯皮尔说，元首有一次开玩笑说，把俄国战后的政府委托给斯大林，因为这个格鲁吉亚人完全知道怎样处置俄罗斯人。

罗扎耶夫斯基不但看错了德国对俄国的政治计划，而且显然未能理解纳粹种族主义的含意，这个种族主义把所有的斯拉夫人都说成是劣等民族。1942年，德国禁止把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著作翻译成俄文。俄国流亡者袭用纳粹的教义和服

① 德国人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的范围后来好像扩大了。1942年5月德国国防军战略家沿着叶尼塞河划下德国打算控制的东部边界，这已到了乌拉尔山以东一千多英里。——原注

饰的念头一定是引起了希特勒及其仆从的反感；俄国法西斯联盟在柏林不受重视是不足奇怪的。

但是，罗扎耶夫斯基要利用德苏战争来改善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命运的梦想遇到了直接的障碍，这障碍不是联盟的分崩离析，也不是德国人的冷淡态度，而是日本人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1932年以来，在满洲国的俄国法西斯分子，无论对一般流亡者行使什么权力，无论对在他们的故土上台掌权抱什么希望，无不仰仗日本人的恩宠。日本人的“指导”就是政治军事行动的最后权威。无论罗扎耶夫斯基多么渴望在苏联因遭到德国攻击而处于混乱状态的时候插它一刀；但是，没有日本的批准，什么事也不能干。1941年夏天，日本人的进攻重点是南面而不是北面。

1940年春，德国在西欧的胜利突然暴露了法国、英国、荷兰在东南亚的资源丰富的殖民地的脆弱性，这给日本的南进政策提供了推动力。日本急欲结束“中国事件”（这事件从1937年起一直拖了下来）并建立“东亚新秩序”，便同德国、意大利一起签订三国条约（1940年9月27日），并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以便对欧洲战争坐收渔人之利。这些外交策略旨在阻挠美国干涉，保卫日本的北翼，从而使东京在东南亚可以放手大干。

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对在满洲国的俄国流亡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如同1939年的德苏条约对在德国的俄国流亡者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样。一夜之间，反苏观点成了言论之大忌。对俄国法西斯联盟的监督和《我们的道路》的检查进行得空前严格。罗扎耶夫斯基当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随

风张帆，顺水推舟。

希特勒进攻苏联，使日本感到突如其来，毫无准备。6月底7月初，内阁大臣、陆海军司令官齐集东京，开了一系列高级会议，以决定日本应如何作出反应。外相松冈洋右在6月27日的会议上极力主张日本立即出兵攻打苏联，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这位南满铁路的前总裁松冈乃是“大陆政策的倡导者”，据说他在1936年曾宣称，他希望把日本国旗插遍乌拉尔山。但是松冈也有些感情冲动、见异思迁、反复无常。他曾策划过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刚刚才从莫斯科签约回来，斯大林还在莫斯科火车站上拥抱了他。因此，他的进军西伯利亚的主张遭到怀疑。听见他说这话的人并不是原则上反对他的建议，而是感到时机尚不成熟。

日本领导集团在7月2日的一次帝国会议上就其方针的选择作出决定：着手进军印度支那；推迟对德苏战争的干预，等到德国国防军的进展创造了有利的机会再说。松冈不仅未能说服他的同僚，而且在7月18日近卫文磨总理大臣组成新内阁时，失去了外相职位。

1941年夏日本决定南进，这引起同美国的对抗；对抗终于在年底之前导致战争。珍珠港事件彻底消除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因为日本发现它已同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展开了全面的战争。恰恰在日本飞机于12月7日飞往夏威夷的时候，莫斯科城外的红军正在给予德国军队第一次严重的反击。

满洲国的白俄对太平洋战争立刻有所感觉。急于参与日本对苏联的进攻的流亡者12月8日从梦中醒来，发现他们自

已已卷入一场对英美的战争。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循着“王道”走下去。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挂名领袖，谢苗诺夫的仆从，老态龙钟的弗拉季米尔·基斯利钦和列夫·弗拉舍夫斯基在哈尔滨在日本顾问的眼皮底下像奉命完成任务似地发表演说，发誓完全支持日本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圣战”，并且许诺白俄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而与日本合作。罗扎耶夫斯基一再重弹《我们的道路》和《民族》上的那些老调。他内心里一定感到沮丧。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年夏天刚才到来，又消失了。现在日本已向另一个方向进发，去反对一个可怕的手美国。俄国流亡者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同这个对手打仗。

“乙”计划

1941年4月间，东京同莫斯科在外交上的周旋并没有妨碍关东军进行对苏采取敌对行动的准备。反苏情绪在关东军军官中已经很浓了，谁也忘不了1939年在诺门汗小型战争中蒙羞受辱。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满洲国的日本士兵仍然视苏联为头号敌人。无论南太平洋的形势怎样发展，关东军的眼睛始终盯着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外蒙古草原。

关东军有一个对苏联采取攻势的应急计划，计划的代号为“乙”，是1934年帝国参谋本部制订的。这个“乙”计划预计采取外科手术式的进攻方式，把东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同苏联分割开。在用一些部队挡住西面敌人从外蒙进入满洲国的同时，关东军主力部队将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苏联领土：一路从松花江下游和绥芬河出发，攻占伯力，孤立滨海地区，包括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海参崴在内；另一路从

满洲里向西北挺进，直达赤塔，攻占伊尔库茨克，从而切断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同苏联其他地区的联系。

“乙”计划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重要地点作为攻击目标，充分利用红军在远东地区后勤供应的脆弱性。苏联军队沿铁路排成一串，给养供应和部队增援都依赖这条铁路。关东军战略家的打算是，在伊尔库茨克和伯力把铁路切断，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在得到俄国欧洲部分的支援之前就可以予以摧毁。

制定“乙”计划的依据是关东军在步兵、装甲兵、炮兵和空军等方面都对红军远东部队享有2：1的优势。这种优势在1934年到1945年间的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事实，不过，这种情况是严格保密的。

按原来的设想，“乙”计划对如何利用白俄并没有作出规定，个别战区指挥官招募一些白俄充当侦探或译员算是例外。但是，浅野旅可能成为白俄战斗部队的核心，这个旅是1938年组建的关东军中的纯俄国人部队。

1940年早些时候，军事计划人员就开始考虑如何使白俄为“乙”计划出力。2月16日从新京关东军司令部来的行动计划官员同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少将一起讨论了雇用白俄充当对苏作战的突击队的问题。这些讨论虽然是关东军发起的，但是，这种想法得到东京的两个退休将军的支持，这两个退休将军就是荒木贞夫和小矶国昭，他们最近已进入内阁。在哈尔滨作出决定，不单要把白俄训练为战斗部队，而且还要把他们豢养起来，作为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傀儡行政机构的官员（对这个行政机构暂时授予“远东反共自治政府”的称号）。对日友好的所有流亡者集团都有资格参加进这

个行政机构，而俄国法西斯联盟和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将优先。

继秦彦三郎任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的柳田元三少将开始执行1940年讨论的计划的军事方面，于1941年中准备沿满洲国—苏联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关东军军事演习（代号为“关特演”）。“关特演”于1941年8月举行，它不单纯是一次军事演习，实际上是显示实力，旨在恫吓苏联。当时红军正在西线为生存而战。在军事演习的同时，招募了约2000白俄，施以搞渗透破坏的训练，把罗扎耶夫斯基召去，命令他监督六七个流亡作家撰写将拿到苏联境内去散发的反苏传单。

但是，军事演习并没有发展成对苏联的实际敌对行动，到了9月，罗扎耶夫斯基的夏季欣快症逐渐减退。日本顾问为了维持他们的被保护人的士气，便用玫瑰色的梦想来使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高兴。10月里，新村大佐向罗扎耶夫斯基透露，日本一切都准备停当，“在德国军队拿下莫斯科后”，就开进西伯利亚。其后不久，柳田的继任者土井绍夫少将对罗扎耶夫斯基许诺，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将来就是俄国的新政府，而俄国法西斯联盟在这事务局里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1942年一年中，日本人许的愿可能维持了罗扎耶夫斯基日渐低落的士气，但是并没有维持他在全面战争的困境中的生活水准。太平洋战争很快就把哈尔滨大多数白俄的生活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因为日本人征用了肉类、粮食和燃料，并且封锁了红十字会运送食品和药品的船只。在1942—1943年冬天，白俄烧家具取暖和出卖仅有的一点点什

物换饭吃的事情，屡见不鲜。

日本人类学家福田进志1942年晚些时候访问哈尔滨，强烈地感受到哈尔滨的战时气氛。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竟然通过了日本的检查，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些还未到青春之年的少女在中央大街的阴暗幽深处，撩起裙子，以色情挑逗过路行人。福田为了摆脱这种令人压抑的景象，便匆匆撞进了“凡塔西亚”；这是在“亚洲的巴黎”还在继续开业的两家有歌舞表演的餐厅之一。在福田的眼睛适应了餐馆内部的昏暗灯光之后，他看见一个俄国胖女人，身穿印花棉布衣服，在只有寥寥几个舞客的舞池里，同一个日本舞伴摇摇晃晃地跳探戈舞。她步子不平稳，汗水湿衣衫，起初使福田认为有些稀奇古怪。但是，随后他注意到她的眼睛。她的两眼深陷，在一层化装脂粉掩饰下，流露出绝望的神色。这种情景强烈地刺痛了他，他立即起身离去。

在这样难堪的环境中，罗扎耶夫斯基还得靠菲薄的津贴来养家活口，维持年迈的父亲、怀孕的妻子^①和幼小的女儿的生活。这位俄国法西斯联盟的首脑住在道里区面对松花江的一套小平房里，身上穿的是14年前在法学院当学生时穿的那件大衣，绒毛磨光，露出织纹。但是，在1942年末他被怀疑为苏联特务的时候，经济困难在罗扎耶夫斯基的各种烦恼中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① 罗扎耶夫斯基于1937年第二次结婚。新娘涅昂尼娜·娅莉谢娃于1938年生了个女儿叫奥尔加，1941年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早夭。另一个儿子弗拉季米尔·康士坦丁诺维奇是1943年生的。——原注

严行镇压

替日本陆军情报机构或宪兵队工作的白俄时刻不忘他或她在职业上的危险处境。一个人一旦与日本勾结，便永远成为人质。不论是谁，要是稍微感觉到“王道”的阴暗面，就要受到特别机警的监视，并且不准离开满洲国，除非有人陪同。稍有不忠诚的嫌疑就要关监下牢——也许还不止于此。

到了1942年，大多数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战友都认识到，他们与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的亲密关系是福也是祸。诚然，与其他流亡者相比，他们得到了日本主子给予的地位和权力，但是，这也要打个折扣。具有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战友们，身穿引人注意的黑制服，成为招引宪兵队的恶棍们攻击的对象，特别是在这些恶棍正在喝酒寻求刺激的时候。战友在街上遭到日本人行凶抢劫时，如果他敢于还手反击，就要倒大霉。黑衫领袖和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萨沙·博洛托夫显然就遭到这样的下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在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总部臭名昭著的二楼上，一张草席裹了他的尸体。

罗扎耶夫斯基除了偶尔有过激的反犹情绪外，他与日本人的合作是十分忠实、十分顺从的，看起来他是最不会引起日本人怀疑的一个人。但是，可以根据事实播下怀疑的种子，也可以根据捏造播下怀疑的种子。

日本人对罗扎耶夫斯基的怀疑显然来源于德国。1942年早些时候，日本外相通过外交渠道得知，波里斯·特德利和在德国的其他俄国法西斯联盟成员刚好被盖世太保当作苏

联间谍逮捕了。可惜德国的文件没有清楚显示出特德利究竟有罪无罪——也没有说明他的命运如何。但是，他被捕的消息立刻影响到东京和满洲国。

日本当局对苏联奸细假扮为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分子已经神经过敏。就在一年前，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记者被揭露是个红军情报人员。佐尔格以无懈可击的纳粹信任状和温文有礼的大陆风度为掩护，几年来成功地与日本各方面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经过调查，逐渐揭露了佐尔格的全部活动，内务省就对苏联的间谍活动怀有过分的戒心。

罗扎耶夫斯基模范的亲日活动历史并没有使他免于遭受怀疑。住满洲国的一个日本外交官于1943年初就特德利被捕一事写给外相的汇报中说，克里姆林宫的间谍假扮成法西斯分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外衣来作掩护吗？可以想像，整个俄国法西斯联盟不过是苏联的又一条战线，其狡诈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分裂白俄社会，另一方面在于使白俄社会疏远日本。

5 哈尔滨的宪兵队得到通知，说宪兵队里的俄国流亡者当中可能有内奸，便于1943年2月到5月之间对俄国法西斯联盟进行了调查。关于罗扎耶夫斯基和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某些罪证，在调查中，全都详细地揭露出来。1925年俄国法西斯组织三个创建人中的两个（亚历山大·波克罗夫斯基和博里斯·鲁缅采夫）据说都已回到苏联去了。^①关于罗扎耶夫斯基

① 波克罗夫斯基于1932年同罗扎耶夫斯基决裂后，实际上是在上海度过了他的残年。鲁缅采夫是在1947年才回苏联去的。——原注

早年在满洲的情况的调查引起一些问题。首先，他1925年从海兰泡逃跑的背景情况得不到证实。提供情报的流亡者还说，罗扎耶夫斯基在1927年和1931年曾两次暂时被开除出俄国法西斯组织，这两次都与人事档案不翼而飞有关。根据日本文件，这些情报员中有人还说，那些档案已被送到苏联，并且说，罗扎耶夫斯基仍然同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保持着秘密联系。

1943年5月，罗扎耶夫斯基被宪兵队拘留，并受到详细的盘问。同时受到盘问的还有马特科夫斯基、基巴丁、尼古拉·基普卡耶夫(前俄国法西斯联盟驻东京代表)和根纳迪·塔拉达诺夫(俄国法西斯联盟上海支部的头头)。罗扎耶夫斯基好像已宣布无罪，在6月间获释，并且恢复了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第二处处长的职务。马特科夫斯基和其他几个人也都恢复了自由。

罗扎耶夫斯基在哈尔滨受盘问的同时，关东军的另一个被保护人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有个冒失行动，惊动了新京，也惊动了东京。5月初，谢苗诺夫没有同日本人商量就给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寄去一封公开信，颂扬他给了斯大林一个打击。弗拉索夫将军是被德国俘虏的红军军官，他从被俘的俄国战俘中抽人组建了一支反苏部队。谢苗诺夫的信不知怎样竟通过了日本人的检查，发表在5月7日的哈尔滨报纸《哈尔滨时报》上，其后不久，又被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广播。外相重光葵得知此事后，对在满洲国和中国的所有日本外交官员，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发出紧急通知，提醒大家注意白俄不适时的表态带来的危险。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3年达到一个转折点，日本人对罗扎耶夫斯基和谢苗诺夫的怀疑迅速增长。日本在太平洋的早期进展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在阿留申群岛的败北。欧洲方面，主动权已从德国人手中转到了俄国人手里。红军保持着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主动权，并且在库尔斯克获得了摧枯拉朽的胜利。在日本受挫后退时，苏联却捷报频传，连关东军也变得十分小心地尊重1941年的中立条约了。关东军渴望避免同莫斯科发生摩擦，便于1943年夏天采取严厉措施，砍掉一些反苏组织。俄国法西斯联盟成了这项新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

俄国法西斯联盟的下场来得十分突然，并且没有任何官方的解释。哈尔滨军事代表团于7月1日命令在整个满洲国、日本和中国取消俄国法西斯联盟；《我们的道路》和《民族》也于同日封闭。前俄国法西斯联盟战友们的集会、穿著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制服、唱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歌、带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徽章都遭到严格禁止。罗扎耶夫斯基的联盟被取缔了，他别无他法，只有保持沉默，继续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里工作。

因此，到了1943年夏，俄国法西斯运动已不复存在。在美国，俄国法西斯运动在珍珠港事件后已经烟消云散；在欧洲，俄国法西斯运动的几个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在远东它被自己的主子送了终。

红星高照

1943年和1944年，在满洲国和中国的白俄当中，苏联的

声威大振。驻上海的日本外交官于1944年阴郁地报告说，在东亚的白俄，百分之九十是亲苏的。除了红军的胜利外，苏联国内1941年以来发生的变化（有些变化是真实的，有些变化是表面上的）也引起了流亡者的良好反应。战时斯大林对东正教的宽容，拨动了宗教人士的心弦，宗教人士是很容易引起反应的。对红军军官恢复军衔，对流落国外的沙俄军官有吸引力。在各加盟共和国中成立外交部和国防部激起了人们对非集中化和民主制度的幻想。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说明放弃了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俄国流亡者当中发现许多亲苏情绪的公开表现。哈尔滨、新京、大连、天津、北平和上海的苏联领事馆纷纷收到申请苏联国籍的申请书。青年流亡者请求允许参加红军。持有苏联护照的人，包括从前的“小萝卜”，也开始谈论回国的问题。商人们恳求苏联外交官的庇护。银行家们突然发现了社会主义的优点。1932年为日本喝彩、1941年为希特勒欢呼的芸芸众生，1944年又为斯大林鼓掌了。这一回的热情可是货真价实的，因为它既基于爱国的精神，也基于求生的欲望。

在满洲国的苏联官员起初怀疑这里面有机会主义，至少在1944年末以前是这样，他们对苏联的新威望反应非常谨慎。也许是莫斯科指示他们不要对日本授以进犯的口实。只是在1945年，在德国和日本面临必然失败的时候，苏联才开始直接号召流亡者在满洲予以支持。2月间，“祖国电台”开始从西伯利亚某地对白俄广播。3月间，地下亲苏报纸《哈尔滨真理报》在哈尔滨出现。4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

乙山向外相东乡茂德发去绝密电报，承认苏联的宣传已深深侵蚀了白俄居民，引起了白俄居民对日本的广泛不满甚至是背弃日本。

俄国流亡者事务局作为日本人卵翼下的一个管理满洲国白俄的工具，这时受到相当严重的考验。1938年一直任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挂名局长的基斯利钦将军于1944年病故，由老态仅仅差一点的列夫·弗拉舍夫斯基将军继任。罗扎耶夫斯基和马特科夫斯基领导俄国流亡者事务局文化事务处和行政处，负责落实日本人对付越来越难控制的流亡者的政策。他们的老朋友秋草俊的重新到来使他们完成任务容易了一些。秋草少佐是特务机关的俄国问题专家，1932—1935年期间曾经当过俄国法西斯党及其后继组织全俄法西斯党的顾问。秋草在陆军省、参谋本部和乌苏里江边防警卫部队之间作了一系列工作调动后，晋升为少将，1945年2月回到哈尔滨当关东军情报处的头头。秋草不仅同罗扎耶夫斯基和马特科夫斯基有良好的关系，而且还是在哈尔滨俄国人社会中广泛受到尊敬和信赖的头面人物。

第三帝国在1945年4月末5月初的灾难性下场，把满洲国的白俄投入了感情冲突的旋涡。一方面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希特勒死了，他那不可阻挡的力量被摧毁了。俄国士兵雄踞柏林，就象130年前他们的先辈曾雄踞巴黎那样。和平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欧洲，好像是医治创伤、重新建设、互相宽大为怀的时候了。另一方面，忧虑之心给这种幻梦蒙下阴影。战争仍然在太平洋、中国和东南亚进行着。苏联会不会由于壮观的对德胜利而壮了胆，直接参加远东战争，并且同

日本算老帐呢？如果是这样，满洲国很可能成为苏日摊牌的舞台，生活在满洲国的俄国流亡者将成为什么样呢？谣言在白俄社会中不胫而走，象野火一样在心情不安的干草上传播着恐惧：日本人要强迫所有的人去打红军，否则要予以枪毙；苏联秘密警察纳卡夫德小分队正等待着处决白俄社会的领袖之后把所有白俄运往科雷马的集中营。1942年红军进入伊朗北部时，曾发生过有些与此相似的事情；在那里抓到的俄国流亡者被统统集合起来，送到中亚的集中营去——据说是这样。

1945年春去夏来，暴风雨的预兆纷至沓来。B—29轰炸机编队开始轰炸大连和鞍山，没有遇到反抗。“祖国电台”宣布，日本要动员所有的男性白俄去执行战斗任务。成千上万流亡者惊恐万状，千方百计想逃出满洲国。但是，他们费尽心机也逃不出去。俄国流亡者事务局按日本人的命令，扣留了旅行证件。算帐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满洲国正在变成一个大陷阱。

满洲国的命运已于1945年2月8日在雅尔塔决定了，这一点日本人不知道，白俄也不知道。在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署的一项秘密协定中，美英两国认可了苏联在远东将得到领土和其他东西，并且承担义务，保证蒋介石对这些予以默认。反过来，斯大林许诺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攻击日本。外交舞台上安排好了一幕军事戏剧，不过有些演员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被安排了一个什么角色。

从1945年2月开始，随着红军的一部分从欧洲战场调到远东，苏联竭尽全力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后勤活动。在随后的

六个月间，火车一列一列地驶过西伯利亚，载着39个师，跨越5000英里，去支援1941年以来一直守卫在苏联—满洲国边境上的19个师。坦克、飞机、燃料、军火和粮食经由铁路横跨浩瀚无垠的西伯利亚大地往东运送，部署在从外蒙古沿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到海参崴的辽阔弧形地带。到了8月，一个令人畏惧的庞大军队从三面对满洲国构成钳形包围之势，这个军队拥有1500000名官兵、2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5500辆坦克、3800架战斗机。这个即将到来的战役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大战役，由坚韧不拔的前苏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这个战役将摧毁关东军，占领满洲国、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南萨哈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苏联老虎钳由三个集团军群组成，每个集团军群在这预定为闪电行动的战役中负责一些具体的目标。最强大的集团军群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外贝加尔方面军，集合在外蒙古和满洲国边界上。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部队大部分都已机械化，它要横扫蒙古沙漠，进入西满，突破兴安岭，直下新京和沈阳。马林诺夫斯基还计划切断通往北平、天津和大连的铁路线，从而封锁逃跑之路。老虎钳的另一个牙是梅雷茨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这个方面军陈兵于乌苏里江和滨海区西南边境一带。梅雷茨科夫将像尖刀一样插进东满，拿下吉林，切断通往朝鲜的交通线。帕卡耶夫将军指挥的远东第二方面军在沿黑龙江一线作好两面出击的准备：一面从海兰泡进北满，另一面溯松花江到哈尔滨。计划对朝鲜港口进行两栖作战，并且在满洲战事取得胜利之时，

还要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进行两栖战争。

在苏联的老虎钳中间驻扎着日本自吹自擂的关东军。在1945年8月初，关东军有787600人、1215辆坦克、1800架飞机以及6700门重炮和迫击炮，此外还有200000满洲国和外蒙古傀儡部队，这支部队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浅野旅的4000名白俄和哥萨克人像西瓜里的瓜子一样，蜷缩在哈尔滨和海拉尔外面。他们的头头是日本人委任的亚美尼亚上校久尔根·纳哥伦。

1945年8月，在满洲国的日本军事地位比数字表示的还要弱一些。同日本国内诸岛的海上交通，由于美国潜艇的袭击而减少到仅存一条涓涓细流。汽油的供应非常短缺，有些飞机只好燃烧用松籽榨出的油。关东军只不过是过去的关东军的一个外壳。它曾经一度是拥有皇军的最坚强的官兵的精锐兵团，但是，它的训练有素的部队和首屈一指的装备已被抽调一空，被送到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的日渐崩溃的前线去了。现在最合用的部队仅仅是1944年春才建立的。关东军的普通士兵有四分之一是1945年7月才动员来的。它的坦克，按苏联的标准，重量不够，又陈旧过时。它的炮兵只有些老式小炮，各部队分配得很少；有一个师什么炮也没有。天皇陛下最好的飞机和驾驶员几乎全部葬身于太平洋海底、所罗门群岛的丛林或硫磺岛的火山灰之中。

关东军虽然人员配置和武器装备都到了脆弱得惊人的程度，但是它却预先得到了苏联要进攻的警告。1945年2月间，关东军情报处获知苏联部队从欧洲调往远东的迹象。到了3月，它得知斯大林在雅尔塔承诺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

进攻日本。4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公开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这条约原定于1946年4月13日到期。到了5月，红军在满洲国周围集结已确定无疑。同样不祥的兆头是离开日本和满洲国的苏联外交官及其家属的人数大增。

尽管有这些不祥之兆，关东军情报处坚持低估苏联进攻的时间表。4月间，关东军战略家们把苏联参战的时间定为1946年4月，认为苏联在废除中立条约后会给日本一年的宽限期。5月间，东京皇军大本营警告新京说，苏联可能早在8月或9月入侵；但是关东军情报处不同意，它声称，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承担后勤运输所具有的局限性，1945年不可能发动大战役。然而，在波茨坦会议于7月26日发表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关东军修正了它的估计，把大规模进攻日挪到8月末。的确8月末是斯大林在波茨坦答应杜鲁门的日期。但是，美国在8月6日就在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斯大林提前了他的计划，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来说，他唯恐在苏联未能“履行按雅尔塔协定对同盟国所作的承诺”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8月8日下午5点钟，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直武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办公室，从莫洛托夫手中接过照会，照会宣布从8月9日起，日本和苏联之间将处于战争状态。那个时候，伯力正是午夜，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刚好在那里命令他的老虎钳开始合拢。十分钟后，来自外贝加尔方面军的第一批连队静悄悄地溜进了满洲国。一小时之内，远东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小部队就越过了边界，其中有些部队以炮火开路，另一些部队则在狂风暴雨掩护下含枚运动。

日本遭到完全出其不意的攻击。正如1939年9月。一场闪电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幕那样，六年之后在6000英里之外，同样也以闪电战结束了这场战争。

就在苏联进入满洲国之前，在满洲国的一些白俄本能地感觉到红军将要发动进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红军进来将带来什么：是奴役还是解放，是惩罚还是赦免，是放逐还是遣返。有些流亡者预见到最坏的情况——他们很有理由这样预见。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就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他。他在俄国内战期间是个残酷无情的反布尔什维克领袖，1918年以来又是同日本人勾结的大人物。前苏联秘密警察留什科夫将军也是这样，他于1938年叛逃到满洲国，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日本人，现在形单影只地住在沈阳，得不到任何保护，他对他从前的同事将怎样处置他不抱任何幻想。

但是，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前首脑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又怎样呢？他没有参与内战。他的党已于1943年按日本人的命令解散了。苏联人真的要惩罚他吗？未来的情况究竟会怎样显然有些使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感到困惑，他在随后几个星期中，作出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生死攸关的决定。

第十九章

决定命运的转变

斯大林主义正是我们过去错误地称为“俄国法西斯主义”的东西。它是清除了极端的措施、虚幻的梦想和谬误的见解的我们的俄国法西斯主义。

——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1945)

虽然自1945年年初以来，几乎在满洲国的每一个白俄都曾听说苏联即将介入太平洋战争的谣传，但是，在8月9日他们睡觉醒来，得知苏联和日本已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得知红军已越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外蒙边界，这时，大多数人才大吃一惊。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头头列夫·弗拉舍夫斯基通过祖国电台听到塔斯社播发的宣战书后，急匆匆赶到哈尔滨军事代表团向秋草俊打听情况，请求指示。秋草正在发愣而不看他的追随者一眼。弗拉舍夫斯基被告知过些时候再来后，便可怜巴巴地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办公处，心中一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老哥萨克已完全习惯于遵循日本人的命令行事，独立行动的事简直是没有

过。他召集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各处室头头开会，其中有罗扎耶夫斯基和马特科夫斯基，他告诉他们，在他与秋草磋商以前，不作任何决定，希望第二天同秋草磋商。

在这同一天，俄国流亡者事务局被一群情绪激动的流亡者包围，他们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否要逃离哈尔滨。罗扎耶夫斯基劝他们不要鲁莽从事，因为军事局势还很不明朗。许多人对这种含糊其词的保证不满意，便转向马特科夫斯基，要求他谈谈究竟红军会不会打到哈尔滨，如果红军将会打到哈尔滨，日本人是否计划疏散愿意离开哈尔滨的白俄。马特科夫斯基的忐忑不安形于颜表，一再申明，这种问题只有等弗拉舍夫斯基同秋草谈话之后才能回答。有些人突然问马特科夫斯基是否打算离开哈尔滨时，一向彬彬有礼的米哈依尔·亚历克舍维奇胀红了脸，含糊其词地咕哝说，作无根据的推测还为时太早。

8月9日，日本人对苏联军队的运动情况，几乎同白俄一样弄不清楚。关东军参谋本部起初没有了解红军入境的全部重要性。习惯于边境事件的山田乙三将军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起初认为，他们是在对付一桩局部地区的挑畔。他们的这种误解，又由于苏联没有进行空袭（受到恶劣气候的妨碍）而加强。但是，到那天末了，满洲国危机的严重性开始显露出来。

在随后的三天里，关东军宛如嫩枝新苗在强劲的暴风下低头弯腰一样毫无抵抗之力。苏联三个集团军群粉碎了前沿防线，从东、西、北三方合击新京和沈阳。在有些地方，红军部队悄悄溜过边界，在日本阵地上的日本兵来不及发射一

枪一弹之前就踏平了日本的阵地。在抵抗顽强的地方，如诺门汗附近的海伦——阿尔山设防地区，苏联人就绕过障碍，推进到满洲中部平原。个别日本联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是也是一个接一个地由于火力被摧毁而屈服。日本步兵腰带上系着手榴弹，在苏联坦克下自杀身亡。红军士兵的牺牲精神也毫无逊色，个别红军士兵以自己的身体堵着敌人地堡的射击孔，承受敌人的子弹，使自己的同志们通过。

大火燃遍了满洲国四周，一种奇怪的寂静袭击着哈尔滨。哈尔滨远离战场，郁闷的天空继续预防空袭。然而平静的外表下面潜伏着恐惧，因为哈尔滨与满洲国其他地方隔离了。军事代表团同在新京的关东军司令部失去了无线电联系。在俄国社会谣言猖獗蔓延，日本就要投降了的传闻广泛传播。来自周围乡村的难民带来惨痛的消息，满洲国的部队发生了兵变，中国人和朝鲜人对日本平民和士兵同样进行猛烈的报复。人们窃窃私语地说，红军在几天之内，也许在几小时之内就会到达哈尔滨。

逃 跑

苏联打败满洲国看来已迫在眉睫，三五成群的俄国流亡者立即集合在门窗紧闭的密室里讨论怎么办的问题。在究竟是留在哈尔滨还是向南逃往中国和朝鲜仅有的看得见的避难所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作出选择是不容易的，哪一种选择都包含着危险和牺牲。年纪大的流亡者对革命后当难民的痛苦经历记忆犹新，不愿意重复这种经历。此外，逃跑意味着放弃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赞成撤

离的人警告说，即使红军不奸淫抢劫，苏联纳卡夫德的小分队也紧跟在红军后面，带着要抓的人的长长名单。另外一些人反对这种阴暗的看法，他们辩称，斯大林刚刚赢得了对德国的大胜利，不会屈尊报复流落国外的同胞。这种乐观的看法得到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官员的支持，这些领事馆官员利用一切机会宣布，再也没有“苏维埃人”和“流亡者”之分了，只有“俄国人”。红军正在从日本人的桎梏下解放俄国同胞，而没有一点伤害他们的意图。

在数以千计的流亡者正在按兵不动和逃之夭夭之间犹豫不决之际，弗拉舍夫斯基终于在8月10日成功地会见了秋草。这个日本军官同其他人一样两眼一抹黑。他由于睡眠不足而形容枯槁。他承认同关东军司令部的联系中断，使得他不能了解满洲国境内的总形势。他答应在他权力范围内尽量帮助任何一个愿意撤离哈尔滨、前往中国内地和朝鲜的白俄。他交给弗拉舍夫斯基一些便条，那上面概括了关东军情报处所知道的苏联宣战文告的内容，并且叫罗扎耶夫斯基把这些内容纳入一项以哈尔滨军事代表团向本地俄国社会发布的通告中。弗拉舍夫斯基注意到，秋草表现出神经紧张的样子，当谈话偶然涉及日本投降的可能性时，他止不住泪流满腮。

弗拉舍夫斯基简要地向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各处室头头介绍完了秋草所说的话之后，立刻爆发了一场辩论，辩论究竟是否要借助日本提供的帮助来实行疏散。罗扎耶夫斯基以超乎他本性的不偏不倚态度一直坐到这场辩论结束为止。他有他自己的打算。

罗扎耶夫斯基在看到苏联军队正在接近哈尔滨的第一个迹象时，就已打算投奔天津。他在8月10日就向他的三个年轻战友——弗拉季米尔·米加诺夫以及另外两人戈尔采夫和森任——和他的女管家维拉·扬希娜吐露了这件心事。他们马上决心追随他。他于是命令他们收拾细软和几件衣服，整装待发。他断言，军事代表团会给他们提供假护照、武器、粮食和马匹，以便沿陆路跋涉到长城。当问起他的家属该怎么办时，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回答说，他的父亲、他的妻子涅昂尼娜以及两个孩子奥尔加和弗拉季米尔要留在哈尔滨。在这个时候，他显然同涅昂尼娜不和睦，不足以深谈，而他的幼子又病得厉害，不能长途跋涉。

8月12日一大早，军事代表团派驻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联络官赤木少佐通知弗拉舍夫斯基，一辆专列定于当天晚上8点钟运送白俄合作者离开哈尔滨火车站。专列的目的地没有说明，但是据估计是天津或者大连。这时，罗扎耶夫斯基把他那沿陆路跋涉的计划全都抛到了脑后。赤木宣布派五六个事务局官员赶快回家去让家里的人整装待发，其余的人开始烧毁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文件。但是，在这时有人跑进来说，他听见一个谣言，说日本人计划在一趟死亡列车上消灭所有的合作者。听了这些后，有些人便表示要重新考虑赤木提出的方案。马特科夫斯基本来一贯是很自信的，但是从8月9日以来，他的自信心也萎缩了。这时他含糊其词地咕哝说，他本来要加入疏散队伍，同大家一起疏散，但是，有些“未曾预料到的情况”要求他在哈尔滨再留一些日子。他还补充了一句不能令人相信的话：美国军队大概要占领满洲国，

并且会保证满洲国居民的安全。

那天晚上，只有二十挂零的白俄出现在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和站台上被日本平民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主要是企业从业人员、商人和南满铁路员工的家属。母亲背着婴儿，大点的孩子跟随左右蹒跚步行，被这种紧张忙乱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日本人的家属拼死拼活地想在为时不太晚之前离开满洲国。大多数人都意识到，现有的铁道车辆只能容纳这些日本人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他们仍然还是等待着，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在有一站台上呈现了一种不谐调的情景：一列空车由一节二等车厢、两节三等车厢和一台过时废弃的机车组成。到达车站的白俄由日本列车员引到这列车上。警察守卫着所有的入口，确保人群中没有人溜上车去。

近8点，赤木少佐来到车站，看见到场的俄国人太少，就命令推迟几小时发车，并动身去调查几个没有来的重要人物。午夜时分，赤木带着弗拉舍夫斯基将军和他的妻子、儿子回到车站。弗拉舍夫斯基在最后一刻本来决定留在哈尔滨，但是，赤木已说服他重新考虑——根据一份材料的记载，赤木是用左轮手枪说服他的。马特科夫斯基在车站露了面，但是，他告诉赤木，他必须坚守他在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岗位，以便传达军事代表团给流亡者社会的命令。罗扎耶夫斯基和他的四个旅伴不需要催促，他们早就到车站来了。在特别疏散者当中还有前警察局巡官尼古拉·马蒂诺夫（卡斯佩绑架集团的头目）、《我们的道路》前记者伊利奥多尔·卡劳赫、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第四处处长米哈依尔·戈迪耶夫

以及两个日本人，其中一个列车长，一个是列车员。

8月13日天亮前不久，这个老机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冒出一阵阵浓烟。三节客车摇摇晃晃地往前开动，在日本人呆滞的目光注视下驶离哈尔滨车站，这些日本人在各站台上列队等候着，显得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几分钟后，火车辘辘驶出哈尔滨西南郊。黑夜笼罩大地，使40名俄国旅客不能最后看一眼他们流亡国外的家园。

火车沿南满铁路干线南下，在新京作了短暂停留，打算把当地的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官员接上车来。罗扎耶夫斯基在头一天夜里已给他们发了电报，但是，没有人在车站露面，大概是因为电报没有送到。8月13日晚上火车很早就到了175英里以外的沈阳。

沈阳火车站上挤满难民，人声鼎沸，谣诼四起。据说苏联铁钳正从东西两边向沈阳收拢。据报道红军空降部队已在大连和旅顺港着陆，粉碎了船只来关东地区的希望。沿辽东湾到长城和天津的铁路线仍然通车，但是苏联的装甲纵队正突过内蒙，随时都可能封锁那条路。只有向东南通往朝鲜边境的铁路看来暂时还比较安全。

这个专列晚上8点钟离开沈阳，驶入山区，很快又开始过隧道。第二天8月14日黎明，旅客们看见一条宽阔的河流，那就是把满洲国和朝鲜分开的鸭绿江。机车突然刹车，整个列车也发出一声巨响而停住了。轨道前面群集着一大帮日本士兵，挡住了去路。列车长和列车员下车走过去同士兵们谈话。这时，机车倒开，把客车推进了旁轨。旅客们等待着、静听着，看来像是要无限期地等下去，这使他们相信，

他们就要被抛弃了。不到一个小时以后，列车长和列车员回来了，火车重新开动了。大家都将要宽慰地舒一口气，但有些人又发现他们的车正在往回走——向北走。

罗扎耶夫斯基诅咒他自己不该离开哈尔滨。他在这充满合作者的火车上，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却留在哈尔滨，孤零零地、毫无保护地面临红军的到来。当他想到涅昂尼娜落到苏联纳卡夫德审讯者手上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时，婚姻上的问题就变得无关重要了。他坐立不安，突然站起身来，在过道上大踏步走来走去，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总有一天要重建俄国法西斯党，并且让斯大林痛痛快快地看看谁是谁。他的话到中途突然闭了嘴，颓然倒在座位上，两手捂着脸，整个身体由于啜泣而抽搐起来。车上每个人都专心致志地在考虑自己的问题，谁也没有太注意这位前首脑。

8月14日下午火车回到了沈阳，在这里又挂上几节车厢，车厢里挤满了从哈尔滨来的俄国难民，然后又离开沈阳。这一次是沿辽东湾海岸往南行驶。紧张气氛弥漫车厢。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如果苏联装甲纵队在疏散列车通过以前，从北面会集到铁路线上来，旅客们全都完蛋。列车长命令拉上所有的窗帘，使情况变得更糟。火车缓缓前进，一小时又一小时地驶向长城，车中空气变得又闷又热，叫人难受。

火车离开沈阳20小时后，突然停下了。一个日本陆军军官上车来对列车长低声细语说了几句，列车长两手捂着脸。每个俄国旅客看见他那样子，立刻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战争结束了。无论在实行“王道”的14年间积累了多少怨恨，车

上的许多人都对战败者感到一阵同情。现在他们全都是具有战败丢脸经验的老手了。

几小时后，火车又停了。现在低声下气的列车长走过过道，喃喃地说，窗帘可以打开了。当阳光涌进车厢时，一双双眼睛张得大大的凝视着车外。有人高声喊着“到中国了！”一片叹息和欢庆之声从车厢这头飘到那头。真的，车站标牌写着“北戴河”，这是中国的海滨城市，离天津120英里，是欧美人士时髦的避暑胜地。

中国的气氛同满洲国的气氛完全相反。从哈尔滨疏散来的白俄在这里第一次感到安全。他们在这里几乎可以呼吸到宁静的空气，因为北戴河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触动。他们身后是一场恶梦，他们前面是充满希望的新生。

然而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并没有和大家一样感到欢乐。他知道，过去是不能轻易摆脱的。他的家属还在哈尔滨。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一个声音悄悄对他说，他早晚都得接受他的祖国的条件。

转 变

火车在北戴河作短暂停留后又继续向天津前进，8月16日到达天津。旅客们在车站上会见了当地流亡者事务局和日本军事代表团的代表，这些代表给他们找到了临时住所，可以容纳过半数的人，地点是一家本地俄文报纸的办公室，这办公室是仓促准备起来的。

天津的白俄没有赶来迎接新来者，新来者是在人员过分拥挤并且什么东西都短缺的时候来到的。所有那些有名的合

作者，他们都染上了与日本人勾结的污点，这是每个人都想洗刷掉的东西。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天津的行政，但是，红军离得太近，使本地白俄感到不自在。这样一些臭名昭著的反共分子来到天津，不会引起斯大林进攻天津吗？天津人要求哈尔滨人继续前进，逃往上海。他们这样想也这样说了出来。这种惊恐和敌意过了几个星期才平息下来，到这时，大多数哈尔滨人都已融化进了当地社会，有些时候是隐瞒他们的生世才融化进去的。

然而罗扎耶夫斯基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弃儿，因为天津的白俄社会排斥他。流亡者事务局拒绝分配房子给他住，但是接待了他的女管家维拉·扬希娜和他的三个年青追随者。最后结果是罗扎耶夫斯基同七个红军的逃兵共住一套房间，其中有两个是纳卡夫德的边防战士，他们是在30年代不同的时候经满洲国逃到中国的。

罗扎耶夫斯基不早不迟逃离了满洲国。8月17日关东军接到东京帝国大本营发来的停火令，就在那天，苏联钳子在新京和沈阳收拢。由谢拉霍夫少将率领的红军部队于8月18日开进了哈尔滨，那正是罗扎耶夫斯基登车南逃五天之后。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在机场迎候谢拉霍夫少将一行，这是头一天通过秋草和哈尔滨苏联领事进行的安排。8月19日黎明，苏联军队占领了城内火车站、松花江大桥和主要道路。那一天，秦彦三郎飞到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总部签署正式投降书。在沈阳机场，满洲国傀儡皇帝亨利·溥仪在刚要登机飞往日本的时候，被一个苏联分遣队抓住。

满洲国的寿终正寝丝毫不值得怜悯，但却给在满洲国生

活、工作和服役的日本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约563000关东军战俘在从哈尔科夫到堪察加的营地里面对11年的“劳改”。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山田、秦和秋草，作为“战争罪犯”被押送到伯力去接受审判和监禁。一百多万日本平民——农业移民、办事员、工厂工人、企业家、商人、医生、教员和浪人(歹徒)——留在苏联手中至少有一年。大约83000士兵和15000平民死于战火；还有91000人在1946年前死于疾病、饥饿和被遗弃。数以千计的人死后简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罗扎耶夫斯基逃离满洲国，避免了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和诸如此类白俄头面人物的命运，他们不把安危放在心上，等待着苏联纳卡夫德的到来。根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屠杀工农的屠夫”谢苗诺夫是被“保安机关”逮捕的。他“和盘托出了他的全部活动，表现得毕恭毕敬，且羞且愧”。流亡者对谢苗诺夫突然与苏联纳卡夫德相遇的情况叙述得更为详细，也可能更富于想像。根据一项资料的记载，一个“斯麦尔什”小分队^①于8月19日夜间空降在大连谢苗诺夫家的附近，并且通过当地苏联领事馆事先的安排，突然把他空运到莫斯科。另一项报道说，苏联纳卡夫德部队把他和他的家属软禁了三个星期，然后把他转移到莫斯科，没有允许他同他的妻子和女儿告别。有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说法，说这位哥萨克为来逮捕他的人准备了丰盛的筵席。一天清早重武装的

① “斯麦尔什”(SMERSH)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别处。

——译者

纳卡夫德特别行动队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作了自我介绍，交出他仔细整理好的个人文件，并且邀请大家进早餐。负责带队的上校在彻底搜查之后，接受了邀请，命令他的队员围着堆满食物和伏特加的桌子坐下。谢苗诺夫为苏联取得打败德国的胜利而举杯庆祝，并且表白自己的心意，说他准备接受斯大林的裁决；但是他声称，他的所作所为始终是出于爱国心。这位纳卡夫德上校填饱肚子后站起来宣布，他的东道主已被逮捕，并且把他押送到机场运往莫斯科。

罗扎耶夫斯基并没有因为逃脱了满洲的大灾难而自我庆幸；他在天津感到意气沮丧。他扔下了家小，担心他们在哈尔滨不安全。从前的朋友都避开他，他对此感到痛心。他尤其为满洲方面关于亲苏的欢欣景象的报道而目瞪口呆。一度是最坚定的反共分子的哥萨克，而今张开双臂欢迎红军。8月19日，数以千计的白俄齐集在南岗的尼古拉大教堂的广场上，挥动红旗，欢迎苏联军队。浅野旅未放一枪就消失了，它的旅长久尔根·纳哥伦上校原来是一个红军情报处官员。

连从前的战友也无耻地加入了亲苏的起哄。俄国法西斯联盟天津支部的领导人乌沙科夫厚颜无耻地拿着一张苏联护照到处炫耀。俄国法西斯联盟上海支部的领导人根纳迪·塔拉达诺夫也是这样；仅仅十年前，他还在《法西斯主义入门》一书里骂斯大林。1927年时是俄国法西斯组织创建人之一的博里斯·鲁缅采夫，重新露面，当了上海苏联公民协会副主席。

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米哈依尔·马特科夫斯基。罗扎耶夫斯基听说这位温和的俄国法西斯联盟领袖是在为苏联工

作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特科夫斯基在8月初的奇怪行为，他不愿撤离哈尔滨，他神经紧张地借口推托，现在突然全都明白了。他现在公开为红军服务，登记流亡者，发放居留许可证，其效率之高，和他为日本人服务时一样。罗扎耶夫斯基一想到马特科夫斯基将向纳卡夫德提供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人事档案，就火冒三丈，但又无计可施。这个来自海兰泡的小伙子过去是知道苏联的渗透战术的，但是它的实际规模(在日本战败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却使他大吃一惊。他，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竟然被日本人怀疑是个赤色分子，无疑是马特科夫斯基向军事代表团灌输了这个想法。

罗扎耶夫斯基的世界在他周围崩溃了。好像谁都背叛了他，再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他感到可怕的孤独和危险。

9月初有些时候，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情绪低落至极点，开始产生异乎寻常的心理变态。心理变态的过程随着外界力量微妙的推动而逐渐显露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年轻的追随者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同两个多嘴多舌、随便花钱的流亡者交上了朋友，这两个流亡者一个叫尼古拉·科罗布科夫，一个叫什么德米阿诺夫斯基。科罗布科夫是马特科夫斯基的老朋友，从前在哈尔滨曾经替日本宪兵队工作过，是康士坦丁·伊万诺维奇(科斯加)·中村的宠儿。在日本投降前他偶尔替中村出差北平和张家口。德米阿诺夫斯基一度是天津反共委员会的顽固派，对日胜利后，摇身一变而持有苏联的护照，并且与反共委员会断绝关系以证明他忠于斯大林。

科罗布科夫和德米阿诺夫斯基把苏联占领下的哈尔滨作

了玫瑰色的描述，以使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感到高兴。红军和白俄社会之间相处十分和谐。过去的分歧在兄弟般团结的浪潮中忘怀了。现在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有什么关系。再说，当一个真正俄国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且以回到苏联当一个苏维埃公民来表明这种爱。孤独地流亡国外的日子过去了。现在是年轻的一代——苏联人和流亡者——并肩携手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俄国、恢复她从前的伟大的时候了。要达到这划时代的目标，流亡国外的人，特别是流亡国外的年轻人，必须自愿回到故里，参加摆在面前的伟大任务，以表明他们的诚意。

德米阿诺夫斯基说，罗扎耶夫斯基正是这种好青年，斯大林在这个时候真能起用他。他理解力强，精力充沛，是个有煽动力的演说家、有经验的宣传家。祖国极其需要有资格、有献身精神的人。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会毫不费力地建立起苏维埃当局对他的信任。噢，现在在负责的岗位上替哈尔滨的红军工作的马特科夫斯基会替他担保。

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兴奋地向罗扎耶夫斯基汇报了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位前首脑虽然可能已意识到了有危险，但也不得不听。他开始看到他的自我孤立对他很不适合。他渴望成为一个国家的一员，成为他的国家的一员；苏联人会接受他，甚至会欢迎他，这个想法引起他的幻想。他听见有人说，为了“摆在面前的伟大任务”，斯大林需要像他这样的人，这时他的自负进一步膨胀了。

罗扎耶夫斯基的无知加深了他的轻信。譬如他还不知道谢苗诺夫和其他白俄头头已在满洲被捕，更不知道他们已被

送到莫斯科去了。《真理报》并没有刊登审判通告。来自哈尔滨的消息支离破碎，并且大多是道听途说。罗扎耶夫斯基最后终于逐渐振奋起来，进入一种需要德米阿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希望来使他醒悟过来的状态。他现在从不同的角度看见了他周围的亲苏幸福感。俄罗斯的“回头浪子”也许真的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如果真是这样，他不想被排斥在外。

罗扎耶夫斯基命令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继续观察科罗布科夫和德米阿诺夫斯基，并且尽量从他们那里了解哈尔滨的情况。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两个追随者一再回到罗扎耶夫斯基的寓所，给他带去更为惹人动心的消息：内斯特大主教一度是尊敬的全俄法西斯联盟的战友，他在哈尔滨尼古拉大教堂主持了东正教弥撒，红军官兵都脱帽参加。德米阿诺夫斯基曾建议罗扎耶夫斯基给马特科夫斯基写封亲笔信，以便采取步骤同他的家属恢复通信联系。科罗布科夫曾惋惜罗扎耶夫斯基离开哈尔滨，他的离开被广泛感到是个损失，因为他的才能在那里是十分需要的。这两个人都敦促罗扎耶夫斯基赶快下决心，不要等得太久了。莫斯科可能把犹豫不决看成是缺乏诚意。

罗扎耶夫斯基仔细推敲了这些建议。最近的经验腐蚀他对别人的信任。但是，他年纪38，极度需要当“一个重要人物”。当了十年政治运动首脑使他渴望行动，渴望配合，渴望参与“摆在面前的伟大任务”。

经过几天的内省之后，罗扎耶夫斯基开始兴奋地挥笔写了起来。他毫无保留地倾诉自己的想法，对过去的信念和忠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看起来很像是宗教上的改宗

换派。首先，他起草了一份题为《灵魂复苏的一个星期》的自辩书，然后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一封给斯大林。

罗扎耶夫斯基在《灵魂复苏的一个星期》里，叙述他自己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危机”由于认识到俄国基本历史的连续性才得到解决。他以一种经外界灌输而持有的看法来看待事物，认为国土的扩张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联系起来。苏联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进一步确定了一个光荣的传统，并且看清楚了一个事实：他的忠诚寄托错了地方。由于斯大林使得“集聚俄国的土地”的神圣传统永存，已表明他是“新的伊凡·卡利塔”^①。（“集聚俄国的土地”是指苏联在1940年到1945年间在东欧和远东获得领土。）

罗扎耶夫斯基写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信已不存在，但是，其内容大意可以从他写给斯大林的信件推测出来。罗扎耶夫斯基的家属激烈否认这封信的真实性，但是，许多有资格的观察家把它当成真的来对待，或者把它当作是那时他的思想状态的花言巧语的表白。

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开宗明义就表明他的目的：

每个工人，每个集体农民都可以写信给俄国人民的首脑、苏联人民的首脑约·维·斯大林同志。也许也允

① 伊凡·卡利塔（富翁），1328年到1341年在位统治俄国，以购买的办法而不是征服的办法扩大了俄国的领土。罗扎耶夫斯基把伊凡·卡利塔同斯大林相比也许是出于痴心妄想。卡利塔从蒙古人手中赎回许多俄国战俘。

——原注

许我这样做。我是个俄国移民，已把我一生中的20年岁月消耗在一场斗争中，这场斗争在我和追随我的人看来，是一场争取我们的祖国俄罗斯的解放和新生的斗争。

我要说明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存在和活动的根本缘由，并求得对俄国移民的辛酸戏剧的理解。因此，这封信不完全是一封个人信件，因为它是为越来越多的想竭尽全力为祖国效劳的俄国人筹划走出困境的办法的一个尝试。

公开表白“不完全是一封个人信件”，而这封信却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因为罗扎耶夫斯基详细地私下交代了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他谈到他为什么逃离了苏联，为什么投身于嚣张的反共运动。他追述了他对下面这件事所感到的失望和忿懑：尽管有地方苏维埃的有利推荐，他仍然未被录取进大学。他接着说，一旦他进了哈尔滨法学院，个人的不满就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结合起来，并且逐渐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着了迷。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有效的解毒剂，可以医治逐渐削弱俄国实力的那些疾病，如阶级斗争、国际主义、犹太人和冷冰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则。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在俄国人中逐渐灌输一种创造性的民族主义新意识，同时为社会正义提供基础。罗扎耶夫斯基承认，他的最大错误是他没有认识到，无论如何苏联都正在演变到法西斯主义。

他接着说，犹太人仍然是俄国的最阴险狡猾的内部威

胁，因为他们强烈的种族意识，侵蚀着俄罗斯民族的根基。斯大林，只有斯大林才能解决俄国的犹太人问题，办法是“把犹太人从遵奉犹太法典的环境挖出来，使他们成为苏维埃人”。他断言，俄国法西斯主义同苏维埃共产主义基本上具有同样的目标。斯大林是他们的真正首脑，虽然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战友们还没有认识到：

我们不是突然一下子，而是一步一步地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们决定：斯大林主义正是我们过去错误地称为“俄国法西斯主义”的东西。它是清除了极端的措施、虚幻的梦想和谬误的见解的我们的俄国法西斯主义。

转而谈到他1931年以来的活动时，罗扎耶夫斯基边认错，边辩解。他认为他的党曾错误地大肆从事反共活动，但是，这些是“出于热爱祖国而反对祖国的行动”。支持德国是错误的，但是战友们真心实意相信希特勒能够帮助俄国除掉犹太人。罗扎耶夫斯基这个俄国法西斯分子，在不同的时候被谴责为苏联的、美国的、德国的或日本的间谍，他自己承认主要是替日本工作。但是，只要他发现日本人的命令有害于俄国，他总是拒绝服从。1937年，他终止了俄国法西斯联盟在苏联境内的特务破坏活动，这个决定最后导致党的被取缔。相反，谢苗诺夫不外是一个工具，求宠于日本的事，什么他都干。谢苗诺夫分子统治了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因此，对俄国流亡者事务局专断流亡者事务要负责。罗扎耶夫斯基解释他之所以于1945年8月13日逃离哈尔滨是受不对苏联作

战的决心所驱使：“既已一度铸成大错，〔支持〕德国对苏战争，我们就不想在苏联对日战争中重蹈覆辙，这场战争显然是苏联为了俄国的民族利益而发动的。”

随着这封信继续写下去，语调越来越激动人心。非常悲哀地叙述了他在天津的生活之后，罗扎耶夫斯基宣布他和他的战友们都如饥似渴地盼望同他们的祖国重新联合。他乞求“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宽恕他的追随者，因为他们不应对他们所作的宣传和行动负责，因为那都是他这个俄国法西斯联盟的首脑所拟定并命令他们去干的：

我准备为俄国法西斯联盟的全部活动负责，准备在任何法庭面前出庭受审，如果必需要我去死，我就准备死。如果杀死我是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您可以杀死我，杀死我可以经过审判，也可以不经审判。

但是，罗扎耶夫斯基唯恐斯大林相信他的这些话，又立刻补充几句：“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当一个“民族共产主义者和认识了错误的斯大林主义者”，为了不辜负斯大林对他的宽恕，罗扎耶夫斯基答应为在满洲的苏联行政当局工作。此外，他还要动员全世界的俄国法西斯联盟组织从亚洲、南北美洲和澳洲把流亡者带回到苏联，回到“斯大林主义旗帜下”。

信件最后热切地要求大发善心，并且表达了一个流亡者由衷的恳求。

为了祖国和革命，我恳求您，伟大的斯大林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一项人道主义的法令，赦免一切移民。……我们岂可在祖国境外死，在祖国境外生，或者干反对祖国的工作，啊！我们要受祖国的命令而死，或者死在为祖国完成任何工作的任何地方。我们要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我们的人民和全世界最神圣的东西——光芒四射的斯大林思想的胜利。

人民的首脑斯大林万岁！

您最卑贱的奴仆，

康士坦丁·弗拉季米诺维奇·罗扎耶夫斯基

附言：〔我〕没有时间来仔细考虑这封信和推敲它的字句。倾泻于纸上的一切都是出自肺腑。

罗扎耶夫斯基把《灵魂复苏的一个星期》同他给斯大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信件一起交给戈尔采夫，让他交给德米阿诺夫斯基。德米阿诺夫斯基又带着这些到北平交给苏联领事馆的一个馆员伊万·蒂莫菲维奇·帕特里基夫。帕特里基夫对罗扎耶夫的问题很感兴趣。他正在中国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搜索流亡者的首领们。

搜 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流离国外的苏联公民分散在欧洲各地，大部分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奥地利，但是，意大利、法国、荷兰、丹麦和挪威也

有。大多数是红军战俘，他们设法在德国死亡营中幸存下来。其中有将近1000000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高加索人、土克曼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哥萨克人和亚美尼亚人自愿地或被迫地在德国国防军中当非战斗的辅助人员，或者加入特种军事编队，如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的俄罗斯解放军、赫尔默思·冯·潘韦兹中将的哥萨克师、或拉尔夫·冯·海根多夫将军的土克曼和高加索支队。除了军事人员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苏联男女被德国人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围捕，送到德国去当劳工。最后还有不知其数的文职通敌者、一般旅游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随着德国军队向西撤退，逃避向前挺进的红军，或者更正确些说，逃避随之而来的纳卡夫德小分队。

斯大林要这些人全都回到苏联去，必要时不惜用武力强迫他们回去。通敌者要受到惩处。但是，斯大林对通敌者所下的定义远超过穿德国制服或在某些政治职位上为敌人服务的那些苏联公民的范围。被敌人俘虏就构成通敌嫌疑的根据，在战俘营幸存下来就打上了有罪的烙印。有的战俘离开战俘营到工厂去做工，作为一种不致饿死的办法，这些战俘也被列入“通敌者”之列；在德国当家庭佣人的俄国妇女也是这样。

但是，斯大林不光是关心通敌者，他还要求遣返最忠贞不屈的士兵和平民，因为他们暴露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标准下，也可能已受了污染，使他们有潜在的危险。在遣返之时，他们要受到详细的盘问；在需要他们的地方，给他们一个机会在“古拉格”^①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① 苏联劳改营中央管理局。——译者

据斯大林推测，有许多苏联公民（西方估计在几万到200万之间）宁愿永远留在苏联境外，无疑是因为他们预见到祖国境内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如果允许他们自己选择，他们可能又是一批散居国外的俄国人，其人数将等于1917—1922年出国的人数。然而，斯大林设法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雅尔塔作了书面保证：盟军解放的“全部苏联公民”要迅速交给苏联当局。雅尔塔协定的正文没有提到对抗拒遣返者使用武力，但是，实际上那是它的合法手段，这是签字各方心照不宣的谅解。无论强迫遣返的想法多么令人憎恶，但是，英美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迁就了斯大林的希望。同时英美还担心英美战俘的安全，这些战俘是红军从东欧的德国集中营中解放的，并且等待着从苏联占领区遣返。

英美军队按雅尔塔协定行动，于1945年到1947年之间，围捕并向苏联当局移交了约2000000俄国男女成人和小孩。武力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蒙骗一般都更有效。预期的遣返人员用车送到苏联占领区周围边界上的交接站，并且受到欢迎他们回到祖国的旗帜、扩音器播出的节日音乐和大量的食物配给的蒙骗，心中升起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个把戏继续要到他们被牢牢掌握在苏联手中之止。

但是，偶然也要流血。1945年5月28日到6月1日之间，大约50000哥萨克人带着家小，在维也纳西南120英里穆尔河畔一个小镇朱登堡，由英国连队武力押送出境。穆尔河是分隔英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界河，河上有桥，遣返人员正在被从桥上赶到苏联区去。这时，有些哥萨克人看见等在那里的红军卫队，就从桥上跳进深谷中自杀。另外有些人试图逃进

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但被英苏联合巡逻队赶了下来。被遣返人员一旦过了穆尔桥，大部分就塞进卡车送到铁路终点站，然后转运到苏联。到了苏联他们就面临着从劳动营到行刑队的各种可能（这取决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经历）。

在朱登堡移交的人当中，有一些是大约25年前内战时期离开俄国的流亡者，他们毫不抱有被看作是苏联公民的幻想。驱逐他们是违反雅尔塔协定的，但是，在混乱的战争余波中，也顾不上这种违反协定的事了。

不用说，斯大林特别希望插手处理那些白军的老将领，其中有许多都在1918年到1922年间同斯大林和他的同代布尔什维克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把这些已被打垮但还在对抗的沙俄遗老交付审判，然后绞死，不让他们像小兵那样由火枪行刑队处死。虽然在1945年还活着目睹这一情景的老布尔什维克为数已不多，但是，斯大林大概从中得到了某种满足。在朱登堡遣返人员中就有一个这种预想中的人物：哥萨克的首领安德烈·什库罗，他在1938年曾经招待过旺夏茨基。

6 远东的情况和欧洲的情况很不相同。斯大林在苏联占领的满洲境内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紧跟在红军后面的纳卡夫德小分队，带着流亡者的详细名单，榜上有名的要予以逮捕、遣返，并按1926年的刑法第58条加以审判，这一条规定了对叛国投敌、帮助资本主义国家、阴谋反对苏联和各种各样反共活动的惩罚。最优先的重点是逮捕俄国流亡者事务局的官员、君主制组织和哥萨克组织的成员、俄国武装部队联合会、滑膛枪手，当然还有俄国法西斯联盟。纳卡夫德得到在这些组织中活动的苏联代理人的协助（例如在俄国法西

斯联盟中有马特科夫斯基的协助，在浅野旅中有纳哥伦的协助)，很快就逮捕了他们追索的猎物，并且把他们送进伏罗希洛夫、伯力和赤塔的监狱，等待审判。像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弗尔兹比茨基将军和巴克谢夫将军等头面人物使用飞机直接送到莫斯科，以便对他们进行更为大肆张扬的司法起诉。

然而，在中国长城以南，苏联当局就没有这种行动自由。蒋介石没有参加雅尔塔协定。事实上这位委员长也没有表示要交出他辖区内的俄国流亡者和苏联叛逃者的任何意向。因此，莫斯科在中国不得不采取一种软办法，策略是对流亡者讲民族自豪感并利用他们的孤独感，引诱他们“回家”。

这软办法于1945年秋天在俄国人在中国聚居的中心获得丰硕的成果，搜索到了一大批三心二意的头面人物。10月间，一个苏联全权代表到达上海，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表示宽恕所有的流亡者。苏联外交官许诺，所有移居国外的人回到祖国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会受到妨碍；流亡者可以把他们的全部财产带回国去，包括钢琴和汽车；他们愿意在哪里定居，就可以在哪里定居。轮船可以把回国的公民送到海参崴，遣返人员可以从那里登车向西驶往目的地。

这些许诺虽然使得数以千计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俄国人信以为真，但是，要叫那些“难对付的人”（即“白卫军”）回去，还需要些更具诱惑力的东西。因为他们有很多理由要呆在苏联境外。“难对付的人”当然是纳卡夫德最急于要寻找的人。

要诱捕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员。这种人员不能单纯是一个绑架者，因为那会引起很坏的影响，还会吓跑其他的流亡者；相反，他必须是老成干练的“新俄罗斯”的游说者。伊万·帕特里基夫极其令人佩服地堪当此任。

帕特里基夫才35岁，住在北平苏联领事馆，是个和颜悦色、语调温柔的外交官。他和他的同事们不一样，同流亡者有广泛的社交往来。他不单和蔼可亲，而且对流亡者的问题抱同情态度，十分关心，并常常给他们以帮助。但是，帕特里基夫关心白俄的福利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情感，而是在莫斯科接受了特殊的命令，要促进“难对付的人”的遣返工作。

帕特里基夫自恃是有经验的行家来从事他的工作。他首先完全熟悉了每一个选好的人的背景情况和性格特征，然后去结识那个人，并争取赢得他的信任。他办事从不仓促行动而是极为小心谨慎，为的是不引起白俄、中国政府或诱猎目标的疑心。

帕特里基夫的第一个大猎物原来是列夫·弗拉舍夫斯基将军，他62岁，谢苗诺夫的同伙，俄国流亡者事务局最后一任局长。苏联军队占领哈尔滨前五天，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家属乘疏散专车逃到了天津。有谣言说，他本来不愿离开哈尔滨，在那里他留下一幢房子，房子里装满了值钱的东西，更不用说留下了朋友和记忆。帕特里基夫听到了这些，立刻在弗拉舍夫斯基的流亡者朋友当中进行周密的调查，并且发现，将军的太太和儿子更不满意天津的生活。不久，帕特里基夫同弗拉舍夫斯基太太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位太太马上敦促这位苏联外交官去会见她的丈夫和儿子。帕特里基夫欣然

同意，并许诺，他会“像俄国人对俄国人那样”同他们谈话。

他们的会见是一天晚上在一个前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官员的公寓房间里进行的。这位官员在天津苏联公民协会里非常活跃。帕特里基夫在被介绍给这位将军时，免去俗套礼节，单刀直入地谈到中心问题，然而并不表现得有丝毫尴尬的样子。帕特里基夫转弯抹角地谈到30年代斯大林搞的清洗的时候说，苏联的生活近年来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普遍可以在和平和安全的环境中生活。然后，他叙述了哈尔滨的和谐气氛。他非常圆滑地谈到弗拉舍夫斯基的逃跑问题，他表示他本人相信，将军是在“日本人手枪枪口下被迫疏散的”。此外，他可以猜到，将军的全家一定是多么惦念他们哈尔滨的家。当然他可以理解他们对回哈尔滨去的疑虑，但是，这样的担心的确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帕特里基夫滔滔不绝地继续说，如果将军愿意作为苏联外交部的客人去哈尔滨进行几天访问，他就可以验证这些疑虑是多么没有根据。当然，将军的安全将无条件予以保证，他还可以到北平去，随时同苏联领事讨论这个问题。

弗拉舍夫斯基可能已经被迷住了，但是他还没有准备上钩。这位将军还需要同帕特里基夫和亲苏流亡者进行几次会见，加上他太太的推动，才能丧失警惕。促使他转变的关键性催化剂看来是帕特里基夫的一个流亡者助手根纳迪·列维廷；他机灵地培植了弗拉舍夫斯基的怀乡之情。列维廷向将军保证，如果他回到苏联，他故乡赤塔的人民会选举他为名誉市长。但是，弗拉舍夫斯基最后终于欺骗了他自己。他知道他的两个最亲密的同事谢苗诺夫和巴克谢夫已被抓起来送

到莫斯科去了。一般常识应该告诉他，他们正在经受着什么，但是，他继续迷于这样的幻想：他们正在自由自在地为祖国服务。他显然不敢向帕特里基夫打听他们的情况。

几个星期以后，弗拉舍夫斯基终于屈服了，并且接受了帕特里基夫的建议。这两个人驱车到北平，并从北平乘苏联飞机飞到新京（1945年更名为长春），弗拉舍夫斯基在长春享受到意想不到的殊荣，被介绍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他虽然没有到哈尔滨，但是，他在长春所受到的殷勤接待，使他十分感动，以致他回到天津后，就成了雄辩的争取遣返的发言人。

几个星期后，在10月中旬，弗拉舍夫斯基同他的家人深情地向帕特里基夫告别，准备登车赴北平。他们热情洋溢地感谢他的热心帮助，他的热心帮助使他们延长了寿命。他们在北平登上苏联飞机，飞机要把他们送到哈尔滨，去与哈尔滨的家和朋友们胜利重逢。不料飞机飞到了赤塔。在赤塔，没有人民代表团迎接弗拉舍夫斯基，承认他是名誉市长。相反，等在那里的是干练的纳卡夫德人员，他们把他和家属分开，并把他塞进另一架飞机。于是弗拉舍夫斯基被空运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立刻同谢苗诺夫和巴克谢夫一起收容在卢布莱扬卡，那是一个监狱，在内务部附近，漫步几分钟就可到莫斯科大剧院和红场。

帕特里基夫在处置弗拉舍夫斯基以前很久就监视过罗扎耶夫斯基。罗扎耶夫斯基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弗拉舍夫斯基只代表老“白卫军”，而罗扎耶夫斯基活生生地代表了一个

更直接为人民痛恨的对象：法西斯主义。正因为如此，他会成为莫斯科举行一次公开审判的好材料，把白匪运动同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预备性的计划，帕特里基夫指示新近在天津重新开馆的苏联领事馆的一些下级雇员，把罗扎耶夫斯基找出来参加宴会，使他心情舒畅些。

这时，罗扎耶夫斯基正在重行考虑他的转变问题。他在两种想法中犹豫不决：一方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苏联的新闻从业人员，另一方面又害怕一旦落入斯大林之手可能产生的遭遇。这个时候，他亲自会见了德米阿诺夫斯基和科罗布科夫，这两个人不断敦促他采取行动，并且提出要把他介绍给帕特里基夫，说他是用得着的联络员。与此同时，尼古拉·马蒂诺夫（前警察巡官，拐骗卡斯佩的人，来自哈尔滨的逃亡伙伴）警告他不要相信德米阿诺夫斯基或苏联的许诺。警察的本能告诉马蒂诺夫，罗扎耶夫斯基正在被捧起来构成一个圈套。但是，他没有证据。谢苗诺夫和巴克谢夫的命运仍然还不清楚。到这个时候，弗拉舍夫斯基在天津到处狂热地谈论他在长春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待的情景。罗扎耶夫斯基终于答应马蒂诺夫，在会见帕特里基夫之前，他要到北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人是他绝对信任的，他就是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教机构的首脑维克托大主教。

维克托简单明瞭地劝他尽量离开华北远一些，因为有谣言说，中国当局要搜捕任何一个与俄国法西斯联盟有关的人，并把抓到的人交给苏联政府。

罗扎耶夫斯基在反复考虑维克托的警告的时候，这位前

首脑的青年追随者戈尔采夫只身去北平会见了帕特里基夫。他完全被这位苏联外交人员迷住了，以致他乞求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亲自去同他谈一谈。戈尔采夫的热情奏了效，他们二人于9月末到北平去会见正被弗拉舍夫斯基捧为仁慈的天使的那个人。

帕特里基夫显然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罗扎耶夫斯基很快就提出了遣返的问题，宣布他本人在某种条件下愿意回苏联去。帕特里基夫不理睬“某些废话”，并抚慰罗扎耶夫斯基的自尊心。帕特里基夫赞赏地把他追寻的猎物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说，这样一个男子汉需要有一个祖国。此外，让罗扎耶夫斯基多方面的才能浪费在国外简直是“犯罪”（他很小心地选择了这个字眼）。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新挑战，她往昔的英美盟邦正在乘苏联遭到战争损失和经济混乱之机，策划帝国主义阴谋。在这样的时候，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只能走一条路：回到祖国。罗扎耶夫斯基很有条件当一名新闻工作者或宣传家为他的人民服务。如果他回到苏联去，他可以编一份以海外流亡者为对象的刊物。他的回国问题，以及愿意陪同他回国的追随者的回国问题，可以分几个阶段进行：第一步暂时在北平苏联领事馆住几天，然后到哈尔滨同家人呆几天，最后回国。

帕特里基夫巧妙地使他的建议符合罗扎耶夫斯基的自私利益。他正确地掌握了他所追索的猎物的爱好（宣传民族主义）、抱负（闻名于全球）和忧虑（担心其家人），于是他把回国说成是好像可以满足所有这一切。

帕特里基夫的一席话使得罗扎耶夫斯基心满意足，激动

得发抖。随后几天的时间他用来同朋友们讨论帕特里基夫的这些话。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认为那些话表面听起来很好。森任和维拉·扬希娜仍然不相信，马蒂诺夫也不相信。

10月初，罗扎耶夫斯基向帕特里基夫说，他已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回国的第一阶段，即住进北平苏联领事馆。帕特里基夫立即发出指示。罗扎耶夫斯基、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应于某天早上5点钟在天津维多利亚路某个地点等着，列维廷开的汽车会去接他们，把他们送到北平。除了他们三人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些计划。

罗扎耶夫斯基受到这种特殊行动路线的约束，再度陷入了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在他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去集合等车的头天夜里，他的神经太紧张而没法入睡。凌晨1点钟，他打电话给马蒂诺夫，吐露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坦白承认心中令人痛苦的忧虑。这个前首脑一半担心一半愤怒地抱怨说，他感到他好像是苏联一个大阴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齿轮的牙。

但是，在规定的那天早上5点钟，这三个人都按指示带着他们手提的东西来到维多利亚路。列维廷开着车来了，打手势让他们上车。他们遵命上了车，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别的人看见他们离开。

其后三个星期，罗扎耶夫斯基、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就住在北平苏联外交人员的院子里。他们住的是一间稍微有点失修的石头大房子，每个窗子上都有铁槛。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在需要时可以外出，但是，帕特里基夫劝罗扎耶夫斯基不要出去，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为了安慰这位前首脑，给了他一间宽敞的、光线充足的房间，配备了一张床、一张

写字台和一张餐桌。帕特里基夫注意到他的客人的需要，张罗着在罗扎耶夫斯基的住处安放了一架钢琴。

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自由自在地利用他们所享有特权，用很多时间去城里闲逛。帕特里基夫偶尔也派他们办点事，跑跑腿。他叫他们去敦促维克托大主教把北平的东正教传教团同莫斯科的最高大主教重新联合起来。他派他们回天津去把尼古拉·马蒂诺夫请来，罗扎耶夫斯基在回哈尔滨之前要再见他一面。马蒂诺夫在得到对他人身安全的保证之后就来了。

这时，罗扎耶夫斯基有了时间，有了写字台和纸笔等条件，便开始写更详细的坦白交代材料，仔细考虑致斯大林的信。帕特里基夫显得很高兴，叫他尽量具体地交代他同关东军的合作。在晚上，罗扎耶夫斯基形只影单，常常感到孤独，这时，他就弹弹钢琴。

10月24日晚上，罗扎耶夫斯基弹琴之后，在他房间里招待三位客人：戈尔采夫、米加诺夫和马蒂诺夫。9点钟左右，房门被旋开，帕特里基夫没有打招呼就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矮胖的男人，穿着长统靴和制服，带着蓝色肩牌和领章，这马上就看出他们是纳卡夫德的特别行动队。罗扎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伴们赶忙站了起来。帕特里基夫一句话不说，在写字台旁坐下，写字台上堆放着罗扎耶夫斯基最新交代的材料和草稿。一个纳卡夫德官员慢吞吞地在帕特里基夫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三十七八岁，肤色白里透红，是位少校。另外两个军官仍然站着，分站在上级的两边。

沉默几秒钟后，马蒂诺夫用别人听起来比他自己感觉到

的还更沉着镇静的声音问，应该怎样称呼新来的几个人。

那个皮肤白里透红的军官大模大样、摇头晃脑地回答说：“你们爱叫我们什么就叫什么。对我们来说反正都一样。”他的回答引起另外两个军官哈哈大笑。来访者显然是喝醉了酒，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不祥之兆，绝不是一般的社交拜访。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一声不吱地盯着地板。罗扎耶夫斯基很明显地在发抖，他向屋里四处张望，像一头被逼入困境的野兽。纳卡夫德官员们带着得意的微笑看着他。帕特里基夫对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毫不在意，沉思地凝视着远方。

马蒂诺夫没有闹着玩的心境，便对那个白里透红的少校问道，罗扎耶夫斯基将在什么条件下回苏联去。少校回答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已经宣布，所有的流亡者，不管他们过去的情况如何，都可以回到祖国去。马蒂诺夫感到不满足，又问道，最高苏维埃为什么不发布正式的大赦令。少校反驳说，大赦意味着宽恕罪犯，而流亡者不是罪犯；此外，流亡者回祖国不需要条件。大门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着。

少校说到这里，站了起来，慢慢踱到罗扎耶夫斯基面前，开始问他满洲国的情况、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的白俄的情况、关东军和浅野旅的情况。罗扎耶夫斯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地回答着，这时戈尔采夫插嘴进来，替他的头头说了几句。少校听戈尔采夫说了一会儿后，又转向罗扎耶夫斯基。然而这一次他说话的语气很客气，近乎是亲切的关心。他问起他的工作经历。这个方式的问话使罗扎耶夫斯基恢复了生气，在他谈到他的组织工作、演说方面的成就以及

《我们的道路》的编辑工作时，他渐渐变得更自信了。在谈到《我们的道路》时，少校打断他的话说：

“在祖国国内，有大量的工作给你做。我们对这种工作的需要是巨大的。也许你对满洲的所有这类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都很熟悉，嗯？”

“啊，是的，是的，很熟悉，我对这些全熟悉。”

“那对我们特别有价值，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对于那些情况还稀里糊涂。没有一些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就难以取得进展。你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评价一些人、决定他们的用处和不足方面少犯错误。”

少校显然拨动了罗扎耶夫斯基的心弦，他焕发了笑容，而不是忧心忡忡。马蒂诺夫趁着这种融洽的时刻，便打听谢苗诺夫的情况。少校从容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呵，谢苗诺夫？当然，我用飞机把他送到赤塔，他在那里干得绝对出色。当然，我们占领大连时，他就到我们这边来了。在我送走他以前，他一直是自由的。对他怎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他毕竟是自愿回到祖国的。”

另外两个纳卡夫德官员互相看了一眼，对认为谢苗诺夫会发生什么问题的想法付之一笑。

马蒂诺夫仍然感到不满足，开始向少校打听涅察耶夫的命运，但是，帕特里基夫打断他的话，突然站起来宣布，时候不早了，大家都应该睡一会儿。然后，不动声色地随便问

白里透红的那位纳卡夫德官员：“古塞夫少校，明天飞，你准备好了吗？”

在这时，真相戳穿了，室内鸦雀无声。四个流亡者互相

凝视着，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无言以对，他们当中有三个人
的未来已经展现出来。古塞夫假装没有注意到对这句话的反
应，若无其事地回答帕特里基夫的问候说，只要天气好，他
就会飞。然后，他转向罗扎耶夫斯基，苦笑一下，补充说：
“今天晚上我们这样开诚布公地在一起聊一聊，我很高兴。
这将有助于我们互相更好地了解，并将为我们的对敌工作作
出贡献。”

帕特里基夫和特别行动队离开房间后，罗扎耶夫斯基立
刻沉浸在自我反省中。他的话说得不老练，已把自己置于不
利地位。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匆匆回屋去上床睡觉，闷头去
想他们自己的心事。马蒂诺夫留下来单独同他的前首脑在一
起，他敦促他不要回苏联去。现在还有时间把温度降下来。
他可以在当天夜晚离开那个大院。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
奇看着他的朋友，喃喃地说：

“不，大门已关了。我家里的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不
能让那种事情发生。”

1945年10月25日黎明时分，天空没有一点云彩，是飞行
的绝好天气。在大院里过了一夜的马蒂诺夫，发现罗扎耶夫
斯基在一个小圣像前祈祷。这位前警察巡官又一次想劝他改
变主意说，这是重新考虑的最后一个机会，也许是他活着留
下来的最后一个机会。罗扎耶夫斯基面带失眠倦色，眼泪挂
满两腮，左右摇晃着脑袋。然后他突然站起来拥抱着马蒂诺
夫。

在这当儿，古塞夫少校又来了。他不满地看着这两个人，
并且问罗扎耶夫斯基，行李是否打好了。现在是该去机场

的时候了。他们要飞到长春。古塞夫交给罗扎耶夫斯基一些文件，证明他是苏联中尉，是为了中国移民官员的事而出差的。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跟森任一样作好了准备。森任是那天早上才出场的，他在第二次改变主意后决定陪同他的首脑和战友一起走。

在马蒂诺夫问起罗扎耶夫斯基的最后目的地的時候，古塞夫少校回答说，他将从长春飞到伯力或海参崴，以“熟悉苏联的新闻业务”。经过一段时期的定向之后，也许会在他愿意居住的任何地方给他一份报馆或电台的工作。

他们迈步出门时，两辆汽车等在大院的入口处。罗扎耶夫斯基、戈尔采夫和米加诺夫同古塞夫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森任和两位纳卡夫德爬进了第二辆车。

帕特里基夫热情地向回国者道别，和每个人握手，祝愿他们旅途愉快，回到祖国后工作顺利。马蒂诺夫默默地站在一旁，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肯定这是他最后看一眼那个曾经预言要作为解放者回到俄国去的人。

汽车驶远了，帕特里基夫愉快地挥着手。这位外交官显得很高兴。他有很好的理由感到某种职业上的骄傲。连一点武力的痕迹也没有就使又一个苏联的危险敌人落了网。

马蒂诺夫匆匆说声“请原谅”就告辞，只身回到了天津。几天后，他听到谣传，说罗扎耶夫斯基从长春经赤塔飞到了莫斯科，被投入卢布莱扬卡，同谢苗若夫、弗拉舍夫斯基和巴克谢夫在一起。马蒂诺夫对来自苏联的谣言一般都要打个折扣。但是，有些迹象告诉他，这一回可是真的。

审 判

1946年8月26日晚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利赫上将召开了一次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乌尔利赫是执行斯大林命令的老手。20年来，他主持过对重大叛国案和反党集团的公开审判，其中包括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图哈切夫斯基、拉狄克和皮达科夫以及布哈林的公开审判。在30年代期间，他那圆胖的脸上，总是带着嘲讽的神情，显出一副龇牙咧嘴的鬼脸，初出茅庐的观察家还误以为他很诙谐。虽然世事多变，而他的职业一直是专门处决共产党人：老布尔什维克、红军将领和其他内部敌人。诚然，几个月以前，他已处理了一些抗拒解放的波兰人。但是，现在他和他的同事们又面对着一帮新罪犯：地道的反共分子，至少是前反共分子。《真理报》给他们贴的标签是“反苏白卫军组织和日本间谍的头目”。

那天晚上和其后三天，小小的审判庭被特许的观众挤得满满登登，这些观众是来看这一场非同寻常的特殊审判的。除了苏联的和外国的新闻记者外，还有几十位佩带勋章的将军和党政官员。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八个脸色苍白、衣衫褴褛的人身上，这八个人坐在两排椅子上，周围站着精锐卫队，枪头上安着明晃晃的刺刀。被告的年纪从35岁到73岁。其中有些简直是传奇式的人物，另外一些谁都不认识。国家检察官瓦维洛夫中将称他们为“谢苗诺夫分子”，但是，只有三个人属于这一范畴：这位哥萨克首领本人和他的两个副手——阿列克塞·普罗克洛维奇·巴克谢夫中将和列夫·菲

利波维奇·弗拉舍夫斯基少将。其余五个人中有两个是自己宣布的法西斯分子：俄国法西斯联盟的首脑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和他的秘书列夫·巴甫洛维奇·奥霍廷。来自满洲东部的保皇恐怖集团成员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普诺夫，1940年以来一直是罗扎耶夫斯基的死敌，那一年，他在满洲制造杀死24个俄国法西斯联盟战友的事件。伊万·安德里亚诺维奇·米哈依洛夫是前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鄂木斯克政府的财政部长(1919年)，在满洲当过日本军事情报处的顾问。最后，尼古拉伊·亚历山大罗维奇·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是个骑兵军官，国内战争时期在喀山对布尔什维克作战，打了大胜仗，其后一直在欧洲和东亚作游动记者。

这八个被告，一个一个地全都服罪，全都承认犯有反苏罪行：间谍活动、破坏活动、恐怖活动、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武装斗争。他们无一例外地承认当过日本间谍。有几人自告奋勇地说，他们还当过德国的间谍。

这次审判中的明星谢苗诺夫首先出庭作证。他的头上镶上了白发，他那众所周知的仁丹胡子也变白了。法庭需要听什么，这位哥萨克首领就向法庭说什么。他回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怎样领导哥萨克骑兵用马刀砍杀孤立无援的罢工工人；1917年时，他怎样策划在彼得格勒暗杀列宁；在内战时期，他怎样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拉起一支50000人的队伍，在整个外贝加尔地区到处烧毁村庄，枪杀被怀疑的布尔什维克。他逐渐谈到近年来的罪行，他证实，日本曾建议给他2000万日元，让他在苏联境内领导一次起义(由于给的钱

少，他拒绝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立了间谍学校，同关东军策划夺取俄国的亚洲领土。他结束他的话时表示对苏联战胜德国感到高兴。

巴克谢夫和弗拉舍夫斯基的证词，大半是同样的腔调。巴克谢夫回溯他的反苏罪行到1906年，那一年他就在哈尔滨使用暴力镇压革命者。这两个人都承认成立白卫军部队的罪行。谢普诺夫承认法庭宣布的罪行，但不承认反对一般流亡者的罪行。米哈依洛夫说，1941年日本人策划入侵西伯利亚前夕，他曾帮助日本人把间谍送进苏联。

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提供证词最为卖力，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他怎样为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制造反苏谣言”。乌尔利赫不满意这个被告只涉及到两个主子(也许他有一只眼睛盯着英美)，便插话打断乌赫托姆斯基的证词，他的插话，在法庭上没有人能不欣赏：

“除了日本人和德国人之外，你当然还从其他特务机构得到钱，但是，现在我们只对日本人和德国人感兴趣。”

这个亲王忏悔地点着头，然后当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潦草地书写时，他又补充了几句：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是我在大连被苏联当局逮捕的那一天。”

39岁的罗扎耶夫斯基和35岁的奥霍廷是最年轻的被告，他们俩都太年轻而没有参加内战。但是，罗扎耶夫斯基以近年来他的反苏活动的强烈程度来弥补这一不足之处。他承认，1925年他18岁时一进入满洲就当上了日本人的侦探；他同样由衷地叙述了俄国法西斯组织同荒木贞夫将军和小矶国

昭将军的联系。这位前首脑自称为“意识形态上的法西斯分子”，他叙述了党的制服、卐字徽章、党歌和党的敬礼方式。他告诉法庭他参加满洲事件、制造边境事件和办间谍学校的情况。他详细交代《我们的道路》和《民族》杂志如何诽谤苏联，并且宣称他既为日本人效劳，同样也为德国人服务。然而，他一点没有谈到他写给斯大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信件，更不用说他没有谈到他把斯大林看成是最伟大的俄国法西斯分子。然而，他却谈到了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是一个投靠美国的通敌者，而没有谈他们交往中的辛酸苦辣。

国家检察官瓦维洛夫唯恐法庭和观众认为，被告在夸大他们的罪行，便找来七个关东军军官作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秋草俊少将，他证实罗扎耶夫斯基曾经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日本特务”。

10月29日，上校助理检察官库尔奇茨基总结起诉的案件。于是，辩护律师第一次发言，他承认被告的罪行，但是，鉴于他愿意认罪，请求从轻判刑。然后，每个被告都说了几句，全都再一次认罪。只有谢苗诺夫请求宽大处理。

乌尔利赫同他的同事们仔细考虑之后宣布判决。所有的被告都犯有违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58条各款的罪行。“苏联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谢苗诺夫被判处绞刑，没收全部财产。罗扎耶夫斯基、巴克谢夫、弗拉舍夫斯基、谢普诺夫和米哈依洛夫被判处枪毙，没收全部财产。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和奥霍廷，“考虑到他们的反苏活动相对来说比较少”，分别判处20年和15年劳役，没收全部财产。

1946年8月30日，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终于尝到了

“摆在面前的伟大任务”。他同其他五个共同被告一起，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对手和一个私人死敌，在卢布莱扬卡被处决。

第二十章

演 变

维持空中楼阁要付出很大代价。

——爱德华·乔治·布尔沃—利顿

俄国法西斯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彻底湮没了，在德国遭到盖世太保的清算，在满洲遭到日本人的镇压，在美国遭到一个野心勃勃的检察官追逼得灭了顶，绝了迹。中东、澳大利亚和南美的支部由于没有人去维持和指挥很快就消亡了。少数几个有声望的俄国法西斯分子——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亚历山大·博洛托夫，可能还有波利斯·特德利——遭到了死于非命的下场。然而大多数战友和一个首脑在战后还继续活着，甚至生活得很富裕。他们的经历为人类在最不可靠的人生浮沉面前的复原力和适应性提供了意味深长的证明。

回 家

1937年，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曾经对在十九穴审查他

的联邦调查局人员说过，国民革命推翻了苏维埃政权之后，他也许不会在俄国停留多久，而是要回到汤普森来打高尔夫球。命运只满足了阿列克斯的一半要求，否定了他的国民革命，而允许他最终回到汤普森和昆纳蒂塞特高尔夫球场。

虽然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五年刑期要到1947年6月21日才满期，但是旺夏茨基由于表现良好而于1946年2月26日获得有条件的释放。他的监狱档案最后的记载说，该病人经三年零七个月的观察，未曾表现出有妄想狂或其他心理紊乱的迹象。他的苦恼是肉体上的疾病：肺纤维化、流行性感冒、齿龈感染以及留长头发（留长发是他自己的主意）。总的来说，他在禁闭期间曾作了“优秀的调整”以适应环境。

在释放旺夏茨基那天，看守长给他一张火车票，还送他几句临别忠告。由于是有条件的释放，旺夏茨基应该遵守一些规定。他不得离开康涅狄格州，他得定期向一个管理假释的官员汇报情况。他必须不参与政治活动。所有这三条限制，在他的刑期自然满期为止，一直有效。这最后一条限制其实没有必要。苏联军事上的胜利已使阿列克斯抛弃了关于国民革命的任何幻想，至少暂时使他对政治没有兴趣。

两天以后，阿列克斯到达普罗维登斯的联合车站。他身穿一套宽松合身的棕褐色衣服，看起来瘦了些、老了些。他的两颊苍白、凹陷，与战前的红润、丰满形成鲜明的对照。当马里恩和娜塔莎沿着站台向他跑来时，他惨淡地微笑着。他们含泪拥抱之后手挽手地步行到比尔特莫尔饭店去吃一顿热饭。《普罗维登斯晚报》的一个记者紧跟在后面，问阿纳斯

塔斯往后有什么打算。“我打算住在我的庄园里考虑我自己的事情，”这位伯爵不耐烦地回答。这显然不是记者们记忆中的那个人了。

阿纳斯塔斯在十九穴休息几天之后，开始恢复了一些旧日的热忱。他的最初计划之一是收集有关他从监狱获释的剪报。

阿列克斯仍然还面临着一个法律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关系重大。康涅狄格州地区检察官约瑟夫·库尼曾于1942年向在哈特福德的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提出一份请求书，要求剥夺旺夏茨基的美国国籍。马里恩聘请的律师阿瑟·康特里曼曾向法院申诉，请求不要同意库尼的请求。旺夏茨基有条件释放时，联邦法官卡罗尔·欣克斯还在考虑这个案件。只是在1946年4月3日欣克斯作了完全有利于旺夏茨基的裁决，阿列克斯才松了一口气，安下心来，因为他知道，他再也没有被驱逐到苏联去遭受什库罗、谢苗诺夫和罗扎耶夫斯基那种命运的危险了。

除了又一次回到家中保住了美国国籍之外，旺夏茨基便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了。他发现他自己在汤普森和帕特南受到排斥。有一回甚至老朋友们都回避他，躲躲闪闪不接受他的打高尔夫球的邀请。伯爵的单身孤影成了昆纳蒂塞特高尔夫球场上常见的景象。除了马里恩、娜塔莎和列夫·贝克外，只有他的老理发师奥兰多没有让他的丢脸之事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不过奥兰多的理发店在普罗维登斯，从而暂时还在旺夏茨基的活动的范围之外。

1947年6月21日，旺夏茨基庆祝他的刑期届满，就像一

只笼中的野鸟突然面临着开阔的天空一样。他首先飞到好莱坞，然后飞到旧金山。那位神秘的“泷太夫人”是否在加利福尼亚等他还不得而知，但是，这位伯爵被抑制的精力找不到政治上的出路，很快就滑进色情的沟渠里去。阿列克斯在旧金山接受《新俄罗斯言论》记者的访问时，叹息说：“我为俄国流亡者背了十字架。”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马里恩曾经为阿列克斯背过十字架——并且还在继续为他背十字架——而他却扮演了俄罗斯浪荡公子的角色。

汤普森的人们至今还在谈论着关于旺夏茨基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混杂着事实和传闻，把这位伯爵刻画为在两性生活方面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而不是对美国安全构成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战后不久豪一马罗特女子学校就关闭了，表面上是由于一场火灾而关闭的，但是，当地的流言蜚语却把学校的关闭归因于这位伯爵色情狂的蹂躏。人们窃窃私议着阿列克斯如何同放荡的女人私奔，然后又写信给马里恩说：“汇点钱给我，我要回家。”或者议论他如何在纽约旅馆里玩妓女，然后把帐单寄给马里恩。还有些人说，马里恩不仅不反对诸如此类的乌七八糟的事情，而且实际上还替丈夫支付帐单，为他提供一幢小型别墅，让他在那里同别的女人幽会，抚育他的私生子。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多数都是出自言过其实的想像，都是富于幻想的夸饰之谈。不过，即使对更多的放荡情节打个折扣，不完全信以为真，但是阿纳斯塔斯的确继续对女性表现了持续不倦的兴趣。马里恩年已70，除了给他些钱，给他一些谅解之外，已不能提供什么他所寻求的别的东西了。

1948年早些时候，阿纳斯塔斯终于找到一个在情欲上为自己始料所不及、可以同自己媲美的女人。他遇到这个女人的地点不是纽约，也不是旧金山，而是这样一个城市：单是它的名字就肯定会使他的心跳得更快。这个城市就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

佛罗里达的黄昏

1947年晚些时候，列夫和娜塔莎·马梅多夫关闭了俄国熊餐馆，迁移到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他们俩都被那里的气候所吸引，按娜塔莎说，还受那个城市的名字所吸引。1948年早些时候，阿列克斯在访问马梅多夫一家时，与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的饭馆女店主邂逅相遇。这位女店主名叫伊迪丝·普里西拉·罗伊斯特，身高五呎七吋，体重133磅，金色头发，灰色眼睛，是个天生的美人。他们俩年龄的差数（她24，他刚好近50）超过阿列克斯和马里恩间的年龄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由初步相识发展到亲密无间。他爱称她为“甜密的天空”；她称他为“国民”，这也许是完全出于头脑简单。

那年秋天，阿列克斯把普里西拉带到北面来住在离十九穴不远的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弗里茨·库恩1939年“暴动”的地方）。不久，汤普森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韦伯斯特的红发女人”，但是，马里恩还是泰然自若，也许她尝到了命运嘲弄的滋味：她的第一个丈夫和第二个丈夫搞的女人都叫普里西拉。

1949年晚些时候，普里西拉发现她怀孕了，永存不朽的

三角关系失去了地理上的内聚力。阿列克斯匆匆忙忙地把她迁回圣彼得堡，1950年7月2日，她在那里生了个男孩：安德烈·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小安德烈不光是继承了他祖父的第一名字，他前额上有一个胎记，阿列克斯说，那是40年前安德烈伊·尼古拉耶维奇上校被枪击中的地方。

安德烈的降生构成离婚的理由，可能已使阿列克斯同马里恩的关系复杂化。过去是否发生过合法分居，是一个被互相矛盾的证据弄得模糊不清的问题。马里恩的侄儿约翰·赖特森·里姆声称，他的姑母同阿纳斯塔斯的离婚，1952年5月22日就已“生效”了。然而，处理过马里恩的许多法律事务的帕特南律师欧文·迈伦坚持说，从来没有发生过离婚之事。欧文·迈伦的意见得到一个从前在十九穴干活的家务仆人的证实，也得到汤普森的一个居民的证实，这个人阿纳斯塔斯和马里恩双方都很熟悉。

虽然阿列克斯和普里西拉是否结婚了还完全不清楚，但是，普里西拉终于取得阿列克斯的姓。如果阿列克斯同普里西拉结婚而不同马里恩离婚，他就很可能遭到柳巴·穆罗姆斯基的幻影的折磨，穆罗姆斯基会重新露面控告他不单是重婚，而且是百分之百的一夫多妻。

暂且不谈法律上的微妙之处，旺夏茨基毕其有生之年，继续同马里恩和普里西拉双方深深相爱。马里恩独具特色地不让另一个女人的出现损害她自己对她从福利斯一贝热雷救出来的那个可爱的俄国人的感情。她很喜欢小安德烈。50年代期间和60年代初，无论什么时候阿纳斯塔斯和他的儿子来

到十九穴(他们的访问好像是定期的,经常的),总是受到“马里恩大姨”的热情欢迎。

阿列克斯虽然是在一个被老年人视为向往的圣地的城市里度过他的垂暮之年,但是,他决不是在那里坐冷板凳,无所事事;他始终有些计划在筹备中,并且始终注视着创造丰功伟绩的机会。1949年,他向职业打牌行家奥斯瓦德·雅各比挑战,要求以5000美元为赌注作卡纳斯塔牌比赛(这次比赛始终没有进行),从而赢得了声望。两年后,他招待了达迪亚尼亲王夫妇。他们是格鲁吉亚的王族,与利奥尼达·巴格拉蒂昂大公夫人有亲戚关系,而这位大公夫人是觊觎沙皇宝座的弗拉季米尔大公(已故圣布赖亚克的特权人物西里尔大公的儿子)的妻子。《圣彼得堡独立报》对这次招待描写得有声有色。1956年,旺夏茨基站在一个码头上,对靠在码头上的苏联船舶的船员发表了演说。《圣彼得堡独立报》问他是否认为他留下了什么印象,他表示他仍保持他旧日的一些感触:“他们假装不听我的讲话,但是,我看见船员们通过舷窗默默地向我喝彩。”

1953年,旺夏茨基为他战后最富有雄心的事业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就是圣彼得堡的尼古拉二世沙皇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夸张,因为仅仅是在北区第5大道的一幢小房子里展出几件从十九穴的军事室弄来的纪念品,但是,旺夏茨基从来不是否认自己有点夸张的那种人。博物馆开幕的时间刚好同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250周年的日子相吻合,使阿列克斯高兴的是,当地报纸对这件事作了很好的报道。在尊荣的地方挂着尼古拉二世的肖像,这张肖像据说

曾经使帝俄驻法大使馆蓬荜增辉。同时展出的还有硬纸壳做的军服肩章，从衣服上剪下来涂上原来的颜色；还有一些贵族和将军的画像，以及一封装在镜框里的信，这是最后一个沙皇写给军事学校学生的。枪架上并排摆着45只旧式的雷明顿和威斯汀豪斯步枪，也就是20年前曾用来装点十九穴军事室的那些武器。

旺夏茨基在圣彼得堡也开始舞文弄墨。他本来是一个对有关俄国的任何东西都狼吞虎咽的读者，现在他也向诸如《新霞光》、《我们的时代》和《鞭子》之类的流亡者报刊投寄一些关于历史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文章。他的稿子偶然也在《圣彼得堡独立报》上发表，其中有一篇把苏联纳卡夫德同盖世太保相比较。旺夏茨基现在是个热心的君主主义者，从来不说他一度是自封的法西斯首脑。

1960年，旺夏茨基对他的一些回忆录提取其精华，纳入一本题为《因果报应》的书里，在圣保罗出版。这本书的很大篇幅用来分类罗列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破坏反苏事业的个人和团体，日本政府就是其中之一。旺夏茨基认为，日本由于十分冷漠无情地对待满洲的白俄，因而失去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然而，《因果报应》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托马斯·多德。旺夏茨基直率地称罗斯福为共产主义者。^①要不然这位已故总统为什么要替斯大林做那么多的事

① 旺夏茨基对罗斯福的情绪十分强烈，以致他拒绝使用带有总统头像的一角银币。

——原注

情呢？多德引起的怨气更为强烈，因为到1960年，这位从前的检察官已成了来自康涅狄格的美国参议员，他对右翼集团作讲演，不断猛烈抨击苏联，享有大喊大嚷的反共分子的名声。1959年7月17日，多德在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认为俄国人民“遭到奴役”，敦促美国支持苏联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多德的这种表示以及他一般的反共活动，在旺夏茨基看来只不过是机会主义地故作姿态。他在《因果报应》中问道，多德为什么在罗斯福政府期间十分积极地起诉反共人士，而在50年代又对麦卡锡鹦鹉学舌？阿列克斯回答他自己的问题：决定多德的行为的是政治野心而不是原则。旺夏茨基永远不会忘记多德，不单是因为多德把他送进了监狱，而且还因为多德踩在他身上往上爬。

不管旺夏茨基在公开场合是多么全神贯注于俄国，但是他的私生活却是以家庭和世俗的乐趣为中心。在他公园北街家中墙上贴着一个横条，上面写着“在本室内休谈政治和宗教”。在这信条下，阿列克斯得到列夫和娜塔莎的热情陪伴，感到极为舒服。他无限喜爱小安德烈；他以有了自己的儿子而充满骄傲。列夫和娜塔莎也很钟爱安德烈；安德烈的出现填补了他们自己的儿子于1941年在英国皇家空军中死去后所留下的真空。旺夏茨基经常带着安德烈过日子，因为普里西拉是个闲不住的人物，没有时间呆在家里。父子俩睡在同一间屋里，接待一批共同的朋友，建立一笔共同热心的事业基金。当安德烈要求他父亲上床睡觉时，阿纳斯塔斯假装抱怨一番，又假装去睡觉，等到儿子昏昏睡去，他又蹑着脚走出卧室，坐在走廊上的桌子旁，全神贯注地写文章，或者

把有关他本人的剪报材料粘贴到剪报册里。^①1961年7月2日，安德烈11岁生日，他的父亲给他一只22口径步枪，一瓶威士忌和一盒香烟，并且对他说，现在是你初次尝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了，但是必须在有监督之下进行尝试，以免对它们迷恋成瘾。

和成千上万其他美国人一样，在50年代，电视占据了旺夏茨基的闲暇时间。他憎恶战争影片，战争影片引起他对俄国内战的痛苦回忆；他憎恶棒球，在斯普林菲尔德他曾被迫去听棒球广播。但是，足球从来没有被他放松。他在别的方面都很放纵安德烈，但是，电视播放足球比赛时，连安德烈也受到严格的命令，不准在电视屏幕前走过，除非用四肢在地上爬着过去。阿列克斯以旧日的那种热情选看他的母校布朗大学的橄榄球赛，但是，门柱削片纪念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吉纳·洛略布里吉达几乎同足球一样使旺夏茨基着迷，每当她同托尼·柯蒂斯和伯特·兰开斯特出现在杂技吊架上时，他实际上总是要上那个剧场去看她的杂技表演。

阿纳斯塔斯继续去看望马里恩，地点或者是十九穴，或者是她在图森的冬季别墅（在科顿伍德—博列法德250号；

① 旺夏茨基收集了大量有关他自己的剪报。他把这些剪报按年月顺序编排，贴在剪报册里，共贴了28本剪报册，每本都有110页左右。收集的剪报从1910年华沙报纸宣布他的父亲被暗杀起，历经《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与马里恩结婚，柳巴·穆罗姆斯基的重婚案，宾夕法尼亚的无产阶级叙事诗，超速行车传票，罗曼诺夫的访问，环球旅行，全俄法西斯组织和全俄国民革命党的活动，汤普森的蠢事，七拼八凑的旺夏茨基逸闻轶事，哈特福德的起诉，入狱，释放以及战后的活动。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剪报都有，但没有《法西斯主义者》、《我们的道路》或《民族》等的剪报。 一原注

1957年她80岁生日之后，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马里恩由于关节炎而走路一瘸一拐，两耳实际已经聋了，有好几个仆人侍候她。虽然里姆家族和家族里大多数雇用人员都不满意旺夏茨基的来访，但是马里恩显然继续爱着他。

阿纳斯塔斯长期持续地依附于马里恩，这里面是否有金钱方面的考虑？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的确对这个老太太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四十多年来，她一直是他忠实的配偶和支持者。不过，阿纳斯塔斯并没有让自己对她的爱情妨碍向她要钱。在阿纳斯塔斯1960年3月20日写给马里恩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心上人，我把你紧紧抱在怀里”，并且接着说，他需要一笔钱来给安德烈医治流感。马里恩好像并没有拒绝这些要求。这样作与她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不过她的收入容许她轻而易举地支付这些开支。^①

随着马里恩的年龄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虚弱，阿纳斯塔斯有理由考虑财产继承问题。她的收入多数显然是来自托管财产的所有权，但是，马里恩在她自己的所有权内也拥有很多财产^②。马里恩于1958年立了遗嘱，她在遗嘱中遗赠马梅多夫夫妇5,000美元，为安德烈建立12,000美元的托管财

① 根据在十九穴鸡舍下面发现的、现在已存放在普罗维登斯学院的里姆一赖特公司的财务报表，单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4月的一笔帐来看，马里恩的收入总计为134,327.52美元。——原注

② 她的财产不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多。遗嘱检验法庭认为她的财产为1,258,695美元。这包括1,042,949美元的债券，122,150美元的不动产，52,154美元的现金，39,242美元已交付拍卖的资产，以及两辆汽车，合计2,200美元。当然托管的财产不在内。美国报界在不同时期估计马里恩的财产为700万到6亿美元之间。——原注

产，但是遗嘱中没有给阿纳斯塔斯的遗赠。不过，1963年4月10日（有人说是在阿列克斯到亚利桑那看望她之后），她对1958年立的遗嘱又增添一项附录，留给旺夏茨基25,000美元的遗赠。

1963年11月11日，死神在图森降临马里恩。她享年86岁。在她的文件中有一张尚未签字的纽约化学银行信托公司的支票，是开给希尔顿信贷公司的，日期为1963年6月12日，金额为222.49美元；这个数字刚好是希尔顿公司将要求阿列克斯偿还之数的一半；这笔钱是普里西拉·旺夏茨基在空白信用卡上签名带来的未偿债务。

马里恩的遗物从图森运到帕特南，并送到西汤普森公墓以便葬入“旺夏茨基陵墓”。阿列克斯、列夫和娜塔莎都从圣彼得堡赶来参加葬礼。“妈妈的”棺材轻轻地抬进地下墓室，滑到对着多纳特·孔尔的棺材的地方，这时伯爵不顾身份体面地嚎啕痛哭。

1964年4月24日，马里恩的浮财在十九穴拍卖。阿列克斯孤独地坐着，不为投标的人们所注意，眼看着充满纪念意义的东西一件接一件地被卖掉、被夺走，其中有绘画、美国初期殖民地时代的家具、中国铜器、珠宝和一座旧式飞机推进器的速度表，这个速度表曾经装饰过军事室。《法西斯主义者》的印刷机也展出拍卖，但是没有谁要买它，因此它只好继续放在鸡舍里听任生锈、腐蚀。阿列克斯缺现钱（马里恩的金钱遗赠直到五个月以后才分配给他），否则他很可能出价把它买下来。相反，这个65岁的老人只是静坐着，沉思着，回味着欢乐时刻的那些残篇断片。

拍卖后四天，4月28日，已在旺夏茨基陵墓中安息了23年的多纳特·孔尔的遗骨由一个承办丧葬的人迁往50英尺以外的地方，在那里以一块小木牌做标志。但是，那个地点很快就草木丛生了。据说是阿列克斯吩咐作这次移灵挪棺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尽管不乏种种推测。昆纳蒂塞特俱乐部的看门老人汤姆·沃森以为，挪出孔尔“是给普里西拉腾地方”。但是在1964年的时候，普里西拉还是个年轻、健壮的女人。此外，那个墓室有容纳六个人的遗骸的地方。那位不朽夫人的丈夫旺夏茨基能够不忌妒只有孔尔和“妈妈”两人在那里而没有别人伴随吗？

阿列克斯于1964年9月得到马里恩的遗产中25000美元的份额时，开始作旅游欧洲的计划。他要把安德烈带到伦敦、罗马和巴黎。自从30年代以来，就没有见到过诸如尼基塔亲王和西奥多亲王等朋友了；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儿子该是多么自豪呵。等到安德烈在海军上将法拉格特军事学院念完了上学期后，父子俩马上就动身。

旺夏茨基的这个旅游计划始终没有实现。1965年2月4日晚上，他邀请列夫和娜塔莎到圣彼得堡南边的格尔夫波特小型别墅去俯瞰坦帕湾。晚饭时他们三人吃光了一只小烤猪。上床就寝后，阿列克斯突然感到胸部刺痛。这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他匆忙赶到蒙德公园医院，第二天上午8点45分就死了。那时他66岁。佛罗里达州的死亡证上认定他是“自由撰稿作家”，从1920年到1937年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服役。他的遗体于2月7日运到汤普森、安放在墓室里，刚好在马里恩的下手边。

旺夏茨基如果知道他的死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真的会大感失望。《纽约时报》没有刊登讣告。只有诺沃克的《康涅狄格先驱报》宣布了他的离去。该报用了一个充满错误的标题，以使人们想起30年代的旺夏茨基的逸闻轶事，标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间谍在其汤普森家中死去。

阿列克斯死后不久，他的家人大多数也跟着死去。列夫·马梅多夫于1966年2月12日心脏病突发身亡。普里西拉于1966年3月25日死于胰腺炎，和马里恩、阿列克斯一起葬在旺夏茨基陵墓。娜塔莎因心脏衰竭死于1968年9月9日。

留下孤单单的安德烈交给养父母照管。安德烈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几件纪念品：一个木头盾牌，一张装在镜框里的尼古拉二世肖像，28本剪报册和一本日记。^①安德烈在圣彼得堡银行保险库的箱子里发现了这本日记。他打开日记，看见横贯扉页写着：“生活在玫瑰花间，生活在红颜色里。”安德烈还发现他父亲亲笔写的一个便条，命令他把日记烧毁，他遵命照办了。

他们如今在哪里？

罗扎耶夫斯基在1946年被枪毙了，旺夏茨基于1965年死于血栓形成，但是，他们的追随者、恩主和朋友们又怎样了呢？从前的战友们已隐匿行踪，难以找到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① 阿纳斯塔斯曾于1939年告诉记者，他有一本日记，打算死后出版，这可能就是那本日记。

——原注

罗扎耶夫斯基在远东的追随者大多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回到了苏联。列夫·奥霍廷被判15年徒刑，服刑两年后于1948年死去。米哈依尔·马特科夫斯基于1946年离开了满洲，从那以后就没有人看见过他或听见他的消息。马特科夫斯基的同伙全都判了徒刑。塞盖·拉兹耶夫和弗拉季米尔·基巴丁在按刑法第58条判处徒刑后，死于伯力地区的劳动营里。博里斯·鲁缅采夫和根纳迪·塔拉达诺夫于1947年11月登上苏联遣返船果戈理号回到祖国后，也走向劳动营。但是，塔拉达诺夫于1949年被放出来，以便他为《祖国之声》贡献他的记者才华。《祖国之声》是以仍然留在国外的流亡者为对象的苏联刊物。弗拉季米尔·米加诺夫是个激烈的反犹分子，他随罗扎耶夫斯基之后回到苏联，与从前哈尔滨犹太人社会的领袖亚伯拉罕·约西福维奇·考夫曼博士共享古拉格劳动营风味而了结残生。

17 一小撮战友在饱经沧桑之后，设法来到美国。《我们的道路》的记者伊利奥多尔·卡劳赫和俄国法西斯联盟的骑兵阿纳托利·斯克里普金住在旧金山。全俄法西斯党的诗人尼古拉·佩特林于1943年移居东京，在俄语广播节目中当播音员，为日本人工作。战后，他从1950年起为美军当译员，直到1963年他在冲绳岛上经营了一个船运公司的分公司为止。1963年，尼古拉（现在叫尼古拉斯）同他的妻子（从前的罗扎耶夫斯基太太）定居于旧金山，现在还住在那里。

在欧洲的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战友，为数不多，或者死了，或者隐匿行踪，全都销声敛迹了。波里斯·特德利1942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特德利

的同伙在那同时也当作苏联间谍而被搜捕了去，大概也被处决了。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格罗特的最后一次消息是1941年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听到的。如果他还活着，他是否还在那里就不得而知了。

罗扎耶夫斯基的家人分散在美国和苏联。他的弟弟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罗维奇于1945年回到苏联，受到短期拘留(尽管他没有参与法西斯运动)，今天他已接近退休年龄，将从他在一个化妆品工厂的职位上退下来。他的妹妹纳杰兹达据说仍然住在莫斯科附近。

罗扎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妻子涅昂尼娜经过一些沧桑后，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美国。1945年8月13日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从哈尔滨逃跑时，她带着小奥尔加和弗拉季米尔孤零零地留了下来。她在哈尔滨一直呆到1952年。她恢复了姑娘时的名字娅莉谢娃，以保护自己和她的孩子。苏联占领满洲一直持续到1946年4月；1946年和1947年中国内战在哈尔滨周围打得很激烈，国民党试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取松花江北岸，但是没有成功。涅昂尼娜不仅在苏联占领期间一直住在哈尔滨，而且在中国内战期间也一直住在那里。1952年她设法弄到移入巴西的证件。在南美住了十年后，她和孩子们(那时已成年了)移居旧金山，并取得了美国国籍。一旦到了美国，他们感到很安全，可以再用罗扎耶夫斯基的名字过日子了。涅昂尼娜在海斯街歌剧院附近开了一家俄国餐馆，名叫“歌剧”。1974年，她离开旧金山，在萨克拉门托另外开了一家餐馆，叫“哥萨克”。奥尔加和弗拉季米尔还住在旧金山。

在旺夏茨基的战友中，只有尊敬的亚历山大·朱格列维

奇牧师可以略加说明。1977年时，他病得很严重，在曼哈顿一家小型疗养所里顽强地活着。全俄国民革命党的其他官员仍然还活着的（西门斯、范茨、诺沃兹希洛夫、杜姆巴泽、萨文、甘塔毛拉）也都隐匿行踪，无声无息——也许他们非常感谢这种情况。

旺夏茨基的贵族朋友几乎全都比他活得久。西奥多·罗曼诺夫亲王于1968年在比亚里茨去世，生前从事建筑师职业。尼基塔亲王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美军语言学校教俄语，退休后住在公园大道的一套公寓房子里，1974年死于法国戛纳。他的儿子尼基塔·尼基蒂维奇孩提时曾写信给旺夏茨基说，他要是成为一名俄国法西斯分子该是多么快活；但是，他成了一个伯克利训练出来的俄国历史学家、1975年出版的伊凡雷帝的传记的作者之一（另一作者是罗伯特·佩恩）。这本传记很受欢迎。亚历山大大公的最小儿子瓦西里亲王定居在旧金山。

安德烈·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成长为一个高大的漂亮青年，面貌酷像他的父亲。1976年毕业于南佛罗里达大学，已结婚，继续在韦克—福雷斯特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

马里恩的弟弟们全都谢世了。罗伯特·克拉克·里姆于1957年去世，留下他的儿子约翰·赖特森·里姆担当马里恩遗嘱的执行人。路易斯·马歇尔·里姆死于1970年。

死神也夺走了伯爵在汤普森的亲密朋友。乔治·康内尔、里查德·麦考利、史蒂夫·罗沙克、詹姆士·巴克以及戴维·谢里全都作了古人。他们的墓碑就像孔尔的墓碑那样星星点点地淹没在旺夏茨基坟墓周围的青草丛中。首脑从前

的秘书诺曼·沃森现在住在哈特福德，是个退休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官员罗斯·厄克特和埃尔顿·诺兰也退休了。沃森、厄克特和诺兰也许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在大陪审团关于旺夏茨基的听证会上遭到托马斯·多德的盘问。甚至在战后，多德还利用厄克特同旺夏茨基的友谊作为政治上的弹药，于1949年攻击康涅狄格州警察局长爱德华·希基，说他没有惩戒他的下属向一个法西斯分子告贷。

但是多德也尝到了自己的丑闻的滋味。1966年1月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和杰克·安德森引证多德的助手给他们的文件，谴责这位康涅狄格参议员为私人目的而挪用竞选基金、给政府开双份帐单、接受公司的可疑付款、利用一次公费的欧洲旅游^①施惠于西德公共关系代理人尤利乌斯·克莱因。经参议院道德委员会调查之后，参议院于1967年6月23日以92票对4票对多德投了不信任票，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五个参议员受到过这种谴责。旺夏茨基没有活着亲眼目睹他的难以对付的对手的这桩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他也许会感到一种同情的悲痛。托马斯·多德死于1971年，死前十分潦倒。

哈尔滨是俄国法西斯运动竞争中心之一，那么哈尔滨的情况又怎样呢？1945年时哈尔滨有白俄50000人，1973年留下来的不到100人。大约有一半白俄回到苏联去了，其余的

① 1964年4月多德访问德国的公务是去接见一个苏联的叛逃者、被控的杀人犯、自己招认的克格勃暗杀流亡者小分队的前成员鲍格丹·斯塔申斯基。

——原注

移居澳大利亚和巴西，剩下的只是那些身体太虚弱不能长途跋涉的，或者是那些宁愿在松花江畔了此残生的。但是俄国的影响还确实有其痕迹：绿色圆顶的东正教大教堂（现在常用来存放家俱）、装饰着雕花屋檐的木头房子、大鹅卵石的道路以及当地饭馆菜谱上的罗宋汤。有一些俄式建筑，包括一些教堂，据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而被毁了。根据一项未经核实的报道，哈尔滨的俄国人公墓（它把道里和南岗分开）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变成了一个公园。

在世界的另一边，事物的延续和变迁在温得哈姆县交织在一起。第52线州际公路是连接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高速公路的四股道公路，它通过帕特南和汤普森之间缓慢倾斜的谷地。汤普森也许是因为没有直接通往第52线公路的途径，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宁静的新英格兰村庄，如今既然旺夏茨基已不复存在了，它可能更宁静了。里姆家族也不复存在了，但是，托马斯·多德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多德在众议院代表帕特南和汤普森。

过去叫做俄国熊的房子，现在空空如也，成了颓败失修的家宅。野草长满了一度是清一色的玫瑰花园；有毒的毛茛紧贴在石头墙周围。建筑物增加了一些，这说明自1947年列夫和娜塔莎将餐馆停业以来，这房屋产权已数易其主。俄国熊餐馆最近几年用来作了一家礼品店和一个白天野营地。这里那里到处都有指路标牌和警告标志，这使人回想起繁荣的过去。窗板上仍然还有雕刻的熊的形象。在附近的牲口棚里，有一块木板招贴画，画的是一头神气活现的熊在一架钢琴残骸下面翻身跃起。1974年这房产要出卖时，房地产经纪

人与安德烈·旺夏茨基联系，希望他能步他姑父、姑母的后尘，但是，他没有那样作。

循“县中心路”而上，那高尔夫球场就是昆纳蒂塞特乡村俱乐部。路对面，昆纳蒂塞特农庄(十九穴)已被分割。中心建筑已慷慨地被划为少年体育运动营地，叫做科伊诺尼亚体育学校。主要的农庄房舍已划分成一个一个的出租单元。石头的附属建筑物看起来同30年代时的情况一样，但是，它的内部已有所革新。过去的军事室，现在是娱乐区。阿列克斯从前的办公室成了卧室，孔尔的办公室成了洗澡间。经改装后用来存放《法西斯主义者》印刷机的鸡舍已重新改装为女子宿舍。一个有围栏围着的宽阔草地，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四条腿的法西斯分子曾在这里欢腾跳跃，现在成了停车场。伯爵和他的客人进行近距离打靶、射击斯大林和贝利亚肖像的牛奶场，已改造成标准规格的室内游泳池，配上淋浴室和存衣室，设备很完善。

在所有这些变迁中，旺夏茨基的阴魂久久游荡不散，突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改造石头附属建筑物时，工人们扯下一块天花板，突然一些子弹夹、各种各样子弹和一把刺刀掉下来打在他们身上。后来，在改造鸡舍时，又从鸡舍下面挖出四个敷满鸡粪的柳条箱。一个柳条箱装的是马里恩私人文件。第二个柳条箱装的是尼古拉二世和各个白军部队的照片。第三个柳条箱塞满了苏联的地图，地图上画了有色箭头和圆圈，看起来好像是入侵路线。第四个柳条箱装了全俄国民革命党的一些小册子和一些78转唱片，其中有罗伯特·胡佛1928年接受共和党提名他为总统

候选人时发表演说的录音片，有埃莉诺·罗斯福谈火腿三明治的录音片，有旺夏茨基、孔尔和马梅多夫三重唱改成俄文的《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的录音片，由几只单簧管、变调长号和双重低音乐器轻快地伴奏。

这些发现改变了昆纳蒂塞特农庄的新主人们对他们的房产的不寻常的背景的看法。但是，他们在埋在工具棚地下的一个废弃木箱里面所发现的东西却没有作好思想准备。他们撬開箱盖时，看见一具保存完好的一丝不挂的人体。他们震惊了几秒钟后才认出来，他们看见的不是尸体，而是作时装模特儿的人体模型。1942年5月9日，联邦调查局剥光了它的打了孔的厚大衣，30年来它一直在这里暗中藏羞。

伯爵的一个更为经久不朽的纪念碑立于西汤普森公墓之中：一座松柏掩映的牢固的花岗石建筑物。阿纳斯塔斯·安德烈维奇·旺夏茨基在那里有老朋友们在其周围，有孔尔忠实地陪伴着，安睡在马里恩和普里西拉身旁：他漂浮在永生之中了。在墓室远端有色玻璃窗那边，圣母玛利亚和圣婴耶稣基督在一处石刻铭文的上方天使般地翱翔，这个铭文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会衷心认可的，这铭文是：

愿 彼 安 息

事后分析

既然俄国法西斯运动已经死亡并且埋葬一个世代了，那么估量一下这个运动以有利于对历史作事后的认识，现在正是其时。

在卷帙浩繁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中，却不见有关于俄国版法西斯主义的著作，这是引人注目的。这是由于俄国法西斯的经验不大重要或者根本不重要吗？不，不是的。俄国法西斯主义遭到忽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显然缺乏文字资料，二是那些直接了解情况的人受到压制，有紧张感。

由于俄国流亡者散居的范围很广，俄国法西斯运动就需要作全球性的探讨，这样提出来的问题就不只限于一个国家领域内法西斯运动所遇到的问题。此外，各种资料来源在地理上很分散，在语文上也各不相同，并且苏联的档案资料还拿不到手。最后，流亡者和苏联人双方都不愿意引起人们注意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变种——显然各有不同的原因。

对俄国法西斯分子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①已导致第二

① 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欧文·奥伯兰德所写的《全俄法西斯党》（《当代历史杂志》1966年第一期，第158—173页）。——原注

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著作和西方著作中的一些错误理解和错误表述。康士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和阿纳斯塔斯·旺夏茨基都被打上德国和日本的奴才的烙印。在罗扎耶夫斯基和日本的关系上，这样说也许有部分的正确性，但是，应用到旺夏茨基身上就是极大的歪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三十多年了，旺夏茨基的逸闻轶事在美国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这情况同1942年在佩利彭科的魔触下为人们津津乐道差不多。在一篇题为《反对不忠之战》的通俗杂文中，纳撒尼尔·韦尔描绘旺夏茨基的代理人把美国军事机密偷运到墨西哥沿岸的一艘日本潜艇，以拔高佩利彭科的形像。有个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的间谍迷在他1971年出版的关于德国人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畅销书《狐狸的花招》中，想方设法地把旺夏茨基说成是纳粹操纵的“乌克兰人的全球性阴谋”的头目。法拉戈暗示，旺夏茨基的“乌克兰人地下组织”对40起“神秘的故事和灾难”分担责任，这40起事故和灾难是1941年1月到12月之间在美国全国各地发生的，其中包括一次爆炸事件，那次爆炸炸毁了阿拉斯加的加邦斯基岛上的海空新基地（与佩利彭科相呼应？）。甚至像谢尔登·马库斯的《库格林神父》这样一本严肃的著作，也给伯爵插上“纳粹特务”的标签（也许是因为佩利彭科在脚注里搞了鬼）。

剥开这些神话，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是两个自私自利的梦想家，他们的装腔作势很可笑，他们易受责难的脆弱性很可怜，他们欲为其所不能为很可悲。1974年，涅昂尼娜·娅莉谢娃把她的亡夫说成是爱国者。毫无疑问，罗扎耶

夫斯基和旺夏茨基都觉得他们自己是爱国者。但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乃出自基于时代错误和痴心妄想的个人幻梦。罗扎耶夫斯基没有看见苏联民族上的多样性，而只看见俄罗斯，这些俄罗斯人大概和他一样信奉东正教，和他一样憎恨国际主义，和他一样厌恶阶级斗争，并且和他一样持反犹态度。旺夏茨基假定，将有某种神秘的民众意志自动地涌现出来，借助于外国入侵者的援助，消灭苏联的人民委员，把法西斯流亡者作为全国领袖供奉起来。由于这种情况在一般流亡者听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两位首脑都不能单靠意识形态吸引到很多追随者。罗扎耶夫斯基利用在满洲的白俄青年的孤独的感觉、贫穷的现实和不安定的生活，并且靠许诺给予好处(据说这些好处大概会从日本主子那里得到)的办法建立了一个党。旺夏茨基则通过个人资质、怀乡病和津贴三者相结合——大半是津贴——收罗了一小撮内战老兵和食客。

对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的性格特点的最精确的刻划乃出自一般俄国流亡者之口。从前哈尔滨的居民、现在旧金山俄国文化博物馆主任尼古拉斯·斯洛博奇科夫恰当地把罗扎耶夫斯基描述为“自负、轻信、愚蠢——但不是罪犯”。如果再加上罗扎耶夫斯基搞错了方向的爱国主义，那么，这个性格特点就比诸如“日本的间谍”、“土匪”、“杀人犯”之类的陈腐标签要可信些，而那些陈腐标签在西方作品和苏联作品中都常见到。美国的俄国贵族联合会会长、旺夏茨基的朋友阿列克西斯·谢尔巴托夫亲王说：“阿列克斯要是在15世纪的意大利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雇佣军队长。他把显示勇气的举动和假装吓人的举动十分完美地结合起来。”他这样也算

是抓住了阿纳斯塔斯·安德烈维奇性格的根本特点。

回顾往事，看来旺夏茨基的“出色演技和装腔作势”似乎使别人有机会陶醉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这也算是对人类的乐趣作出了一些贡献。要是没有他，美国《工人日报》在别的什么地方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怪物？要是没有他，谁能给托马斯·多德提供一个德国—日本大间谍，或者给迪克斯坦众议员提供康涅狄格州境内的50000俄国法西斯分子，从而使这两个人英雄地上升到保卫美国利益的高位？要是没有他，谁能使帕特南和汤普森这样活跃，以致老一辈的人仍然还在无限深情地缅怀这位“伯爵”？

不过，尽管有这一切逗人发笑的古怪行为，旺夏茨基也决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着迷于自己的高升，而对家人和朋友很少表示关怀，直到他生命的后期有了自己的儿子之后，才有些改变。他永远也匹配不上马里恩的无私精神，也许他对她的无私精神并不领会。40年来马里恩对他始终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地容忍他在社会上的丑事、政治上的臭名、财政上的狂想以及多次不忠实的行为。要是没有马里恩，阿列克斯就可能和他的数以千计的同类人一样，去当出租马车的老车伕、搬运箱子的搬运工或口出狂言的醉汉。

不管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作为堂吉诃德式的失败者看起来有多么可笑、可怜，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国家，他们很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不止一个小丑捉弄过他从前的观众。当年许多人曾讥笑那个长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的奥地利人企图占领慕尼黑一家啤酒馆，如今这些人中仍然活着为此而懊悔的还有多少？俄

国法西斯分子同纳粹分子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而后两者是他们的同代人。旺夏茨基善于吸引观众的技巧在墨索里尼身上有相似之处。罗扎耶夫斯基的辩才酷似希特勒的辩才。米哈依尔·格罗特的反犹叫嚣，与罗森堡和斯特雷切尔的反犹叫嚣一唱一和。如果有机会，博洛托夫也许能够填补希姆莱或贝利亚的位置。

然而，俄国法西斯分子同纳粹分子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不一样，他们缺少成功的外部条件。他们不是在反对一个僵化的君主国或正在挣扎的共和国，而是在反对一个极权国家，这个国家由无所不在的保安机关维持其治安，由世界上最大的常设军队保卫其国防。斯大林当然也不是兴登堡。其次，俄国法西斯分子本身也是散居全球的俄国人的一分子（同他们所嘲弄的犹太人一样），缺乏独立的、地理上紧密结合的行动基地。没有根底，这使他们依附于外国政府，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他们没有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帮助就不能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变得清楚了的时候，俄国法西斯分子就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不可解决的道义困境中：他们是民族主义者而又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外国对自己祖国的入侵。他们的尴尬处境最后又发生了另一个有讽刺意味的转折：俄国法西斯分子被他们自己的恩主所毁灭或遣散。

俄国法西斯运动是不是苏联的一条战线呢？盖世太保认为是。日本宪兵队和外务省同意一半。不管这个问题多么诱人，在没有得到苏方档案之前不能予以回答。众所周知，罗扎耶夫斯基的一些最亲密的副职官员是苏联特工人员。但是，难以想像旺夏茨基是以哪种身份进行活动的，虽然他为

了换取自由自在地出风头的机会，肯定是愿意扮演妖魔鬼怪的。

俄国法西斯运动的重要意义可能就在于：它模仿它的主要敌人来铸造自己的模型，并以崇拜他的主要敌人而告终。